

經濟叢書

計劃經濟與
非計劃經濟

吳均著
王世憲譯

Barbara Wootton 著
王世憲譯

經濟叢書

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受人番號：

受入日：昭和

請求號碼：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



譯者序

本書作者是一位英國經濟學者吳頓女士 (Barbara Wootton)。她自己著這本書並沒有做序。現在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內容，作簡略的介紹，以明我譯這本書的用意。我以為這本書的長處有兩點：第一，是很客觀，第二是很深刻。所以說他客觀，因為他把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做一個比較的說明，分別分析這兩種經濟制度的性質，過去的利弊，及其將來的發展。他並沒有偏見，使讀者看完這本書不至於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我所以說他深刻，因為吳頓女士的觀察力非常細緻，尤其在最後一章計劃經濟成功的條件裏，她說得很透徹；認為要實行計劃經濟，要顧到一個國家的經濟背景，要顧到人民的智識能力。近年來國內主張中國應實行計劃經濟的，頗不乏人，但實行計劃經濟的先決條件，則鮮所論列。為全國通盤計劃機關的設置，經濟建設專家的培養等，都是先決的問題。吳頓女士是贊成計劃經濟制度的一個人，她以為英國要根據英國的國情，實行一種英國的計劃經濟，不能完全抄襲人家，這點值得我們大大注意。我覺得這本書雖然偏重英國事實，然以例類推，頗有足供吾人借鑑之處，所以我把他翻譯出來，介紹於國人。

瞿菊農先生介紹這本書給我，張君勳先生督促我的翻譯工作，黃卓先生替我校閱，並此誌謝。

目錄

第一章 非計劃經濟之性質

- 一 導言……………一
- 二 價格如何決定貨物之分配……………四
- 三 價格如何決定產物之種類與數量……………九
- 四 工資價格對於勞工分配之影響……………一一
- 五 價格對於資本使用之影響……………一六
- 六 國營事業與價格經濟制度……………二三
- 七 經濟決定之性質……………二七
- 八 價格機構之性質……………三二

第二章 蘇俄計劃經濟之性質

- 一 無貨幣會計制度之失敗……………四二

二 攤配制度……………四六

三 工業概況……………五二

四 工人供求分配問題……………五八

五 農業概況……………六四

六 蘇俄經濟制度下供求之情形……………六八

七 結論……………七三

第三章 非計劃經濟之成績及其可能性……………八〇

一 價格經濟與不平等現象……………八〇

二 效率問題……………八五

三 以求利潤為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說之批評……………九一

四 霍布孫以投資過剩為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說之批評……………九八

五 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對於將來情形預測之錯誤與貨幣制度之不當……………一〇四

六 干涉問題……………一一五

七 生產過剩為矛盾情形之一因……………一二〇

八 局部與全體之利害衝突為矛盾情形之一因……………一二六

九 結論

一三〇

第四章 計劃經濟之功績及其可能性

一二二—

一 計劃經濟成績之略述

一三二—

二 計劃經濟制度之效率問題

一三六

三 失業問題在蘇俄

一四二

四 通貨膨脹政策與蘇俄

一四四

五 生產過剩問題在蘇俄

一五四

六 計劃經濟制度對於矛盾情形之補救方法

一五九

七 計劃經濟具有避免失業蔓延之可能

一六五

八 儲蓄與投資問題

一七一

九 計劃經濟有避免離心力現象之可能

一七五

十 結論——蘇俄經濟制度之展望

一七九

第五章 將來如何

一八一

一 共產黨之社會哲學——唯物辯證法之應用

一八一

二 共產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衝突之原因

一八八

三 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共產制度之可能性……………一九三

四 汎西斯主義……………一九六

五 資本主義復興之可能性……………一九八

六 資本主義之崩潰與今後之繁榮問題……………二〇二

七 蘇俄經濟制度前途之推測……………二〇八

八 社會平等問題……………二一三

九 政治制度問題……………二一七

十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計劃經濟制度之種種問題……………二一九

十一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計劃經濟後之社會組織……………二二六

十二 改進社會組織之和平辦法……………二三〇

十三 改造社會不可以革命為手段之三理由……………二三七

第六章 計劃經濟成功之條件……………二四五

一 實行計劃經濟所需之智識與使用此智識之能力……………二四五

二 中央計劃機關……………二四九

三 生產工具應歸計劃機關所有……………二五五

- 四 計劃經濟與價格機構……………二五九
- 五 計劃經濟制度與經濟動機……………二六五
- 六 實行計劃經濟國家之自給問題……………二七七



上海圖書館藏 文書 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

第一章 非計劃經濟之性質

一 導言

人們向來取笑社會主義者，說他們無論答覆任何問題，或是應付任何批評，總是要提到廢除資本主義制度這句話。但是若加以追究，他們時常不能用十分確定的詞句，來解釋這句話是什麼一個意思。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造成資本家的要素是什麼而解除這些要素時，纔能把資本主義制度廢除，纔能表示我們並非徒然在資本主義的演進途中，作進一步之進展，這些都不是他們所能解釋。同樣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含義的模糊，也時常加以攻擊。據社會主義者的意思，若以社會主義來代替現實的社會，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愉快的結果。好像一個啓示者一樣，很肯定的表示，自今以後，不會再有所增加了！人們還攻擊社會主義者，說他們要想在他們聽衆的腦海中，裝滿社會主義的理想，希望其明瞭的程度，可以同在他們自己腦海中一樣。

本書主要的目的，是要將今日世界上正在實驗中的社會主義，與英、美、德人民所生活下的經濟制度，作一比

較；並且要注意到將來這兩個經濟制度，所要發生的關係，所以在開始的時候，至少要花一部分的功夫，來準備應付人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幾個攻擊。換句話說；我們要想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是比較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我們必須先要完全了解，每個名詞的準確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們的比較，僅限於他們主要不同之點。我們不要忘記，所謂資本主義，是過去的資本主義，和今後的資本主義，一樣的。而在蘇俄所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是具有隨時準備加以變更的特性的。今天通過一條法律，明天可以通過另一條，與之完全相反。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不是一個靜止的宇宙；並且這個宇宙，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完全與他本身相一致的，或者能與他自己的原則相一致的。我們開頭所先要明瞭的，是這些原則的本身，而不是這些原則在應用上一致不一致的問題。應用的問題，可以留在以後討論。我們目前應當將宇宙內比較永久的，與比較普遍的原則，同比較暫時的與比較特殊的原則，劃分清楚。我們做了這一部分工作之後，纔可以認識比較的這個字的重要。世界上並沒有至終不變的東西，我們目前所作的比較，認為最基本的，也許在將來看來，是辨別不清的。目前有許多共產主義的青年，正在爲了這個比較，與奮着；同時也有許多他們的敵人，正在很切實的準備着流血。我們把這兩個勢不兩立的經濟制度，按放在相反的地位上劃分爲南北兩極。此後我們就要隨時準備留意在這個地球上，要發生各種激烈的或和緩的可能的變化。這個變化，到了最後，也許要將我們現在所小心繪製的地圖毀了。關於這種種可能的變化，將於此書以下各章述及。我們目前的第一要務，是要先把這個圖製好，這是我們要討論到將來各種驚人變化的主要初步工作。

很優偉的，自從近幾年蘇維埃的俄國出現以來，這個初步的工作，比較容易了！社會主義者，現在不能再有所藉口，說他們不能解釋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這兩個名詞的意思。蘇俄已經產生了一個大家所公認為，無論如何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者不必再替他們的理想世界，建造空中樓閣了！自然這並不是說，一定要把某種社會主義的理想，來和現在蘇俄的實際狀況來證合，事實上還差得遠。但是整個的問題，為之簡單化不少。要解釋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不但可以有一個相反的實例相比較，並且可以有二個相反的實例相比較。過去的社會主義者，欣然具有喜色的說，在我們世界內，並沒有所謂貧苦、失業、以及貪利之徒、浪費財物的情事，這些現象，都應當變更。但是反對社會主義者，要答應他說，這些事情，可以實現麼？兩個人辯論結果，總要談到人類本性，是否有變更的可能性的死路上去。到了今日，這個辯論，至少可以由兩方共同進一步發問：（假使他們都是要尋求各人理論的真理，並不是要亂意氣，證明他們自己的主張。）在蘇俄還有這許多不良的現象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反面的。假使是正面的，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再想一想，並且要想法子去追究到底蘇俄所試驗的經濟制度，是否已經達到他們在創始這個制度的時候，社會主義者對於他們所預期的結果。或者蘇俄這套制度，簡直完全不是社會主義者所預想的制度，乃是另外一個完全不相同的制度。在這時候，社會主義者一定要想法子找出蘇俄的制度，與他們自己的藍本，有何不同的地方。或者社會主義者，以為在蘇俄人民手裏所感棘手的這套制度，假使在德國人，或美國人管理之下，一定可以順利進行的。假使答案是反面的，那麼這兩個辯論者，一定要尋求蘇俄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到底有何不同的地方，而能引起此種美果。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一定要私自暗想，他們

是否可以只抄襲共產主義之某方面，而仍然能够保存他們所知的世界中他們所愛護的老原則，使其本質上不變其舊有的面目。

人們往往好在經驗的境界裏，尋求例證，以稱合其一己的主張，以尋求其因果之關係。比方說；我們很喜歡的認為十一月選舉以後，失業情況之所以改善，乃是由於政府的改組，其實在事實上，這不過是聖誕節大家爭購禮物的一種季節影響。這種援引例證的智巧，固然有他的弱點，並不是一種完滿的辦法，並不能避免他的危險，但是總比沒有事實，可以援照好些。過去社會主義者，與個人主義者所作的辯論，即使是用科學的精神來伸說，總是免不了陷於走不通的路上去。因為在個人主義者方面，其所引的證據，都是根據經驗，而社會主義者，都是根據理想。

二 價格如何決定貨物之分配

有了上面這一段小引，我們可以從事尋求，目下這兩種相反的經濟機構的主要特徵何在。這一章所討論的，僅限於非共產的，與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機構。關於蘇俄的，與有計劃的經濟制度的機構，留在下一章討論。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目下我們所要討論的，僅限於經濟的機構，只限於推動工業機輪週轉的那個機構。(economic mechanism)。無論其為何種機構，他的機能，是像蘇俄的計劃委員會那樣，可以為蘇俄人民決定一切。明顯一點說，就是像一年要製幾雙鞋，要出幾噸煤，你我的工資是多少，何處應當開設新工廠，何處應當開闢新道路，等等問題，都在他決定範圍之內。在一個非計劃的機構之下，這種種問題，應如何整個決定，固然無人專負其責，但是其需

要有一種方法去決定，還是一樣的。

事實是這樣子的，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居中決定一切的，是價格。或者更明顯一點說，是價格的變動。這一點，恐怕是任何經濟學者所知道的，就是對於這問題，無甚研究的人，大概也略知一二。但是這個價格的機構，到底如何發生作用，他對於非計劃經濟，是有如何絕對的重要，恐怕不是一般人所深知的。

價格變更的第一個主要機能，是在調劑有限的供給。世界上的東西，還很少能有充分的供給量，使人人都能無限制的使用，還不能像在威廉莫里斯 (Wm. Morris) 的 *News From Nowhere* 故事裏邊，所講到的那樣：有一個人，走到一個舖子裏去買香煙，煙斗，使他覺得驚訝，那裏並無所謂購買這件事。他僅僅說他所要的東西，香煙和煙斗，就應他的要求，是他的了。這種世界仍是如莫里斯 (Morris) 所說的，尚在不知何處之中。這種世界，不能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並不能在蘇俄實現。蘇俄在革命後無貨幣的會計 (moneyless accounting) 時代，曾經有過與這個相類似的試驗，結果形成一團糟的現象。

蘇俄固然並沒有完全放棄，能達到有充分供給量的夢想，但是他們承認，在供給量仍有缺乏性的時期中，一定需要一種可以調劑，或是分配供給量的制度存在着。所以他們同我們一樣，凡不具有特殊引誘性，能使人類作過分要求，或是個人的過分消費，不至於引起過分浪費的東西，纔讓人盡量的享受。例如平時家庭裏水的消費，及道路上的路燈使用等等。除這些東西以外，調劑分配的制度，是必需的。我們知道，任其近代的工業，存有多麼大潛在的生產能力，還沒有發展，但是供給量的缺乏，不能容許人人都能無限制的去使用生產品的現象，總是存在着。

的。我們固然承認假使我們的經濟制度，能有充分的發展，一切東西，可以達到消費者手裏的數量，一定比現在為多。但是我們懷疑，縱使所有失業者，都有了工作，所有科學上發現的技術，都盡量的利用，我們在二三年之內，除倍增現在貨物的出產量之外，還能有何種別的貢獻。

僅僅倍增產量，是無用的。假使要把這些東西分給人家，一定不够分配，我們非但不能將其分與消費者，且亦不願。單以英國職業階級一份子的生活程度，同一個替職業階級份子造房子，掘花園的工人的生活程度相比較，就知道假使我們大家都有了不必花錢，可以得到任何東西的機會，僅僅倍增消費物的產量，已是沒有用處的。而況這班職業份子在實業家銀行家眼裏還是窮得可憐呢！換句話說，欲供給量與慾望的關係中能無缺乏的情形，恐怕還要等很久纔能實現，所以我們在預期中所要實現的經濟制度裏，調劑或分配供給量的制度，還是占一個主要的部分。

價格調劑供給量的作用，是非常簡單的，在價格增高的時候，消費為之減退，無力付價的人，就無力實行購買，或者只好減少他本來所要購買的數量。在價格降落的時候，市場上增加了一批新的消費者，舊的消費者，心裏認為現在是我們可以多買一些這個，多買一些那個的機會了；這種價格高低的操縱，供給量隨之而大小，在理論上很可以使社會的人們，按着這種變動，永遠能如他們的願望，向鋪子裏去買他們所要買的東西，並付以相當價格。同時在實際上也差不多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很少發現無論我們出多少價錢，而買不到我們所要買的東西。在成千成百的貨物中，無論是一磅糖，或是一雙鞋，總可以擔保凡是你所需要的，馬上就可

以爲你預備好。但是這不過是表明價格的機構，如何可以很有效的避免需要超過供給，價格機構調劑供給量的機能，實際的情形，是可以與理想的想像有發生差不多同樣的效力。

但是從與這個相反的一方面看來，這個制度的成功，沒有這樣大。我們目前就隨時發現舖子裏所存的貨物，其數量多過人們在目下所定的價格下所能購買的數量。所以商人費了許多時間、金錢和精神，去引誘人們去購買人們不大願意花這許多價錢，去購買的東西。還有許多東西，是人們雖然受盡兜攬者的花言巧語，同奪目廣告的引誘，也還是不願意出價去買的。但是推究他們所以用兜攬的方法，其唯一原因，乃是因爲在賣者方面，不願意用太低的價格，去引誘人們。因爲他們的利潤，根本就沒有了。並且有時候，他們簡直還要虧本出售，他們不願意再增加他們的損失了。其所以發生這種混亂現象的原因，容在以後各章詳述，目前我們姑且把他當作現存的狀況看待。

在這種狀況之下，假使存有貨物的人，願意以極廉價格，把貨物出售。到最後沒辦法的時候，就是得不到一個小錢，他也願意出售。在那個時候，假使他所存的貨物，是有用的，他一定可以把貨物全部售清。在每次價格降低的時候，都有新的購買者發現，這完全是一個價格問題。自然有幾種貨物，在價格降低的時候，其需要量的膨脹，比別的貨物，擴張得快，同時人們所欲購的東西，自然也並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阻止一般消費者，不去購買賣者所急要賣的東西，乃是價格在那裏阻止着，並且價格是唯一的阻力。這點我們很難尋出一個例外。這種不好的現象，所以發生，不是因爲價格調劑制度本身，失了效力，乃是因爲我們不能夠，並且也不願意，讓這個制度，有自由統制的力

量。這兩點的分別，應用在目前實際情形上面，似乎不過是一種字面上的分別而已，其實在理論上，是很占重要的。對於我們以後的討論，有許多幫助的地方。價格增高的時候，貧窮的消費者，一定感覺缺乏之苦；價格低落的時候，現存的貨物，一定可以有新的脫售方法。不過這種現象的發生，要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上，永遠不要用任何法子去阻止價格作極端的變動。我們要記得，任何東西，並沒有絕對的需要性，很危險的，現在有許多人們，卻把這點忘記了。在甲種價格之下，有甲種的需要；在乙種價格之下，有乙種的需要。價格高，需要小，價格低，需要大。

這樣子下去，年復一年，價格機構，很可以把貨物分配得很好，平衡了需要和供給的關係。目前世界經濟，所以發生走不通的現象，乃是表現價格的機能，運用得太不得力了！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不得力的現象，程度上固然是特別深，不過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並不只有這一次。目前走不通的現象，還只能算是一個相對的失敗，乃是表示世界上為消費者的需要而生產的東西，其中有百分之幾，沒有法子分配給消費者。這個百分數，自然很大，但是這種失敗，仍然是一種例外，並不是一個定例。假使沒有價格的力量存在着，恐怕事態之壞，有甚於今日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下的人，所能忍受的。

所以處現在情勢之下，我們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所謂價格的機構，可以把貨物分配得很有效，與所謂價格機構，可以把貨物分配很正常，這兩種說法，是完全不同的。進行得很順利，是一件事；進行得很正常，又是一件事。普通人，把兩者混為一談，並沒有什麼好處，徒足以造成一種阻力，使兩者得以並存的好現象，不能產生。我認為假使有一個人，盲目的向雞場裏擲進一把食料，這種分配法，既非有效，亦非正常，其結果將要受捷足先登，與強權即

公理兩個原則的支配。那些雞子爲要爭先搶奪一粒穀子，一定要費了許多力量，來往互相爭鬪。一個有經驗的養雞家，一定要在喂雞以前，把雞都聚在一起，其強大敏捷者，給他多一點。這雖然不能算是一種正當的分配，但是總比較的有效些。自然養雞的人，也可以顛倒次序，先喂其弱者，而讓其強者餓着，這也不失爲一種有效的分配方法。不過這也不能算是一種正當的辦法。關於正當的分配方法問題，這裏暫且不談。

三 價格如何決定產物之種類與數量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僅限於用價格機構，來調劑我們普通所認爲，在鋪子裏出賣的貨物供給量。自然這並不是價格機構所能調劑的唯一東西。土地和房屋，以及其他比較有永久性的東西，要付租錢，其作用是一樣的。在繁華的區域，可以用以住家的地方，總比較人們所需要的少些，於是租錢增高。凡是能够付得起那些租錢的人，纔能享受那個供給量。凡是不能或是不願意出那些租錢的人，自然就不能列於這部分消費者範圍之內。同樣的，假使地主，或是房東，過於擡高他們的估價，他們也就很難的找到房客。這也是因租錢上下的力量，（就是價格）使供給與需要終歸於平衡。

提到這一種價格調劑的機能，我們發現價格的變動，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作用，並不僅僅能够按着消費者的慾望，與能力，對於各種貨物，予以分配。因爲像地產、房屋這類東西，在房客或購置產業的人，與房主或地主接洽，購買的時候，各種不同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利用他們所購買的產業。一塊地可以用以建築電影院、房屋、禮拜

堂、學校、工廠。假使唯有一個電影院的經理，纔能够出地主所定的租金租那塊地，那麼那種租金之規定，已不止是將那塊地分配給他個人應用，同時也就是間接的擴張了電影業的供給量。換句話說，本來在那個地方，可以增加一排房子，或是一個禮拜堂，或是一個學校，或是一個工廠，現在增加了一個新的電影院。

換句話說，價格機構的第二個作用，乃是決定將要生產什麼。價格的變動，可以調劑已經生產出來的貨物的供給量，同時還可以決定某種供給量應當不應當生產，在什麼時候，某種貨物的生產，應當停止。在蘇俄，他們的政府，決定在某一年內，應當紡織若干碼的棉布，他們就在五年計劃的某一頁上，將這個好議決案，加以公佈。在英國，就沒有這種的決定，不過英國的棉布，乃至於其他貨物，也是要到某種數量，而停止其生產的。這個數量的數目字，是從價格變動的結果裏表現出來。比方說，我們所以增加稅的產量，而減少煤的產量，其樞紐乃是在乎價格的變動，表示在那種價格變動之下，這些貨物，纔可以製造，纔能出售。我們的理論，認為假使某種貨物的需要增加，那麼消費者對於那種貨物所願意付的價格，一定是靠得住的，或者還有增高的希望。同時價格的變動，還可以引起生產那件貨物的生產者的注意，於是新的供給量，一定就要應着新的需要，而增加。同樣的，假使在某種價格之下，生產者認為再增加一小片的供給量，也是不值得的，那時候，那件貨物的生產，一定要停止了。一九三二年，英國煤的出產量，為何只達到二〇一，四七三，二九九噸，而不達到二〇一，四七三，三〇〇噸，或者二〇一，四七三，二九八噸，乃是因為從實際情形，與推測的理想兩方面，按着煤的出產量，與煤的買價的變動看來，二〇一，四七三，二九九噸，是有利的，二〇一，四七三，三〇〇，是不會有利的。其他各種工業的終止點，都是按同樣的力

量，而決定。同時其他各種工業的出產量，也是受同種原則的支配。比方說，在大戰時候，我們所有的工業，此起彼繼，全部開工；在目前的時候，我們所有工業，都因生產過剩而停止，與停機。這兩種現象，都是受同一個原則的支配，這個原則，並不受那種意義含糊，所謂「有利的生產」或「引人注意價格」的口頭語的影響。現在我們只須承認在價格引人去注意的時候，那個價格，一定是可以注意的。換句話說，在價格刺激人們，去經營某種事業，或去生產某種貨物，或使人能有所經營，或者所生產的時候，那個價格，一定是可以注意的。

四 工資價格對於勞工分配之影響

我們現在討論一些，關於價格決定生產的種類，和生產的數量以後，所發生的幾種結果。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價格有決定，我們應當從事何種職業的力量。因為要成就一件事物，必先有人願意去做那件事，並且要有人能夠去做那件事。但是在我們經濟制度之下，醫生、縫衣匠、礦工、護士、女招待等供給量，是否已經够用，或者是否太多，也同這些人所生產的事和物的供給量一樣，兩者都不見得預先有一個整個的計劃。我們只是覺得隨時都有一定數目的人，去從事這些職業，去尋求這些職業，這裏邊有一問題在，就是我們如何能夠使這個數目，正好那麼多，也不過多，也不過少。

很明顯的答案，就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都是由於命運（好的壞的）機會、遺傳、能力、及其他一切不能計算的社會力量，共同造成的。但是假使人之所以為人，僅僅是如此，並沒有任何別的力量，使得

人們向某種事業去努力，所謂沒有一種合理的制度，在那裏支配着，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恐怕老早就比現在還利害了。同時在各種職業工作人員的供給量，與各種職業對於這些人工作的需要中，恐怕也不會有何關係了。但是在事實上，任何企業，在任何時候，雖然都發現工人供給與需要，不能平衡，並且在某種時期內，工人失業的現象，還覺得特別利害，可是成功的現象，仍然比失敗的現象普遍些。所謂成功，是指一個僱主，可以如其願，找到許多工人，一個僱傭也可以找到僱主去僱他。並且我們於此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種成功的程度，在人們職業有極大變動的時候，特別顯著。不過人們在職業變動的時候，同時人們的消費，也不須要有同樣的變動，或是準備發售的貨物的性質，也要變動。

五十年以前，從事製造無線電機件，或是汽車零件的工人很少，從事於工業化學的人更少，僅是耕地的工人比較多，可是到了現在，不知怎麼的，前者忽然增長，而後者竟是消滅。

形成這種變動的唯一機構，又是價格的變動。興盛的企業，用改善報酬的法子，來吸引一批新的工人，使他們的收入，可以比他們在原来的企業裏，所能得到的多，於是這批新的工人，在發現他們，或是他們的兒女，可以在別的企业，得到較多收入的時候，就自然放棄了他們原來衰落的工業。所以事實上各種工人的分配，就是以付給各種工人的價格比率的變動，為依據。不過在這裏所謂工人價格的含意，是廣義的，不只包含各種職工所得的工資而已。因為凡是一種職業，其吸引工人的力量，或大或小，除工資以外，還要許多別的要素，要顧到的。如工作的性質，工作的時間，位置的保障，以及其他一切。假使我們明瞭了工人價格廣義的含意，我們就可以很正確的說，在一個

非計劃受價格支配的經濟社會中，工人的價格，是支配工人分配的工具。

從這句結論，我們附帶的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推論。就是說，我們應當把工資或者薪金，或是其他合法的收入，當作兩件事看待。第一：工資是一個人，做了某件事後，所得的報酬，假使是一種不勞而獲所得的報酬，那麼就是某件事他允許別人去做的。第二：工資是一種工具，使人去做某件事，或者允許人去做某件事。這兩點的區別僅在其着重之點，但是這個不同之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假使我們不顧到第二點，我們的經濟制度，將要崩潰無餘。平常的人，往往把這點忽視了，是很危險的。社會上一般人，除經濟學者以外，凡談工資比率，及所得分配的人，都僅僅顧到工資第一個作用，把他當作報酬看待。我們平常覺得我們的工資不夠，其原因不是因為那個報酬，不夠我們生活上的使用，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報酬，比別人少，那個人是我所不欽佩的。我們時常咒罵現社會的不公平，富者少，而貧者多，不做工的人，反而可以得到鉅量的收入。但是假使我們要想消除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我們立刻就注意到工資的另一個意義了。假使根據人道主義來說，於某種生產品需要減退的時候，而把那種生產品的工資增加了，在那種情形之下，不是要發生一方面工作機會減少，而另一方面尋求工作的人，反而增加的險象嗎？假使有一個守財如命的僱主，開設一個工廠，同是一種的工作，他的工人的工資，定得比市面低少百分之二十，你想除在失業狀態嚴重之下，他能找到工人嗎？根據這種種的考慮，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工人分配背後，是要靠工人比率的力量，在那裏支配着，不過人們時常把這一點忽略了，忘記了，所以除非我們能夠發明別的東西，來代替替這個人量，我們就不能不利賴工資，來支配一切。

工資的作用，處現實社會之下，雖然因為受機會分配不均，及社會各種偏見的阻礙，運用得很不靈活，但是其足以支配工人的分配，還是一樣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絕不能僅僅因為經濟上的利益，可以自由的放棄了漁業的生活，去市府音樂隊去做彈琴的工作，我們更不能因為裁判所長 (Lord Chancellor) 每年能得一萬鎊的薪金，做律師的，每年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我們就放棄茶房的職務，去做律師。工資之不同，多半是受社會上，分為各種社會階級，與經濟階級的影響。某一階級工人價格的變動，僅能影響到某一階級內的各份子，或者僅能影響到與某一階級相接近的階級裏去。但是任其有這種種的限制，工人價格，仍不失為一個唯一的力量，使工人能得到恰當的分配。

換句話說，這些限制，所發生的影響，使得價格經濟制度，不能循着他自己法則去進行。這就是說，按價格經濟制度的原則，價格增高，供給必需增加，價格減低，供給必需減少，現在受這種種限制，不能按着這個原則進行了。我們試想想看，假使這個法則，果然如理想所期望的實現了，那麼這個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這就是說，假使任何工作的工資，都能很有效的支配工人的供給，在某職業工資高的時候，可以很快的吸收進來一批新的工人；在工資減少的時候，連已有的工人都減退了，那麼這個社會，要變成什麼樣子？很明顯的，這種現象，不能實現，除非所有的職業，都可以很自由的，讓任何男女人們來擔任，任何專門技術的訓練，都可以不必有任何花費的，可以學到。但是我們還要想想看，假使目前所有限制價格自由支配工人分配的阻力，果然能够如以上這個辦法，消除了，那麼在目前經濟制度中，工人的分配，一定要從頭到底的，發生一個大變動，工資高的，減低了，工資低的，增高了。其結果要

產生一個近乎大家平等的社會，至於其不平等的現象，仍然存在，其原因不是因為某種工作的吸引力，超過別種的工作，就是因為某種人不能受某種職業的訓練，或者是受別的種種臨時原因的限制。比如某種工人的分配，因為要適合時代的需要，而必需加以變更，或是因為何種工作是好，何種工作是壞，失了一個共同的標準。換句話說，我們很可以認為，假使我們能夠按着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固有的法則，去運用一切，其理想的結果，是含有大家報酬，可以均等的傾向，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與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問題，似乎沒有多大密切關係，並且這也不是表示，在經濟組織沒有發現其他變化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達到報酬平等的目的。如其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會引起極大的混亂。工人的供給和需要，無論在任何經濟範圍中，都要大失其均衡。所謂假使價格經濟制度的法則，能夠實現他的理想，我們就可以漸漸的達到報酬的平等的目的，與所謂把報酬均等的法則，介紹到價格經濟制度裏去，是不同的。因為價格經濟制度，並不能循着他自己的原則，去運用一切，所以報酬均等，是很明顯的辦不到的。

所以各種不同的工人的分配，實在是受價格變動的支配，不過在這個支配的方式中，含有許多不可計算的人事的結果。平常還有人認為價格變動，對於工人的影響，還不只如是。若就比較低等的工人來說，報酬之足以支配工人的供給量，並不是就各種職業，予以個別的支配，乃是就所有的職業，予以整個的支配。按照這個理論，他們認為工人的生育率，應當以他的工資的增長為比例，即使這個比例，不能完全實現，至少在已生出來的小孩中，那些小孩，是否能夠長大，要與他的工資的增加，成正比例。不過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論斷，只能適用於工人階

級，而不能同樣的適用於富人階級。富人優越的收入，爲什麼不因爲富人生育率的較速，而消除。要答覆這個問題，其答案甚爲簡單，同答覆別的問題一樣。因爲研究工人習慣的理論家，並未嘗想到他所研究的對象，也是與他們自己血肉一樣的血與肉。不過無論如何，所謂工人的總供給量，是受工資價格支配的理論，現在已沒有他的地位了！人們並不是按着需要與供給的法則，支配他的生育率，假使人們還要遵守這個法則，擔保他要失敗。因爲工人的新供給量，要想出現於工人的市場，非等到一個小孩，生長到十四歲又九個月之後，不可。可是在那個時候，恐怕工人需要量，已減退了！至於說工人兒童的生育率，同工資的比率，成正比例，這部分理論，似乎有一些理由，不過也不能完全成立。因爲最容易因生活景況的不佳，而致於死亡的，是極小的嬰兒。這個嬰兒生存的力量，是與他的父母收入的增加，相並進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需要的增加，與工人供給量的增加，兩者之間，還是有一種接不上的現象，還是同前一個理論一樣的，不能成立。總而言之，我們要以爲工人的總供給量，是受工人價格的支配，這個理論，是無意義的。爲實用起見，一個經濟制度，應當把所有工人的總供給量，當作一種理論上的根據看待，並不能由他自己來控制的。

五 價格對於資本使用之影響

現在要談到另外一個理論，這個理論，與上面所談的，有些相同，不過從這個理論裏，我們可以發現價格機構，又應用在另外一種經濟活動上，又在另一方面，支配了一個其他很重要的經濟問題。這就是說價格不但足以影

響勞工的供給，與勞工的使用，並且還足以影響資本的供給，與資本的使用。近代工業，不但需要勞工，並且需要鉅量工廠，與購買材料的費用，所以在生產這些設備，與生產滿足人們慾望的製造品的中間，必需要保持一種均衡的狀態。換而言之，在滿足目前慾望，與儲蓄以待將來之需要的中間，要保持一種均衡狀態。我們細細的考察，無論是共產制度，或是資本制度，他們都要花費一大部分的精力，於間接的生產事業，或是從事於建設的事業，或是發起新企業，以擴充其他的生產事業。目下共產制度，在這方面的努力，已超過資本主義多多。

這種生產，他們名之為旋迴的生產方法，不過要從事這種生產，需要幾種條件，非實行資本主義社會裏，所實行的那種儲蓄與投資的辦法，或是與這辦法相類似的辦法不可。這種辦法，平常人謂之為兼程並進的辦法（*Double Process*）。儲蓄之所以需要，乃是因為，諸如鍋輪、縫紉機、這類東西，並不是供直接消耗之用，凡製造這種東西的工人，須靠着麵包匠、縫衣匠們，所生產的東西，來養活着。假使麵包匠及縫衣匠們，吃盡他們自己所做的麵包，縫衣匠穿盡他們自己所做的衣服，這種建設事業，就無從着手。所以從事這類製造建設事業的工人的工作，含有儲蓄的意思，他們的生產，並不是直接由從事這件生產的生產者，或是受這些生產者伺候的人們，一下子把他消費完了，要有一部分，留着貯積起來。所以在這時候，節制和儉省的好習慣，是需要的。節制是指大規模的節省資本的消費而言；節省是指小規模的個人節省而言。自然這些良好的習慣，假使要實行過了某一種程度，無論對於個人，或是對於社會，都要發生壞的影響。但是凡是明白的人，絕不能否認某種限度的貯積，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工業，所必需的。

這個兼程並進辦法的另一方面，就是投資，其重要是一樣的。投資的意思，是表示將貯積的錢，去僱用工人，從事建設的工作，或是間接有用的生產事業。其目的並不把一部分現用的消費品貯蓄起來，以供從事建設工作工人的使用。假使沒有從事建設事業的計劃，這筆儲蓄金，就不會用到這些工人手裏。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儲蓄，只不外減少貯積者的收入，而並沒有增加其他任何人的收入。這種儲蓄，只不過是一種制慾主義，由一個度心者，多半用犧牲別人的辦法，來實行之。

這種儲蓄與投資兼程並進的辦法，對於人類的關係，非常重大。他可以減少某種人收入，增加某種人的進款，變更某種生產的性質和方法，他還可以使一塊荒地，變成生產豐盛的地方。俄國的大草原，所以能够變成像狄特惡（Detroit）的大道，也都是歸因於他。所以這個兼程並進的辦法，應當進行到何種程度，其中需要何種機構，把他們兩個連合起來，都是人道上與經濟上極重要的問題。在一方面看來，這些問題，好像只不過附屬於各種經濟決定中的一種決定而已。其實在另一方面看來，他是與支配勞工供給，與勞工分配的力量，很有關係。因為工人的分配，與工廠的供給，必定要能相符合，而後有了工廠，工人纔有地方去工作，有了機器，工人纔有器具去工作。所以這些問題的決定，無論是在計劃經濟制度，或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都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要看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如何決定。

要答覆這個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又要受價格機構的支配。儲蓄與投資之有價格，與靴子、貨物、醫生、人工之有價格，是一樣的。儲蓄者和投資者用他的所有的財產，去生產，或是允許別人去從事生產，他們從這裏邊所得的

報酬，就是他們的價格。這個價格，在外表上，是用利潤，或是投資所得的利息，來表現的。就儲蓄而言，可以說是受價格機構的拘束，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任何私人，在任何狀況下，多少也都有一些儲蓄。不但一個公共團體，一個公司，纔把他們的利潤的一部分貯積起來。儲蓄，差不多是一種習慣問題，或者是對於將來經濟的狀況，取信任的態度。過富的人，所以要儲蓄，因為他沒有法子，把他整個收入，都花費了。住近城郊的人們，特抵押購置他們的房產並且把他們的生命，投保人壽保險。做生意的人有職業的人，他們所以儲蓄，乃是希望他的子孫，可以承繼他的財產，如同要承繼他的腦子一樣。各種人儲蓄目的之不同，有如其面，但是他們之要從他們的儲蓄裏，得到價格的心理，可以說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想從他們的貯蓄裏邊，一年可以得到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四，或是百分之三，或是百分之二的利息。有些人爲他自己老年時候打算，就是在貯蓄價格低的時候也情願多貯蓄一些，還有許多人，隨着價格的漲高，而增加其貯蓄的數量。他們在價格高時，可以存百分之百，在利息低時，存百分之五，也不願意。這些人的貯蓄，真是完全受價格機構的支配。價格高的時候，他們的儲蓄，就加多，這種情形，正與在電氣業工資高漲的時候，爲父母者，都驅其兒子去做電氣學徒，或者在麥價高的時候，栽種麥的土地面積，即行增加的情形一樣。

可惜我們不能很準確的計算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儲蓄的總數中，有多少的儲蓄量，是受以上各種力量的支配。尤其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是完全受供求的法則的支配。不過我們可以認定，在利率增高的時候，儲蓄的數目，總是增加的。政府方面，要想抓住人民的貯蓄，就要這樣的相信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大戰的時候，英國政府，爲要使人民盡量的向政府輸將，避免人民把他們的收入，都花費了，就是用提高向政府投資的利率的方法，

來引誘人民。這是很明顯的表示，他們相信價格的機構，可以在這方面發生效力，政府債券的利息愈高，則人民愈願意借錢給政府。這種看法，根據經驗來說，似乎是對的，不過有人還可以說增高利率的用意，並不是要使人民，把他們本來要浪費去的金錢，貯蓄起來，而多半是在乎，使他們將他們要投資到別的地方的錢，轉歸到借給政府。換言之，利率的增高，是一種工具，用以支配各種用法不相同的貯蓄的分配，而並不是在增加貯蓄積累的總數。但是這種說法，是否能包括貯蓄的全部用意，不能斷定，只能算是一種猜想而已。據我的猜想，這種說法恐怕不能包括其全部的用意。人們見慣從前政府公債的利率是百分之二·五，今見增至百分之六，其積蓄的確比從前來得熱烈。這其中雖也有因愛國心熱，但利率的提高實是最重要的原因。

換句話說，在我們決定儲蓄，或花費的時候，與我們決定要製造小鍋子，或製造牛油的時候一樣。這兩種決定，至少有一部分，都是受同種原則的支配。這僅是就貯蓄而論，若是就投資而論，其受價格機構力量的支配，可以說是更大了。在近代複雜的社會裏，儲蓄與投資，時常分割很遠，有時候還要因分割發生不好的結果。比如有一個醫生，經一個公司的發起人的介紹，尋到一個耕地的人，纔把他所貯蓄的錢，投資在一塊土地上。凡是沒有直接經營生意的人，投資與貯蓄，都是要這樣分開，無論他是富者，或是窮者。可是在一個經營公司與做生意的人看來，他自己永遠沒有把自己的錢花去，因為他永遠是將他的利潤，回放在他的營業上。貯蓄與投資，都是由自己去辦，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儲蓄，去付工資，去付材料的費用；但是無論他們的投資，是由儲蓄原主自己來支配，還是由他所委託的人去支配，很明顯的，又是價格的變動，從中左右着。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投資和貯蓄的區別，是很簡單的。

投資就是使用一筆錢，去經營一種企業的代表，這筆錢的來源，是由於投資者本身，或是別人，不願意把這筆錢，用在自己身上，或是他的家庭上，而儲蓄來的。其所以儲蓄的理由，乃是因為投資者，認為他的企業，有發展的希望。假使已往投資的結果越好，則大家對於將來的希望越大。換言之，投資使用的價格增高，則投資的使用量，必隨之增加。假使所有用以經營新企業的儲蓄量，完全都用在投資上，則投資的收穫必好，同時一定可以吸引許多新的儲蓄量。同樣的，假使投資的利潤降低，則人們經營新企業的熱心，一定衰退，但是價格機構的作用，在這方面，同在別方面一樣，時常有一種錯誤發生，特別是在決定一件經營企業，與求得其金錢上之利益中間，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所以投資者自己所預定的數目，到了某種時間屆滿的時候，不一定可以完全實現，但是無論如何，一個投資者，或是想投資的人，他的眼睛，總是看着價格的變動而決定的。

還有一層，就是價格的機構，可以同時支配一般投資的供給量，與這供給量各種用法的分配。關於支配投資供給量的各種用法分配，是很明顯的。我們知道，金融機關，如證券交易所，金融報紙等等，他們一部分的時間，還有那些除衣食住打算外，還有餘剩精力的人們，都是注精會神，在比較投資於煤油，或是投資於肥皂的價格，那個比較好些，而後根據他們自己的最後決定，而發生適當反應。自然有少數思慮超越的人們，不去研究價格的變動，就可以決定，還是投資在製造啤酒上好，還是在軍火業上好。可是這種人，非常少，同時像這類性質的投資，可以使他們費躊躇的範圍，也比較的小。所以少數的例外，並不足以證明我們的理論，有何缺點。我們還是承認投資的分配，是受投資者對於投資利潤的反應力的支配。

關於價格構足以支配一般的投資供給量，還有一點，可以說的。照最近的發現，投資的供給量，因時不同，有很大的變化，並且不受尋求有利的投資的儲蓄量的限制。有時候，人們可以發狂的投資經營某種新的企業，有時候，就是你不要利息，也很難使人去擴張營業，或是經營新企業。這兩個極端，很難有法子去解釋。但是在一個細心的觀察者看來，總是相信這種現象，是基於人們對於投資所得的利潤的觀察而來的，雖然有時候，這個觀察，是錯誤的。換而言之，人們在看準了，他們的投資所得的代價之後，願意冒險把他的麵包，或是別人借給他的麵包，拋棄在水裏去。

由是可知，每一件工作的收入，或工資，含有兩種意義，就是維持做工者的生活，與支配某種工人的供給量，及其分配。不勞而獲的收入，也是同樣的有這兩種意義。從人道方面看來，一個工人流汗之後，所得的代價，與一個廠主，僅僅供給設備，與材料，去讓別人工作，而自己可以不必流汗，而得到代價。這兩種代價，是不相同的。可是在經濟方面看來，這兩種代價，是相等的。兩者都是代表完成了一個很複雜的經濟機構中，所必需的機能。假使不是用這個法子去完成他，一定要有別的方法，去代替他。不勞而獲的收入，無論是從地租，或是利潤，或是利息，或是版稅得來的，是同勞役而得來的收入一樣。第一，他也是用以維持投資者的生活；第二，也是用以支配投資的使用，及投資的供給量。在一方面看來，他們的利潤很大，他們可以變成富足的資本家，可以供做社會主義者畫譏諷畫的好材料；可是在另一方面看來，他們好像是一塊吸鐵石，可以使投資者，相信某種企業，可以得到某種利潤，於是就極力的去實行儲蓄。抽版稅的人所得利潤，他們雖然不能使不產煤的地方產煤，但是他們卻可以決定一塊地應該劃

爲產煤區，不應用爲種菜之用，雖則這塊地也可以產煤，也可以種菜。

六 國營事業與價格經濟制度

我們已經把非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幾個比較重要問題，如何受價格變動的支配，概括的說了一些。在這個概括說明中，我們發現了價格變動，如何支配已經造成的貨物的分配，如何支配這些貨物的生產，決定何者應當製造，何者不應當製造。同時並發現工人的供給和分配，如何受工資率變動的支配，及價格變動，如何可以使人們決定應當如何限制目前的消費，留待將來，以供更多的享受。我們並且看出這個價格機構的作用，在各種經濟決定中，有時候發生的力量較大，有時候較小。但是在價格作用力量較小的地方，我們還沒發現，有什麼別的力量，可以來代替他。比如就儲蓄而論，他並不完全受價格力量的支配，而發生反應，有的人，即使貯蓄的價格，降低到極點，他應當老早放棄儲蓄的習慣，可是他還拚命的去儲蓄，難道這也是價格的力量，在裏邊支配着嗎？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並不見得，有一種別的力量，去停止他們的儲蓄，或者用何別種的方法，使他們放在投資上。我們僅僅發現市政府方面，發出通告書，去獎勵大家，去爲尋求職業的人而消費，或者勸大家把錢用到幾種正當的花費上去，如佈置餐室，修理花園，購買新鞋等等。在這時候，價格機構的作用，很不見效，但是這並不是因爲人們不願意受價格機構的支配，乃是因爲人們不能受他的支配，乃是表現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注意資本制度本身，在原則上發生了自相違背的現象。一個教師的收入，比礦工的收入高，無論如何，自然會使當礦工的人，喜歡去當教師。但是事實

上因受階級及教育費用的限制，不能讓當礦工的人，達到他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主義，並沒有想法子補救。

以上所討論關於價格經濟制度的內容，雖然是很簡略，很粗糙，但是卻引起了經濟上許多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無論在任何一種社會裏，無論是有計劃的方法，或者是用摸索的方法，都要是想法子去解決的。這些問題的解決，決定了人們的生活形式，與人們的幸福。我希望從上面所說的這些話裏面，人們可以對於價格經濟制度的普遍性，及其潛勢力，得到一個簡略的概念。現在再舉一個例，或者可以把價格經濟制度的力量，更明白的表現出來。這個例子，並不是要表明在那個經濟範圍內，價格經濟可以支配一切，乃是要表明，至少在理論上，他不能超出價格經濟範圍之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並不是完全沒有非資本主義的企業機關，如由國家及公共團體所經營的企業機關。但是他們所經營的原則，有許多是同一般資本主義的公司一樣，所以他們也絕不能超脫價格機構的支配，舉實例為證。英國政府所經營的郵政局，他的營業方法，並不完全根本上同私人所經營的鐵路公司不同，兩者都遵守價格經濟制度的幾個重要原則，他們都是用營業所得的價格，來支配他們勞役的供給，他們所付給工人的工資比率，也是同其他同種工作的工資比率一樣。他們要想從中得到利潤。不過國營郵政局，同普通公司不同的地方，就是郵政局處於專利的地位，在營業上，比較容易成功。所以兩者只可以算是同一個屬類內，兩個不相同的種類，而不能算是兩個不相同的綱目。根據各種原因，如藉口企業之具有特殊性質與伴言索取代價而徵稅等等，所有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對於目前許多企業的營業，都負有相當的責任。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營企業的範圍，不止以上所說而已。政府所經營的事業還有別種，不由價格機構的支配。諸如關於我們教育上、衛生上、娛樂上、各種設備，及球場、游泳池等等，假使這些設備的供給量，都要受消費者所付的代價支配，恐怕至少教育就不會有了。這些事業，不受供求法則的支配，同上面所舉郵政局的例子，比較，自然只有程度的不同。但是這些事業，只要他是不受價格機構的支配，就可以表明在非計劃經濟制度裏，也可以有有計劃的事業，可以產生。社會上有一般人，認爲凡國家所做的事，不會有對的，又有另一般人，認爲凡國家所做的事，皆是對的。國營事業的適當範圍，到底是如何，言人人殊，人們永遠不斷的爭論着。這種爭論，是從一般原則裏產生出來，是永遠辯論不盡的。這個辯論，固然對於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沒多大重要，但是這是表明目前狀況之下，非計劃經濟制度，在他自己所管轄領域中，似乎失了支配的力量，所以新的問題，就應運而生。目前大家羣集視線到政府身上，希望政府能够想法子擴展他的活動範圍，可以安插現在在工商業方面沒有位置的人們。

在此種狀況之下，所發生的情形，實給我們以不少的啓示。政府當局，自然很明瞭他們所應負的責任。他們知道，僅僅爲僱用工人，而僱用工人，並不是好的辦法。任何計劃，一定要爲工人尋到有益處，有價值的工作，並不僅是安置幾個工人，去叫他們做掘溝的工作，回頭又讓他們把溝填起來。一定要使受報酬的人，認爲這是政府給他們的工資，而不是對他們施行施捨。所以政府方面的計劃，應當想法子一方面可以容納許多工人，一方面還應當在事業上，適合人民的需要。這些需要，是人民前此所不能享受的。許多人現在都是從這方面，向政府貢獻意見。十年之前，我充任一個政治團體裏面的經濟研究會會員，擔任研究關於幾個經濟上的計劃。我記得其中有下列這幾

個計劃：諸如開闢通過蘇格蘭的運河，利用 *Neyron* 的水力發電，修築新的道路，新的橋樑，及造林等等。我相信這些計劃，大體卻是好的計劃，我並且知道，在我之後，有許多政黨，還利用這些計劃，列為他們施政的方案。一九二九年，喬治 (*Lloyd George*) 代表自由黨，發表一個好計劃，改建 *Tale of Ely* 橋樑，也包括在他計劃之內。但是這些計劃，並不是好計劃。也許我們請一個從別的星球的人，來參觀我們的經濟組織，在他乍來的時候，會覺得這些計劃，是合乎人民的需要，是應當辦的。但是假使要叫他去參觀我們的貧民區之後，他們一定會同我們提議，多製造若干雙新鞋，增加若干鎊的牛乳，及內衣、鍋子、椅子、大房子等等。這些東西的缺乏，對於他們的印象，一定會比鑿運河、種樹等更深。

事實是這樣子的，政府要想發展有計劃的事業，是含有他的限制的。這些有計劃的事業，絕不可侵犯受價格經濟制度的境域。即是有了一個境域，價格的力量，已完全失其效用，可是政府也不可輕易侵入進去。政府一定要尋一個中立的境域，在那裏價格經濟制度，向來還沒有施行過他的力量。其所經營的生產事業，要完全合乎人民的需要。其經營的方法，絕不可像一般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樣，受一般商業原則的支配。凡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就知道要弄一個計劃，能夠適合這些條件，實在是不容易的。不過負責計劃的，假使能將這許多限制，予以留意，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完滿的結果。

計劃與非計劃，國營與私有，在這兩種制度之間，有許多可爭持的地方，建築房屋的計劃，可以供做一個好的例證。工人住處的供給，在從前差不多都是受供求原則的支配，但是現在政府極力向這方面想法子，想弄一個計

劃，把失業的建築者，和住破屋子的工人，歸併住在一個地方。不過即就這個國營的計劃而論，欲求其成功，一定要等到商營的企業制度，永久完全剷除，而後可。要想剷除這個商營制度，一定要由政府負責出而干涉價格機構的自由發展，比如租金的限制。由此可知，就建築房屋的例子而論，國營計劃，要想侵入進去，尙且要等到價格經濟制度，完全放棄他的防地而後可。價格經濟制度的敵人，對於價格經濟制度勢力，要表示敬意，由此更可想見矣。

七 經濟決定之性質

我們已經把價格機構，在各方面所發生的作用，簡略的作一個大概說明。現在進一步對於價格機構本身的性質，及在價格機構作用之下，所發生的各種經濟決定的性質，作一個一般的探討。因為我們必須先明瞭一個機構本身的任務，及其構造，與其動力，是如何，而後纔能將他在運用上，所發生的效能，與他將來的替身的效能，作一個比較。

現在先就受價格機構支配的各種經濟決定的性質而言。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經濟決定的內容，完全是數量的問題。經濟問題的答案，從來沒有是與否，只是分量多少的問題。我們在經濟決定上，不是要決定要不要消費，要不要儲蓄，要不要造房子，要不要造就醫生，或教師，我們乃是要決定要消費多少，要儲蓄多少，要造多少房子，要開多少鋪子，要造就多少醫生，及多少教師。凡是急要表明計劃經濟機構的效能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時常忽略了。但是他們這種忽略，是經不起人們加以詳細的追究。比如我時常聽人說，有時我自己，也這樣說：國家管理投資的功

效，可以使儲蓄的分配，比較在現在的制度下，容易根據大家需要的原則，而分配。又有人說，某種投資應當投資於建造工人的房子，而不應當投資於建造電影院，或製造留聲機。他們這種說法，並沒有指出他自己的主張的好處，到底在那兒，只不過引起幾個重大問題而已。在後此各章，我們可以見及他們這種說法，向大庭廣衆發表，似乎很合宜，但是假使一個有思想的人，將這個說法，予以詳細考慮，絕不能認爲這種說法，是對的。因爲除非在電影院留聲機片公司的投資，完全停止的情況之下，我們平常對於這種說法的意思，是指工人住處的數量，在公共管理之下，應當比現在所有的娛樂機關，在比例上多。即是我們趨於極端把所有不相干的生產，都停止了，我們還要將這造房屋計劃，與開設新廠子，製造靴子和傢具的計劃，考慮一下。像這一種籠統說法，只可以在大衆面前發表，使大家都集中注意於造屋子的問題，而忘記了其他。並且在大家僅僅想到貧民窟擁擠不堪的時候，自然會覺得造屋計劃，是最好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這問題裏邊，其含有數量的性質，和其他問題一樣。假使我們要造屋子，我們一定要碰到要另外多造多少房子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看造房子的慾望，一定有達到減退的時候，在那時候，我們也許又願意生產些別的東西，如同娛樂品之類。假使我們認爲我們現在的精力的精力，都是費在不生產無聊的事情上，那麼我們要從這種籠統好聽的說法，踏進做實際計劃的時候，我們一定先要決定，我們現在的錯誤，是到什麼程度，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纔能算是已經把這個錯誤，消除了。或者我們的錯誤，固然是一種錯誤，但是這種錯誤，是爲事實所容許的。

上面這種說法，恐怕任何經濟學者，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什麼。這就是說，我們覺得沒有一種工作，或是一種

生產，無論在那一點上，是內具的，或是天生比別的任何工作任何生產爲優越。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看見內具價值 (intrinsic value) 這四個字，沒有不眼睛發紅。但是據我的經驗，一個沒受過幾年經濟學訓練的人，對於這種相對價值的說法，一定非常討厭。也許有一些人，經過考慮之後，認爲這是一種理論上的探討，但是一到應用之於實際事實上時，他們就要保持他們固有的意見。他們不相信麵包是不會絕對比鑽石有價值，他們也不相信收集垃圾的人，不一定比海盜有價值。經濟學家，就是作退一步的說法，他們也不表示滿意。經濟學家認爲在現有的貨幣價值中，所表現出來的現有價值，或與道德的觀念，社會的需要不相符，所謂道德觀念與社會需要即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爲這些價值，僅是表現大衆集合起來的輿論而已。並且在人們對於一件東西在物質生活上，或是精神生活上所具的價值的估計，可以有很大的錯誤。比方說，人們對於哥根 (cocaine) 金錢價值的估計，就是起於他們錯誤的意見。有許多富人，相信哥根可以使人們感覺快樂。但是這種信仰在某義上是絕對的錯。這種說法，只是引人們牽涉到道德問題的糾紛。不過任其如此，經濟學者的結論，仍是不受影響，這就是說，凡是一件可欲的東西，並不是永遠同樣的可欲，所以他的可欲性，也並不是永遠可以比別的可欲東西爲高，不過別的可欲的東西，暫時不可欲罷了。

自然這種結論，僅是一種常識，同時實際的情形，也就是如此。不過假使我們要生在一个任何東西都沒有的世界裏，那當然有幾件東西，是我們在要求任何其他生產之前，所必須先行要求的。在這種狹義的解釋情形之下，自然可以說麵包比起鑽石，有他絕對的價值，並且我們還要認爲這種絕對價值的存在，是永遠重要的。但是這種

解釋，與我們討論這麼複雜的經濟制度問題，是不相干的。處目前的社會，我們不是要從事於從頭做起的工作，我們是要研究各種生產的數量多少問題。換而言之，我們要想辦法解決每種東西，要製造多少，這許多東西，是給誰用的。所以處這種情形之下，這個東西，所以要多，那個東西，所以要少，完全看某種東西的需要，已經滿足了多少，而決定。我們絕對不能否認假使世界上，僅有我們所認為最需要的東西，而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結果一定會使我們對那個僅有的東西，發生厭惡。我們更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大大的錯誤，假使我們認為麵包的絕對價值，對於我們的生活，是超過其他一切，於是全世界人，就都放棄其他生產，而專門製造麵包。同樣的，拾垃圾的工人，當然有他相當的用處，但是社會裏若是充滿了這種人，我們起碼對他發生厭惡，主婦的時間，恐怕都要被清潔垃圾桶所占有了。

上面所說的，似乎有點離題，不過其用意是要對主張絕對價值說的人，予以提醒。上面所說的，是與我們所要討論的，經濟機構根本問題，有密切關係。因為我們在沒有認識經濟價值的相對性以前，我們就沒法子知道，某一個經濟制度所要從事的任務，是什麼，遑論其成功，或失敗。一個受價格機構支配的制度，他一定要隨着相對價格 (Relative Price) 的變動走。多造一些這件東西，少製一些那件東西，完全看某種東西的需求，在相對的價格上，如何表現。其需求已經滿足者，價格吸引生產者的力量，一定小，反之，一定大，並無所謂絕對的優越或固有的價值。處現實社會之下，我們很可以發現這類事實。比方人們給他的小孩，用以購買玩具的錢，往往比用以買麵包的錢多。自然在災區內，這種現象，也許會適得其反。此外價格機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用價格安排各種東西價值的

等級，生產者就可按着這些等級，去安排他們的生產。換句話說，價格本身，就是一個做數量比較的工具，並且是很好的，很有效的工具。所以生產與購買，既是都受價格變動的支配，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問題，就為之簡單化不少。因為他們就可以有一個指數，供做參考。這個指數，不但可以記載何物需要多些，何物需要少些，並且可以指出需要變更的確實數量。於價格漲落之時，指數的百分數，隨之而漲落，消費者與生產者，就可以減少某種東西已有的需要，和確定某種東西應當增加的數量。同時他們還可以自己知道在經濟上的行動，是否適當。當然在現經濟制度之下，價格的變動，所給人的指示，往往有錯誤之處，因之其所引起之反應，也往往有許多不恰當的地方。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要注意的，就是價格變動的特別功能，是在乎他可以供做決定數量的工具。這種工具，無論在任何經濟制度裏邊，都是需要的。在我們致力探討計劃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假使我們要對幾個重要的經濟問題，作一個正確的決定，其困難之點，即在乎數量的問題，與相對價值的問題。我們還沒有一個可靠的籠統的有效的概論，說 x 一定比 y 好。

上面所說的，就是用另一個方法，來提醒我們，在作各種經濟決定時候，比較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嚴格講起來，這個要素，在所有經濟決定中，都是有的。我們平常所謂決心，其意思乃是說，我們決心向某方向去進行，而不向其他方向去進行，因為向某方向去進行的益處，比向其他方向益處大，所以我們纔下這個決心。在經濟上，我們決定多製造一些這個，少製造一些那個，在這裏，花費六個辨士，在那裏，儲蓄六個辨士，在這種種決定裏邊，比較的要素，是永遠最先呈現着的。假使我們僅僅說香煙與奮我的神經，請你給我六個辨士，去買他一包。這種說法，是很無

聊的，除非我們已經計算過，花六個辨士，去買一包香煙，去興奮神經，其利益是比用別的方法，去花這六個辨士，爲大，或是比把這六個辨士，儲蓄起來，利益爲大。同時我們僅僅說我願意接收寫六篇，關於計劃經濟的文章的合同，每篇的代價，是二十一個先令，也是無聊的。因爲或者我們還沒有考慮過，我們用同樣時間，發表幾篇名人傳記，其代價是否不比寫這六篇文章高；或者將來用這六篇的代價，去買來的東西，並不能償補我們寫這幾篇文章的所失。因爲我們寫這幾篇文章，一定要拋棄其他工作，如同去研究聖經，或是去作玩具給自己的小孩玩等等。同樣的，假使社會要求增加高等教育的設備，政府僅僅予以加添，也是無聊的，因爲他們也許還沒考慮過，是否可以利用開辦學校的金錢，與人力，用得到別的用處上；或者他們還沒有覺得這個學校的最後供給量，是值得去使爲學校盡力的人，去得一些錢，同時並值得去費許多事，用收稅的法子，又把他們所得的錢，從那個人身上，收回來。自然各種決定，都要求其十分正確，是不可能的。並且事實上假使每個決定，都要求其比較得非常正確，則沒有一個決定，可以決定了。所以因爲這個原故，有許多人作了無聊的決定，就以此爲藉口。但是我們在從事一個經濟決定的時候，若是認爲這上面種種比較，可以不必加以重視，或者也不想法子去比較他，或者我們爲公衆，或是爲自己辦一件事，並不去計較其代價如何，乃至於並不加以適當的選擇，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在目前的經濟決定裏邊，無聊的決定，已經夠多了。改善經濟制度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於避免這種無聊的決定的增加。

八 價格機構之性質

後此所要討論的，是控制我們經濟活動的真正機構之所在。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關於價格變動，如何支配經濟活動的地方，還沒提到利潤的作用。利潤的關係很重大，在我們經濟制度中，有他特別的作用。因為利潤的變動，是發現在所有價格變動之先。利潤之好壞，是給予生產唯一不可少的刺激。一定要有人聞到利潤的味的時候，工人纔有工作可做。工人的任務，就是製造貨物，去應需要，去生利潤。換句話說，就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而說，如其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首先要經過利潤的刺激。消費者的渴望，的飢餓，還只是吸引工人，去工作的次要原則。消費者並不能求得滿足，假使消費者所能出的，與所願意出的最高價格，是不夠數。所謂夠數，就是說他所出的數目，不但要能够供給工人的生活，並且還要使企業家能得到利潤，使他去僱用一些正在求工作的工人。僅是在幾個極專門的工作，纔有幾個例外，可以使工人與消費直接碰頭，不必經過求利潤的企業家的手裏。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說消費者的需要，乃是直接即與工人的價格發生關係，而不是同資本家的利潤，發生直接的關係。但是利潤的重要性，雖然這樣特殊優越，與我們在以後所要討論的問題，很關重要。不過就目下而論，我們所要注意的問題，乃是價格與利潤有何種同等的，重要，而不是注意他們之間，有何種差別。因為從維持非計劃經濟向前進行的力量上看，兩者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無論其所表現於價格，是為企業家去僱用工人之用，或是為付給工人做工之用。自然在社會主義者方面看來，是首先要向利潤下攻擊的。因為他們認為圖利，或是預備圖利，乃是從事所有生產的先決條件，同時享受利潤的企業家，或是資本家，他們對於從事生產與對於發售貨物的關係，無論怎樣，不能說能像實際從事生產，從事製造貨物的工人們，對於貨物的關係，那樣密切。所以利潤本身，是一個很容易引

起人攻擊的目標。但是在經濟學家看來，他們是很容易指出來，在資本家利潤達到最高的時候，是要與工人的工資，受同一法則的支配。所謂沒有人們不去從事有利潤的生產，與所謂人們絕不去辛苦生產不需要生產的東西，這兩個法則，並不見得完全不同。工人們，企業家們，投機的人們，以及其他所有人們，要想有收入，一定要承認價格是從事生產的主要動力之一。所謂價格，就是我們從事某種工作，或是我們允許別人，做某種工作的代價。我們各個人對於我們自己的價格，所取的態度，其關係是特別的重大。假使我們承認價格機構，在任何方面所表現的作用，都是一樣的，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機構，可以得到一個更準確的觀念了！

最後於我們未把計劃經濟，與在這一章裏所說的非計劃經濟，作一個比較之前，我們要說到在什麼意義之下，我們可以把自動兩個字，用在計劃經濟制度上，纔算適當。我們是否可以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自動的，像鐘表那樣自動的動作，共產主義制度，是像槓杆一樣，需要人去拉他。嚴格講起來，我們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假使我們承認行為派的心理學認為一切行動都是起於對刺激的反應，我們就應當承認凡是由人造成的與人工做成的事，都是自動的，任何經濟制度，都是人爲的。假使這個理論，可以適用於某一種社會制度，他就可以適用於其他任何制度。所以我們並沒有理由，說這一種的經濟制度，是自動的，而對於別一種具有同樣目的的制度，就不能以同樣的字眼，來形容他。假使宇宙的法則，認為人類不過是機器孔中之辨士，那麼我們絕不能認為，僅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以放進一個辨士，就能得到糖果，就能跑馬玩，或者可以告訴你，你的命運，在別的社會就不能了。因為根據這個法則，在一個共產社會，我們也要同樣的放進一個辨士，方能達到同樣的目的。

但是所謂價格經濟，是自動的，絕不是這樣極端的說法。真正的意思，是指與計劃經濟制度比較的時候而言，就是說，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制度裏，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可以在推動着。這個力量，與在計劃經濟制度裏邊，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要審量的，有有用的，去努力生產事業不同。根據這種解釋，自動兩個字的用法，很有用處。但是同時又足以引起誤解。其所以有用處，因為他可以使人注意到非計劃經濟制度，與有計劃在原則上真正不同的地方。其所以引起誤解，因為會使人們覺得，若將非計劃經濟，與有計劃經濟，加以比較，則前者似乎不至於陷於作拙劣經濟決定的危險，並且在進行上，能够較為順利。比方有兩個機器於此，假使我們要替這兩個機器，登廣告，一個以自動的來形容，一個需要注意與管理來形容，結果一定會使購買者都傾向於前者。這兩種字眼，應用到經濟制度上，其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尋求價格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真正區別之點，絕不可認為，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各種經濟決定，不是人類意志的表現。因為他們確是人類意志的表現。普通我們說價格減低，或是價格漲高，乃是一種簡便的說法。其實價格之所以減低，與漲落，是有人與各方面有關係的人，共同決定。價格降落的時候，並不是像石塊子那樣從山上一下滾下來，事前一定要有許多預兆。腦子清晰的人，都可以見到的。同樣的，供給減退的時候，並不是像一個水槽涸乾那樣，一點水都沒有了，乃是有人從中決定，把槽口封起來，或是幾千人共同決定，把幾千個槽口，一同封起來。我所舉的事實，也許太淺現，不過一般人用以形容價格經濟的字眼，實在太容易使人對於各種經濟決定的前途，作錯誤的悲觀，或樂觀了。樂觀者認為凡是聰明的人，都可以不用一個指頭的力量，機器自己便能活動

起來。悲觀者認為這個機器本身力量太大，他自己力量，不足以干涉機器的活動。我相信這種種的錯誤，完全是受字面上的影響，同時有思想的人，對於經濟問題所要表示的態度，也受了這些字眼不少的影響。

因為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之處，並不是在非計劃經濟缺乏人類意志的表現，乃是在非計劃經濟，決定作一種經濟決定的時候，其範圍比較的狹小，比較的受限制。在任何經濟制度中，凡是一種經濟決定，都是由幾個私人，或是某個團體，用一番苦心，決定下來的。統計家，經濟學家們，所表現的數字，所發明的理論，就是所有這些人的決定，的總和。自然這個總和，與這各種決定最後所應得的結果，不免有許多不同之處。我們並不能確定，這個總和，是否根據某一個規定計劃而得來的。經濟制度，有如一種積木，乃是由幾千萬塊木頭，積起來的。藝術家用他們的心思，把他積起來，做出種種不相同的圖案。他們僅能推想他們所想像的，可以同別人所想像的一樣，把所有藝術家的圖案，都聚集起來，纔是一個最後整個的圖案。每個藝術家的圖案，因他們能力所及到範圍之大小，彼此之間，雖然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到了某種程度，也會發生種類上的不同。所以根據這個比喻看來，即使一種工作，是由二三個部分共同計劃出來的，但是因為這些計劃，彼此之間，沒有連帶相互的關係，自然其最後的結果，不會有統一的結構。也自然不能說這是人們整個意志的表現。只能說這是每一個工人，按照一己的幻想，做他一小部分的工作，他們對於別人的工作，只能供做參考，並無力加以支配。

所以價格經濟的特殊之點，就是他並不知道有所謂一個總的經濟計劃在。特殊意志所支配的範圍，雖各不相同。但永遠沒有到了某一個時期，這個整個的範圍，皆係意志所決定。因此其結果很容易使得我們認為，這個整

個的經濟決定，是機械的力量所造成的，而不是人類意志力量所造成的。比方說，在個人意志決定之下，有一個開機器工人的寡婦，他感覺得生活上的貧乏，投一點小資本，開一個糖果舖，他所能支配的範圍，是非常的狹小。糖果的批發價格，以及房租工資等等，完全要受外面的力量的支配，不能由他自主。他的糖果，對於市場上糖果的供給量，與產量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微小。再如在一個團體的意志決定之下，有一個製造火柴，或肥皂的大公司，他們的股東，不但可以支配其國內火柴的產量，和價格，並且還可以支配全世界的火柴業，但是這種大規模的力量，僅能在他們自己是業主，或者是業主的代表人的企業範圍之內，行使之。他們並無力支配到別的具有同樣規模的企業上去。同時他們對於購買者的購買力，也無力實行一種政策，左右購買者的錢包，使他們囊囊都去購買他的貨物。推而至於工資比率的決定，應當以何種工資率為起碼點，他們也是一樣無力支配。這些問題，他們只能在他們自己有限的範圍內，比較的有一些自由的支配力量。所以這些現象的總和，雖然不能絕對說是自動的，至少可以說是不是人類意思支配下的產物。煤的產量，人們並不覺得他與絲、或豆的出產量，有何關係。由此可以推知，假使一旦某種計劃，在他的範圍內，失卻了這個總和，那麼某種範圍下的特殊計劃，無論其規模多麼大，計劃多麼週到，都要失了效用的。

自動這個字，此外還可以在其他方面，使人用以形容我們現有的經濟制度。這點也很重要，不容忽視。價格經濟制度，雖然沒有一個整個的精密的計劃，但是他的表現，並不是完全不能預料得到的。萬能的價格變動，並不是盲目的力量的結果，多少是人力的決定。價格的變動，乃是在某種假定下發生的，乃是人們對於某種引誘，所發生

的反應。價格經濟，是表現人們在某一個範圍內，對於人類行為，作某一種假定。我們預料的價格變動，是否準確，完全看我們的假定，是否準確。我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重要的經濟決定，都是受價格變動支配。要這個東西生產，要那個東西不必生產，都是價格的力量。但是價格變動的作用，僅限於此而已。因為人們對於他的反應，有一定的方式。價格漲高的時候，自然會使供給量減少的東西，消滅了。因為人們認定，並且很準確的認定，價格的漲高，會使人們限止他們的購買量，降到前此的水平線之下。同樣的，在利潤轉好的時候，會使人們去擴張企業，因為人們認定並且很準確的認定，人們一定要儘量的盡其力之所及，去實現那個好的利潤。

經濟學家時常碰到許多攻擊，因為他們都是根據以上這許多心理的假定，來解釋價格機構的作用，而許多人認為這許多假定，是不合乎人類的脾胃，是不正確的。他們所謂經濟學家假定是不正確的，並不見得有事實根據，可以證明。因為我們將價格經濟的作用，作一個膚淺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社會中，假使有人希望他們的行為，能夠適合未來的經濟情形，他們確實可以達到他們目的。這就是說，他們對於某種刺激，所反應的結果，確實能如他們所預料的一樣，雖然其結果不能完全與預料相同。比方說，假使洗掃煙肉工人的工資，比起其他做手工的工資，一旦增高，並且其增高的程度，很利害，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本來不做這種工作的，現在都去做洗掃煙肉的工作了。這種根據經驗所得來的概論，固然是就在某一個環境下的人類行為而言，但是其適用於某一個環境內的程度，絕對可以與任何其他的假定一樣。換句話說，除這個假定之外，還沒有發現其他假定，其適用程度，比他更好，為用更大。根據經驗來證實經濟上的理論，固然是很危險，因為在沒有實驗的可能性的狀況下，我們的話一

定會含有許多推想的成分。但是雖然我們不能避免這個危險，雖然我們不能承認可以根據經驗，在經濟理論上得到正式的證明。但是我們仍不能否認，在這個特殊範圍之內，總有一些供作研究經濟的參考的常識在焉。舉一個極端的例子為證，我們都知道，在一般放債的利率降低的時候，自然會引起定期付利的抵押品的價格漲高。要解釋這個例子，可以用一個非常恰當的事實來證明。比方說，在借款者願意出百分之三的利息的時候，一般要求要百分之四的利息的人，一定多過市面上的利率是百分之五的時候。換句話說，無論何時，都有一般人，在那裏反應着利率變動的刺激，其反應的方向，正如經濟學者預料他們所要的反應一樣。同時這種反應，適足以證明經濟學者所作的概論，是對的。就是說，利率的漲落，可以引起定期付利的抵押品的價格的漲落。

或者我們可以加以注意的，就是上面所說的這個概論，僅能適用於某一種特殊環境之下的行動，那個環境的影響，可以達到多遠，並不是經濟學家力量所能談到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大家是多方面受環境的影響，比方說：我們生在這個世界，我們就會對於價格的變動，發生興趣，因為這是環境使得我們去對這事情，去發生興趣，去覺得有興趣。假使我們不發生興趣，一定是一種奇怪的現象。自然在每一個社會裏，總有一些人，天生不能適合環境，但是這種人，一定是少數。多半人都是很容易，很自然的，適合環境。他們對於環境的反應，正如我們所想像他們所要反應的一樣。同時自然這個環境的本身，也要隨着那些少數不能適合環境的人的意旨，而隨時代而變更。在一個非計劃的經濟社會裏，假使人們是需要衣食住，那麼大家對於所有活動，屬於經濟方面的，自然需要一種廣大的認識，因為在這社會之下，除非我們去求得這種認識，這個社會，不能替我們預備衣食住。假使你在火車上旅客

談話的資料中，要沒有包含收入太少，或是運費負擔太重的怨聲，或者你也聽不到，大家彼此相慶祝交易的成功，或是大家彼此互相交換價格漲落的消息，那麼到了最後，火車的車輪，一定要停止走動了。因為那些談話裏邊，就是表現出某種心理態度的反應，同時並可以看出，他們根據這個反應，所生出來的行動。建築一條鐵路，開辦一個公司，其動力完全是從他們的態度和行為裏邊，得來的。一個聰明的哲學家，也許對於這些經濟上一般的推測，不會覺得很奇怪。假使有人請他去鑒賞他的朋友，得着一個新的有用的東西的時候，他或者會覺得奇怪，他的朋友，首先所希望他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對於這個東西本身的評語，而反希望他問道，你這麼喜歡這件東西，是用什麼東西，去換得來的呢？明顯一點說，這個意思，就是問這件東西的代價，是什麼。但是哲學家所以覺得奇怪，也許是他一個人的超然態度，我想假使大家要都同哲學家一樣，覺得奇怪，那麼世界上一切生活的便利，與舒適，都要停止了。現在蘇俄的試驗，所以有許多地方，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也許就是在乎這個態度上。我們將於下章，詳細討論蘇俄對於這種種經濟上的問題，所以要樹立一種新的態度，有他們自己的理由。假使他們的試驗，照這樣繼續進行下去，將來可以使得我們去猜想看看，人類在甲種經濟組織下，所表現的行為，可以在乙種組織之下，有多少的變更，其變更的影響，將為如何。在那時候，我們對於經濟上各種概念的範圍，以及心理上的假定，也許可以解釋得比現在更準確些。

關於第二個攻擊，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對於目前各種經濟決定所作的心理假定，未免把人的行為，描寫得太醜了。可是這個攻擊，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只不過是分析人類對於某

種刺激，將要發生何種反應的問題。但是這個攻擊，頗引起一般有心之人的不安，他們認為任何假定，假使超過某種不適合的程度，這個假定，就不能成立。所以我願意對於這問題，表示一些意見，說明企業家臉孔，也並不像被人把他塗畫的那麼黑。因為一般人認為貪取兩個字，是企業家所特有的性格，也就是我自己認為，這個是維持車輪走動的一個主要力量。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貪取，只是代表整個經濟原則上，各種合理的行動中一部分而已。換句話說，人們應當在他從事的事業中，去盡力得到最好的結果。假使人們都能遵守這個原則，其結果人們都能盡力，在他的事業中，去為人類服務，這個原則的好處，恐怕立刻為人交口稱頌。自然假使遵守這個原則的結果，發生了勞作過多，報酬過底的現象，那就變成了一種流弊。但是一個細心研究經濟理論的人，一定會覺得這個原則的應用，可以比一般經濟學家所應用更廣闊些。經濟學者多半受一種環境的束縛，在那個境界中，凡是一種動作，其表現於外越醜者，越容易使人覺得。可是其動作的本身，仍不失為好的。在這生命短促，機會有限的世界中，人們要想另求一個路向，應當以最低的代價，去奔走你的前程，纔是一個聰明的行動，也是一種經濟的行動，改革家把他眼力注到不悅人心目的問題上，其危險有如把一個小孩，和洗澡水一并倒掉。但是他應當知道，一旦這小孩離開這惡濁的洗澡水，仍不失其為一個潔白的小孩。

第二章 蘇俄計劃經濟之性質

一 無貨幣會計制度之失敗

前一章已經將依賴價格機構而活動的經濟制度，作一個大略的說明，現在轉移討論到，用另一個方法，來支配經濟活動的經濟制度。這個制度，現在已經在着手實驗中。

在這一章，我首先要說明的，就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經濟制度，可以完全廢除價格機構的用處。而能得到什麼結果，而值得我們去研究他的。原始的共產制度，並無所謂價格，僅有一種極其簡單的貨幣制度，其用途非常小，固然有他一種光榮的歷史，假使他的成功，能有繼續生存的力量，自然值得我們詳細去研究他。但是這個制度，對於所謂經濟制度的演進，並不發生多大關係，不願意過那種生活的人，並不覺得有去研究他的價值。

我們記得，在近代史中，曾經有過兩次理想經濟制度的實驗。他們希望可以不必受價格機構的支配，而能最後得到企業的便利與享受。這兩個試驗，第一就是理想社會的試驗，其中以十九世紀歐文（Owen）的理想社會最著名。第二就是蘇俄革命初年所謂無貨幣的會計時代。二者都是經濟中的奇怪產物。歐文的理想社會，希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一個模範社會，結果算是失敗了。一八二六年，著名的 New Harmony 理想社會，決定凡是

那個社會的分子，可以不必花錢，能得到衣食住，及受教育的機會。凡是那個社會的一分子，都要各盡其力，為大家謀幸福。但是不到二年之後，他們的財產，都折價賣給私人的業主。那些業主，本來就是他們社會中的一份子，不過因為不贊成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為表示態度起見，有許多在開始的時候，就拋棄他們的老家，遷移到遠方去。○7

Histon 及 Queen Wood 的理想社會，及當年英美兩國所作的試驗，其情形亦大致相同。這些理想社會之所以失敗，有的是因為他們內中分子，大家都是毫無限制的，提用大家所共同生產的東西，結果他們的消費，超過生產有的。是因為生產的數量，並不能照他們腦中所希望的，在事實上日益增加。結果每一個分子，就都開始懷疑。他們自己所放進的力量，比他們所能享受得到的東西多；同時並懷疑別人所放進的力量少，而其所享受的多。於是每個分子，彼此間發生不愉快，不信任的關係，而終於沒有法子，繼續他們理想中為天下法的工作，甚至至於不能在任何條件之下，共同生活。雖然其中有許多人，作最後的努力，儘量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肉，不吃牛乳，但是終於無濟於事。這些理想社會的分子，共不過幾千人。(New Harmony 只不過八九百人。) 大家的結合，並沒有根據什麼原則，凡是願意加入者，就可以加入。在這種團體裏邊，各方面的人才，不見得俱全，並不足以代表能夠實現大規模的經濟制度的社會。他們都是具有抱負的理想家，都是所謂幻想者流。

蘇俄的無貨幣會計時代，其本身雖然也是一種奇怪的產物，但是若就其大膽的嘗試，與其規模之大而言，到是一種比較含有近乎人情的經濟意義。並且我們要注意的，蘇俄雖然完全承認他的過去，完全失敗，但是他們現在還正在極力想法子，另轉一個方向，這個方向，並不是完全同本來制度不同（指無貨幣會計制度而言。）他們

仍在希望能有一天，達到完全廢止貨幣的時候。在他們日常生活中，他們已經想法子不用現金，就在銀行裏立一個摺子，以供付工資之用，同時工人所購買的東西，也在這個摺子照扣。可是他們離開當年剛剛革命的熱望，要想完全廢除所有貨幣的使用，還差得遠。

關於蘇俄廢除使用貨幣的整個經過情形，還沒有人報告過，並且也沒有法子可以報告，因為身歷其境的人，已經備受當時貨幣廢除後，所發生的結果的激動，不遑更事訓練以求養成一種計算準確的習慣。蘇俄這種大膽的嘗試，想把支配億萬人經濟生活的工具廢除了，可以從 Mr. Yurovsky 蘇俄貨幣制度與政策一書中，得到一些材料。那本書中，有下列幾句話：「我們認為按着一個總計劃去實行分配。用按份攤配 Rationing system 的制度，去滿足消費者需求。用保證出品的方法，去滿足生產者的需求，以代替自由競爭。到了最後，可以完全把自由競爭辦法廢除。」一九二〇年，蘇俄財政委員長，曾經奉命採取決然辦法，廢除國有機關，及公共團體郵電的費用，同時電話、水、煤氣、電氣的費用，也在廢除之列。凡中央燃料委員會所供給的燃料，及人民供給委員會所供給的貨物，也都不必付給任何費用。凡國家所僱用的工人，及中央政府各市政府官吏的住處，也都不必付房租。這種廢止付費用的運動，不但是廢止付給現金，並且連銀行裏立摺記帳，及任何其他方法，也都在廢止之列。在一九二〇年命令之後，還有一個命令，更把範圍擴大，就是凡海陸旅行，都可以不必付費用，工人的工資，至少要有部分用貨物來付給。一九二一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下令廢除所有稅徵。

在這種制度之下，國營工廠，應當將他們所有存貨的種類，及他們所需要的各種材料，告訴最高經濟委員會。

這些工廠的出品，是由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置。這個委員會，就是總管那一項企業的總機關。這些工廠，都屬他管轄。凡是國營的企業，絕對不許在市場上，自由購買原料，出售貨品。政府當局，實行一種優先的制度 (Priority system)，來適應在這種大規模實驗下，所要發生一種混亂的狀態。在一個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經濟制度裏，假使某一個東西的需要，是很殷切，但是其供給量是很缺乏，在那種狀況下，一定要發生價格漲高的現象，用指數來表明那件東西需要的程度，以吸引生產者去擴張他的生產計劃。但是在這種制度之下，蘇俄的最高經濟委員會，是用暗中摸索的辦法，來猜想各種東西的需要，是如何，而後經過會議的通過，及政府命令等手續，纔把他們所猜想的，現在事實上。他們只是根據他們自己心理的原則，去決定這個工業，或者這個工廠，可以享有某種優先權，並且還要決定，在什麼時候，這個優先權，應當停止。他們並沒有確實的指數，可以遵循。據說當時政府當局，應付某種問題的時候，對於那種問題，所需要認識的幾種淺顯的經濟事實，時常茫然無知。某一個區域內，負責供給食料的人，可以對於他們那個區域內的人口估計，錯了百分之二十，其結果自不免發生駭人聽聞的錯誤情事。比如在人民糧食問題，急待政府下令解決的時候，政府當局，會認為製造鉛筆，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這種現象，並非過甚其詞，因為人民需要解決糧食問題的時候，在政府官吏方面，很可以認為按照他們對於鉛筆供給量的觀察，鉛筆的需要，是高過任何其他其他的經濟活動。

當時蘇俄政府，為要使工人的工作，能夠遵照他們的生產計劃，去分配起見，他們相當的採取了強迫勞工制度。在開頭的時候，這種強迫勞工制度，只限於產業被沒收的階級人們，但是後來改行決定，每一個公民，凡國家需

要其工作時，都應當去工作。一九二〇年，政府特別設立委員會，專門管理各地方，強迫勞工事宜。

這個無貨幣會計制度的生命，不能維持長久，結果遺留下許多笑話。在這個制度實行的時候，正好蘇俄發生大規模的內戰，自 *Ufa* 與 *Vladivostok* 之間，宣告獨立的政府，至少有二十個之多。到底這次內亂的發生，對於無貨幣會計制度，還是有益處，還是有壞處，這個問題，現在尚未解決。自然在贊成蘇俄廢止貨幣政策的人看來，是認為有害的。但是也未嘗不可以說，這個戰爭，無論是對內，或是對外，都為蘇俄解決了不少的問題，減少蘇俄在經濟清算上許許多多的糾紛。戰爭狀態，正可以使蘇俄當局，捨卸對付當時廢除貨幣後，混亂情況的責任。若在平时，這個這種混亂情況絕非人民所能容忍的。但是無論如何，蘇俄人民，經這次試驗之後，工業的出產量，較戰前水準，降低百分之十，至十五。鐵路的運輸，僅達戰前數目百分之十二。鄉村裏每頭的麵包消費量，減低了一半。五百餘萬人民，得了傷寒病。當時統計的數目，雖然不是很準確，但是即就上面所推測的數目而言，就可以表明當時試驗失敗程度之深。這個就是無貨幣會計制度第一次大規模實驗的終局。結果到了一九二一年，列寧頒佈新經濟政策，在買與賣上，都相當的恢復價格機構的用處。公用事業，如鐵路運輸，及郵政，（沒提到食物的分配）都用緊急命令，恢復付費的辦法。國營企業，起先僅能在市場上購買材料，到後來並可以在市場上售出貨物。

二 攤配制度

上面這段驚人的歷史，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這十二年之中，蘇俄集中精力，實驗一種所謂計劃經濟制

度的經濟組織。我所以用實驗這個字，因為自從蘇維埃的俄國產生以來，他們都是在表現着，現在仍繼續的在表現着，一種大膽實驗新事業的偉大精神。凡是試驗過，不成功的政策，他們就予以廢除。這種精神，若與西方各國，很無謂的，受一般無聊的公共意志支配，相比較，就是蘇俄同西方各國不同之點。所以我們似乎不能認為，目前蘇俄的經濟組織，具有任何永久性質；並且我們也不要忘記，作者在這一章，與前一章，所作關於目前蘇俄計劃經濟制度，與西方價格經濟制度的比較，只不過具有供歷史參考的價值而已。蘇俄現在還正在繼續不斷的，向着與我們西方不相同的路向，向前走去。至少可以根據他們已往已有的成功，看出他們的路向是對的。我們若是把他們的實驗，與我們的制度，做一個比較，也許可以尋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結果。

我們現在仍舊順着第一章的程序，先開始研究蘇俄用以分配消費者的供給量的機構。在蘇俄，貨物也是放在鋪子裏，讓人去購買。有錢的人，可以到鋪子裏，買他們所要買的東西，價格的機構，顯然在他們經濟組織中，還沒有完全廢除。但是他們的價格機構，同我們不同。

蘇俄用按份攤配 (Rationing system) 的制度，(現在已廢止譯者) 來補充價格機構的作用。凡是執有攤配執照的人，都可以到市合作社，或是其他公共商店，按着這些鋪子所規定的價格，和執照上所規定的數量，去購買貨品。這個執照發行的方法，及其為用的範圍，同其他蘇俄各種制度一樣，時常變更。發行執照的機關，或為合作社，或為政府，或為某種工作的廠家。但是關於食物的攤配，已經規定了一個比較確定的辦法。一個人攤配數量的多寡，是政府方面一種很重要的工具，用以表示政府，對於某一部分工人，特別看重，或是認為某種工人的工作，對

於實行計劃上，特別重要，就給予較多數量，以示優待。所以在蘇俄，凡是取消權利的階級，如帝俄時代的官吏、僧侶，及其他危害蘇俄政府的人，就完全把他們執照權取消了。重工業的工人和效率神速的工人，給以特別好的食料，來優待他們。

在按份攤配制度存在的情況下，價格機構，並不能完全實現他平時所具的機能，去分配貨物給消費者。牠所能表現的力量，非常受限制。因為已經受了攤配的貨物，他的價格水準，一定要比在其他國家，在沒有受攤配的情況下，所能達到的水準低。如若不然，假使價格仍然定得很高，供給量循環的上下，把貧的消費者，驅逐出市場之外，那麼在那種情況之下，他們又何需乎實行執照制度。其實蘇俄利用攤配制度，所產生的結果，也可以用價格機構的力量，造成差不多同樣的結果，其方法就是使價格到達某種水準，使消費與供給碰頭，而後在那時候，再斟酌規定工資，以實行上面所說的優待制度。我所以說差不多，同樣的結果而不說完全一樣，乃是因為價格機構所產生的結果，享有特別利益者，是一般的，而在攤配制度之下，是特殊的。比方說，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假使我的錢，比我的鄰居多，無論我買任何東西，都可以比他買得多；但是在攤配制度之下，假使我僅在食料方面，有較多的分配量，則我在經濟上所表現較優越的地位，僅是較多的食料，而且僅是食料而已。

這種一般的經濟利益，和特殊的經濟利益的分別，或者在目前的蘇俄，並不見得有多大實際重要。但是這個分別，會慢慢的變成很重要。我所以說目前沒有多大實際的重要，因為現在蘇俄人民的生活程度，還是那樣低，人民除衣食住以外，需要的東西，是什麼，大家差不多都是一樣。假使他們所需要的是食料，那麼無論你是給他一個

執照，使他能夠得到較多的分配量，或者給他較多的錢，使他能夠買到較多的食料，兩者並沒有多大分別。這兩種方法所發生的效果，是一樣的。因為領有執照的人，與發執照的當局，對於各種消費品的重要性，所作的比較，兩者意見是會趨於一致的。兩方面都會認為人們所需要的是食料，但是在兩方面可以同意的的情況下，有一個事實，仍然要存在着，就是在分配用攤配制度來支配情況下，決定消費者應當在某種供給量範圍之內，選擇某種貨物的權柄，是操在主持攤配制度的當局手裏，而不在消費者手裏。攤配制度，多少含有一點以下這個意思，就是說，關於我們還是應當多要幾片麵包，上面少鋪一點牛油，還是少要幾片麵包，多鋪一些牛油，這個問題，由政府替我們決定，不必由我們自己去操心。這個意思，在將來一定會變成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假使有一天，他們的生活程度，達到某一種程度，對於麵包牛油這類東西，不需要十分注意，他們心理，一定會發生以下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去避暑好呢？還是去買一個好的無線電收音機好呢？生活程度越高，各各人所需要的消費，其不同之程度越甚。到了那時候，政府當局，為人民決定某種需要，而不能適合人民自己之需要的機會，一定比較多。

蘇俄並不是完全用執照攤配制度，來代替價格變動的分配方法。有許多東西，並沒有用執照攤配制度，加以攤配，而其分配，也可以得到很恰當的結果，使購買者可以於滿足其需要之外，增加其購買量。所以有許多東西，供給的分配，完全是靠機會來分配的。假使有一件東西，其價格降落得十分低，在那種情形之下，各購買者之間，並沒有優待辦法左右着。那麼其分配的問題，完全是一個機會問題。經過攤配的東西，也可以發生同樣現象。因為假使遇到人民懷疑政府的攤配量，不能充分的適應人民的需要，在那種情形之下，就發生經濟學家所謂爭相購買

的混亂(Quene)狀態。

上面所說的兩種現象，也許可以用以解釋蘇俄市面上，所以時常發生爭相購買的混亂現象的理由。市面上時常發生謠言，說某種沒有經攤配制度分配的物品，可以向某種鋪子購買（其實並不見得有其事）人民就紛紛向那個鋪子去購買，恐怕被人捷足先登了。關於受攤配制度分配的物品，也是一樣。假使人民不相信政府的攤配，能夠隨時應人民之需要，則混亂的現象，也就發生。無論如何，人民認為捷足先登，總是對的。

但是有一點，也許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爭相購買的混亂狀態，只是使用一種特別方法，來分配貨物，或者可以說，缺少正當分配所發生的病態。混亂現象的本身，並不表示某種東西的供給量，較平時為缺乏。一個不用攤配制度的國家，對於這種混亂現象，莫不認為混亂愈持久，則供給的缺乏性愈厲害。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在分配受價格機構支配的國家裏，在某一個特別的時期，我們也可以發現，商人也有採用這種特別攤配的方法。諸如買女人衣料，和買傢具的公司，隔多少時期，就實行一次廉價，就是其例。衣料和傢具公司，在廉價的短時期中，把價格定得很低。在那時候，我們很可以發見在公司未開市之前，發生爭相購買的混亂狀況。同時顧客之間，紛紛欲謀捷足先登的現象，也就發生了。所以凡認為爭相購買的混亂現象，乃供給量特別缺乏的表現，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反過來說，爭相購買的現象，正是表明購買貨物的機會，不比平常減少，而比平常加多。在沒有廉價的時候，顧客們都藏在家裏，他們認為無力去購買那些貨物，一定要等到價格降落到某種程度，這些人纔肯出價去購買。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太窮，平常只好藏起來，一定要等到廉價的時候，他們纔有機會，與那些比他們富的人，去競爭。

購買。假使我們把同樣的推理，應用到一般人所共同需要的商品上，如食料、牛油、肉類等貨物，（在西方國家這些貨物平常絕不會發生爭相購買的狀態）我們就可以知道，爭相購買的混亂現象，發現與否，與貨物的缺乏，及人們的慾求之是否滿足，並沒有任何關係。在英國，有人喜歡買肉，有人喜歡買牛油，但是他們不能都去擠在肉鋪，或是牛油鋪的門口，因為他們知道，這個辦法，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好處，結果會使他們出不起那麼高的價格，去買那些東西。所以在購買者具有這種認識之下，我們就看不見那種爭相購買的混亂現象了！於是同時也就認為，並沒有這種現象可以發出。大家認為他們都平平安安的，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食料。在蘇俄，價格的勢力，並不在那裏左右着。人民認為假使他們走得快，運氣好，就可以有機會得到肉，或牛油。所以人民都爭先恐後的跑到食料鋪子裏去，擁擠着。一個外國人，看見這種現象，自然會覺得奇怪。

諸凡上面所說的，是就蘇俄的合作社，國營商店，及其他相類似機關，用國家統制的辦法，來分配商品而言。在這些機關中，商品價格的規定，是總計劃中一部分的工作，至少須與總計劃的原則相適合。有的時候，這些必需品價格，簡直低到水平線下，若照一般價格的機構來解釋，已達到消費者不需要那種東西的程度了！為避免讀者誤解蘇俄的實際情形起見，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上面所說的制度之外，貿易制度，在蘇俄仍是存在着。價格變動的勢力，同樣的在支配着。但其運用，並不如在西方國家那麼如意。凡出售於自由貿易市場的貨品，一部分是屬於供給量太瑣碎，不足以列入生產計劃之內的貨品，我所看見的，如花、小孩玩具之類。一部分是屬於生產量有限，國家商店不能充分供給的貨品，如布料之類。還有一部分是食料，這種食料，是政府為要鼓勵農民，增加生產起見，

確他們在市場上發售。這種市場，好像東方的集市，價格完全是根據討價還價的原則，而規定的。

三 工業概況

現在我們舍消費的分配，而論生產的統制。看看價格機構在蘇俄生產方面，能占有多大力量。蘇俄農業的生產方法，與工業的生產方法，並不相同，有分別討論之必要。下列所說的，僅就工業而論，其中也有地方，可以適用於農業的。關於農業的詳細情形，容以後再論之。

關於生產方面，所首先要決定的問題，就是我們要生產什麼？要生產多少？這兩個問題，是蘇俄經濟總計劃內所要包含的問題。我們要明瞭蘇俄生產計劃的程序，先要認識的一點，就是蘇俄的工業，是由屬於國家所有的工廠，或是歸由國家管理的工廠，或是屬於國營工廠一份子的工廠，來主持。其生產組織，甚為複雜。但是可用一二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其大概。比如一個化學工廠，是屬於全蘇俄化學組合的一個單位組織。紡織廠乃是屬於一個地方紡織托拉斯的一份子。（自然是國營的）一個麵包店，是由一個地方政府來經營，如同莫斯科的蘇維埃，就是其例。這種組織，就好像英國的市政府，自己管轄並自己經營，他的電車公司一樣。其生產機關，雖不同，或為組合，或為托拉斯，或為地方政府，但是凡是一個負責工業生產的機關，都是一個獨立的團體，有他法律上的地位，執有訂立合同，管轄財產的權利，與英國的股份公司，或公用事業公司一樣。

在起草計劃時候，其計劃大綱，是根據共產黨大會的議決案，而訂立的。比方說：共產黨大會議決，在一九三七

年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蘇俄消費品的出產量，應當在比率上增加三倍。於是在這個議決案通過之後，每個工廠，或是每個工業單位，都接到命令，準備起草可以達到上述目的的計劃。同時計劃委員會（Gospplan）得各地方計劃機關的幫助，也就準備起草計劃。每個工廠的計劃，都是交給負責管理他們的托拉斯，或是其他機關，再由托拉斯，送給上級機關，比如由一個地方托拉斯，交給工業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是管理托拉斯的上級機關。這個計劃草案，要一直達到莫斯科的中央計劃委員會（Central Planning Committee）為止。中央計劃委員會，把這些草案，加以修改，確定他們的計劃，是否與共產黨大會的議決案相符，而後再從事起草總計劃。總計劃定了後，再把各部分的計劃，按着組織上一定的程序，發還各單位組織去實行。

這些計劃的內容，含有兩種方案，一個是生產的數量的說明。比方說，在某一時期內，要出多少輛起重機，要出多少噸煤等等。還有一個方案，就是規定各種生產品，在各種時期，所應定的價格。根據這種辦法，價格的控制及生產計劃的監督都是歸由每一個獨立的生產機關管轄。這種辦法，在行政上雖有繁複的地方，但是對於計劃的原則，並無根本的變動。比方說，生產者的商品的價格，如工廠、房室等等，似乎是歸最高經濟委員會的統制，這個最高委員會，同時也負有生產計劃的重要責任，但是同時還有一個另外機關，人民貿易委員會存在，凡是最後要達到消費者手裏的東西，其價格至少一大部分，要歸他規定。我們現在姑無論蘇俄的計劃，最後是由那個機關完成，我們可以明白知道的，就是每個單位組織，在工作上要顧到生產計劃的兩方面。一方面是出品要達到某種數量，另一方面是要顧到財力的限制。尤其財力方面，是要特別注意的。凡是參觀蘇俄機關的人，如學校、工廠、或是俱樂部

等，如果問到他們如何管理這些機關的問題，他們一定先要把這些機關開始時候的預算情形告訴你。這一個單位組織所費的錢，是多少，其所費的錢，大部分是花在什麼上面，其經費獨立的程度，是如何，其經理對於經費方面所能支配的限度，是如何，這些問題，完全看他們在整個生產組中，所占的地位如何而定，要看他們是不是一個上級機關下所附屬的機關，好像一個工廠，是附屬於一個托拉斯。

我們現在要問的，在這些計劃與這些預算之中，蘇俄的生產計劃，受價格機構的支配，到什麼程度？在表面上看來，他們受價格的支配，與我們有相同的地方。因為蘇俄自從廢除貨幣會計以後，每個獨立的生產單位組織，在原則上都應當能夠清償其生產費用，並且還有利潤總行。蘇俄為堅守這個原則起見，曾經通過一個命令，將破產的國營企業機關名字，宣佈出來。照這樣看來，很可以認為蘇俄經濟制度，與我們的一樣，都是以求獲利為目的。其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們國家裏，利潤是歸到私人手裏，在蘇俄，利潤是歸到國家手裏。同時我們還可以認為，蘇俄所以決定每個商品，應當生產多少的方法，也是和我們一樣。其所遵守的，都是一個原則。都是在可以獲得利潤限度之下，從事生產，並且不能超過這個限度。

但是這種相同，不過是表面的。因為蘇俄的生產方法，與我們的生產方法，除有其根本不同之處外，（這個根本的不同，就是在價格機構經濟制度之下，價格的變動，是許多不相關聯的意志的表現，在蘇俄經濟制度之下，凡貨幣、生產工資、價格等等，都是在一個總計劃之下，互相關聯起來）尚有兩個很明顯的不相同之點。第一，蘇俄工業上所謂求得利潤，乃是指他們各方面所有的收入，能償付他們各方面所有的支出。其收入有一大部分是包括

國家的津貼在內。所以所謂某個企業，有利潤，並不是說，在每一次他們出售產品所得的數目中，都能抵償他們生產的費用，而有贏餘。有許多企業，在我們經濟制度下，認為不能那麼大的規模而在蘇俄，能夠經營。還有一些企業，在價格經濟嚴格支配之下，大有破產之可能，而在蘇俄，則不然。還有許多企業，在價格經濟制度國家裏，可以有比較大規模的發展，那麼在蘇俄經濟制度下，就可以得到極高的利潤。這些企業，就是其他利潤不好的企業的津貼金，所由出之處。

第二（其實是從另一面來說明第一點）蘇俄並不以利潤所得之多少，以為擴張或縮小某種企業範圍之標準。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價格界限之變動，可以說是決定某種出產量（比方說煤、電影院、或是建築游泳池）要受限制，或是要擴張的唯一方法。在蘇俄，他們所以利用甲工業的利潤，去津貼乙工業，是完全根據一定計劃的原則，去實行的。他們對於某種企業將來計劃之大小，並不受其過去經驗的表現的束縛。可是每個工廠單位，對於他們所收的津貼費，及他們在經營上所得的利潤，仍是要詳細簿記起來的。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蘇俄計劃經濟，怎樣可以不顧價格的變動，而能相當解決他們的問題。現在所要繼續討論的，是關於資本，及各種天然富源的使用方法。他們也可以同樣不顧價格的變動，而決定他們的用途。我們知道，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決定一塊土地的用法（或用以蓋房子，或留着耕種，若是以蓋房子，還要決定還是造房屋，或是造禮拜堂，或是造電影院）完全是在各種用法之中，比較各種用法所得的經濟收入的多寡（包含短期與長期）而決定。而蘇俄經濟制度，不承認土地私有權，對於付地租，且極力表示反對，也沒有如價格一類之方法，



可以作決定的標準。就我所知道的，在蘇俄機關的預算表中，其會計項目中，就沒有地租這一項。縱便有幾個例外（可以說所有蘇俄制度都有例外）也不見得是因為這一塊土地的出息，比別一塊土地好，而給這一塊土地的地主，以較好的租金。在一個計劃之下，其所以指定這塊土地，做甲種用，那塊土地，做乙種用，完全是看，其各種用處的適合程度如何而決定。我不能尋出任何證據，證明土地有因其各種使用收入數量之不同，而影響其用處。

政府當局，所以用某塊土地，做某種用，其心理上所持的態度，可以說與一個尋求利潤的地主，所持的態度相像。兩者都在比較其各種用處，而就其用處大者，決定之。不過一個是用金錢價值的數量之多寡，而表明其滿意之程度；一個是根據主觀信念的原則，而決定，並沒有任何正確的數字的衡量，可以在客觀上表現出來。蘇俄當局說，我們決定用這塊地，建工廠，而不建電影院，因為我們想前者的用處，比較後者好，他們並沒有說，我們計算結果，認為前者的用處，可以比較後者，多得百分之二十的地租。

關於分配儲蓄的資源 (Scarce Resource) 的各種使用方法，（就是我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投資）也是一樣。他們在投資上所作的決定，比方說他們願意開發甲工業而不願意開發乙工業，完全以他們在事前，決定要製造什麼做根據。而後就按着這個決定，去進行。假使在某一時期內，煤的出產量，要增加百分之三十，那麼開礦的準備資本，如工人材料等等，都要按着增加數量的比例數，去設備起來。

關於統制儲蓄的數量的方法，比較分配已經儲蓄起來的富源，較為複雜。在蘇俄，儲蓄有兩種方法：一個是私人節省，一個是英文上所謂社會主義資本積疊 (Socialist accumulation)。蘇俄吸引私人儲蓄的各種方法，與其

他國家所有的一樣。國家發行公債，人民應在工資中，分別權認。權認的報酬，其利率（其水準平常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裏，作公債投資的最理想數目）及抽籤得獎的機會。得獎或為現金，或為一種特別權利，如休假，即為一例。同時私人儲蓄，也可以放在儲蓄銀行生息。從這方面看來，蘇俄用以吸引私人儲蓄的各種方法，完全是以供求的原則為根據。他們相信得獎金，利率高，則儲蓄的資源多。但是同時他們也想盡他們能力之所及，把他們所要付與這些儲蓄的利息，定得很低，希望用道德的觀念，來激發他們愛國熱誠，使他們不專為金錢的利益着想。

所謂社會主義資本積疊，可以說與資本主義國家股份公司，及相類似的團體，所儲蓄的準備公積金，相類似。蘇俄許多工業團體，把他們的利潤的一部分，儲蓄在做長期投資的銀行裏（Primbank）。同時他們又向這個銀行，透支資本，經營事業。這種透支的利率很低，有的簡直沒有利息。所以按着這種辦法，許多工業團體，在決定他們價格政策的時候，就必須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集疊，計算在內。他們在計劃的時候，必須將製造品的價格，規定得比其生產費用，高出一些，以供這種儲蓄目的之用。

上面所說的第二種儲蓄方法，完全不與我們所受價格機構支配的意義相同。因為他們並無所謂價格之存在。消費品到最後總要買到消費者的手裏。假使政府當局願意，他們可以不時注意到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但是蘇俄當局，不許儲蓄與投資，在市面上有他們的市場。國營企業的儲蓄政策，必須完全受內部力量的支配，並不受市場上資本變動的影響，一如他們的生產政策受市場貨物暢售情形的支配一樣。我現在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數目，來表明蘇俄的資本，是有多少，是從這上面兩種儲蓄方法得來的。但是根據事實看來，一方面蘇俄對於社會

主義資本集疊，看得如此之重要，工業團體，對於這種資本集疊所希望的利息，如此之大，一方面蘇俄人民，是非常的窮困，根據過去十六年的經驗，蘇俄人民，對於投資安全的信心很少，所以我認為毫無懷疑的，蘇俄的資本，一大部分是從集體的儲蓄得來的，而不是由私人儲蓄得來的。換句話說，價格機構，在這方面所能施展的力量，非常有限。另外我們還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假使支配蘇俄新增資本的力量，是與支配我們國家儲蓄的力量一樣，我敢說目前蘇俄儲蓄的總量，絕不能超過蘇俄人民所願擁認公債的數目，或者他們儲蓄在儲蓄銀行裏的數目。

四 工人供求分配問題

現在要討論到前一章所最後討論的問題，看看在計劃經濟下的情形是怎樣。這個問題，就是關於各種工人供求的分配問題。這個問題，在計劃經濟中，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為經濟上討論關於人的問題，自然同討論關於物的問題不同。我們很可以斷然的，決定某一塊地，應當要用以建築劇院。假使我們要想把這個決定，實現於事實，所要費事的，就是使決定使用那塊土地的用處的人，變成那塊土地的主人，或能行使相當於地主的權柄，就可以了。但是我們假使要想把這個所有權的問題，應用在人的問題上，那除非是奴隸制度，就不能同解決一件東西，那麼容易了！我們決定某人要做某個劇院的戲子，要實現這件事，一定要得到那個做戲子的人的合作，而後纔能成功。換句話說，就控制與分配工人供給量的各種問題而論，凡經濟制度，不能以人類行為方式為憑藉者，皆不能有所作用。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要想一個計劃，能夠順利的進行，其需要適當的人去工作，與其需要一個精細的計劃，

是一樣重要的。

關於這個問題，蘇俄經濟制度所處的地位，是非常進退維谷。目前蘇俄在這方面依賴價格機構的地方很多。但是社會主義，在原則上，是不願意依賴價格機構的。所以目前關於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蘇俄發現了一種很困難很不自由的折衷辦法。他們在分配工人供給量方面，尋不到一種方法，可以完全代替價格機構的方法，他們正在極力的想法，找一種辦法，可以比較的與共產主義的原則相合。

我認爲，在蘇俄，價格機構支配工人分配的力量，是很大的。至少可以說，在這方面，並沒有別的更大力量，在那裏支配着。可是這種力量，運用非常不靈活。各地方及各種工人之分配，完全是受機會、習慣、及成見的支配，而不是根據合理經濟的分配。這種現象，在蘇俄，至少是和完全利賴價格機構的國家一樣。人們尋求工作，到處碰釘子，在蘇俄同在別處一樣。一個人要尋工作，可以由個人的意志去決定，同時經濟的計算，也相當的在左右個人意志中。所謂個人意志，我們在蘇俄人民談話中，偶然可以發現一些，與在別的地方，所發現的一樣，我發現蘇俄做父母的人說，我希望我的兒女，能做一個工程師，一個教師，我現在正準備叫他們去受這些訓練。

這個個人意志，尚爲構成另一種現象的要素。就是說，蘇俄工廠當局，時常感着工人移動的比率甚高。他們時常要去對付工人離職的問題。這種現象，差不多成爲普通的現象。工人今天來上工，明天走了。他們認爲他們也許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找到更合適的工作。有人以爲，工人特別願意到權配數量較好的地方，去尋求工作。他們用『飛行家』(Aviator)的綽號，來加在這種工人身上。意思說，他們飛來飛去，在各工廠中尋求工資最好的工作。

此外還有一種現象，時常不斷的發現，就是農民在工廠，過了相當時間工廠生活，又要回到鄉間了。

這種工人移動的現象，在我們肉眼看來，可以說是目前蘇俄生活中最顯著的現象。一個仔細的參觀者，在火車站，或是在路旁上，都可以發現一羣人，在那裏等候着。我們沒法子知道，這些人要往那兒去，同時也很難相信，這些人是在實行任何計劃。

事實上，在工人移動的現象裏邊，實在是有經濟計算的力量，在其中左右着。並足以使這些工人，去按着計劃的需要，去工作。我們可以在蘇俄工資制度所發生的現象，證明蘇俄的工資制度，完全與其他各國相同。就是說，地位高的，負責重的人，工資的比率高。蘇俄教育當局，供給我許多關於教員薪俸比率的材料，所有教育機關，教員的等級，都是從初級教員而高級，教員而主任，而助教，而講師，而教授，而導師，階級升高，工資比率亦隨之而高。不過其上下差別之程度，不如我們那麼厲害。考察蘇俄工廠的人，也發現管理工廠行政的人，所得的報酬，比做粗工的工人多。至於技術專家，或是為實現某個計劃特別需要的工人，其所得報酬，自然也很高。有人告訴我，有些工程專家，他們的薪金，並不受最高限度收入的限制。最高限度收入的限制，多半是為阻止共產黨黨員用的。

這種在經濟上對於專家的優待，其用意乃在鼓勵專家供給量的增加，使他負較大的責任。但是在這裏，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在蘇俄，凡奉公不力，才不勝任的人，是要構成刑事罪狀的，是要受嚴重的處分的，甚至於有喪命之虞。這樣子使人都不敢輕易去負重大的責任。以上這種優待專家的辦法，很明顯的是價格機構在裏邊左右着。價格高，供給多。同樣的，蘇俄採用計件的工資制度，或是對於工作特別緊張的工人給予特別優待的撥配數量，這

也是表示價格機構的力量，在裏邊左右着。蘇俄當局相信工人得錢多，或是報酬好，就可以工作的好些，多些。蘇俄之所以能找到許多工程師、醫生、鐵匠來工作，去實現他們的計劃，也就靠着這個力量的吸引。

但是這裏發生一個困難，就是根據共產主義的第一大原則，有些工人是天生被人尊重的，公家要多方面的優待他。其社會階級，正與西方國家相反。特別是一般做粗工的工人，工作很髒的人，及工作很危險的工人，在平常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在蘇俄要占最高的地位。那一般僱用工人的富人，其地位反而最低。但是蘇俄對於專家，及負責較大的人，在薪資上，亦予以優待。這又正與上面這個原則相反（這個原則，就是凡從前被壓迫的階級，現在應當維持最高的地位。）並且蘇俄用經濟的吸引力，來支配各種工人供給量的分配，也正與蘇俄人民仇恨私人得利的情形不相合。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榨取的動機的行爲，是最可恨的行爲。凡是讀過奧都司（Mr. Huddell）的書的人，可以記得，他在紅麵包（Red Bread）的故事裏，講到一個小孩，認爲富這個字，已經束之高閣了。但是現在蘇俄，正陷於進退兩難的地位，要實現他的計劃，非靠着大家認識這個富字不可。並且大家還要遵照這個價格機構的正統辦法去應付這個富的問題。

所以現在蘇俄正在這方面用功夫，想法子將價格機構比較不合適的地方，加以改良。並且想用比較適合於共產主義原則的法子，來代替他。蘇俄計件付資的辦法，多用團體的辦法，而不用個別的辦法。分付紅利，也是根據一個團體的出產量計算，而不是根據個人的出產量計算。因爲這種辦法，可以使大家對於別人所做的工作，均分到利益，並不使每個人去獨得他自己的利益。

在這個辦法之下，支配工人供給的方法，可以不必受價格機構的支配。比如按蘇俄法律的規定，國家有招募全國人民做工的權力，一旦國家需要人工的時候，凡是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女，（女子至四十歲）都要應政府的需要，去做工。僅有懷孕七個月的婦人，和看護小孩的母親，是例外的。根據孟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Evening）通信記者的記載，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俄國北部，曾由政府頒佈過這個命令。那時候，全體集合農場的農民，或私人農場的農民，都總動員的組織起來，都要自己預備一套行旅工作，到墾區裏去工作。其目的是使墾區裏，尤其內地部分，能有充分的交通工具。塞勒博士（Dr. H. Seligson）也曾提過蘇俄政府，曾經頒布過與上面這個類似的命令，叫曾經服務於交通界的工人，在五年之內，都應當回到工業界去，不從者，加以處罰。

除此之外，蘇俄的紅軍，和共產黨黨員，還充為工人供給的幹部，直接供國家的調遣。被招募做工的紅軍，多半是充任短期軍役的軍人，和一部分服役兩年的軍人。紅軍有三個任務：一、軍事上任務，這是所有公民所應盡的義務。二、教育上的任務。三、工業上的任務。以紅軍的份子，去擔任工業上緊急的工作，恐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不為工會所歡迎。我還沒看見過軍隊分子，正式每天到工廠裏參加生產的工作。軍隊去參加所謂臨時的工作，到是時常有的，好像修理馬路上的水管破裂等臨時的工作。

共產黨員雖然數目不多，但是對於支配工人的供給，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力量。共產黨是一個特殊的組織，（至多有三百萬黨員）入黨者，要經過相當時期的檢定。工人與農民檢定期，為六個月；資產階級分子，時期多些。並且隔幾時，還要檢查一次。凡對於黨義不忠實者，或者其入黨動機，不純潔，為私人謀利益者，就予以開除。共產

黨黨員享有特別權利。有人告訴我，蘇俄計劃中爲工人所造的新宿舍，凡爲黨員所預定的房子，他們的名字，是用紅色寫的，比別人享有優先權。但是黨員在生活上，要遵守嚴格的紀律。他們爲表示他們沒有榨取的目的起見，他們的收入，仍是要受最高限度的限制。他們的生活，永遠要廉潔。凡飲酒，及有不良性的行爲，就要開除黨籍。還有他們要服從黨的命令。有時候，要放棄職務，到數百里外，去做一件新的工作。關於這一點，在支配工人分配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對於一個計劃的實現，雖然不占最重要的力量，至少是一個補救一個計劃不能如期實現的好方法。除去黨員外，還有共產黨青年團，有六百萬團員，他們也有同種擔任工作的義務。假使一個黨部機關，或是一個青年團體，要令某個團員，到某個地方去工作，他們絕對要服從的。（除非那個機關，那個團體，不下命令。）自然以一個充任黨員，或是某一個黨的附屬機關的人員，的資格，絕不能對任何工作，都可以擔任。所以這種辦法，對於某種工作所需要的各種工人，並不能予以一個適合的分配。但是有時候，可以就黨員中，或是青年團員中，按工作的需要，加以挑選。

所以照蘇俄一般的社會情形看來，我們雖然不能得到確實的證據，來證明蘇俄的實際情形，我們可以認定，在蘇俄，價格機構，確是支配工人分配的一個主要方法。不過其運用，不如在我們國家那麼自如罷了！一九三二年，我在墨斯科，列寧格勒，烏可蘭等地方，問過他們用什麼法子，去替這些要興辦的新企業，去尋找工人。他們告訴我，管理各地方工廠的托拉斯，都有到某一個地方，去招募工人的特權。托拉斯的代表，到鄉間去，從農民中，挑選工人。學校及專門學院，也應他們的需要，供給一些專門的人才。達老頓博士（Dr. Dalton）說，他在賈格利托哥斯克地

方(Magnistogorsk)聽人說，各地方工廠同集合農場訂立合同，招募若干工人。我不知道這個招募的法子，是怎麼辦？這個合同，是怎麼履行？我想第一批的工人，一定是由於他們自己自動願意來的，他們所以來的動機，一定是經濟的。但是自願來工作者的數目，若是不夠，那又怎麼辦？我不相信，在蘇俄，他們能完全應用強迫做工的辦法。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在這時候，想辦法引用經濟的動機，來吸引工人。關於這點，有幾種消極的吸引辦法，可以有事實證明。在蘇俄假使有一個工人，他認為某件工作，合他生活上的待遇，或是報酬比較好，他一定要去就那個工作。但是假使他要想再去尋更好的工作，他的自由，一定要受上面所提到減少工人移動的辦法的限制了。所以我們聽說，在蘇俄，有時候，一個新來的工人的工資，要等到工作四星期之後，纔發給他。這就是他一定要工作那麼長時間，纔能有報酬。此外還有別種辦法，就是用各廠發給工人權配量的執照來限制工人的移動。工人於未得到執照之前，他就不能放棄他的工作。這樣子，工廠當局，對於左右工人的移動，可以有很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並不是使工人可以到他們所願意到的地方，去工作，乃是使工人一旦就了一件工作，就在那裏守着。

五 農業概況

這就是就工業而言，農業將如何？其實蘇俄人民，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還都是用在農業上。蘇俄農業，有三種組織：第一，非集合農場的農民。他們是獨立生產者，同別的國家農民一樣。可是他們自己不能有土地，土地私有制度，在蘇俄，是禁止的。他們僅可以占領一塊地，去耕種，養活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假使他們有剩餘，可以拿來市場

上去賣。第二集合農場。近年來集合農場運動，大為盛行。集合農場的數量，為之大增。集合農場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最顯著者，有下列幾種：農民合資購置牲畜、農具，每人可以領有一定最高數額的農具。我到基夫（Kyiv）參觀集合農場，據說每一農家，可以領有一個牛，為他自己，及其家庭之用，其他則由大家公用。大家共同耕種一塊地，他們的工作，是由農場管理委員會指定。在一個領袖指導之下，共同工作。這個領袖，也是屬於集合農場的一分子。在理論上，他是選舉出來的。每個工人，按日領工資。這個工資，或是用東西，或是用現金，或是東西與現金各一半。每個工人的工資率，不都是一樣的，或是按着工作的結果而決定，或是按着技術的程度而決定。這個工資，就是代替他們農產的收穫，在農產收穫變賣以後，再將其所得收入，分配給大家。在這個制度之下，很明顯的，農產工作的收穫，是大家共有的財產。其中一大部分是歸由大家共分，其餘的一小部分，留為公家公有，以供工人俱樂部、飯堂、工人子弟幼稚園等等之費用。關於這部分的費用，每個集合農場，各不相同。第三就是國營農場。國營農場，是農業托拉斯的財產。其經營的原則，與經營工業一樣，上面已經把國營工業，大概說明，國營農場，與國營工業不同的地方很少，於此不復贅及。這種國營農場，在蘇俄農業所占的地位較小。蘇俄當局，想以集合農場為農業中心組織。據云一九三二年集合農場與國營農場之比，為二三〇，四〇〇與五〇〇之比。蘇俄全耕地百分之七十八，是屬於集合農場。

關於私人農場，其生產之動機，還是受個人主義的支配，不過這個動機的實現，中間要受許多不如意的阻礙。農民耕種的目的，第一是為他自己打算。假使中間沒有交易上賣和買各種問題的阻礙，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生

產，充做自己食料，與羅馬尼亞及法國的農民一樣，同時也與加拿大的農民相彷彿。但是根據蘇俄計劃的需要，他們生產，不能僅止於是。他們還得養活城市的人民，所以他們除供給自己之外，還需要有剩餘的生產。農民心裏對於這個剩餘的生產，所具的希望，是想可以把這些剩餘生產，變賣了，去換取一些他們所需要城市裏的東西。他們希望得到金錢的報酬。假使他們從工作中所得的淨價格較高，（就是指以他們的所得，到鋪子裏所能買到的東西的而言）則他們的出產量就越多。他們真算是受價格機構支配的人們。所以蘇俄當局，雖然按區去估計每區的生產量，但是不能像工業計劃那樣，完全實現他們的計劃，因為他們對於這些私人農場，並沒有全權，可以支配。農民自己是站在主人的地位。在工業方面，工廠已經歸由國有，在農業方面，農場還沒有完全國有。所以蘇俄當局，為要實現他們的農業計劃起見，很想法子拉攏這些不屬於國營農場的農民，去擔任他們按計劃所應做的工

作。

經過十二年深刻的經驗，蘇俄當局，深知農產物是如何不可避免供求原則的支配。但是他們想盡方法，去避免正式承認這個事實，並且想盡方法，不讓這個原則，從中左右。他們一方面希望農民，並准許農民，在他們自己需要之外，多有剩餘的生產；但是一方面又強迫他們，把剩餘的生產，賣給國家。其規定的價格，並不得農民的同意。要按照農民的意思，是不滿意的。所以結果農民為抵制起見，把他們的耕地面積，縮小到最小限度，把他們的牲口，殺了，把剩餘的穀糧，埋存起來，把派來收集農產的代表，暗殺了。蘇俄當局，為壓制起見，實行了武裝收集的辦法。凡儲存食料者，就處嚴刑。

在這種對抗情況之下，自然農民認為他們大吃虧了，政府當局，既是需要他們的農產，那麼假使有好的價格，當然他們很願意把他們的農產，貢獻出來。如若不然，他們還寧願回到以前的現象，受價格經濟制度原則的支配。但是農民們同時又有一點事實，要顧慮到的，就是在共產世界裏，一個富有的農民，乃是罪惡之最大者，所以無論如何，假使他們能在耕種方面，可以得一點的好處，便有被發配到西比利亞的可能。如若不然，僅憑他們自己的理想，恐怕那些窮人，和有公共觀念的人們，都要整個被他們傳染壞了。這就是蘇俄現在進退兩難的情況。生產者既不能完全憑着貪取的動機，去從事生產，同時凡貪取動機成功者，一定要受懲罰。

蘇俄當局，為補救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起見，首以集合農場代替私有農場。可是蘇俄當局，雖然極力的推行這個政策，也不見得在農業生產方面，能真正避免受價格經濟的支配。集合農場中，各個人的生活，還是靠着出售他們產品的贏利求生活。這個就很與資本社會裏，農業生產者的聯合會相像。他們稱之謂合作社。因為丹麥的農民，設一個總代銷處，出售他們的鹹肉，美國舊金山的果商，將他們的蘋果，賣給代銷處，將所得的收入，由大家共分。他們的目的，乃是利用價格的機構，來為自己謀到更大的利益。蘇俄集合農場農民的地位，在他們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範圍內，在反資本主義社會情感所允許的範圍內，是與丹麥舊金山農民一樣。集合農場農民的地位，完全同蘇俄工廠工人的地位兩樣。工廠工人，對於工廠營業上的利益，並沒有關係（自然更無直接關係）。工業生產品的價格，為減低出口價格起見，都是定得非常低，絕無盈利可能。這筆虧折，是由國家予以津貼。工人的工資，並不受其影響。至於集合農場，每一個農家，對於他自己和別人農產物的售價，都有直接關係，因為他們就是靠着這個

所得的價格，來維持生活。所得的價格越好，則他們從每一斗米，平均所分得的收入越多，其關係甚為明顯。並且我們要知道，所謂集合農場，其分子多半是私有農民，及私有農民的子弟。要增加集合農場的出產量，非有好的價格，來吸引他們不可。

所以根據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兩個蘇俄農業的命令，很明顯的，表示無論他們怎樣把集合農場的價值，加以宣傳，並希望將這個新理想，輸進民衆的腦中，但是蘇俄不能不承認價格經濟，還是在相當的從中左右着。根據上面這兩個規令，從前農民，應當在某種價格規定之下，納給政府一定數量農產物的舊辦法取消了，而以一定的稅額，代替之，不過這些農產物是限於肉、牛乳、及穀物之類。這個稅付了之後，無論是私有農場的農民，或集合農場的農民，都可以自由到市場上出賣他們的農產品。但是為鼓勵實現集合農場政策起見，對於集合農場所征的稅，比較輕。這種辦法，其用意是要擴張農產物市場的範圍，更顯明的表示農生物所受價格經濟的支配，是更大的了。

六 蘇俄經濟制度下供求之情形

此外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在，就是我們在前此認定，在蘇俄凡是有受價格經濟勢力所支配的經濟活動，其支配的方式，是完全與在我們的國家一樣。但是這個看法，到底是對嗎？我們可以不可以說，在蘇俄辦法之下，整個的經濟活動，是按着一個總計劃進行。凡關於貨幣、價格、工資、及生產計劃等等問題，是最後受同一個最高的總機關

的支配。(前一章所述關於經濟方面的決定，其範圍實在是包括全國的經濟決定而言)我們還可以不可以說，蘇俄所以用現金來表現價格，和生產費用的數目，其用意是與非計劃經濟社會一樣的。

我很懷疑，他是這樣子的。爲明瞭解釋起見，很可以舉例說明。我現在舉一個簡單例子，來說供原則機構的意義，並將這個例子，應用到三種能夠自足的人身上。一個是代表非計劃經濟制度，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一個是代表有計劃經濟，像俄國那樣。

第一、假使我是一個耕種白薯，維持生活的人。我與任何別人，沒有交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白薯的生產量，完全是由我自己決定。到何時應停止生產，也是由我決定。在我決定停止從事生產的時候，就是表示，我認爲不值得花那麼多功夫，去增加其產量。此外還有一個衡量的因素，(Element of balance)在其中左右着。這個因素，對於各種經濟決定的重要性，在前章已經鄭重說過。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衡量的因素，乃是用一種簡單心理狀態，來表現他。就是將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與從工作結果所得的滿足，加以比較。

第二、假使我是生存在一個非計劃價格經濟社會裏，耕種白薯。我靠到市場上賣白薯，維持生活。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白薯的生產量，是在沒有人肯出價，再買白薯的時候，停止了。在那時候，凡是種白薯的人，都要心裏計算，再多種一磅白薯，是否得不償失。在這個例子裏邊，含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方面，在金錢交易上的計算。不過其原則，是與第一個例子，生產與消費都在一個人身上一樣的。在這個例子裏邊，就有一般價格經濟的力量，在其中左右着。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所謂生產白薯，是有利的，或是所謂合乎經濟意義的，就是表示有充分的人，願意出生

產者所要求的價格，去買白薯，認為出那些價格，是值得的。同時在衡量因素的另一方面看來，（就是表示在接收那種價格的生產者看來）他們認為值得在那種價格之下，將他們所有的白薯出賣，這個交易，就可以成交了！至於過了某種限度，生產者不再去生產白薯，乃是因為他們認為，假使再生產，市場上價格，一定要降落，其報酬一定要減低。我們在工作上，在生產上，都不能不顧到我們的報酬，是得足以償失。

在這個第二個例子裏邊，其情形稍為複雜，就白薯本身而言，一方面是出勞力的生產白薯人，一方面是吃白薯的人，所以在勞力與需要的比較之中，一定要用金錢的價值，來做衡量的工具，使他們二者碰頭。關於這個問題，內中的複雜情形，讀者請於下章詳細留意之。

現在討論到第三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之下，白薯的生產，是屬於蘇俄整個計劃的一部分。在這個制度之下，我無論是一個私有的農民，或是集合農場的農民，我都是要將我的白薯，賣給經營食料的托拉斯，或是國營合作社運銷機關；這些機關，也是要付給我相當的價格，其衡量計算的因素，也是同前一個例子一樣的存在着。在我方面，認為這個價格，是可以吸引我去生產白薯，否則我就不再生產了；在托拉斯合作社方面，認為他們是值得出這許多價格，去買白薯，否則他就不去出價去買。

但是在這個例子裏，有一個重要的要素消滅了！就是食料托拉斯自己並不吃白薯，他們經由工廠，或者各地方合作社的手，最後買給蘇俄的無產階級。食料托拉斯，既是一個國營的機關，他所定的價格，並不是代表無產階級，認為這個白薯，是值得買的。有的時候，托拉斯受了別人很多的津貼在那種情形之下，其所定白薯的價格，是比

我們私人所要出的價格高。有的時候，這個托拉斯本身，是在津貼別人，姑以茶為例。在那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在市場上將要得到較多的茶，較少的白薯。假使市場不是這樣的受國家的統制，也許他們不會得到這麼多的茶。此外更重要的，就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出那些價格，去買白薯，並不是表示他們心理覺得，出這些價格，去買白薯，是值得的。其中是用另一種方法，來吸引購買者，當於以下詳論之。

自然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一個生產者，也不見得能夠將他的產品，直接買給願意買那種東西的購買者，但是在生產者，與最後消費者之間，所有經過的經濟行爲，都是根據價格機構的原則決定的。這就是說，他們的行爲，都是依着價格的好壞，來評定他們行爲的對否。最後消費者，所能出得起的價格，就是這個整個經濟活動最關緊要之處。假使這個界限價格，不夠開銷生產者從頭至尾的費用，不久那個東西的產量，也就停止了。所以無論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或爲直接的關係，或爲間接關係，我們可以認定於消費者對於某件產品所出的價格，其數目足以抵消那件產品在生產方面，分配方面，所花的費用的時候，那種生產，纔可以存在着。人們爲價格所吸引，（以現金計算）纔願意去從事生產。

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捨棄白薯的例子，舉一個更切實的例子來說明在蘇俄計劃經濟之下，實際的情形，是怎樣。我在蘇俄的時候，有一天到離卡哥夫（Калуга）不遠的地方，去參觀流浪兒童教養所所住的大房子。這個房子，是新設計的，設備很完全，可以住三百以上的小孩子。除生活上設備之外，還有小工廠。小孩們在裏邊，做些電氣發動機的工作，裏邊也有講堂。那個教養所的當局，很得意的告訴我們，說這所房子，雖然是國家政治警

察(Stake Political Police(Ogpu))送給他們的。但是他們內部，現在很可以自給。小工廠出品的收入，很可以充經常費之用，如管理員、教師之薪金等等。小孩們每天在工廠做工四小時，上課四小時，他們年紀平均在八歲九歲至十八歲十九歲之間，都不是很聰明的，但是以一天只有四小時的工作，而其中的小孩，多半都是相當於學徒的工人，竟能使這麼一個團體自給，並且維持得相當像樣，實在難得。

經我詳細打聽，纔知道這些小孩所做的電汽發動機，在蘇俄並沒有別的地方製造之。在這個教養所沒有設立以前，這個發動機，是從外國輸入的。現在輸入已停止了。他們的當局，很滿意他們的出品，竟能使蘇俄在這方面不必依賴外人。此外他們的產品，是完全賣給經營電汽工程的國營托拉斯。

這種自給的例子，顯然表示一種新的現象。但是所謂自給，並不含有自給的真意義。因為一方面蘇俄的當局，可以給予他們專利生產的權利；同時需要這個出品的企業機關，又有充分的財力，去購買他們的出品，任憑其價格如何之高。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專利生產，固然可以由一般生產者實行壟斷，請政府實行保護關稅，禁止外國輸入，但是他們還是要仰鼻息於消費者。他們並不能有支配兩方面的力量。他們不能使消費者，在專利價格之外，增加購買力。但是在蘇俄，他們就能夠。其實際情形，是這樣子的。上面這個教養所工廠所謂的自給，乃是帳目上的表現而已。乃是生產費用與賣價，在紙上表示平衡而已，並無何種真正的意義。

其次縱使生產品是賣給最後消費者，而不是賣給國家企業機關，可是計劃經濟，也可以有控制價格機構的力量。以前面所說的白薯例子來說明，我們認為其最後所得的價格，一定是可以抵償其在生產各階段中，所花的

費用。政府並沒有中途給予任何明的，或暗的津貼。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否可以說白薯的生產，是受價格機構的支配，以維持生產費用，與價格的均衡。我認爲在消費者自由意志，還是一部分受攤配制度的控制之下，我們不能這樣的認定。因爲雖然白薯本身，不受攤配，可是有別的東西，已受攤配，其對於最後消費者，願意出多少錢，去買白薯的影響甚大。比方說，甲某每月的薪金，是一百羅布，因爲攤配的制度他不能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羅布，去購買麵包、肉、奶油等，所以他就把所餘剩大部分的羅布，花在白薯上，盡他的購買力去購買。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對於各種消費的選擇，並不是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意志，去比較各種消費品的價值。也許也是願意多得一些麵包，或者牛油，少得一些白薯，但是事實上，不能辦得到。結果他對於白薯的需要，很不自然的膨脹起來了。

這個例子，並不是完全根據推測，因爲有人時常聽見在蘇俄住居過的人說，任何蘇俄人民，凡其收入比最低限度的數目較多者，簡直不知對於他自己的錢，要花在什麼上好。所好蘇俄實行攤配制度的貨物的價格，定得很低，其水準還低過供求相應的價格，所以貨物尚可以在人們的錢尚未花完以前，都暢銷了！其結果消費者的需要，發生一種畸形現象，並不足以真正代表他們內心的需要。他們的需要，政府已經爲他們規定，他們便是對這個規定發生一種反應。他們所要買的，並不是他們所願意買的。他們乃是有什麼，就要買什麼。

七 結論

上面所舉的例子，還不足以完全表現計劃經濟對於價格經濟控制的力量。因爲根據上面所說的，國家是工

人的唯一購買者，國家對於工人，除直接用經濟動機，施行吸引外，還可以實行許多別的控制力。生產的費用，可以不受市面上工人價格的束縛，隨工人報酬的規定而增加，或減少。工人的工資，可以自由規定。上面所舉兒童工廠的例子，電汽發動機的生產費用內，是含有普通教員和專門技術教員的薪金，要不然，其所定價格，還可以比較一般受價格經濟的支配低些。所以凡是國家托拉斯出產的貨品，其售價不需要盈利。可是政府方面，可以有種種法子，去使他的生產，足以抵償其費用。比方說，他們可以把凡是製造那件貨品的工人的工資，一律降低；同時其售價不變，這樣子，生產的費用，就可以抵償了。然使用這個法子，一定要工人供給量的分配，不受價格機構的支配，如若不然，工人們可以全體不做這件工作，到工資率沒有減低的工廠裏去尋工作了！蘇俄工廠的經理，對於工人的變動，可以有充分控制的力量，不至於使上面這種現象發生。自然在強迫做工制度沒有完全實行以前，他們對於相對的工資比率，所要發生的現象，並不能完全控制，不見得會比資本主義企業家所能控制的能力，超越許多。

或者政府當局，不願意用扣工資的法子，去同工人為難，那麼在完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他們也可以用別的法子，達到同種目的。他們可以想法子使所降低的工資，適與生產費用所虧折的數目，相均衡，同時還可以用減低各地合作社所規定的價格的辦法，俾在事實上，工人純工資，依照他們的購買力，可以維持不變，雖然他們不同別人一樣，把生活費用減低。所以照這樣看來，我們發現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假使僅僅在某一個企業，或者某一項工業範圍之內，將其生產售價，與生產費用均衡起來，是無補於事的。

最後我們要記得，在生產費用內，要計算到的，不只是工資一項而已。並且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在蘇俄，尚要依

賴價格機構，來支配工人的供給與分配的時期中，就其所依賴的實際程度而論，其所能依賴的範圍，是要有一個限制的。超過那個限制，工人的工資，是不能由人力左右的。因為按着上面所說的辦法而論，某個工業工資的減低，乃是要使他的成本，在數目字上，顯出有利的現象。在這時候，食料的價格，也隨之減低。可是假使在這時候，工資沒有減低的人，可以同樣的享受到食料價格減低的好處，那麼在不久之間，工資減低的工人，一定會認為他們的地位，同人家比起來，是變壞了。假使工人的市場，一日存在，則這些工人，一定要到工資較好的地方，去尋找工作。在那時候，當局方面，一定會覺得假使他們要完成比較細膩精巧的工程，除非他準備付一個最低限度的代價，他們是找不到工人的。在那時候，他們絕無法用減低工資的辦法，來減少成本費用了。

但是，在上面我們所討論的，成本費用，與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成本，完全不同。資本主義的成本，是用付利息來表現的。在蘇俄，他們僅有與工人市場相似的東西存在。他們也僅有一種近乎工資時價的東西，但是他們並沒有資本的市場。所以他們並沒有利息的時價。但是我覺得真正的成本，確是要付利息。比如期待將來的結果，或是努力於儲蓄的人，我們確是要付給利息。但是許多社會主義經濟家，否認這點。比方馬克斯，他就認為資本貨品，乃過去的產物，消費品，乃現時的產品，除此以外，就是工人。工人就是代表一切。差不多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承認他的意見。根據這個理論，假使有一個機器，可以用四十個工人，一同工作，在一年之內，把他做好，在這個機器造成之後，二十年之內，其每年出產量的百分數，稍稍超過兩個工人，不用這個機器，所能出產的產量，而我們就根據這個理由，認為一個資本家，值得製造那部機器，因為在這部機器之存在期中，他可以省僱許多工人。並且在二十

年之後，他的所得亦比較多些。

假使資本家，要是這樣辦，一定是一個呆子，要不然一定是一個瘋子。因為他要造這部機器，他要使四十工人離開製造他目前所需要的。固然在二十年的長時期中，他從這個機器和他的工人的工力中，所得來總產量，其百分數，會比他不用這個機器的出產量多。但是有許多多的出品，是要期以二十年的時間的。假使他是一個精神沒有失常的人，他一定會感覺得一種困難，就是他不能把二十年之內，他所要滿足的慾望，弄成一個縮影，假使他要享受這二十年的快樂，他一定要犧牲目前的消費，若將目前的犧牲與將來之滿足比，也不過少了一些些，而他二十年的等候，卻沒有報酬。

所以根據這個情形看來，假使資本家僅僅知道，這部機器，在他的生命期中，其出產量的百分數，可以正好比他現在為造機器所用的工人的出產量大，他是不會表示滿意的。他所欲知道的，是這個相差百分數，是有多大。假使其百分數之大，可以抵補目前的損失，那麼他心目中一定認為這部機器，是可以值得製造的，是有前途的，是有希望的。換而言之，他不但要認為這個機器，在他生存期中，可以把工資的成本，包括在內，並且還要把這個成本所要付的利息，也要包括在內。所以我認為資本家之所以要求利息，並不只是因為他是生在贊成付利息制度的世界裏，所以他要付利息，乃是因為凡是人類，都是相信，一個鳥在手，是比許多鳥在樹枝上好，就是他確知在樹枝上鳥，是可以捉到手的，他也是作同樣的看法。

上面所說的這些話，究竟與計算計劃經濟制度的成本，有什麼關係。其關係很多。因為計劃經濟家，與資本家

一樣，也要決定應當僱用多少工人，去製造目前所需要的東西；同時還要知道僱用多少工人，去爲人類將來的慾望準備着。根據成本與慾望的滿足，應當維持平衡的原則而論，假使要從事爲將來準備的慾望而生產，一定要計算其生產的結果，是否可以抵補他將目前所需要的工人，用以做將來工作的損失。這就是說，這些工人所造成的間接消費品，在將來所得的結果，一定要含有付給他們的工資，並加上利息在內。

所以我認爲一個有計劃的企業，除非能將全部的利息與工資、原料同樣的放在成本裏邊，他不能說是已經包括成本的一切。不過所謂全部的利息，在一個社會化的經濟社會裏，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如何答覆。我們平常所謂全部工人的成本，乃是指你要出一筆價格，去僱幾個工人，去完成你所要做的工作。那麼全部的利息，就是指你要付一筆代價，把這幾個人，目前的消費，限制起來，以留待將來的報酬。這個利息，是要靠許多要素造成的。如儲戶對於將來酬報的信仰程度，目前，儲戶的貧富狀況等。假使有個資本的市場存在，那麼利息時價，可以在資本市場表現出來，如同工資時價，可以在工人市場上表現出來一樣。比方說，假使在一年之內，除收還其固有之資本外，復有一分的年利，足以吸引許多儲戶，那麼年利，增到一分五釐的時候，一定也照樣的，可以吸引許多別的儲戶。這個道理，正與每星期三鎊可以僱到許多工人，替你做工，假使每星期增加到五鎊，更可以僱到許多工人一樣。但是在蘇俄，沒有資本市場存在着，利息的實在利率，沒法子表現出來。其實際情形，是這樣子的。假使蘇俄人民，在目前加緊一分努力，在五年之後，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較好的利益，那麼假使再加一分努力，就可以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但是再加上一分努力，是否能得到百分之三十的利益，與再加一分努力，是否值

得的，並沒有法子使努力的人，可以利用市場的機能，有所依據。計劃委員會，為將來計，加緊目前的工作，他們自己認為加緊到某種程度，他們將來收穫的增加，是可以抵補目前的犧牲。換而言之，他們認為這個投資所得的利息，是足以抵補這個投資所花的成本。在一個儲蓄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社會裏，這種推測，是否準確，大可由儲戶對於各種刺激所表現的反應中，以判斷之。假使一個人認為儲蓄一百元，在五年之末，能得一百二十元，是不值得的，他就不去儲蓄。那麼儲蓄者一定少。在蘇俄就看不出來這種反應。因為儲蓄的數量，並不由個人的反應而決定，如工作乃是由個人對於工作代價的反應而決定。蘇俄儲蓄的數量，乃是由大家集合的決定，乃是由代替個人貯蓄的人來決定。

照這樣看來，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成本項目之中，似乎有類似利息的東西存在，但是絕不能希望他在某一個企業的支出，與收入的平衡帳中，表現出來。因為我們並沒有法子，估量其成本的確數，真正是若干，其所能得到的數目字，都是武斷定下來的，僅僅表示計劃當局心目中，認為那般節省的人們，應當得到某種酬報而已。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利息的地位，久已成爲討論的問題。但是我們所應得的結論，應當是這樣子的。就是說，在資本商品歸大家共有，與商品的製造，歸大家共同決定的情況下，利息還不失爲經濟上的成本。但是在數目字的表現，是很困難的。於是利息的時價，就不足以爲決定實際政策的準繩了！或者還可以把我上面所舉的，在三種經濟方式下生產白薯的例子，來申說一下。第一、是個人經濟制度之下，成本與收穫，都是在一個人身上。第二、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一方面是節省的儲戶，另一方面是享受直接物質結果的投資者。但是後者願以利息來借前者的儲蓄，假使兩

者同意，則交易成功。第三、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儲蓄與收穫者，都是屬一個團體內的人，但是這筆交易，是否值得，他們不能自知。因為他們應當進行到何種程度，並不是由他們自己決定，乃是由第三者替他們決定。

我對於本章的最後結論，是這樣子的：在一方面看來，蘇俄的計劃經濟，有時候簡直完全用不着價格機構。或者僅是一部分用着他；在另一方面看來，似乎價格機構，仍然存在着，仍然以他供作經濟上各種決定的工具，同其他所有的經濟制度一樣，尤其時常以他供作支配人們行動的工具。因為物品可以國營，可以用法令來支配，人則不然，如價格機構對於工人所發生的關係，對於農業所發生的關係，都是例子。但是他們使用價格機構的法子，與我們不一樣。所以計劃經濟，雖然受價格機構的支配，而其所得的結果，同非計劃經濟制度下所得結果，完全兩樣。這個價格機構，有如一架天秤，為控制這機構的作用起見，蘇俄當局所處的地位，非常奇特，他們的力量，可以同時達到天秤兩個盤子上。假使有兩個團體的人，向這個天秤加重量，一個團體加這一邊，另一個團體，加那一邊，在某一點上，他們平衡了。那個平衡點，就是表現他們兩個團體，在每一邊上，所要控制的力量。假使這兩個團體，把這個天秤，交給第三者，請第三者替他們秤量，自然也可以在某一點上平衡，但是這兩個天秤盤子的含量，在這兩個辦法之下，並不見得會一樣的。

第三章 非計劃經濟之功績及其可能性

一 價格經濟與不平等現象

前兩章的目的是在敘述以後各章的目的，注重在評價。

我們現在先就資本主義價格經濟而論。在未批評這個經濟制度之先，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制度，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實在爲人類增加了許多種類的消費方式，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未可與之比擬的。這種現象，是因人口作空前未有的增加，而演成的。就產品的數量，與實際物質成就的紀錄而言，價格經濟，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在英美各國的成功，是沒有別的制度能及得他，這也是自古以來所未有過同樣的現象。我們的嘴，能夠吃到麵包、牛油、果醬、香蕉、桔子、茶葉、咖啡，我們的足，有皮鞋穿，地板上能有地毯，窗戶上能有玻璃，家庭裏能有電燈、無線電收音機，都是價格經濟的賜與。其數量並不是少，都是以千百萬計。價格經濟還可以穿透叢密的森林，供給人們以新聞紙，以內衣，還能夠使成隊的載重車，接續不斷的動着，從這裏走到那裏。這種種成功的結果，總而言之，可以說是漸漸的減少了人們工作的時間，所以目下工人每天的生活，不是分爲二部分，而可以分成三部分；工作、健身、遊玩。以這個制度過去的功績，如此之大，所以我們現在對他下評價時，非特提到他的失敗，且亦提到他的

成功。我們若是說他可以救我們於貧困之中，使我們在孜孜不倦的工作中，得到安慰，同時我們也要承認那些許多虛有其表亂雜的奢侈品，只是把我們的靈性毀壞了。

但是這些成功，是我們所共曉的。我們現在要去批評他的弱點，並不是表示我們要抹殺他的功績。因為凡是已經成功的，似乎不能再改進了；但是過去失敗的，似乎還有改進的可能。資本價格經濟的失敗，已經有許多人在討論着。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大抵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涉及倫理道德問題，一部分是涉及經濟效率問題。這兩個問題，自然並不是兩個絕對分開不相關的問題。因為在你不知道價格經濟的任務，是什麼以前，你就不能決定他的效率是如何；在你沒加以倫理的估價以前，你也沒法子確定他的任務是什麼。舉實例為證，現在在蘇俄，並沒有一個人，他的富力，能有及美國的福特者，但是假使我們根據這個，就認定蘇俄經濟制度的效率，不及美國，那麼這種批評，絕對不能成立。除非你事前已經認定，在一個國家裏，其極貧者與極富者的數目，占居少數，而一般人都中等，這種現象，是比一個國家，每個人都是貧者，並無富者在那裏同貧者相比較的現象好。這個好壞的問題，就是涉及倫理上評價了！但是我們在批評價格經濟的時候，很可以將倫理的評價，與經濟上的評價，作一個合理的區別。因為我們認為這個經濟制度所產生的結果是錯的，是一件事，我們認為他沒有達到他所要產生的結果，又是一件事。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兩種不同的說法上，將上列兩種的評價，予以區別。

近年來大家在這兩方面給予資本主義的評價，其攻擊的分量，隨時不同。舉一個個人的實例為證。許多年前，我到一個工人團體裏，去尋求一個位置，當僱主的代表，引見我的時候，他頭一句話就問我說，你什麼時候加入工

黨，爲什麼要加入。我對於第二個問題，回答說，據我的淺見，我認爲我所以決定加入工黨，是許多考慮聚合而成的。隨後黨裏有一個朋友，說我的答覆，未免大出於老實了。他說：我應當答說，因爲氣憤社會的不平等而加入的。我想他對於我的勸告，到了今天，時過景遷，應當同從前不會相同了。雖然說社會的不公平，仍是一個理由，但是人們對於資本主義失敗的失望，在今日可以說是一個更好的理由。

我認爲在這本書子裏，我對於價格經濟的評價，要完全站在這個立場，來發表意見。其關於價格經濟倫理方面的評價，僅願意很扼要的提到一些。我的理由有三：第一、這本書的主要之處，是在於說明經濟機構，所以我們從事研究經濟制度的效率問題，是比較討論那個機構的倫理問題，有關係，有用處。第二、近來大家對於目下經濟制度的評價，大半從討論他的不好的方面，轉移到討論他的笨拙問題了。這種方向的轉變，是值得注視的。因爲這個經濟制度的笨拙，有的地方，在近代歷史中，是已經很明顯的表露了。爲實際上需要起見，這個失敗，是急需加以研究的。第三、倫理的評價，最後總要追究到信仰問題，而不能歸於理智問題，所以我們無加以深究的價值。因爲假使別人對於我們善惡的標準，不表示同意，我們並沒有法子，責備他的意見，是錯的。不過話雖這樣說，事實上我自己又覺得，若對於資本主義，施以倫理上的攻擊，其力量是比較的大。這個制度，實在處處在表現他的不公平地方，凡仰其鼻息的人，實莫不受其節制，與壓迫的。

把他不公平的地方，總括來說，財富分配之不均，機會之不等，勢力之不平衡，都是很明顯的現象，都是可以代表近代資本主義，所具有的特徵。資本主義，固然爲世界人造福不淺，但是受其惠者，總歸限於少數人，即是還有一

些人，可以受到一點小惠，但是還有許多人，連一點小惠，都沒有享受到。凡對於資本主義作倫理評價的人，最後總要說到他的不平等，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的批評，是不能適用於以價格機構來解決經濟問題的社會裏，這種社會假使能完全實現，其生活狀況，並沒有明顯不平等的表現。所以這種批評，並不能對價格機構而發。（關於這點，已經在前一章說明過了）應當對財富的分配而發。可是這種財富分配，都是在經濟事實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社會裏產生，所以我們就發生疑問，到底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還是價格經濟所偶然發生的現象，還是他在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呢？用價格機構，來支配經濟活動，是否可以與社會的平等，及經濟的平等相融洽呢？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給一個確定答案。我們只可以說，價格經濟本身，並不是生來就不能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裏，表現他的機能的。我們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價格機構，是有趨向於平等的傾向，假使他的進展，不受階級及偏見的阻礙。目前社會上所發生收入不均的現象，至少有幾種可以避免的。現在財富不均的現象，有許多是遺產制度所造成的。在個人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而決定生產產量，與勞工分配的事實中，並沒有預先決定，我們應當如英國或法國，將我們所有的財富，遺留給我們的子孫。我們的能力，很可以構成一種社會，使每一代人都要從頭開始積財，沒有人可以坐而享受永遠的福利。就是在他自己一生的期間內，也是不可以的。因為他的成功，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去做倣他，並且別人還要分享他的所有。我們也可以說這就是價格經濟神聖的地方。根據柏拉圖的理想社會，現在的資本主義，簡直是一個卑鄙以假冒真的東西。

但是這個理想社會，事實上在現在社會中，是很難存在和發展。第一、因為人到底還是人，其性格能力，總歸不

相同，在人類任何制度中，根本都有趨於不平等的傾向。我們不必認為，假使人類的身體，是可以互相交換的，我們就可以在現社會制度裏，造成一個公平的社會。現在我們既是不能互相交換，我們就應當記得，無論任何經濟制度，到了最後，總要形成上重下輕的現象。除非那個制度，很明白的規定，專門為弱者、不幸者、與能力薄弱者、謀幸福而有的。第二、平等靜止的社會，僅能在個人主義經濟制度下實現，但是這種個人主義經濟制度，要沒有發生不平等情事，是不會有進步的。使個人有進步的希望，乃是價格經濟整個動力之所在，但是要想別人同我同時有同樣進步的希望，那就不是同為一事了，並且永遠不能同為一事。

經驗告訴我們，價格經濟社會，欲求其發展迅速，惟獨有很明顯分配不均，纔能達到目的。我們既然不能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的分配，必要遵照一個一定的方式，我們就要注意工業化的程度，與不均的現象，在價格機構支配之下，總是攜手並行的。像瑞士以及斯干地內維亞各小國家，他們的社會，固然是個人主義經濟制度社會，其財富的分配，並沒有很明顯的不均，但是他們的社會，到底很小，他們多半都是農業的國家。

所以我們似乎可以暫時得一個結論，就是說，不平等是隨着價格經濟進展之程度，而來的。價格經濟本身，絕沒有含有不平等的性質。在這世界上，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社會，他是絕對厭惡不均的現象，而同時又願意保留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那種自動的伸縮性（這個自動的伸縮性我們在上而講過了）。思想左傾的人，正在夢想這種理想社會的實現，但是擁護這種理論的人，究竟不多，所以欲求這個理想，成為事實，似乎不容易。但是他在理論上，並不是沒有成立之可能。所以我們又不能認為其不能在事實上實現。所以我們可以說，凡以不平等來攻擊

資本主義者，不管他是從善惡觀點，或是從效率的觀點來解釋，我們都可以加以承認；但是不能歸咎於價格機構的本身，而只能歸咎於隨着運用價格機構而來的，幾種平常所要發生的事實。所以凡是咒罵這宇宙發生不平等的現象的人，請你們用一點心思，去想一想，我們咒罵所指的目標，是什麼。所好這種考慮，還不至於把人們咒罵的情緒打斷了！

二 效率問題

現在就效率的立場，來批評價格經濟。但是我們先要替經濟上所謂有效率的經濟行為，立一個定義。自然經濟上所謂效率，是指以最少的精力，能得到最高的滿足。更明顯一點，按照生產事業來解釋，所謂效率，就是說生產只可以進行到某一個相當的頂點，不可以過那一個頂點，過了那個頂點，則其所產生的事物，並不足以滿足，或者抵償我們所花的，那一點多餘的精力。就是說，每一種生產，到了剛剛足以滿足需要的時候，就應當停止。我們可以用其餘的精力，去生產別的，或者去從事休息。這種說法，可以拿前一章所舉的白薯例子，來做證明。

在前一章裏，我們已經作一個最簡單的說明，就是說，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的消費，能與他自己的生產相平衡。但是即使要求這麼一個很簡單的平衡，都是很難辦得到的。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並不是一個人經濟狀況下，試問誰能夠開口說，我的需要，已滿足了，請對方不必再從事工作了！比方說，我現在寫一本書，我怎樣知道，這本書是做得使我去費這許多功夫去寫，並且還值得使出版者，與賣書者，去費許多事。再比方說，離開我寫這本書的一里外，

有一個女孩子，他正在使用他的眼睛，替某某人修補褲子，什麼人可以斷定，這個穿褲子的人，因褲子的完整，所得的快感，可以抵償那個女子所費的眼力呢？

這些問題，並不僅是一種無聊的問題，即是承認其為無聊的問題，亦適足以證明每個人在他所從事的工作中，沒有不發問同樣的問題的。假使我們的經濟制度，對於這些問題，不能給我們一個正面的答覆，那我們的經濟制度，就有不妥當的地方。

人們所以擁護價格經濟制度，是因為人們認定價格經濟制度，可以供做一種工具，以衡量不可衡量的快樂與苦痛。要達到這個目的，他是要根據上面所指的經濟效率的原則，來發生作用。這個衡量，是以金錢來表現的。苦痛就是成本，快樂就是價格。兩者可以用金錢來互相比較。假使有一千人認為我這本書，可值五先令，而在出版者與賣書者方面也認為五先令是足以償補我們所費許多的精力，那麼在經濟上就認為這件事是可以做的。假使肯出價買這本書的人，只限於一千人，而在我們生產者方面，認為我們不能減低到五先令以下，出售那本書，那麼價格經濟就告訴我們，不要再印行第二個一千本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將要賠錢，乃是因為這種要賠錢的事實，表示給我們看，這個生產事業，已經過了他在經濟上的限度了！同樣的，假使一個人，認為他值得去花五先令，把他的褲子，修補一下，同時正好另一方面，也有人願意出材料，出地方，去交換那五先令的一部分的錢（比方說，四個先令），而同時更有一個女子，願意出人工，去賺那餘剩的一個先令，那麼根據價格機構的作用，這件工作，就成功了！

價格經濟的妙處，全在於此。所以就有人認為，個人主義價格經濟，可以使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我們所急切需要的東西，以抵償我們要滿足那些欲望所費的功夫。價格經濟的最後指導者，是未可知的消費者的需要。如其價格經濟，不遵照未可知消費者的意旨，乃是因為他們要滿足的慾望，是不完全合乎經濟的。同時又有許多人認為，現在價格經濟，雖表現矛盾現象，但是在根本上，他還是不錯的，合理的。就是在反對價格經濟者，攻擊價格經濟的資料中，我們也可以有所解釋的地方。比方說，反對價格經濟的人，引證了下列這一段話。有一個漁翁，假使他覺他所捕的魚，已經過了他所應當捕的數量，他將要把魚，擲還海裏去。這一段話，在表面上看來，是一種攻擊價格經濟的話，但是請大家想一想，這個漁人，所以把魚擲還海裏，乃是因為恐怕假使他把這個魚，放在市場上，將要使魚價大行跌落，這個跌落的價格，將不足以補償他一日勞苦下來所應得的工資。但是在價格機構上看來，所謂沒有人願意出一筆價格，去報償漁翁從辛苦中所得的魚，是同我們說，沒有人對於魚的需要，正可與漁翁捕魚所費的精力，相稱合，是一樣的。所以那些魚是不應當捕的，捕了那些魚，既是不對，那只好把魚放回海裏去。

我所以對於這點，加以申說，因為我認為根據上面這個方法，一方面去衡量生產的成本，另一方面去衡量生產結果所得的快感，在這種衡量的準確性中，是整個問題關鍵之所在。這個關鍵，就是說，我們在價格經濟制度下，對於生產的性質，與數量，所作的決定中，是含有經濟的真理在。這個決定，我們不能有別的任何法子，可以預先決定。但是關於上面這種衡量方法的準確性問題，頗引起許多人的批評。答覆這個批評的人，自然也有。批評者大半根據兩個理由為其出發點。第一、有些人認為一件東西的價格，只要能夠使眼前接收這個價格的人，認為這個價

格，是足以抵償製造那件事物，所需要的成本，就可以了。此外也許還有別的成本，不過並不在他介意之中，或者他可以用別的法子，去在別人身上，去取得價補。比方根據上面所舉一個女子修補褲子的例子來說，那個女子，因為補褲子所費去的眼力，絕不能在付給他的價格內，包含有這一筆報酬，假使他的僱主，不願意價補他。同時，假使僱主可以隨便把眼力壞的女工開除，以別人代替，那麼在這件工作的成本中，還含有這個眼力殘廢的女工的親屬的手工在內，或者還含有國家給予這個眼力殘廢的女工的撫卹金在內。可是這都不包含在成本與價格的平衡之內。假使消費者對於工人眼力的損失，還要付以相當代價，恐怕這件工作的需要，就會停止了。

關於這種批評，我認為沒有別種方法，可以答覆。除非我們承認，無論任何東西，他的真正成本，都是很難確定的。這個問題，終了也許是一個慣例的（Convention）問題。在前一章裏，我們提到蘇俄流浪兒童教養所的產品問題，我們發現，在一個計劃經濟制度裏邊，國家當局，如何可以（假使他們願意）把我們平常所認為應當歸於教育制度上的用費，也歸併在成本裏邊。現在我們正好發現一個與這個正相反的例子，就是在價格經濟之下，竟把本來應當歸列在成本項下，用以平衡成本與價格的項目，而不列在成本之內。我們要加以細想，並參照別的經濟學者，所發現許多關於這類沒有包括在成本以內的項目，我們就覺得價格經濟的理論，有些站不住。

第二種批評，認為在我們以金錢為衡量某甲成本，與某乙需要的滿足的情況下，假使發現其中有一個人是貧，一個人是富，那麼這個衡量，所代表兩方面個人所費的精力，或是滿足的快感，其意義，是不相同的。比方說，我願意花半個英鎊請某甲做某件事，某甲也願意接收那件工作，但是那個半個英鎊，在我這方面，也許不算什麼，而在

某甲方面，也許就足以解決他的生活問題，那麼這個半英鎊的轉移，於我與他之間，在價格經濟看來，是表明那件工作，值得做，可以做，但是其實並不見他所費的力量，是與我的滿足相等。事實上價格上的同意，並不見得能避免下列這個現象發生，就是說，某甲雖然竭盡心力，為我成就了某一件事，但是這件事，在我方面看來，也許是一件不相干的事。

回答上面這個批評的正宗答覆，就是說別人心裏懷着什麼念頭，我們沒法子去透視。所謂半英鎊的價值，在富者眼中看來，是比貧者所認定的價值小，這種輕易的概論，並沒有法子，可以證明。除非有一個人，貧與富都經歷過，那麼也許可以告訴你，在富的時候，他覺得半英鎊的價值，是比貧的時候小。他所以能給你這麼一個比較，因為這兩種現象，是存在一個人的心眼中。但是他不能告訴你，在他貧的時候，假使多得半個英鎊，其快感比起一個別的富者，花費這半個英鎊時候，所受苦痛，還是大，還是小。許多人認為他的快感，不比富者的苦痛大，因為稍為富有的人，他的生活程度，比較高，他有必需的花費，與他的嗜好，這些嗜好，貧者從來想像不到的。我們知道，有的人，他的收入，比我們多出三四倍，但是他還對於我們平常人，所沒想到的花費，加以計較。認為他們與那些需要計及鋪張的人，一樣不能隨便耗費。

這個答覆，顯明表示經濟家所謂，富者的金錢界限效用，是低於貧者，這個理論，是沒法子證實的。不過此外這個答覆，還含有別的更重要含義在。因為我們還可以根據同種理由，說明為什麼我們不能說，同是一筆錢，其所以代表人類的苦樂，在富者與貧者之間，是有一樣的作用，並且我們也不能說，在任何兩個人之間，是會一樣的。最後

我們可以歸結到這個理論，就是說，在兩個沒有一個共同意識的有機體中，他的感覺根本上是不可比量的。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所謂生產是受價格與成本在現金上謀平衡的現象的支配，乃是表明這種現象，長久的在經濟活動裏支配着，終於可以使凡要從事生產事業的人，一定要在消費者與生產者，對於這件生產，都表示同意，在他們兩方面看來，都覺得這件生產，是值得進行的時候，而後纔能進行。但是所謂值得去進行，有兩種說明；一種是消費者與生產者同是一個人，他可以直接的，從他自己所從事某件生產所費的精力，與他從事這件生產的所得的快感中，求得平衡。還有一種，就是從事生產是一個人，願意出價去要他的出品，又是一個人。這兩種說法，是不一樣的。因為在後一個說法中，生產者與消費者，雖然同意，但是他們在價目上，所想像的客觀對象，並不見得與他們主觀上所想像的，恰好相合。假使有兩個人，同種一畝地，兩人各種半畝，表面上看來，這個工作的分配，是很均等的。但是假使一個是殘廢者，一個是活潑的人，那麼所謂均等，只是膚淺的說法而已。但是經濟上的決定，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是需要受與上面這個同樣膚淺的事實的支配的。

照這樣子看來，我們對於價格經濟所作的各種經濟決定，絕不可下一個絕對不錯的斷語。那些決定，用金錢來做表現勞力與快感的工具，並不見得能真正代表成本與生產的平衡，那些衡量，都只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價格機構所能為力的，只不過將與某種平衡有關係的人們的意見，用某種特別的詞語，來具體的表示他們的意見而已。那種詞語的意義，因使用的人之不同，而其含義亦不同。但是他們這些人，用某種詞語所發表的意見，所以能夠決定生產與消費的活動，第一，因為他們所表示的詞語，雖然在意思上有變動，但是他們所要表示的內容，是一

樣的。第二、人們所以在詞語上表示某種意思，乃是表示他們願意根據那種意思，從事活動，在事實上，他們就是那麼活動。我們所以能知道消費者覺得某件東西，是值得五個先令，同時也有人覺得值得花五個先令，去做他，乃是在那件東西，已經產生出來，與已經賣到五個先令的價格的時候，我們纔有法子知道。也許在賣者與買者之間，就會根本彼此誤會大家心中對於這個交易上所懷的是什麼意思。但是在事實上，他們就照每個人所推想的，去實行交易。所以這兩個人所以認為那個生意是值得做，也許多少是因為他們覺得那個生意是應當做。如若不然，假使僅僅因為凡人們心中所願意做之事，而加以阻止，是一種不好的事情；或是因為政府當局，要讓他們改變他們的辦法，所以他們纔去做那個生意，那麼到最後一定會發生很不好的結果。這種困難，在我們要想施行一條法律，規定最低的工資的時候，可以證明。比方說，有一個僱主，他知道他們能在這規定工資率之下，僱到工人，而另一方而工人也認為，假使他們接收這個較少的工資，可有較多工作的機會。但是事實上在價格經濟之下，所謂有人願意訂定某種契約，覺得這是值得的，並不見得就是說，那種契約，是足以代表雙方在勞力與快感上，已達到真正平衡的表示。我們實在沒有法子，去避免以下這個困難，就是說，在從事工作是一個人，與使用其工作之出品又是一個人的情況下，我們絕不能斷定這個出品，是否是值得去費力去作的。

三 以求利潤為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說之批評

上面這段話，是對於以價格為衡量勞力與快感的工具的準確性，加以批評。這種批評，隨時都可以應用得到

的。現在再進一步，討論到人們對於價格經濟所作更深一層的批評，其範圍較狹，其問題較為顯著。最近數年來，價格經濟的效率，大為減低，其結果演成一種不能充分利用目下既有的人力，與物力的情勢，這種情勢，是一個悲慘而又滑稽的情勢。我們平常認為，貧困無事可做，是非常悲慘的，但是假使處在一個一切都是充足的環境中，而覺得貧困，實在是悲慘而兼滑稽的事。尤其是唯其因為太充足，而會發生貧困，那更是滑稽了。同時在一個許多事情，尋着要做，與工廠等着人去開工的環境裏，而覺得無事可做，更是同樣的滑稽。這種情況，不用我在這裏多說，恐怕大家都已經很感覺得了。

但是我們似乎可以注意看看，人們在目前這種病態矛盾情況之下，都發生了一些什麼意見，我想或者最能綜括一般人的意見的，莫過羅素氏（Bertrand Russell）的話。他說：目前一般有經驗的人，莫不承認，每一個人的工作，只是使每一個別人加苦。照這句話看來，我們越能阻止人們去參加生產事業，越可以使這個社會有辦法。所以現在有許多，作以下各種的主張：（一）做妻子的，可以不必自求生活，應當仰給於他的丈夫。（二）強迫教育時期，應當延長，這種辦法，不但對於少年人本身，有益處，並且還可以對於社會有益處，因為可以限制這些少年們，去增加生產。（三）我們的工作時間越短，則我們可以越富足。補救目前經濟脫節，及貧困的唯一好辦法，就是想法子把我們所有財富，整個的折毀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大規模的戰爭，是很有效的辦法。如其不能有大規模的戰爭，我們可以把現在所有錯用勞力，去生產的產品，燒了，沉了，並且從此立志，不許再有這麼多的生產。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在每次作以上幾種主張，或是擁護以上這種政策的時候，我們心裏是承認下列這一個信念，就是說，

席上東西越少，則在坐的同人，幸福越大。你要想替你的同胞謀幸福，其道不在乎用你自己的力，去謀生活，而在乎使你自己，去由別人來養活你。用上面這一段話，來解釋價格經濟社會，這種悲慘而滑稽的崩潰現象，是一種近乎無聊的說法，無加以詳細追究之價值。其中且有許多，是完全無價值的。假使我們願意真正將非計劃與有計劃的經濟制度，加以比較，我們至少應當就所以造成目前這種情況，幾個可靠的，比較為大多數人所承認的，原理原則上，加以探討，我們應注意回答下列這幾個問題：第一，目前這種病態，是否為價格經濟本身所固有的，或者是由不大重要的缺點，所造成的，而這幾個缺點，是可以立即加以改正的。第二，凡生存於非計劃經濟制度下的人們，是否要永遠陷於這種悲慘而滑稽的狀況中。計劃經濟，是否能夠避免這種病態。

第一，根據社會主義者的意見，這種病態，是固有的。這種現象，應歸咎於在價格經濟社會裏，含有利潤可以追求，即無生產事業之可言。我個人對於這種意見，僅承認為半真，除非再補充有他一半，這種意見，是會引起錯誤的結論的。其可以引起錯誤的結論，有三點錯誤的地方，為求解釋周到起見，容我每一個分開來分析。

第一，是關於利潤的本身問題，我在前而已經說過，假使一種生產，進行過了某種程度，是不合乎經濟的。所謂某種限度，就是說到了某種時候，假使再增加其生產量，那麼這個增加的生產量的價值，在消費者方面，所認定的，並不足以償其生產的成本。同時我在上面也說過，在成本裏邊，到底要包含幾項項目，實在不容易把他明確規定，或是在事實上把他明白指定出來。我們平常所謂在每件東西的價格內，一定要含有利潤的成分，實是我們不能完全利用富源的原因。這種利潤的理論，含有利潤與成本內其他項目，在性質上是不相同的意思。

但是這種區別，加以詳細考究，似乎有一些混亂。這自然不是說，利潤不能具有別的特性。這個特性，在別的時候，是很重要的，但是與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不相干。社會主義者，在這裏所謂的利潤，是包含付與資本者的全部價格而言。但是在這個全部價格裏邊，是包含有利率在內。這點我在第二章已經說過。這個利率，其應當列於生產的真正成本項內，正與把付與工人的工資，列在成本內一樣。經濟學者，更把這個主張，作進一步的解釋，認為假使要計算某一件東西的真正成本，應當把最低限度的利潤，包含在內。這個利潤，包含兩種東西：一個是資本利息，還有一個，可以說是一種保險金，以防某種企業將來之趨於失敗。換一種說法，就是說，投資於將來，必要含有限制目前消費的犧牲。這種成本，我們絕不能把他忽視了。假使投資的危險性比較的大，其結果不能盡如我們所期的實現，那麼這個成本，更要把他計算得多些。

假使我們把上面所討論的這種利潤，當作成本看待，那麼凡不把他列為成本項目的經濟制度，照我們看來，都不能算是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假使某種生產，進行到某種程度，消費者的供給量，已經充足了。消費者認為這種生產，如再行增加，就不值得再出價去抵償生產這件東西工人所費的力量。在這時候，大家都承認這種生產的增加，是浪費精力，還不如請這些工人，去做一些別的正在需要中的東西。假使沒東西可做，還不如請他們去休息。但是假使我們覺得在生產成本中，我們確實應當把上面所說的最低限度的利息，和保險費，與付給工人的工資，同樣的包含在成本內，那麼我們對於一件東西，凡是其售價不足以抵償這個最低限度成本者，也可以同樣的表示反對。所謂一件東西，其售價低於這種最低限度的成本，就是等於說那種生產，也是浪費精力。因為凡是做一件東

西，假使其所費的費用，在使用這件東西的人看來，是不值得的，那麼這個東西的生產，就不是有效的生產。不過自然假使我們認為這個最低的限度的利潤，經濟學者所謂正常競爭利潤可以不必列為成本項目之一，那麼我們生產量，還可以增加些。因為假使在一個東西的成本內，可以免除幾個項目，那麼那個東西的價目，就可以減低，其出產量就可以隨之增加。因為凡在從前那種價格之下，買不起那個東西的消費者，現在都可以買得起了。但是在售價內，把利率和保險費免去，並不見得可以很有效的減低價格。假使從事生產者的意思，是在一定要達到某一種利潤，要不然，他就不需要任何利潤兩個念頭打算盤，那麼在這兩個念頭中，後一個比較可以給我們多生產一些貨品出來。但是並不見得能多生產許多。假使我們在前面一段所說的理論，是不錯的，凡是一件東西，不足以償其成本的，都是不值得生產的，那麼去增加這一些的生產品，就是一種錯誤。

但是這時候，讀者將要覺得不耐煩，認為我們平常所認為的利潤，難道僅僅就是要付給利息和保險費的最有限度的數目嗎？如果如是，那麼假使到處都實行自由競爭，這個利潤，一定會趨於這個最低限度的數目。那麼社會主義者，大可以不必對於這個利潤，氣憤了。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者所得的利潤，並不止於此。事實上是這樣的，假使有一個人，從事某種生產，而社會上從事那個生產的人，就是他一個人，同時可以生產的事業，也就有這一種，那麼凡是一種生產能夠達到百分之二的利益，就足以引誘他把資本投在一個新的企業上。如果社會情形不是如此，假使在大家合資的辦法，與在競爭的情況下，他可以有得到百分之十利益的機會，那麼其結果，凡是比這個利益少的，他都要看不起了！在那時候，他所要從事生產的貨品，一定要準知道消費者對於他的貨品，

可以付他所能得到的利益的價格，而後他纔去生產。這種情況，在事實上確是如此。我們就各種工業，各種公司，所得各種不同的利潤看來，就知道經濟學家，所謂正常競爭的利潤，並不是正常的。

以上這段話，就是對於社會主義者，攻擊資本主義因利潤而生產的批評而發。我認爲他們這種批評，僅有一半是對的，現在我所說的，就是補充其他一半。但是這個其他一半，雖然很重要，同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沒有關係。我們認爲資本家願意圖謀獲取厚利，固然可以解釋資本家爲什麼不將其工廠，從事所有各種的生產，所謂所有各種的生產，乃是指我們對於那些生產所願意出的價格，適足以償其成本，在工資、材料、利息、保險費各方面的費用，而不至於使生產者虧折的貨品。但是資本家願意圖厚利，並不足以解釋爲什麼資本家，已經決定將其工廠，從事某種生產，而又把這個工廠關閉了。而又把已經生產的貨品，破壞了。換句話說，資本家圖利的說法，僅可以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並沒有發育滋長，並不能解釋爲什麼資本主義的發育滋長，是時長時輟。有時候必要受長期消化不良的打擊。在一個生產被資本家獲取高利而發生阻礙的社會裏，人民感覺着貧困，與無能力去購買許多東西；我們預料資本家，在這種社會裏所生產的數量，一定不肯超過他用有利可圖的價格所能賣出的數量。但是這正是資本家所沒有做到的。

現在我們談到前面所謂三種錯誤中的第二個錯誤。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三個錯誤，都足以使人們將資本主義所以發生悲慘而滑稽的毛病，歸因於資本家爲求利潤而生產的結論上。這種說法的錯誤，是很顯然的。因爲他沒有看到這種悲慘而滑稽的毛病，是與資本家本身不利的。這點我們現在不多加以解釋。目前這種病態最

顯著的症象，就是資本家把他的錢，放在各種企業上，他希望可以從中國利，但是終於使他失望，在他失望之後，他就停止生產，於是就發生了現在這種棄貨於地，及民不聊生的失業現象。這種現象，顯然表明價格經濟，在目下所發現的缺點，並不是因為他是為求利潤而生產，所以纔發生這種缺點，乃是因為他想求利，而沒有達到目的。這兩種原因，並不能混為一談。目下這種狀態，並不是由於資本家所玩的把戲，本身所造成的，乃是由於資本家沒把他把戲玩好造成的。這兩種說法，不是相同的。資本家沒把把戲玩好，使別人受損失，同時他自己也受損失。在目前恐慌狀況之下，資本家的利潤，有的簡直減少到虧折的地步了。我所以說這句話，並不是要表示我們對資本家，表示同情，而沒有想到那些億萬失業工人的痛苦。乃是我覺得，假使我們把這點記在心裏，在我們解釋目前經濟狀況的時候，或是對於現狀謀補救方法的時候，可以不至於走錯了路徑。最明顯的推理，就是說，假使目前恐慌的狀況，是由於資本家做法的錯誤演成的，而並不是由於資本家的成功所演成，那麼資本家大可以研究改良辦法，去消除目前這個錯誤。如果此言不差，則人之相信資本制度實際上應加廢除者，必係癡人說夢。關於此點，請於下文詳及。

最後我們談到大家認為求利是危害價格經濟的第三個錯誤。這個錯誤，認為利潤本身，含有一種不好的性質，就是說，資本家得了利潤後，對於需要量的增加，並不發生關係。一個工人，得了工薪，他把他的工薪花了之後，可以使資本家再去增僱工人。但是在資本家方面，他得到紅利，或其他利潤之後，並不會發生工人得了工資的那種效用，結果在一個東西的價格中，有一部分的钱，是停止週轉了，不能生利。並且更進一層，還會使消費者缺乏購買

力去購買貨物。那種貨物，本來是可以足抵償其成本，及投資者利潤的價格下脫售的。這種說法，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裏討論着，要是按所聽到的次數來判斷，似乎大家都認為這種說法是對的。但是其實除了幾個很特殊的情況外，這種說法，實在是無聊的。很明顯的，一個資本家，他所購買的東西，與一個工人不同，他為個人需要起見，他所買的奢侈品，比較多些。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並不是直接供他自己的使用，多半用以購買企業上所需要的各種材料。假使他是一個間接投資者，並不是自己直接經營企業，那麼他就要把他的收入，轉移到他人手裏，請別人替他花在企業上，或者他還可以把他的收入的一部分，儲存起來，也不投資，也不花費。這種儲存，在不景氣時候，其數量是比較的大。因為投資的人，莫不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結果。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提過，就是說，在某一個時候，人們儲蓄的數量，可以超過人們願意投資的數量。

但是這種暫時增加儲蓄量的傾向，只是代表在一種不健全的理論下所發生的現象。所以說不健全，因為人們的收入，是否可以永遠儲存起來，不用以購買任何東西，實在是令人懷疑。同時就是有這類的收入，也只是一種特殊的收入，如利潤之類，而不是指一般的所有收入而言。事實上以收入去購買材料工具，而不買食物、果蔬、白薯，並不會把人們對於那個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的購買力取消了，也不會阻止資本家去僱用工人。反而言之，採棉花與紡織業工人的工作機會，反而為之增加。其所不同者，就是生產果蔬白薯人們的工作機會，為之減少而已。

四 霍布孫以投資過剩為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說之批評

我們現在已經把爲利潤而生產，是使得價格經濟沒法子消費其產量，並利用其資源的原因，推翻了。現在再進一步，考究人們解釋目前經濟狀況的另外一種主張，其爲人所承認，也不見得比上面這個主張少。這個主張，霍布孫（J. A. Hobson）堅持最力。他認爲有錢者，把他們大部分的收入，儲存起來，留爲投資之用，結果資本制度，不得不形成一種畸形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投資的數目，永遠比企業界上所能承受的多。明白一點說，這種說法，可以分爲下列幾層：凡收入較多的人，覺得他們的收入，任憑他們的花費，如何奢侈，他們都花費不了，於是他們就把不能花費的錢，儲存起來，供投資之用。因此新的資本商品，就由於他們的投資，創造起來了，同時工廠，也建築起來了，船舶也製造起來了，礦產也開發起來了。這種種資本的工具，其本身顯然不是寶貝的東西，一定要有消費者願意，並且有能力去購買他們這些工作，所產生的東西，而後這些工作，纔有效用。但是處現在狀況之下，因爲工人階級的貧困，消費者的購買力，爲之限制。結果富有的人，雖把他們的收入，投資去造工廠，但是不能獲到利潤。現在補救的方法，就是增加貧困的人的收入，使他們有錢可以花在靴、牛油、肥皂等等貨品上面。同時並須減低富有的人的收入，使他們不會再繼續的去建築工廠、製造靴、牛油、肥皂等等。

我認爲霍布孫的主張，可以說是把右派的社會主義者與左派自由主義者在經濟理論上所爭持的意見容納在一起。最近考納（Mr. G. D. H. Cole）所主張的意見，大體上是與霍布孫相同。其所不同者，僅在其細末之處。但是一般正宗經濟學者，在過去幾年中，都主張將霍布孫的主張，置之不理。不值得加以反駁。這種態度，實在不對，因爲除非我們承認經濟學是一個神祕的科學，我們不能有這種態度，並且就經濟學者的任務而論，也不應該

如此。經濟學者對於已知的，應當加以修正，求其完美，對於未知的，應當予以開發。（此二者所需要的性質並不相同）不應當僅僅注意到大多數人們所相信的理論。所好近年來經濟學者這種不理不問的態度，已經發生動搖。因為霍布孫名字，已經引起大經濟學家基利斯（Kyrles）的注意。

關於上面所說的，自然我們有加以一討其究竟的必要。據一般工人階級的意見，資本制度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資本家投資過多。可是據有力經濟學者的意見，資本制度所以失敗，乃是因為投資不夠。這兩種說法，都不見得對。因為事實上這兩種說法，絕不能都是對的。但是我們總要想法子，找出那個是對的。要不然，我們沒有法子，把我們現在經濟制度的前途，可以成功到如何程度，去同另一種的經濟制度，互相比較。

我自己認為把霍布孫的理論，歸納起來，發現社會主義者對於目前經濟制度的批評，有許多不幸的錯誤。結果使許多很好的理想，都走錯了路，碰了壁，走不通了。假使我們要想改善我們目前的狀況，並創建出來一個比較滿意的經濟制度，我們就不得不趕緊回頭。霍布孫主張根本的缺點，如加以分析，可以用各種的方法，把他指點出來。要想整個把他駁斥，恐怕要占許多篇幅，不過其根本錯誤之處，可以扼要的說一說。根據他的理論，投資過多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富者實行儲蓄，其所以儲蓄，是不得已的，並不是他們有什麼眼光，預料某種投資，有多少利潤。他們並不是對平常我們所謂的利潤，去反應；他們的動作，是盲目的。但是假使我們承認，他們的投資，果然是盲目的，並沒有顧到利潤，那麼我們就要問，為什麼在無利可圖的時候，又發現他們消極緊縮起來呢？其實個中情形，是這樣子的。逃不出下列兩種現象：一個是投資者不顧到利潤，在那種情況之下，他的投資，可以超過可以獲利的限度。

之外，他並不因為無利可圖，而不去投資。一個是投資者要顧到利潤，在那種狀況之下，他的投資，要限於可以獲得利潤的範圍之內。從這樣看來，所謂因收入太多，而引起盲目儲蓄，而發生投資過多的趨向，自然不會永遠的存在，而且勢必自歸於消滅。

再進一步說，這些盲目儲蓄者的儲蓄，在資本主義制度，用以創造新資本的總量中，只不過佔其一部分而已。在此總量中，還有許多別的小資本的成分，包含在內。這些別的資本，都是按着正宗的辦法，對價格經濟，發生反應的。所以在這許多小資本，於投資的總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的情況下，縱使其餘的資本，是由那些不是為求利潤而儲蓄的投資者所湊成，可是在事實上，這些盲目的儲蓄，並不能阻止這個總資本量，去在利潤的範圍內，經營着。因為那些受利潤變動的影響，而聽從於利潤變動的人們，已經足以在這個總資本量中，左右一切了！我們可以舉一個比方來說明，假使有一桌人吃飯，我們知道其中就有了一個人，他的飯量，是不隨桌上菜量的多少，而變動的，其餘的別人，都要是按着桌上有多少菜，而增加其飯量，那麼這一桌飯，就不怕有不夠的危險了！除非固定飯量的比例數，占得太多。同樣的，盲目的儲蓄者，他們的儲蓄，是不會影響儲蓄市場的情況，除非他們這種人，能整個占滿儲蓄市場。

我認為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我們從事生產的方式，是多半隨着生產者對於需要吸引力的反應，而決定的。這個情形，永遠是這樣子的。無論我們是多需要資本商品，而不多需要消費品，或者我們多需要一些甲種消費品，而不多需要其他消費品。人們的儲蓄與投資的增加，就是資本商品產量的增加。資本商品生

產的限制，是以利潤希望的大小為依歸。同時也要看市場上，對於這些資本商品，所製造的消費品的需要，是否殷切。投資者權量這個機會，而後決定他的行動。其情形正與生產皮鞋、牛油、的生產者一樣。他們的產量，也是根據同樣的原則，來決定的。假使我們把市場上所有的生產品，分為三大類：一個是日常必需品，一個是日常奢侈品，一個是生產工具。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這三類生產品生產數量分配的比例數，也是完全受同種情形的支配。在一個富人較多的社會裏，奢侈品的產量，當然比貧人較多的社會裏為多。同樣的，假使用以投資的資金，非常的多，其資本商品的出產量，當然比在不喜歡儲蓄，只顧目下，不顧將來的社會裏多。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之中，一個是富人多，一個是儲蓄者多，並不包含有下列這個意思，就是說，應這些人的需要而產生的貨品，可以永遠繼續生產，可以超出有利可獲的限制。

應用盲目儲蓄的理論，來解釋資本工具過剩的現象，還有別種說不通的地方。因為作這種主張的人，很容易犯證明太多的毛病。霍布孫自己固然承認有些儲蓄與投資，是必需的。有的時候，會發現儲蓄不夠的現象，假使社會上沒有充分的儲蓄量，以供擴充，並改善生產的工具。這個生產工具，是用以增加生產數量，以供生活程度較高，或人口增加時候的使用。但是這句話，只是一種常識問題，同時也就是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經驗。他的意思，就是說，創造新資本工具，乃是提高將來的生活程度的途徑，很明顯的，因為我們的祖宗，投資創造了許多工業上所必需的工具，與器械，所以我們繼承了他們這些工具，就可以大規模的製造了，許多便宜商品，使我們生活上所享受，遠勝於他們從前的生活。但是我們不大明瞭，照他們這種說法，如何可以使投資在資本商品上的數量，不

至於超過上面所說的限制，恰到好處，而有益處。換而言之，如何可以使新產生資本，先有提高人們生活程度的能力，而後我們可以根據生產品無法在市場上推銷，來證明除非提高生活程度，資本是過剩了。不過這種提高，據我們知道，在資本社會內，是不能的。讀者細細研究霍布孫理論，就發現霍氏認為可以用同種推理的方法，表明投資過剩所發生的結果，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任何資本工具增加下，必不可免的結果。這種說法，是反乎常識，同時也是反乎經驗的教訓的。

現在我們且將屬下一章的材料，應用一下。我們希望蘇俄制度的經驗，可以供為參考。按霍布孫的理論，在一個消費者貧困的社會裏，企業的新設備絕不可超出某種一定限制之外，否則生產的能力，一定超過消費者的購買力。在蘇俄，固然絕沒有因富者盲目的儲蓄，而發生新資本膨脹的問題。但是我們深知，在五年計劃期中，蘇俄用於生產新資本的資本量，其比例數與資本國家的標準，比較起來，一定大得多。而從另一方面看來，蘇俄的消費者，是極端貧困的。可是大家現在對於蘇俄新投資額之高，除承認其將來可以提高生活程度外，並沒有別的说法，雖然我們方纔所談各種關於投資過剩的情形，目前的蘇俄，都已具備。所以根據蘇俄的經驗，我們是否可以證明人民的貧困，足以限制用於將來的投資的數量，而不至於使制度本身崩潰。

此外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投資過剩的理論，既是把資本主義目前矛盾的現象，歸咎於財富分配的不均，那麼我們就不能認為投資過剩的理論，是對價格經濟下攻擊，這個投資過剩理論的主要之點，認為假使人們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富，沒法子把他們的收入，花費完了，或者人們日常所要花費的費用，比較我們所想像的多，那麼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些不良的現象，都不會發生了。根據這個說法，假使有一個經濟制度，同我們一樣，建築在個人創造，與個人對價格變動發生反應的基礎上，而收入可以近乎相等，那麼這個制度，絕不至於像現在這麼糟了！不過我想凡認為投資過剩的理論，基本上批評價格經濟的人，是可以加以原諒的，因為相信這個理論的人，差不多都是懷着這種意見；認為一個經濟制度，既不是計劃的，而可以平等，雖在理論上，可以存在，但是實際上不見得能實現。其理由我在前面已提到一點。

五 病態矛盾情形之原因——對於將來情形預測之錯誤與貨幣制度之不當

為利潤而生產，及投資過剩的現象，既都不能用以解釋目前經濟制度之所以崩潰，那麼其原因安在其答案有二：第一、價格經濟機構，雖然因為現在運用不靈，發現他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是偶有的，而不是根本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想實現一個經濟制度，使其仍然基於人們對於價格的反應，同時能避免他的流弊，這是可能的，是有一天可以實現的。第二、每個價格經濟，至少都有一個不能避免的矛盾，這個矛盾，隨時都可以使價格經濟的最高效率，變成很低。目前價格經濟之所以特別無效率，也許就是這個矛盾，要負一部分責任。

先就價格經濟的非基本的缺點來說。我們知道，所有的經濟制度，都要相當的依賴人們對於將來情勢的預測，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經濟制度，其依賴的程度尤甚。這個預測，是時常會發生錯誤的。這種預測，要錯誤到什麼程度，自然是不能想像得到。比方就美國企業界，美國銀行界，一九二九年的報告看來，我們在那種繁華全盛的現

象裏邊，簡直連影子都猜想不到，將來美國會發生現在這種狀況。整個的看來，資本主義者的機器車輪，所以軋軋作聲，恐怕是以資本主義者錯誤的預測爲其唯一的原因。或者我們換一個比喻來說，我們所以沒有法子，玩一個遊戲，並不是那個遊戲的規則，從中作祟，乃是因爲我們沒有準確依照那個規則去玩。我們在生產貨品時候，我們希望人們所出價格，可以抵補其生產的成本，再加利潤，可是到了結果，並尋不到這種人。沒有油的油井，自然只能把他填塞了！投資者只願意聽從好作順利預言的預言家的話，結果就要遭受他所應受的代價。這些錯誤，要想加以糾正，需要相當時間。在糾正的途中，是要受損失的。有時候，其所需要時間，與其所受的損失，是非常嚴重。其實投資過剩理論的真諦，並不在乎他認爲我們的經濟制度，會有永遠產生過剩的資本工具的趨勢，乃是在乎他認爲假使我們把生產資本商品的限度，估量錯了，那麼我們對於那件生產，可以得到多少利潤，也一定會計算錯誤了！這個錯誤，需要無限長的時間，去糾正他。關於這一個問題，許多經濟學者認爲資本商品之有耐久性，是這個問題的不利的地方。因爲假使我們預料錯誤的對象，是消費品，而不是資本商品，比如說，在某星期之內，市場上發現楊梅的產量，過剩了，結果其價格降低到無利潤可言的地步。但是照規矩，這種現象，在幾天之內，就可以恢復常態，至多限於一個時季之內而已。資本商品，則不然，假使我們預料錯誤的對象，是一個工廠，或是一條船，那麼工廠既是建築了，非需要幾年的時間，去恢復不可。同樣的，農業上的錯誤，其程度比工業上的錯誤，還深。比方有一塊地，本來牧羊，可以獲得較多的利，現因預料的錯誤，改爲種麥，其損失非需要一年的時間，不能恢復。可是關於農業，有兩點可以注意的。第一、農夫素有固執，與反應遲慢的特性。第二、農夫要受輪流耕種的限制，需要幾年的工夫，輪流一次，

所以農夫對於需要的變動，並不見得有高速度的反應，也不然會有很大的錯誤。

事實上是這樣的，每經一次錯誤的預測，總有一些人的收入，爲之減少。這種錯誤，在第一次，使人在心理上覺得受一種打擊，第二次，就要使人發生膽怯。這種錯誤，綜合起來，終於使價格經濟的運用，發生一種滯澀的狀態。這種滯澀的狀態，對於一個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社會，所以不能繼續儘量使用他的資源，要負不少的責任。這種狀態，就是不會發生經濟恐慌，或經濟衰落的顯著現象，至少會使價格經濟，在資源上，時常發生很嚴重的浪費。很明顯的，假使因某種的原因，大家所有錯誤的預測，都湊巧一樣，那麼把大家錯誤聚在一塊，其結果自然是非常不可樂觀了！這種錯誤的預測，其表現於外表者，有各種不同之方式。在每一個錯誤中，都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矛盾的現象。這種現象，就是用了不了的資本和勞力，與不滿足的慾望，同時並存。但是我們同時要承認這種矛盾，是就資本家的立場來說，而不是這個制度，在正常運用狀況之下，所應發生的現象。

自然這些錯誤，欲完全避免，是必不可能的。並且經濟制度越複雜，則其企業的組織，越分得細密，越分得專門，則消費者所需要的貨品的種類，也就越多，種類越多，則其錯誤之可能性，也就越利害。目前的現狀，並不見得不是受這種情形的影響。凡生活程度有極度增長的時候，企業界爲要適應社會之變遷，就不得不有極度的發展，在那時候，價格經濟，則隨之有極擴張的崩潰。這個崩潰，是非常嚴重的。其企業發展得最快，最近代化的國家，其崩潰程度特甚。所以美國的情形，其比較英國的情形，更爲險惡。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有幾種錯誤的預測，固然是不能免的，但並不是完全沒有法子，可以避免的。第一，我們可以詳細研究，過去價格經濟失敗的歷史，得出一些概論，去減

少將來預測的錯誤程度。第二、將來總有一天，從事經濟事業的人，可以依照經驗的教訓，去從事他們的活動。凡人在事後表示聰明，固然是容易的，但是我們不相信，在目前這種經濟恐慌現象沒有發生以前，那些錯誤的預測中，沒有可以用過去的經驗，來避免的。我們未免過於輕易抹殺價格經濟了，假使我們認為在價格經濟制度生活的人們，其將來行動之愚蠢，永遠是與過去一樣的。

每一個人的錯誤，是獨立的，彼此不相關係的。除非每一個人的錯誤，都是受同一個羣衆感覺的影響。但是我不相信，這每一個人錯誤的總合，是目前價格經濟所以不能如意運用之唯一原因，我認為價格經濟的整套機器中，還有其他部分也損壞了。他對於目前經濟的恐慌，也要負相當責任。這部分機器的損壞，並不是沒有修理的可能性。這一部分的機器，就是貨幣。按照目前經濟崩潰的性質來說，我們絕對不承認貨幣制度，不負相當責任。因為很明顯的，貨幣的主要目的，是在從中疏濬各種生產與勞役的交易，避免以貨易貨的困難。同時更明顯的，就是在許多地方，人們之所以把他們已經造成的東西毀壞了，乃是因為他們不能得善價而售之，這就是顯然表示，交易制度的錯誤，而不是生產的錯誤。假使我們要指出其錯誤之所在處，我們首先要檢查管理交易的機器，那就是貨幣。所以經濟學家，尤其英美經濟學者，認為貨幣制度的錯誤，乃是經濟崩潰所以發生的樞紐之所在。價格經濟，如果知道如何去管理貨幣，則價格經濟之前途，可以很有希望。並且還有許多人，認為不管經濟恐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假使能用正當的方法，去操縱貨幣制度，那麼目前這種現象，是有補救的可能。大家請注意，假使歐美兩洲的經濟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有一個很好機會，找到我們的答案了。假使價格經濟只要有

一個好的貨幣制度，果然就可以繼續存在，那麼我們絕不是作過分的樂觀，認為至少一般少男少女，在將來仍以繼續聽到價格經濟的機器，可以很有節奏的，在那裏動作了！那麼一般已經把價格經濟的運命，宣告死刑的社會主義者，一定要大受打擊了。

歸咎資本主義之崩潰，於貨幣制度者，其說甚多。茲今僅將一般貨幣理論，略加探討，即知所謂金融狂者，所以發狂之理由安在。

在這一般的貨幣理論裏邊，首先可以注意的一點，就是根據實在主義 (Truism) 來解釋貿易的衰落。這種解釋，是舊式的，是屬於常識的。所謂貨幣定量論是也。(Quantitative theory of Money) 根據這個理論，凡市場上貨物供給量增加的時候，同時需要這些貨物的消費者的貨幣準備量，也要隨之增加，使消費者能有力量，去購買那些貨物。要不然，那些貨物的價格，就必須減低。這個理論，實在是一個很簡單的算術問題。大家都知道，貨幣的價值，乃是按着他所能購買的東西的多少，而衡量，所以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以上所謂降低價格的辦法，並沒有什麼可以反對。比方說，每種貨物的產量，均較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同時人們的貨幣量，並沒有增加，可是每種貨物的價格，卻都減低了百分之二十，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至少可以享受到便宜百分之二十的好處。但是事實上情形，並不能這麼簡單，我們都知道，某種消費品的數量增加，可是同時消費者的收入，並沒有增加，那麼其所發生的結果，並不是能像我們剛纔所想像的那麼愉快，並不見得每一件貨品的價格，都能一致的隨之降低百分之二十。在事實上，其結果是這樣子的，在推銷員競相努力拉攏顧客的情況下，有許多貨品，其價格簡直降低到

是供價補所增加數量的數目之下，有的貨品，其價格就始終不變。那種有的貨品的價格，降低得快，有的慢，就是表明出賣後項貨品而收買前項貨品的人們，都要破產。所以商人們對於貨品價格的一致低落，莫不懷戒懼之心。（如過去這幾年的情形）他們一致要求，在貨物的出售數量，與購買這些貨物的消費者手中的貨幣量之間，應當維持一個恆定的關係。他們認為假使這個辦得到，那麼甲貨品價格，可以上升，乙貨品的價格，可以降低，我們就不必害怕商品價格有一致跌落的危險了！他們這種要求，在商人的貨棧堆滿不能找到適當價格的貨品的時候，或是在企業家與農人因市場上價格的暴跌，而停止其出品的時候，特別厲害。

價格經濟的危機，以近代的貨幣論去解釋，雖然其中有許多可以批評之點，這點以下要論到的。但是上面所提出的這一點簡單意思，我認為很難從根本上把他推翻。嚴格講起來，或者我們應當把貨物的生產量，因現有資源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與因新資源的收入，而使貨物的產量增加，加以區別。比方說，假使因科學新發明的結果，工人的生產力，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那麼工人的工資，自然可以仍然與從前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出產量的增加，不連帶的增加貨幣的流通量，而企業的利潤，是不至於發生問題。但是假使生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乃是因為工廠和工人的加多，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就要發生了。除非增加新貨幣量，以供這些新工人的工資，使這些新工人，在社會上可以有錢去買新增的貨品，或是所有的收入，應當與所有貨物的價格，同時降低，使新增的貨物，可以脫手。但是這種收入與價格一致的降低，事實上無實現的可能。因為他一定要連帶的引起成千成萬的人，要從新修改舊有的契約，以適應價格與收入一致降低的新狀況，使大家都不至於吃虧，可是這是事實上辦

不到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主張貨幣量，應當隨人口與產量的增加，而俱增的理論，似乎非常占勢力。即使我們認為實際上要衡量貨物增加量的確數，或者衡量一般價格的變動，是很困難的，可是這個理論，仍不減少其力量。同時即使我們認為消費者手中的貨幣量，與待售貨物的價格，雖然能達到平衡，但是假使消費者非常固執，一定要把他的收入，貯蓄起來，那麼平衡一定要被推翻。或者我們更認為貨幣之隨產量之增加而俱增，是錯誤的，因為貨幣無限制的增加，在事實上是很危險的。但是這種種說法，都還不足以推翻上面這個理論。因為以上所提的這幾點，在事實上固然如此，我們要想規定一個實際的辦法，使貨幣的流通，與商品的生產，能夠相吻合，而能避免誤墮於別種困難之中，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個事實，與上面那個理論，是否正確，並無關係。同時與我們是否要想辦法，去制勝那些困難，也無關係。我們知道，在經濟恐慌沒有發現以前目前的貨幣制度，是代表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已經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了！他們向來就沒規定過任何辦法，使貨幣流通量的伸縮，可以與市場上商品的產量，互相調和。管理貨幣的傳說辦法，就是想法子在貨幣的流通量，與管理貨幣當局手中所有某種的金屬的數量之間（戰前多半是金），維持一個相當穩妥的關係。這種制度的好處，或者是在有章則可以遵循，負責的人，可以不必很用腦子，很費心思。關於這點，我可以拿最近的事實來證明，因為最近有一些負責的當局，已經開始用他們的腦子，來想法子，創造新章則，以代替舊的章則了。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個，認為這個制度的本身，已經在那裏想法子求貨幣流通量的變動，與商品產量的變動，互相調和。

所以有些人認爲，目前經濟的崩潰，其主要原因，乃是因爲在商品產量的數目，與生產力有鉅量增加的時候，新貨幣的發行，受了限制。這種論調，我們不能完全抹殺其無價值。誰都知道，在世界的總產量，有鉅量增加的時候，一定有一大部分商品的價格，大爲跌落。同時也一定有許多生產者與商人，在那裏高呼着他們的痛苦。假使貨幣數量論的主張，含有幾分真理，那麼這種價格暴落的情形，只能認爲是因爲消費者的消費，沒有與生產者的推銷，同肩並進。關於這個問題，無容我們加以解釋，因爲人們既沒有得到錢去消費，他們當然不容易任意消費。

此外人們對於目前非計劃經濟的運用，所以發生阻礙，還有一種更新的解釋。也是以貨幣論爲依據。不過對於上面的說法，似乎含有批評的地方。認爲貨幣數量論的說法，未免過於簡單，假使一旦能夠把貨幣個中複雜的情形，發現出來，貨幣數量論，絕不能那麼容易，從他的假設，就可以得到結論。他們尤其以爲，所謂一般商品價格，應與一般消費者的收入總量，相平衡的主張，過於抽象，毫無實在意義，對於企業界，絲毫不會發生影響。實業家對於這個問題，簡直不予注意。人們所注意的問題，是他或是她所要買，或是所要買的某件貨品的價格，是多少，並不注意到一般貨品的假想平均的價格，是多少。所以他們認爲，如其我們要將市場上貨品充斥，買不出的現象歸咎於貨幣制度之不良，那麼並不是因爲貨幣的綜合數量，不能與商品的綜合數量，不相吻合，而乃是因爲貨幣制度，把貨幣放在一個錯的地方去流通。換而言之，我們所謂增加貨幣的流通量，要記得新的貨幣，並不會在全市面上很平均的流通着。有的人先得到，有的人後得到，當他從一個人的轉到別人的手的時候，這個貨幣，就會中途被人截留了，用以做生產的資金，以滿足得到貨幣的需要。

海以克(Hayek)是英國方面主張這個理論最力的一個人。他認為處我們目前這種貨幣制度之下，購買力是最先發現在生產者，或企業家的手中，他們從銀行裏，借到一筆款，用以增加社會上的資本設備，換而言之，就是投資。所以貨幣的第一用處，有如一塊吸鐵石，乃是用以吸引生產者，去製造資本商品，但是在不久之內，企業家就用這個貨幣，去付工人的工資，於是這個貨幣，就轉到要用這個貨幣的人的手裏了。這些人並不是用在資本上商品上，乃是在消費品上。結果資本商品，是歸於無用了！人們對於資本商品，沒有真正需要的時候，如其有之，僅僅是一種假的需要。這個需要，乃是因為在新貨幣流通市面的時候，有的人非先得到他不可，如若不然，等到新貨幣流通到全社會的時候，那些人再去想法子，取得新貨幣，那是不為經濟上實際的情況所容許的。以實在的例子說明，假使汽車、啤酒、房屋的出產量增加了，按着貨幣數量論的原理，市面上應當增加新購買力，以供購買這些新出品之用。但是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這個貨幣可以到處流通，真正實行購買汽車、啤酒、房子的人，纔有得到新貨幣的機會，假使貨幣當局，把生產的一般指數，加以研究，而後再決定增加貨幣的流通量，那麼這個貨幣，似乎不會流到購買汽車、啤酒、房子的人的手裏，而流到開設棉紗廠的股東手裏，用以發展他們的營業了。

基利斯並根據目前的貨幣制度，如何不能在儲蓄與投資之間，謀適當吻合的觀點上，又構成一套貿易盛衰的理論。他的主張，與海以克頗為接近。根據基利斯的理論，我們現在的貨幣制度，給予從事生產資本商品的人，一種不正當的利益。其不正當地方，是這樣子的，市面上最先使用新購買力的，是從事生產資本商品的人，他們取得這個新購買力的方法，是在市面上信用擴張的時候，向銀行家透支款項。可是他們沒有理會，這些透支的款項，儘

僅是紙幣，而不是任何人的儲蓄，於是在不久後，他們就要發現，他們的投資，不會有利潤，因為根本在事實上，投資的數量，已經超越儲蓄的數量，這種投資，是經濟所不容許的。這個過答，要歸到貨幣制度，在事前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要發生。在現象發生之後，接着所再要發生的現象，就要適與之相反了。因為投資既是沒有利潤，那麼就沒有再去投資，可是儲蓄者仍舊儲蓄，結果那部分本來可以構成需要新貨品的新購買力，就放在一邊，歸於無用了。

我們不能不承認基利斯的主張，是用另一個說法，解釋貨幣制度如何阻礙目前這種經濟機構的進展。至少我們得承認，要想在貨物產量與購買此貨物的收入之間，求一個平衡，並不是像數量論所認定的那樣簡單。這裏邊並不僅是一個數量平衡問題，並且還含有綜合調和的問題。但是我們相信，到現在為止，非計劃經濟社會所用的貨幣制度，絕沒有注意到海以克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沒有人出面，對於從前的貨幣理論，加以攻擊。海以克認為要避免生產走上不經濟道上的唯一方法（這種不經濟現象，是每一次貨幣的伸漲與緊縮所遺留下來的）就是使現金購買力的總量，維持着一個絕對不變的數目，並且不必使每件貨品的價格，與理想中的價格平均標準，謀相適合，應當使他與每件貨品本身的供求情形，謀相適合。這個政策，是否可以解決生產與消費相吻合的問題，在大家尚固守在金元的圍城的世界裏以前，似乎很難有機會，去嘗試一下。

總結起來說，我們認為，凡以個人創造，和私營企業為基礎的經濟組織，要想進行得很順利，其最主要之點，是要有一個可靠的貨幣制度。因為在我們這種經濟制度之下，凡居中左右各種經濟決定力量，莫不以貨幣為衡量那種力量的工具。即以記載經濟上各種經濟決定的合同，契約，及合同的執行來說，都是以貨幣為衡量的工具。

假使籌劃這些經濟決定，和執行這些決定的人，其所用以衡量的單位，不是固定的，事實上每日在那裏變換，其結果自然在生產方面，會引起大混亂。最近常聽人說一個英金鎊 (Sovereign) 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內，是值得十二先令，或是十五先令，這個就可以表示貨幣制度之混亂了！我們試想想，假使一磅要值多少恩斯，一尺要等多少，是時常變化不同，那麼企業家在營業上，如何可以計算他們的營業量。並且我們要知道，這些磅尺的衡量，只不過就依重量與長短而發售的貨物而言。至於貨幣的單位，是無孔不入的，任何經濟上的活動，都要牽涉到的。我們試想想看，一個不好的貨幣制度，對於經濟效率上所受的損失，要負多大責任！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乎我們有時候，發現在經濟組織極端個人主義化的國家裏，也有向後轉反於以貨易貨的現象發生。美國的橡皮製造家，以他們過剩的橡皮胎，去同人交換印刷品，或是文具；牙科醫生，替人補牙，去交換魚肉。一個貨幣制度，要想進行順利，一定要能避免以貨易貨時代所發生的困難。但是同時還應當同以貨易貨時代，一樣的能夠不使我們去做我們所不要做的事，去生產我們所不要生產的東西。假使一個貨幣制度的作用，超過了這個，我們寧可恢復以貨易貨的辦法。在非計劃經濟社會中，一個理想的貨幣制度，應當要使各種重要經濟決定，所表現的形態，可以與我們在以貨易貨不用貨幣時代所表現一樣。貨幣僅可以當做一種工具，用以記載經濟的決定。這個記載，是參加這個經濟活動者，所感需要的，就是沒有貨幣出現，他們也願意有法子去記載他。假使貨幣的作用，超過了這個，影響到經濟決定的內容，那就減低經濟效率，而不會提高經濟的效率了。

以上把近代的貨幣理論，做一個單簡的探討，很可以表示目下的貨幣制度，已經盡了他的任務，同時我們把

他的缺點，研究一下，頗足以從這些缺點之中，解釋了目前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潰敗的原因。此外我們還發現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目下還不能造出一個完滿的貨幣制度，使他在理論上，與事實上，都可以同時兼顧。現在有許多，正要解決這個問題。我不相信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同時我也不相信，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可以把他解決。貨幣是推進非計劃經濟的滑潤物，一個污穢的滑潤物，可以停止機輪的走動，我們換一換油，不是就可以不必討論到換機器的問題了嗎。

六 干涉問題

欲求價格經濟順利進行，可靠的與理想的貨幣制度，並不是唯一的條件，同時還要顧到別方面與這個問題有關係的原則，其不容忽視，與我們要遵守實行金本位或別種貨幣制度本身的幾個原則，有一樣的重要。在一個經濟組織中，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則，要注意的，就是經濟上各種決定，應當是人們對於某種刺激而反應所得來的結果，要達到這個結果，自然每個人必須要有自由反應的權利。關於這一點，引起了我們平常所謂的干涉 (Interference) 的問題。近代的價格經濟，就是受這個干涉的限制，我們在第一章裏，已經提過，無論任何貨物的供求，都能在某種價格上，互相一致，除非購者願意出價格，而賣者不願意賣，或是在購者方面無能力，或不願意出賣者所認為最低的價格。假使這種不能一致的僵局，是由賣者方面計算的錯誤造成的，如我們在一章所提到的，那麼到了相當時間，一定可有辦法解決。自然我們隨時都可以發現，有許多錯誤，湊在一塊，而尚未有辦法，可以解決。如同

工廠的歇閉，工人的失業等等。在那種情形之下，計算錯誤的賣者，收存許多不能如他所期望，可以得到的價格的貨品，不是把那些貨品拋棄了，就是把那些貨品，減價出售。他受了這個教訓之後，一定要小心，不要再錯誤了！比方說，在一個營業減退的工廠裏，一個工人，本來他每星期的工資，是五鎊，現在連十天二鎊的工資，都不容易有了！在那種情形之下，他自然要想法子不讓他的兒女，再去步他的後塵，充任那種工人。

但是假使這種供求相應法則的力量，在某種情況之下，受了外界某種的干涉，而軟化了！那麼上述這種情形，將為之一變。近年來，這種干涉的機會，和他的效力，頗為增加。尤其在英國德國為然。這種干涉的方式，有時是在賣者之間，用一種一致的行動，來表現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某種生產者，共同同意不去訂立某種合同，這個合同，在干涉的力量，沒有出現之前，本來是要訂立的。干涉的方式，有時候是由國家機關出面，認為這種干涉，是為大家謀利益，或是有關大家的安全。這兩種干涉方式之不同，很有區別之必要，當於以下見之。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關於這種干涉，具有造成目前資本主義危機的趨勢。這個趨勢，是上面這兩種干涉方式中，所共有的，換而言之，就是造成貨物堆集，與工人失業並存的不良現象。比方說，有一個賣香蕉的商人，因為受價格規定的限制，每條香蕉，不許在二便士以下出售，結果他手中有許多沒法脫售的香蕉。反過來說，假使沒有那個價格的規定，他很可以以賤價賣給那些出不起一個便士的窮顧客。同樣的，假使有一個工人，他如果不肯接收低的工資，他就要完全沒有收入，結果他一定要去接收低的工資。但是假使在他的背後，有工會的保險金，或救濟金，替他保障，那麼他當然要等着更好的工資，而不去就那個低的工資了。由此看來，無疑義的，有許多失業工人，現在是可以得到工作，假使他

們的同業，沒有規定一個最低限度的工資。

依英國的現狀來說，受全國健康保險法案保障的工人，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其中有三百五十萬，是已經登記過的工會會員。此外在工會議決案之下，享有最低限度的工資的工人，有一百五十萬，在農業工資議決案之下，享有最低限度的工資的農工，有七十萬人。另外在商人方面，他們還自動的立了許多控制價格的規定。由此看來，很明顯的表示，近代的英國價格經濟的前途，並不是像經濟學家所理想中那樣自由。以上這些條例的規定，都是最近這一世紀中的現象，與兩百多年前的英國經濟制度，完全不一樣。

這些規定工資的條例，與其他的規定，乃是表示用一種公共意識結合起來的力量，加在價格經濟的身上，以期避免革命的發生。因為最先提出這些價格規定問題的人，是急進派的社會主義者，在那時候，與社會主義者反對的人，都認為這種要求，是辦不到的，是過於苛求，可是結果通過這些條例的人，也就是這些反對的人。這些要求，既經列入法規，就很難加以廢止。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要求，是為大家謀福利的，他們絕不問選民們到底對於他們的相信，贊成不贊成！

但是我們不相信所謂社會立法，雖然具有非常人道的精神，是絕對與非計劃的經濟制度的發展，與進行，是相融合的。我們在第一節已經提到，在非計劃經濟度之下，工資的付給，是具有兩種作用：一供接收工資者維持生活之用，二使某件事因接收工資者的努力，或因接收工資者的允許，可以完成。假使工資的付給，是由外界來決定，那麼其工作的結果，無論是一件已經完成的事，或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一定同工資完全由收工資者，與給工資者

兩造自己決定的結果，不同的事情，在沒有這種外界干涉的情況下，也許可以完成的，現在不能完成了。比如說，按照法律規定，某種工業的工資，每星期不許在二鎊以下，假使現在有一個工人，他找不到一個僱主，願意給他每星期二鎊的工資的工作，可是他自己是願意少賺一點工資，現在因為工資條例的限制，他從此就找不到工作了。還有，假使國家對於失業的工人，立有保險與救濟的制度，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其結果本來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有一套機構，可以使衰落的企業，設法減退他的工人，現在這套機構，不能再發生作用了。再有，假使有一羣生產者，他們鑒於前此利潤的豐富，認為將來打算得到同樣豐富的利潤，其最好的方法，是維持他們的出產量，達到某個一定的水準，這個水準立定之後，固然會使目前的許多生產發生過剩，可是他們同時可以決定，對於那些無用的生產品的生產者，予以相當的抵補，暗示那些生產者，改變他們的方針，去經營別的生產。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平常在利潤降落狀況下，所要發生的正常的現象，現在算是被他們取消了。同樣的，在某種企業的價格，與利潤有上漲的趨勢，某種企業有發展可能的時候，也要受同樣的限制。因為在被干涉狀況之下，企業中人無論是工人或是僱主，隨時都要取得註冊權的條件的限制，或是受僱用工匠的數目的限制，無法發展其企業。其結果在我們這種經濟制度之下，本來有一種唯一的力量，可以扶植經濟制度繼續不斷的生長，現在算是受了限制了！

凡此所述，皆為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予人種種的束縛（Restriction）。現在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很多，這種束縛，從巴力門的法案，到私人的紳士協定，都可以造成之。或者這種束縛，只不過是這個時代的輿論的反映，也未可知。許多人認為生於今世，其不幸無有過此時者。不過這些束縛，相當的表示在我們這種比較舊式的經濟制度之下，我

們的動作，比較的遲鈍，適應新環境的力量，比較薄弱。（自然我們同時也不要忘記，這些束縛之所以發現，乃是因為我們時常覺得我們過去在謀適應新環境上所費的人力，太大了）這些束縛的影響所及，並不只限於干涉私人的契約而已。因為我們要知道，近代社會立法所費的錢，是非常的多，為需要這筆錢，而實行課稅，其結果時常會使人們不敢向比較危險的企業去投資，或是不敢投資在須經過長時期始可得利的企業上了。比方說，許多人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進行一個全國的電力計劃，是等於我們祖宗的時代，建築一條鐵路的計劃。但是從前建築鐵路，是可以有把握，請私人投資者出錢建築，現在則不然，在資本家的利潤中，已經被政府征收了每鎊五個便士的所得稅，所以除非政府對於資本家的投資，附有保息的辦法，而後纔有希望他們出錢，去經營全國電力計劃。

所以無怪乎近來有許多有力量的人，認為用一種公共立法的辦法，去限制價格的變動，尤其是工資，是有害的。即使他的目的，是為立法的對象謀利益，也是一樣的有害。因為他們認為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價格變動是從事新生產，或限制新生產的一種預告。比如最近希克斯（J. R. Hicks）就認為在工會要求增加工資的結果中，十次有九次，是反而使工人失業了。所以工會在這方面的努力，真正成功的範圍，是非常受限制。因為所謂真正成功，乃是工會能真正的替全體工人，增高他們的生活程度，可是工會對於這點，很少能辦到。近來一般人的論調，都覺得如此。

但是近來美國，因為經濟恐慌的嚴重，這種種束縛所發生的效力，比在英國德國差得多了。因為經驗不斷的告訴我們，工會的團結力，無論其為多麼鞏固，但是在這麼嚴重，與這麼長時期的困難情況之下，其團結力也就鬆

懈了！近來失業保險金的數量，較前減低，所以其吸引力亦為之減少。並且能得保險金的工人，非常受限制，其數目甚為有限。此外所謂紳士協定，並還不不斷的發生失效的事，因為簽訂協定者，往往僅是僅有紳士之名而已。根據以上這些情形看來，我們可以不必把束縛的力量，看得太大了。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自謀適應的力量，還是相當存在着。價格變動的趨勢，無論如何，還可以相當從旁指示我們，應當去從事那種生產。

但是很明顯的，到了某個頂點，我們一定要發現，假使我們要把一個以個人企業，與謀個人報酬為目的的經濟制度，與以國家的力量，或是國作的力量來控制收入的辦法，相合併，是辦不到的。所以自從所得稅每鎊收五先令，六先令以來，凡是對於經濟前途抱悲觀的人，莫不將這種所得稅的壞處，大為宣傳。但是平心而論，假使國家一旦要征收到二十先令的所得稅，工商業之必歸於停頓，實可斷言。再有，假使國家的法律，或是我的同行，或是社會輿論，仍舊認為我的工資，每星期不可比二鎊低，我想其唯一的結果，就是我的僱主，將要迫而放棄他們所不應得的錢財了！但是假使這個數目再增加到二十鎊或者五十鎊，我想不但我，恐怕連我的同行，都不會有工作可作了！在這個極端例子，與個人主義經濟的毫無限制的自由之間，有一個地方，是價格經濟的缺點，最容易讓人發覺的地方。

七 生產過剩為矛盾情形之一因

以上所提到的各點，綜括起來，是三種比較重要的原因，每種原因，對於目前價格經濟制度效率之衰微，與造

成今日世界經濟之恐慌，都負有相當責任。第一、經濟上成千成萬的決定，完全受未來不可知的力量的左右，所以這些決定的預測，是免不了錯誤的。縱使這些錯誤，在所有預測的總數目中，所占的成分甚小，而這些錯誤，綜合起來，仍是不免是一筆大損失，大浪費。第二、我們缺少一個可靠的貨幣制度。第三、在以自行料理為主要原則的經濟制度上，我們加以許多的限制。

此外在非計劃個人主義經濟組織之中，尚存有一個要素，亦為致價格經濟效率於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在本章的前面，曾經證明過。每件貨物，或每件勞役的生產，都有他的適當的限制。現在我又把這點重提，所謂適當的限制，乃是說，貨物或勞役的生產，要是超過這個限度，是不值得去費力，費錢，去生產他。假使在一個經濟制度之下，其所有的生產，都能適達到那個適當的限制，而不超過那個限制，那麼其效率一定可以達到百分之百。現在我們在個人主義經濟社會裏，所有的生產，是受成千成萬的個人，對於價格變動，分別作不相關聯的反應的支配，同時這些價格變動的本身，也就是另一般人分頭各作不相關聯的反應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之下，其所以求得我們那個適當的限制，乃是根據下列這個原則造成的。貨物的價格，須足以償報參與生產這個貨品各方面的人的成本，至少須不至於使他們虧本，或者使他們改行去做別的生產品，而後這個貨品，纔可以繼續生產。但是我們在這一章的頭裏，已經提到，我們不相信，可有法子，能夠很準確的，求得這個成本與生產的平衡。現在我們姑且撇開這一點不談，但是我們仍然相信，在非計劃與自由競爭的生產制度下，無論任何企業，都有超過那個適當限制的趨勢。根據經濟原則，假使某種生產，超過那個限制，其生產就必須停止。這個趨勢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甲

生產者，在籌劃他們生產計劃時候，他並不知道他的同行，是在計劃什麼；他僅知道爲他自己的利益起見，第一、他自己所要生產的貨品的總產量，不可超過可以獲到盈利的限制。第二、在某個貨品的總產量中，他自己的產量，所占的成分，越多越好，而後他自己可以盈利最多，不至於落於別人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很明顯的，所有的商人，都要致力於獲得第二點的利益，結果大家全忘記了，他們的行動，都會影響到第一點，而足以引起不良的結果。

現在請舉例說明，假使在某一個時期內，有許多消費者，願意以每鎊二便士的價格，購買二百萬鎊白薯，假使每鎊二便士價格，乃是所以使栽種白薯的人，栽種二百萬鎊白薯的最低價格，那麼根據價格機構的原理，白薯的產量，絕不能超過二百萬鎊的數目，可是假使我對於每鎊白薯，可以賣二便士的價格，覺得十分滿意，我想再加種一萬鎊，那時候，我一定忘記了，除非我的同行者，在他們白薯的產量中，減少一萬鎊的白薯，我是不會得到每鎊二便士的原價的。可是在非計劃與無組織的企業制度中，我的同行，絕不會去減少他們的產量，因爲他們對於盈利的熱望，正同我一樣，他們之要想法子，去拉我的顧客，亦如我之要想法子，去拉他們的顧客一樣。其結果，在我與他們之間，白薯的產量，一定超過二百萬鎊的數量。在這種情形之下，願意出每鎊二便士價格的消費者，一定就要日益減少了！於是我們希望中，所要得達的價格，也就無從實現了！結果營業大受虧折，精神大受打擊，但是不旋踵之間，市場上白薯供過於求的現象，過去了，那時候，我們又忘記了過去的過失，不免又要重犯過去的毛病。因爲根本我們就忘記，我們每個人的生產量，無論其爲多麼小，乃是總產量的一部分，在總產量的大小，與消費者的需要發生了關係之後，就決定了我們大家所可得價格。每個人都應當以這個價格爲依據。不過假使每個人僅圖眼前

的利益，假使認為每鎊二便士，是一個好價，每鎊二便士，是我們所可得價格，那麼二萬個二便士，不是比一萬個二便士好麼，在那個時候，每個人就都忘記，每鎊二便士，是我們大家所可得價格了。

企業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者的產量，超過可以盈利的限制，這種趨勢，是不大要緊的，假使生產過剩的代價，是能限於由過剩生產本身去擔負。可惜事實上，不能這樣。假使企業的產量，超過可以盈利的限制的數量百分之十，在這種情形之下，受價格跌落影響的，不是限於這百分之十，在市場上的貨品而已，而是這個貨品的百分之百，全部都受影響。比方說，在某一時期內，世界小麥的出產量，正好與消費者的需要，相適合。於是有些農夫，從前不願意產麥，現在鑒於別人產麥獲利之大，及保護關稅，或者補助金的可靠，於是他們自己就去從事產麥。假使新產麥量之增加，減低了麥的價格，當然受價格低落的影響，其影響不只限於新增的產麥者而已，乃是及於全體的產麥者。從前本來可以安然盈利的產麥農夫，現在受產量的增加，價格機構的影響，而歸於虧折，其所受影響，正與那些負直接產麥量過剩的責任的幾個人一樣。並且我們要注意，經過這樣一次打擊，凡是本來可以生活的人，現在都不能生活了！這種影響人們生活的大力量，漸次蔓延於全社會，欲求其恢復，非經長時間不可。破產的農夫，不得不中途打斷送女兒入學校的念頭，不得限制佈置房屋的用費，不得不停止購置新無線電機的開支。因此開學校的，做漆匠的，製造無線電的人，的生活，也不得不連帶受影響了！同時這些破產的農夫，並且把他的僱工辭了，結果僱工的辭退，又直接影響到鄉村的商店的營業，同時因為這個僱工的消費停止了，鄉村商店的店主，起生恐慌，而供給這些商店的小公司，也就受影響了，這個悲慘的圈子，就日益擴大了。

非計劃經濟之感覺不安，應歸咎於這種自由過剩生產的現象，並不是一種新的發現。許多年之前，俾威利 (Beveridge) (現在的威廉 Sir Wm) 在他失業那本書初版的時候，就已提到了這種說法，雖然因為現在在目前經濟恐慌中，又發現了許多精細的理由，而使他不得不為人注意，但是我覺得這種說法，對於自由競爭的非計劃經濟，所下的批評，仍沒有人可以給他一個答覆。自由競爭的非計劃經濟制度，是天生要有一種越出範圍的趨勢，這個越出範圍的結果，就是使投資者無利可圖，而歸於停頓；同時使本因投資的活動，可以有工可做的人，歸於失業。這樣子下去，終於引起今日資本主義之大矛盾的現象。

但是要就這個非計劃的經濟社會，謀補救的方法，不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假使以上所提到的這些事態，屢次發現，那麼受其禍者，一定要羣起研究這個事態，到底怎樣發生，並想法子去避免其重新發現。他們一定可以發覺，其中最重要的錯誤之點，就是在你與他之間，你想犧牲他的利潤，而增加你的產量，他也想犧牲你的利潤，而增加他的產量，殊不知結果是兩敗俱傷。因為你與他，都忽略了你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關係之要點在。所以唯一要謀補救的辦法，就是把你與他的相互利益，宣佈出來，而後你與他就共同的顧到你們的共同利益。在這個辦法之下，應當想法子將自由競爭的所有企業，歸併為一，將所有從事某種貨品生產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個協定，規定某種貨品總產量的水準。這種歸併的方式衆多，不一而足。但是無論其方式如何，或是將所有的小商店，合併為一個大組合，或是設一個總推銷機關，由這個總機關，規定每個生產者的產量，而由這個總機關，負擔推銷之責。或是只不過集所有生產者，把產量與價格，加以規定，除此之外，個人還可以保持他的自由。這些種種方式，在方式上，雖

有不同，但是其所發生的效力，從我們目前的眼光看來，是一樣的，產量是減少了。減少產量的目的，便要使產量歸到某種適當的限制，使無利潤的現象，恢復到有利潤的路上去。

假使這種企業的合併，能夠普遍的實行，假使凡參加這個合併的份子，都是忠實的，假使他們對於消費者將來需要的變動，能夠預測得相當準確，但是我想假使他們要想，消除目前經濟衰落表現的這種特殊矛盾的病象，在一個自由競爭的企業中，還有兩件事，是賣者所要顧慮到的，可是這兩件事，都不能由他控制的。一個就是消費者的心理，一個就是自由競爭對手方的心理。所以就第一個而言，生產者的合併，是不足為力的。他是沒法子避免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浪費。這個浪費，是由於生產者對於需要預測的錯誤。比方說，像以下這類的問題，生產者的合併，就沒法子解決。比方說，我們問：假使電汽每度的價格，降跌二分，那時候，可以新添多少用電汽來煮飯的用戶，生產者的合併，就沒法子答覆這個問題。只好由專利的公司，或是市政府的電汽部，用正誤嘗試方法及大概的估計，去答覆他。但是關於第二點，自由競爭的對手方的心理，企業者的合併，可以完全答覆，因為企業者結合之後，每個人就不允許有他自己的心理了！所以企業者結合，要能百分之百的團結，一定可以維持每個企業的產量，在某個限制上。但是我不敢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失業的問題，也可以附帶的解決，可以使凡有兩隻手的人，都可以尋到工作。因為任何種工人的供給量，都不會與他的需要量，正好相適合，每個企業家與資本家的生產方案，並不是為全人口的工作而設想。所以在生產者合併的制度下，會不會發生如今日之失業狀態，實在要看在那種制度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所訂的協定，是怎樣的。假使工人願意時常變換他的工作，工作時間短，工資少，那麼失業，就不會發

生。假使工人要堅持高的工資，那麼一定有些人找不到工作。但是在企業者合併制度下，我想一定不會發生了歇工、貨品堆集、與工人失業，同時並存的現象。資本家一定可以避免自行損毀他自己所生產的貨品的悲劇。

所以這種補救生產過剩臨時的辦法，是否不會使目前的病症加重，我們似乎不敢斷言。因為假使每個企業的生產者，合併了之後，果然能夠限制生產，使其價格適可抵償其生產之成本，而能獲得最低限度的利潤，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憂愁的了！不過我們所憂愁的，這種機會的實現，是微乎其微。因為一旦某一集團的生產者，對於某種生產的總產量，可有總支配的權柄，他們認為這種辦法，既可以使他們由虧本而復歸於獲利，那麼同樣的，也可以由小利潤，而獲得大利潤。在那時候，他們一定要把產量降低到適可獲利限度之下，去吸收可以出高價的錢，而使一般平民，無力購買。這樣子一來，他所獲的利，可以超過他理想中所謂最低限度的報酬，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發生的病象，是生產低於適可獲利的限度下，適與生產超過適可獲利的限度的現象，相反。在本章開頭時候，曾經把為利潤而生產的重要性，提到一下，現在可以在這裏，將上面所說，接連起來。我認為為利潤而生產，並不是僅對目前資本主義這種特殊矛盾的現象負責，為利潤而生產，實在是危害現經濟制度效率的一個更深刻更危險的原因。

八 局部與全體之利害衝突為矛盾情形之一因

為解釋明白起見，我們要知道目前這種種經濟困難的情況，僅僅為我們啓示了經濟制度中，各種錯誤的一

種錯誤而已。我在這一章裏所說明的，大部分是要證明這一種錯誤，並不是絕對無補救的可能。目前經濟上各種困難情形，所以引人極端重視，乃是因為經濟上種種的悲劇，和種種滑稽現象，在這時候，正好都湊合在一起，表現出來了！（這一點，在上面已提過。）假使其表現的，僅僅是個悲劇，或者其困難的程度，並不至如此之甚。那麼我們生在這宇宙裏，這個宇宙，有他的固定的安排，我們總不免要受一些痛苦。我們之所以能夠忍受這些痛苦，多半受了那些格言的影響，就是所謂在悲劇中有他的尊嚴在，可以得到代價；還有所謂克己的美德，並不是罪惡。但是假使在悲劇中，會製造出來許多笑柄，那就無尊嚴之可言了！克己只不過是愚蠢的表現了！那就無美德之可言了！失業的礦工，眼巴巴的望着礦洞的沉寂，沒吃飯的工人，搗毀了很好的食料，無論人們怎樣魯鈍，目觀此種悲慘而滑稽的現狀，無不為之慘然。

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這種種矛盾的現象，沒有發覺之先，非計劃經濟真正崩裂的力量，已經在那裏醞釀了！這種矛盾的現象的發現，恐怕還只不過是那種崩裂力量，在崩裂中的暫時失敗的表現而已，而不是他的潰敗力量本身的表現。資本家毀滅了製成的貨品，不肯按照消費者可以出得起的價格，把他的貨品出賣，這種現象，只不過是資本家對付目前狀況的臨時辦法（這種狀況他們沒想到會發生的。）假使他能夠永遠不讓這些貨品問世，恐怕他的受益更大。但是禁止貨品問世，與毀壞已有貨品，在原則上，雖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實際上，可就大不相同。禁止貨品問世，可以說是人們已經充分的利用了他們的資源，不希望再需他了！至於毀壞已有貨品，那就絕對不能這樣說了。但是這兩種行為，同樣的表示非計劃經濟制度效率低微之根源之所在。假使貨品的產量，

應當限制到某種限度，超過那個限度，在購置那件貨品的人看來，是不值得花那些成本去製造。所以這種產量的限制，乃是與社會全體大家有關的。至於說貨品的產量，應當要稀少，其售價應當要貴，這個就是企業家與商人所最注意的。他們認為貨品愈稀少，則售價愈貴，愈與他們不利。經營企業的人，他們並不注意到成本與欲望滿足，是否可以平衡。這種平衡，在我們看來，假使能夠衡量準確，生產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但是他們所唯一注意的，並不是成本與價格的平衡，乃是價格愈能超過成本愈好。

這種個人與大家局部與全體利害的衝突，乃是經濟效率的最大阻力。運用計劃經濟的機構，或者可以有法子把這個阻力，完全掃除。但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裏，這個力量，是普遍的存在着。一切資本家，工人，地主，都同樣的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種離心力的表現，不但在工作受人支配的工人們身上表現出來，並且在主持工作，籌劃工作的人的身上表現得更厲害。一個小孩，聽見他父親是一個教經濟史的教授，他很可能的問他父親道，你是不是以教授最少的歷史，而得到最多的錢呢？這句話，很扼要的，很準確的，代表了整個個人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

這種利害的衝突，也就是所以引起我在這一章的開頭，提起每個人愈工作，每個別人愈窮困的矛盾現象的原因。現在似乎益證我的話之足信。這種矛盾現象的含義中，其正確的成分，與錯誤的成分，是兼而有之。因為這是講邏輯的人，所謂綜合的錯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問題。假使我們不承認，每個人愈工作，則每個別人愈窮困，那麼我們就應當承認，假使別人與我從事同樣的工作，那麼這些別人的工作，可以使我變窮，假使我承認這個推理，對於我是對的，那麼凡是以工作，或賣東西求生的人，其情形一定與我一樣的。由此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應當盡我們力量去勸人不要去工作。因為假使他們工作，他將要害及別人。由此推理，我們不得不將錯就錯，承認所有政治家，經濟家，都盡其力之所及，去阻止財產之增加，以免我們蒙受其害，而趨於飢餓。

這樣子看來，我們也不必時常自己慰藉自己，認為假使我們對於社會的貢獻，若只求愈少愈好，則人類將歸於滅亡。因為我們假使承認以下這一個經濟信條——你應當做大家所公認為應當做的事，那麼我們仍然應當承認我們值得去做別人所沒做的事。在大戰的戰後，增加生產的呼聲極高，有一個替人受過的人，他是一個製磚的人，他把他每天所出的磚，立一個每天最高限度的限額，以期盡量能夠延長他的工作時間。要按平常的邏輯去解釋，經濟學家，一定以為假使每個人都同這個製磚的一樣，則所有貨物的產量，都要整個停頓起來，全世界都要變窮了。但是這種推理，恐怕要碰釘子。因為經濟學家不能擔保，假使這個製磚者，把他限制取消了，別人是否，也同他一樣的取消。經濟學家絕沒有法子脫逃以下這個事實——生產者與企業家心目中最理想的世界，就是別人的工作，要盡量求其多，別人的所得，要盡量求其少；自己的工作，要盡量求其少，而所得要盡量求其多。這就是表明假使製磚者聽從經濟學者的話，他也許是社會中的一個良善份子，但是也要變成一個壞的丈夫，或是一個壞的父親了。

並且這種個人與大家，局部與全體利害的衝突，絕對會引起某私人，或某團體，犧牲社會的大利益，而圖謀自己小利益的壞現象。所以同行的商人，很願意結合起來，去限制自由競爭，苟為事實之所許，他們更要相約，以最低價值，去換取最多的金錢。但是這種約定，一經簽定之後，除非每個分子，對於這個約字，真正表示忠實，在不久之

間，大家就要毀約。所以我們時常發現，在市面不好的時候，這種限制的競爭的約定，可以隨時被人破壞。假使其中有一個商人，他肯以較多的價值，去換取現金，那麼許多別人的顧客，就要被他拉攏了。在那時候，每個商人都願意做那種人，結果競爭自然還是免不了的。其始是個人間的競爭，到後來，是進一步變為團體與團體的競爭，再到後來，就更進一步，變為團體之內，自己的互相競爭了。

事實上，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其關鍵乃是在乎人們往往以為，凡是一件事，與大家有利的，需要大家能有一致的行動。可是事實上誰也不能干涉誰，去履行一致行動。結果這件事情的本身，終歸於無成。這種現象，在別的面，也是一樣的。比方說，關於軍縮及減低關稅的事情，大家都認為假使大家都能減縮軍備，世界就要太平了。假使大家至少都肯不增加他的關稅（不必說減低）經濟的前途，就可以有希望了。但是誰也不肯開頭，去實行。因為誰要開頭，誰就要冒極大的危險，有時候，也許遭受大損失。於是除非能有一個外來的大力量，直接干涉，認為我們一定要去做大家所公認為應當做的事情，要不然，這個局面，是沒有法子打開的。非計劃經濟制度，是不允許這種力量來干涉的。就是關於極關重要的事情，直接干涉，也是辦不到的。因為直接干涉，果屬可能，則非計劃經濟即不為非計劃了。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各種經濟決定的籌劃與執行，何者生產數量，應為若干，都由各自為政的個人意志決定。這些各自為政的人們，其行為完全是受離心力力量的支配。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無經濟效率之可言。

九 結論

現在我們回頭看一看，資本主義過去的成功，其功績固屬斐然，但其進展，則參差不齊。關於斐然的成績，前此已經述及，茲不復贅。稍稍涉獵近二百年來的歷史，就知道以二十世紀工業之發達，其成績已顯然可以表現。至於其參差不齊的進展，則隨時隨地都在表現着。有些國家，其資本主義的進展，比別的國家快，但是在其進展之中，永遠不是全社會整個的發展，乃是少數人，片斷的發展。換而言之，多數人只是乞憐於那些少數人的富人階級的恩惠而已。此外資本主義的進展，也隨時有阻止其自身發展的趨勢，就是說，他自己時常踏自己的足，其腳步遂就發生不穩。所以有的時候，其發展非常順利，使人們覺得快慰，有時候，竟發現一種停頓的現象，使人們一致覺得要致富，則必須消費愈多愈好，生產愈少愈好。在這一章裏，我們特別注意並圖謀解釋，這種完全停頓的現象之道。因為資本主義之前途，完全恃此解釋之道為轉移，我們對之似乎應當加以一種判定，現在還沒有人對於目前經濟的危機，能給一個完滿的解釋。我已經證明了一般的解釋，有許多是錯誤的。我認為目前的危機，有幾個主要的原因：一、生產者預測的錯誤，二、貨幣制度之缺點，三、舊資本社會之束縛，但是比這些理由，更重要的，就是潛伏在這些理由的背後的一種力量。這個力量，雖然不是很顯著的，但其影響甚大，這就是個人與社會的利害衝突，這可以說，就是個人主義經濟制度的成功，所以只能這麼微小的一個根本原因。

第四章 計劃經濟之功績及其可能性

一 計劃經濟成績之略述

估值計劃經濟的功績與其可能性，同估值資本主義經濟過去的功績，與其可能性，完全不同。資本主義之能形成目下這種狀態，已經有他二百年的歷史，與發展，如併早年的非計劃經濟而計之，則其年代，更爲久遠。蘇俄制度形成現在這種局面，僅有十六年的歷史。在開頭的十二年中，他們只是實行以一年爲單位的零星經濟計劃，真正實行大規模有系統的計劃，僅有四年的歷史。（現在已不止了譯者）根據這麼短期的實驗，我們自然不能得着什麼確定的結論，僅能大概的把計劃經濟的性質，和他的前途，做一般的推測。研究這問題的人，假使要想得到實在的事實，作參考，不但要覺得在現在這世界中，這個大規模的計劃，是一個創舉，所有的材料，僅是零星的事實而已；並且還很難尋到人們對於目前蘇俄的現狀，像對於我們自己那種制度一樣，下一個公平的斷語，批評他到底是好是壞。假使我們知道一般人們對於蘇俄有許多誤解，（這些誤解是由於個人的偏見，）假始我們知道我們踏進一國境界之內時常因偶有所見，便以爲是一種最可靠之事實，確有驚人的發展。因而不能有認真批判事物的態度。那末我們很難斷定，到底蘇俄的計劃制度，已經成功的是什麼，未成功的是什麼。

假使我們要從蘇俄的經驗，去推測計劃經濟在別的國家裏，要得到什麼結果，其困難之程度，則更深而更多。我們要記得，蘇俄是在武裝抵抗情況之下，開始他的實驗，他和別的國家的經濟關係，是非常不穩定，所以他要不斷的修改他的實驗。並且我們還要記得，這個實驗，並不是在美國人，英國人，或是德國人，指導之下進行的，乃是由俄國人，喬治亞人，Tadzhiks, Uzbeka 人指導之下進行的。他們具有 Dostoevsky 及 Chekov 的性格。他們的計劃，和他們的統計，是由非用算盤不能計算的男女們，所弄出來的。他們對於時間價值的觀念，很薄弱，很少人覺得一小時和五分鐘，有什麼區別。執行計劃的工人，大多數都是沒有適當的專門智識，或經驗。其中很有一般人，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會識，不會寫的。我假使這部分工作，不是由蘇俄人民去幹，而是由有秩序，有條理的德國人去幹，其區別將為如何。

受了以上種種的限制，我們只能將所謂蘇俄計劃經濟實驗的成功，簡單的說一說。我們知道蘇俄的實驗，還不能使其人民的富力，可以像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那樣富。就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而論，要將英國普通的工人與蘇俄工人互易地而處，並不見得那個英國工人的狀況，會在蘇俄有什麼進步。去年春天和夏天，蘇俄實際饑荒的情形，到底如何，這個問題，正是許多人所關心討論的。但是我覺得蘇俄工人，如其他他們生活的必需品，是缺乏，而他們除必需品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假使他們的麵包，是充足的，那麼他們的牛油，一定是缺乏的。蘇俄工人心目中，對於所謂不必用品，奢侈品，簡直茫然無所知。我們知道，蘇俄的工人中，僅有少數人，所住的房子，其樣式與設備，是與英美的工人宿舍一樣。其餘大多數工人的住宅，都是擁擠不堪。一般的農人，仍然是住在茅舍裏。總而言之，

蘇俄人民是極端的貧困。

但是我們知道，蘇俄人民雖然如此貧困，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一大部分的工人，是享有集團生活的愉快。其享受的程度，絕非布爾喬亞國家工人階級所能及他們的。工會的開會地點，並不是像我們這樣，在啤酒酒店，或是在一個布爾喬亞階級出租不了的空房子裏，他們是在過去大豪商，大富戶，及王子們的皇宮裏。工人們在白天做完工之後，晚上可以到他們俱樂部裏，坐在一個很舒適的沙發椅上，看他們自己所演的戲，或是由他的工會，給他們一張免票，或是減價票，到莫斯科的國家戲院，與布拉，坐在當年皇家包廂的位子裏，享受着。假使他們運氣好，還可以有幾天的假期，他們還可以到當年貴族們的別墅中，去享受。同時我們知道，蘇俄的社會與經濟，固然並不是完全平等的，但是他們人民的貧困，並不是由於一部人的奢侈，或虛糜所造成的。工人中，據我所知道的，就一九三二年四月而言，薪水最高的，一個月有一千羅布。這些人，是富有經驗的工程師，在訓練所裏邊，負技術指導的責任。最低的，是八十羅布，這是一般工廠裏無技巧的工人。自然有的人薪金比較這個數目小，有的人比較這個大。同時薪金中所含現金的數目，有的比較多，有的比較少。因為有的工人，喜歡多要一些攤配的數量，有的工人，或可以有較多的機會，在工廠的飯店裏，買到較便宜的食物，這種情形，並不是大家所共有的。有時候，享有特別權利的，還可以有其他舒服的享受，如駕用汽車之類。至於那些窮困的工人，還是仍然要擁擠在電車裏，爭奪座位。但是假使我們明瞭這些特殊的情形，我們絕對承認，蘇俄在經濟上，無論如何，是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為平等的，是較為接近於平等的理想的。凡在莫斯科馬路上，散過步，或是進過莫斯科的公共娛樂所的人，沒有不發現，他們在街上，尋不到

有所謂東西街頭之分，(East End or West End) 戲院的座位，也絕對沒有票價高低之分，同時也看不見許多侍者，在那裏盡其諂媚之能事，侍候觀衆。上面這些情形，正是倫敦、巴黎、紐約、柏林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據我的經驗，到過蘇俄的人，無不覺得這種現象，是唯一令人覺得痛快的地方。

縱使撇開這些屬於社會的狀況不談，就他們人民的收入而言，那種沒有很厲害不平等的現象，實在是社會主義化經濟制度，像蘇俄之類的必然結果。在那種社會裏，大規模私有財產制度，是禁止的。因為在任何國家，人們要專靠個人的薪金，而能維持鉅量的收入，是非常難辦得到，也是非常難於維持的。僅是一些銀幕上，舞臺上的明星，在他們早年的工作中，可以有大量的收入，或者是大公司的領袖，在他們晚年，可以得到鉅大的薪金。但是要想永遠維持富有，還是要有一筆資金，這筆資金，或是承繼的遺產，或是節省儲蓄來的，而後纔有長期維持富有的可能。並且無疑問的，還要有富者立出新金的標準，而後使那些已經富有的人，可以在他們目前收入的水準下，保持他們舊有的富力。比方說，Lord Ashfield 充任倫敦旅行社總經理，假使不是因他從前在資本主義的管理之下，每年得過三〇，〇〇〇鎊的收入，他現在是否能有每年一二，五〇〇鎊的薪金，殊屬可疑。我們試想一想，假使在我們經濟社會中，經濟地位之不同，僅能限於人們個人服務之不同，而有差別，則情形將爲之如何的不同。在那種情形之下，某甲的收入，可以比別人多過十倍，十五倍，二十倍，但是我們並不覺得奇怪，至於相差一百倍的情形，恐怕就絕對沒有了。所以在蘇俄，人們除非自食其力，就不能有收入。

二 計劃經濟制度之效率問題

假使上面所述各點，足以表明蘇俄計劃經濟，在他短期歷史中，表面上簡略的成績，那麼我們要問，這個制度，所能完成的經濟效率，可有多麼大，或者還可以推測到別一種的計劃經濟，所能完成的效率，達到多麼大。在前面一章裏，我認爲一個有效的經濟制度，就是在滿足與勞力相較之下，能使滿足方面得到最高的剩餘。就是說，一個人所用的時間與精力，在某種用法之下，可以達到最滿足的結果。每種出品，都是正好達到某頂點，超過某頂點，則其供給量，是不值得費力去生產的。在那時候，人們工作的結果，正好與他勞力相稱，也不太多，也不太少。人們將來的需要量，也正好達到某頂點，足以使將來的過多與現在的缺乏，互相抵消。

在前一章裏，我們並且發現，一旦分工與分能的辦法，介紹到經濟制度裏去的時候，要求這種抵消十分準確，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簡直好像要將一個理想的幻想，安放在一件實際的事實上。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這裏邊包含有許多不可衡量的成分在內。假使我自己所要用的東西，是由我自己去製造，那麼我在製造的事前，或事後，都可以決定這件東西，是不是值得費功夫去製造。假使我是製造者，而他人是使用者，那麼這種計算，就費功夫了。一定要在費勞役與求滿足之間，作一個比較。關於這個問題，或者哲學家值得費腦子去考慮。但是無論其考慮結果如何，無論其爲哲學家，或者不是哲學家，都不能擔保其計算是準確的。

所以我們發現，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他們想法子在甲方的勞力，與乙方的滿足之間，預備一個衡量的工具，

(就是貨幣)似乎要想利用這個工具,把兩方的數量,用數字衡量出來,排成一個方式,由兩方自己去解決他們的問題。並且我們發現假使可以確定這種衡量的工具,對於這兩方面,是含有同種的意義,同時其中所含的各種項目,都能與這個問題所要求的項目,相稱,那麼這種衡量的方法,實在是解決求平衡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占之實際,以上這幾點之中,沒有一點,是能加以準確衡量的。所以其結果,在價格經濟制度之下,實在不能保證各種經濟上的決定,都是對的。我們不敢說,某種的決定,可以比較任何其他一種的決定,得到較多的滿足。並且實際上講起來,這種衡量價格與成本的方法,其本身是一個很危險的方法。因為這個衡量的準確性,只是虛有其表,實在不足用以做一種決定的根據。

但是關於這點,計劃經濟的辦法,是兩樣的。計劃經濟制度,所以以計算的工具,固然也是與用於價格經濟一樣,至少在目前,是這樣的,他們也是用盧布,計算衡量生產的成本,和出品的價格,使兩者求其均衡。但是在這個計算中,他們所要包括的項目,及其選擇的方法,是很武斷的。在蘇俄計劃經濟各種經濟決定之中,足以代表由於均衡下來所得的結果,非常的少。這就是說,他們並不用同一種機構,一方面去衡量消費者的所好,另一方面去衡量生產者的勞力,以求其均衡,而決定他們經濟上各種決定。他們乃是由第三者加以武斷決定。計劃當局,在某一時期內,決定煤應當出產這許多噸,牙籤應當出產這許多盒,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東西,出產到某種數量,是比出產得較多或較少的數量為適當。所以一星期中本來應當有六個工作日,與一個休息日,但是後來改為五天工作,一天休息,到最後又改為六日工作,一日休息。這都是由計劃當局決定的。他們所以如此決定,乃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

的規定，據他們猜想起來，是最適合的，隨時可以使大家工作的時間，與大家所需要的貨物吻合。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要問，在蘇俄計劃經濟這種辦法之下，其生產的數量，及工作的時間，都是由國家計劃當局去決定，那麼這種辦法，比起由私人之間，互相互立契約的辦法，是否比較經濟些，有效些。關於這問題，我們並不能有一個合理肯定的答覆。這完全要看這些決定，是在一種什麼環境中決定。一方面要顧到計劃機關的組織，與目標，另一方面還要顧到參加這種經濟決定各關係方面的力量，和他們相互的關係，是如何。蘇俄的計劃當局，從理論上直接講起來，是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國家計劃委員會，附屬於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含有政府各部部长，差不多與議會政府的內閣組織相像。不過與內閣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代表會議，是由全蘇俄的議會，即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出來的。這個執行委員會，在明文上，有兩點和我們的議會不同：第一，是由間接選舉出來的，各地地方蘇維埃，指派委員，賦以較大權柄，去參加區蘇維埃，再由區蘇維埃，派出幾個委員，去參加全蘇維埃大會。第二，各地方蘇維埃的選民，是蘇俄全蘇維埃基礎之所在，其選民分配的方法，不是根據地域來分配，乃是根據職業來分配，某選區選民所代表的單位，是各地當地的工廠，而不是他所居住的地方。關於蘇俄憲法的詳細規定，於此不贅。其實蘇俄的選舉，其高級部分，都是由共產黨領袖支配好了，所以憲法在紙上，無論如何規定，也是無用的。蘇俄經濟計劃，是完全由黨內一般特殊階級的代表們，接着他們黨內的政策，來計劃，來支配。

不過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照目下情形而論，共產黨的政策，總算解決了一些計劃當局所要感受的困難問題。

題，使他們可以在決定計劃時候，無須顧忌到各種消費者的好惡是如何。比方說，假使在英國這種國家裏，政府指派了一個負計劃全權責任的狄克推多，請他按着全國的需要，去安排全國的生產，與入口的項目，同時並沒有其他機關，負責指導他，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他凡作一種決定，都要碰着釘子。比如說，他現在要決定僱用工人，開設工廠，去製造燙髮器，以應需要，但是他就不知道，他這個決定，是否相宜，是否可以滿足燙髮者的需要。因為也許在那時候，有許多消費者，所需要的是雨天的套鞋，而不是燙髮器。像這種的狄克推多，實在不能做任何決定，除非他自己能夠決定，他是否應當時刻去注意各種階級人們，生活程度不同的狀況。假使應當注意應當注意到什麼程度。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以後可以多談。我們在這裏，可以注意的，就是在蘇俄計劃當局作這種決定的時候，他們是根據凡是屬於工人和農民階級的人，大家應當平等，這是他們理想的原則。各種不同的生活程度，總是以經濟上的需要為前提。所以需要品的供給，總要比奢侈品提前。自然這並不是一個定量的原則，但是為事實上方便起見，有這麼一個原則，總比沒有好。

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答覆以下這一個問題，就是說，由計劃機關所作的決定，其經濟效率，是否比私人在價格經濟下，所訂的契約為大。我們認為要答覆這個問題，至少要注意兩個要素：第一，計劃機關，真正要想達到的經濟效率的程度如何？第二，在價格經濟下，私人成立契約可及到的範圍，可以有多廣。我想假使計劃當局，很忠實的為人民的利益打算，按着國家的資源，去從事生產與分配，使生產與消費者，都能達到他們最高的滿足。假使計劃當局，果真極力去達到這個目標，那麼平心講來，他們去理想的途徑，一定可以比在價格經濟制度下，大家自相

訂立契約，每人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頭裏，爲近些。換而言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假使一個窮人，願意聽從富人的命令，去做一件換取六個辨士的工作，我們雖然不能證明，假使他要知道，他下一頓飯，是有着落，他也許就不報酬這麼少的工作，但是占之人情，大半是這樣子的。所以假使遇到這樣例子的時候，有一個大公無私的第三者，具有權力，向富者說，你一定要付那個工人，半英鎊的報酬，要不然，就不必完成這件工作。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成本與滿衡足的水平，一定比由勞資兩方，自己去定契約，來得準確些。

同樣的，假使一個計劃機關，並不是大公無私的，他僅是爲社會上某一部分人打算，如同他的親戚，他的朋友，或是他自己的黨員，或者他的目的，專爲充實軍力，那麼按我們的推算，這個計劃機關，一定要產生一個效率非常低的經濟制度。因爲像這種的制度，一定要驅使人民，去做從一般生產者與消費者眼光看來，是不值得費力去做的事情，而不讓人民去做比較值得費力去做的事。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我們很容易過分的認爲，在一個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社會內，消費者的好惡，可以最後決定一切。在任何複雜的經濟制度裏，一切的動念，一定是由生產者與賣者來創始的，非計劃經濟，或是有計劃經濟，都是一樣。生產者一定要預料到消費者的好惡，但是並不是聽從消費者的命令。這就是說，生產者應當預先猜想到消費者的好惡，這個好惡，是很難預料的，有時候他們會猜錯了。在一個非計劃經濟社會之下，生產者在某種限度之外，絕不能把錯誤的預料，隱藏起來，認爲他是對的。假使有一件貨物，你已經想盡法子，用廣告招攬的方法，讓人們去買，但是人們仍是不買，那就沒有法子可想了。生產者只好自認失敗，因爲他們不能永遠倒貼出

賣。在一個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就沒有這種限制，假使在假定的預料上發生了錯誤，他們可以有法子彌補他，就是從甲貨品所得的利潤，去補助乙貨品的虧折，或者用操縱消費者購買力的法子，加以補救，或者用其他同樣的方法。可是這些法子，只能由能夠控制全社會經濟活動的人，使用他，而不能由只能控制幾個企業的人使用他。非計劃與有計劃經濟制度之不同，已如上述。但是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賣者之具有支配消費者行為的力量，可以說比經濟學書本上所論列的大些。假使把廣告的辦法完全廢止，誰敢說我們對於貨物的選擇，會同我們沒受廣告誘惑的時候一樣。大家都知道，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生產者總是想盡法子，去叫人們想信，他所猜想的是對的，他的貨物，是值得花那些價格去買的。所以所謂非計劃經濟，把我們所要的東西，預備好了，無異於說他讓我們去要他所給我們的東西。

事實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世界上是否有一個經濟制度，可以專門給我們預備我們所認為真正急需，與真正值得去費力去做的東西。關於這問題，永遠不能有一個確定的答覆。充其量，我們所能答覆得到的，就是說，我們把許多貨物，都陳列出來，毫不加限制的，讓消費者自己去決定，看他如何處置。但是事實上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答覆。因為第一，消費者永遠不能不受限制的，讓他自己決定一切。第二，消費者的選擇權，已經讓生產者預先的決定限制了。消費者只能（除極少數的例外）就已有的貨物中，加以選擇。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並沒有法子從消費者的行為中，看出消費者是否真願意去買他心理所要買的東西，或者他所願意買的東西，市場上還沒有替他預備。所以從這樣看來，整個消費的經過，與消費的性格，完全是由生產者決定，而不是由實際使用貨物的人

去決定。關於這一點，似乎不必在非計劃經濟與有計劃經濟制度之中，有何選擇。但是在他們兩個制度，相當的保留自由市場的情況下，最後消費者，可以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去花錢，這兩個制度最後都不免相當的受消費者反抗的力量限制。非計劃經濟，或者比有計劃經濟受的限制厲害些，因為計劃經濟是絕對的要使消費者望某種方向去走，無論是補助費要花多少，在所不惜。

三 失業問題在蘇俄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經濟是否能夠避免目前資本主義所發生的那種特殊崩潰的狀況，使資本家歸於束手無策。他是否可以避免工人失業，與用不了的資源，同時並存的矛盾現象。或者是否可以一直很順利的，望着提高生活程度的路向去走，而不至於碰到阻止資本主義前進的那種種挫折。

蘇俄共產黨人，絕對相信他們能有這種力量。計劃經濟制度之能避免生產過剩，與工人失業的病態，蘇俄是絕對的相信。蘇俄很驕傲的誇耀說，蘇俄是一個無失業者之地。他們認為蘇俄的計劃，並不是僅為人民尋找工作，乃是在訓練充分的工人，使他們去做他們所認為要做的工作。假使我們根據事實來觀察，我們認為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未進行以前，工人失業的狀況，在蘇俄是存在着的。這種狀況，至少在五年計劃的初期，和計劃未進行以前是這樣的。這種狀況的存在，他們認為是因為有許多從前在工業方面失業的工人，現在都望城市裏跑了。但是這種失業狀況的存在，不管其原因如何，乃是表明在五年計劃的初期，蘇俄計劃經濟，並不能適應所有工人的要求。

但是到了五年計劃的中期，我們確實承認蘇俄可以稱爲無失業之地了！在這個時期中，無論對蘇俄怎樣表示不好感的人，都不能說蘇俄失業的狀態，有像我們那樣的嚴重。Herr Baasches 對於蘇俄經濟所下的批評，大體說來，是不好的。他寫一本書，叫作工人之缺 (A Appalling Shortage of Labor) Dr. Roellinghoff 在同一本書中，正式的提到蘇俄並沒有失業的人。胡佛教授 Prof. Hoover 在一九三〇年，寫了一本報告書，他說蘇俄失業的人數，一直增加到一九二九年末爲止，但是到一九三〇年，失業者開始減退，這個減退，與一九三〇年夏天的大建設計劃，很有關係。(其實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蘇俄就開始發現從事這個大計劃的工人的缺乏了) 從數目字上看來，蘇俄工人的情形，實在比資本國家好過許多。不過他說這個情形，一半是受特殊情形的影響。所以從這樣看來，自從一九三〇年以來，蘇俄當局對於工人失業問題，並不甚感覺困難。據一九三〇年九月的法令，失業者在社會保險制度下所受的保險金，廢止了。因爲那時候不但失業的工人，完全沒有，並且還感覺得工人缺乏。我在前面曾經提到，當我一九三二年在蘇俄的時候，我曾看見國營托拉斯，實行在某個指定的區域，招募工人的辦法。這個辦法，至少一部分很顯明的表示，是要避免那個托拉斯，侵犯別人的工人供給量。這種辦法，絕不能發現於工人失業的國家裏。並且在那個時候，蘇俄當局，正愁着如何可以減少工人的移動問題，以期能如期完成他們計劃中所預期的產量，這個也是表示他們是感覺得工人的缺乏，而不是工人的過剩。

但是我不敢說，自從一九三三年夏天之後，蘇俄的情形，仍是這麼樂觀。蘇俄當局，固然沒有收回他們可以避免工人失業的口號。李維諾夫最近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世界經濟會議裏，誇口的報告，在他們國家裏，生產過剩，

貨品堆集，工人失業，工資減少，外債增加，銀行倒閉，種種病象，是完全看不見的。但是據一般人的傳聞，蘇俄的失業工人，似乎現在是在增加。據 *Editorial Petro Class* 報告，蘇俄失業狀態，開始發現於一九三二年的中季，當時因各機關裁員的結果，各大城市失業者，達一五三，〇〇〇人。現在蘇俄發現許多工人沒有護照，被拘留在某個地方，這也就是失業的明證。關於各機關裁退的工人，據聞被裁不久之後，其中有六〇，〇〇〇人，都應集體農場的需要，去做書記的工作了！據莫洛托夫 *Molotov* 在莫斯科新聞報告，蘇俄現有國家農場五，〇〇〇，這個數目頗可樂觀。

上面所提到各種事實，自然還不足以使我們得到什麼結論。但是我們很可以根據蘇俄的實驗，詳細研究看看，從一般情形看來，到底計劃經濟有沒有消除失業的希望。我們欲知資本主義之前途，要看我們對於下列這個問題，如何答覆，試問目前資本主義的恐慌，還是因為資本制度本身，有幾個小缺點，有待乎我們的改正，或者目前這個恐慌，就是根本無可救藥。同樣的，欲知計劃經濟之前途，也要答覆下列這個問題，試問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末期之所以能夠消除失業，還是由於幾個僥倖的機會造成之。（比如當時經濟狀況，與當時的經濟政策，）或者真正是計劃經濟本身的成功呢。

四 通貨膨脹政策與蘇俄

假使那幾年蘇俄失業之消除，乃是意外的原因造成的，那麼那個原因，最可以想像得到的，恐怕就是實行貨

幣膨脹政策。我們都知道，假使貨幣膨脹政策實行到相當限度，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也可以在某一時期內，消除了失業的狀況。我想沒有人否認，在大戰時候，各交戰國所以能夠充分把失業的工人，吸收了，貨幣膨脹，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一般人都認為，在戰爭時候，失業者所以消除，乃是因為工人市場上，億萬的工人，都到前線去當兵，同時政府方面，不斷的需要工人，去做軍火，這種情形，正與平時一般人們的消費，都是很有有限的情形相反。但是我們要知道，政府不斷的需要工人，其結果還是與平常一般人的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情形一樣，假使在政府背後，沒有預備一筆大款子，來付工資。至於當兵的工人，自從他們取消工人資格之後，其從前當工人靠薪水收入的消費力，也同時隨之取消，但是現在這批工人，讓政府大規模的收買了，同時政府對於那些靠工人為生活的人們，還給予一筆補取金，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就把這一批工人，圍到前線去當兵，所消失的購買力補充了。

所以在通貨膨脹時代，工人失業之所以能夠避免，其前因後果，是很簡單，而易明瞭的。但是我們還願意明瞭這種用通貨膨脹，減少工人失業的事實，還是一種舊有的現象，重見於今日之蘇俄，或是一種新的發現，所以我們不得不把在戰爭時候，通貨膨脹的真象，簡單摘要說一說，研究其個中情形是怎樣的。在戰爭時候，政府方面，願意將國內所有的資源，都吸收，歸他自己使用，以供製造軍火，及軍隊的用品。這些資源，在平常的時候，因為資本主義的種種錯誤，與浪費，（這一點已在上而提及）都沒有盡量的使用，其被使用者，多半都是用以製造某種需要非常殷切的商品。現在處戰爭狀況之下，政府為要盡量使用那些未使用的資源，並且要把從前製造犖頭等等需要的資源，移以製造刀劍等等起見，他自己就非準備一個很充分的購買力不可。他可以用征稅的辦法，達到他

的目的，或者用借款的辦法，提取已經在消費者錢袋中的錢，或者由政府自造新貨幣，以供使用。這個製造新貨幣的辦法，是政府最歡迎的，因為可以不必直接去搜括人民，已有的錢，自然這個辦法，到後來所要引起的困難，也並不減於實行以上其他各種辦法。

政府增加貨幣之後，他變成一個擁有極大新購買力的新消費者，同時別人的購買力，並不受他的影響。這種現象，是商人們所最喜歡的。這時候，市場上新增了許多貨幣，他們的貨物，可以暢銷，貨物的需要量，一時為之大增。他們可以擡高價格，以應需要，同時生產與僱傭的機會，也為之大增。失業的工人，有了不少工作的機會，一切的一切，都很樂觀了。但是其不可樂觀之點，就是假使政府，要永遠維持他的最大的購買力，以期他的需要，可以比人佔先滿足，那麼他就要繼續不斷的，發行新貨幣，結果到了全國資源，都被使用完盡的時候，無論購買力再行如何增加，也不能引起新商品產量的增加，於是繼續發行新貨幣的唯一結果，就是生產者把所有貨品的價格，都行擡高，以資對付每人手裏都擁有鉅量貨幣的消費者。因為假使生產者不擡高價格，他的貨品，都要一售而空，那些需要還沒有滿足的購買者，還要擁上他的門來。但是價格全部增高的結果，人民生活費因之增高，於是大家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還不如請政府直接收稅為愈。到了這時候，困難的時期，就要發生了。假使通貨膨脹，並不是很厲害，其困難程度，也許可以不至於過甚。那時候，政府鑒於人民生活費之提高，改變他的政策，商人於是也就轉向降低價格，停止購進貨品，生產者也就停止生產，裁減工人。但是假使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尚不改變政策，仍舊繼續發行貨幣，其最後結果，就是貨幣的購買力，日益降低，到物品價格的數目，不可以數目計的時候為止。在那時候，貨幣的

價值，直等於零，人們不得不同反到以貨易貨的路上，或是改行使用外國的貨幣，以資付價，有如德國在戰後馬克膨脹時代，以金元計價一樣。

我們試問這種情形，在蘇俄是否已經發現。關於蘇俄貨幣政策，實在很難窮其原委。因為他的貨幣政策，與他的別的政策一樣，時在改變試驗之中，同時也很難決定，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貨幣與信用制度之真相，究為如何。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僅有下列這麼幾個事實；我們知道，蘇俄銀行，乃按照他的計劃，以發行紙幣，以供生產事業之用。生產機關，握有這筆購買力量，以資給付工資，及購買原料之用。通常蘇俄消費者手中所有的貨幣，大別可以分為兩種。一、國家銀行的紙幣，這個紙幣，根據法律，須有一定數額的準備金，為其後盾。二、國庫紙券 (Treasurer's notes)，發行這個紙券，並不受任何章則的限制。在五年計劃中，蘇俄的紙幣，與現金的流通量，增加了不少。下列數字，可以昭示：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貨幣的總流通量，包括國庫紙券，銀行紙幣，和錢幣等，共有一，九七〇·八百萬金羅布，到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增加到五，七八六·五百萬金羅布。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紙幣的增加，竟成了一個顯著的現象，頗足為怪。我雖然不敢說蘇俄經濟計劃的經濟來源，是來自貨幣膨脹，有如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所採取的辦法一樣，同時我也不敢說蘇俄計劃之成功，是要靠他實行貨幣膨脹政策，但是根據最近蘇俄實驗的經過來看，似乎暗示了我們，計劃當局，是很願意實行貨幣膨脹的政策，也可以說貨幣膨脹的引誘力是很大的。蘇俄銀行，發給生產機關的紙幣，似乎頗為鬆懈。因為這是一個最容易的方法，使生產機關，得握有支配購買力的權柄。同時並可以避免生產機關發生缺乏資金的現象。所以在這種自由信用政策之下，國庫紙券之增加，是一個

不能避免的現象。因為生產機關與銀行的透支的關係，甚為密切，他們必須提取鉅量紙幣，以資付給工資。計劃當局既是願意生產機關不乏生產的資金，同時他又有權柄，可以使他達到這個目的，那麼最容易的法子，自然是發行新紙幣，以供生產機關的使用，或是在銀行帳簿上，增加一筆信用借款的數目，使生產機關，可以向銀行提取。

照這樣子看來，以發行紙幣，以供生產的引誘性，如此之大，同時其發生之方法，又如此之簡便，那麼發行紙幣的政策之足以引誘蘇俄，向這條路去走，也正如一個窮困的政府，要實行通貨膨脹的政策一樣。但是我不敢說，蘇俄計劃之成功，完全都是實行有效的通貨膨脹政策的結果。理由很簡單的，因為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後，所要附帶發生的結果，是絕對與蘇俄計劃的原則不相容的，也絕對不容其發生的。所以在蘇俄，通貨膨脹的趨勢，是可以有的，但是其所要發生附帶的結果，是不能有的。所以平常通貨膨脹的用處，也就大部分歸於無用了。事實上是這樣的，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通貨的膨脹，是要使市面上增添新的購買力，以供生產計劃的發展，在價格機能支配的經濟制度之下，貨幣的增加，乃是擴大消費者的需要，使生產者到處忙於擡高價格，增多利潤，擴充生產，吸收失業的工人，恢復停閉的工廠。到了企業者的生產力，達到頂點，或者超過頂點的時候，價格一定要加速的擡高，一直到貨幣當局，能夠繼續發行新幣，與之並駕齊驅為止。

所以每經一次通貨膨脹，欲求其通貨膨脹之生效，則需要擡高價格，擡高價格的目的，第一是要使政府得有充分的資金，第二是要恢復失業工人，與停閉的工廠。關於第一個目的，是價格擡高的主要目的，因為價格擡高之後，生活費用，纔可以提高；生活費用提高，纔可以限制人民對於生產的需要，而後政府纔可以將國內的資源，留

爲己有。如若不然，生活費不增加，這些資源，將要落到人民手裏；所以一定先要人民無力購買，而後政府纔能從而購之。關於第二個目的，恢復失業的工人，提高價格，也非常的有用，因爲唯其貨物價格提高之後，而後其售價纔能超過成本，而後利潤纔可以加增，在價格經濟之下，唯其利潤加增，企業家纔肯擴充生產，纔肯加增工人。

但是在蘇俄經濟制度之下，價格提高的現象，是無從發生的。因爲在社會主義的企業制度之下，規定貨品的價格，至少有一部分是屬於計劃範圍內之事，假使僅僅因爲一般消費者，擁有過多的貨幣，其數目超過他可以購買目前市場所有的貨品，而就違反計劃的規定，而就增高價格，那就是明明表示計劃的本身，是失效了，不能與人民需要，相適合了。並且按照蘇俄的分配辦法，是以按分攤配制度（Rationing System）來代替用價格的變動，來分配的。供給新購買力的紙幣之增加，並不表示貨物供給量有什麼變動，足使分配得以增加，或者減少。假使價格，及攤配量，及供給，均都維持不變，在這時候，新貨幣增加了，其最後結果，一定是這樣子的；就是這個貨幣的增加，對於取得這個新貨幣的人，並沒有什麼用處，因爲他們並不能用之以增購貨品，其可以購買的數量，是與沒有此新貨幣以前一樣的。就已受攤配的貨品而言，人民所得的攤配量是與前此一樣的；就價格受國家規定的商品，沒有受攤配的商品而言，新貨幣增加的唯一結果，就是使未來的購買者，擾亂分配制度，使新購買者，發生一種爭相購買混亂的狀況。

但是實際上貨幣膨脹所要附帶發生的結果，在蘇俄上不見得能像以上所說的，那樣完全避免。因爲新貨幣增加之後，無論如何，得着這個新貨幣的人，在消費上總要多少得着一些益處。這個因果關係，非常密切，不容易完

全避免。其理由亦非常簡單，我們絕對不能把他完全抹殺。所以其結果在蘇俄不得不發生一種折衷的現象，在別的國家，通貨一經膨脹，價格立即漲高；在蘇俄，價格可以一時不至立即加高。據說，在蘇俄五年計劃之頭二年，貨物零批的價格，確實沒有增加，但是久而久之，政府當局抵抗不住，終於稍微讓步，價格稍微提高，不過過去二年來，蘇俄沒有繼續正式發表零批價格漲落的數字，所以我們不能有確實證據，來證明出來，到底其物價漲高了多少。但是據報告，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所有被攤配的貨品的價格，在一天之內，都加以修改了，其增加的比率，自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二〇〇不等。

但是蘇俄社會主義化的計劃經濟制度，還沒有普及於全俄的經濟生活，所以在沒受社會主義化的經濟活動範圍之內，價格仍然可以膨脹起來。新增的購買力，就可以向這方面去發展。換句話說，新增的購買力，可以向那些私人營業的市場上發展，所以在蘇俄的私人營業市場上，價格的變動，也是非常厲害。同樣一件貨物，其售價之貴，可以超過國營商店或合作社所定的價格，不知有若干倍。由此看來，通貨膨脹所要發生的結果，雖然大部分受蘇俄計劃經濟制度的阻力，而不至於發現，但是在沒有這種阻力的地方，他還是要發生相當的力量。但是就蘇俄的計劃本身而論，通貨膨脹所要附帶發生的結果，大體可以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雖然並不是全部的。所以我們似乎可以說通貨膨脹的辦法，是可以相當避免其所要附帶產生的影響。但是一旦這個附帶所要產生的影響發現了，則其絕對與計劃經濟原則不相容，計劃當局，應當奮全力以抗拒之。

關於通貨膨脹所要發生的第二種影響，就是商人及生產者，因利潤的增加，而擴充其企業。關於這一點，與蘇

俄計劃經濟，絕沒有關係。在蘇俄計劃經濟之下，某種企業利潤的增加，並不見得就要擴充其生產計劃。並且按計劃經濟的會計方法，計算利潤的盈虧，差不多是一個假定的事情。所以在蘇俄經濟制度之下，假使某企業的利潤增加了，其所要發生的結果，絕不與在資本國家裏所要發生的一般的結果一樣。獲利大者，並不見得會比獲利小者，在企業上有何大的發展。新企業之發起，並不是以企業的股東及董事的意旨為轉移，乃是要按照計劃當局的決定。計劃當局對於新企業之發起，或別有其他用意。貨幣量的增加，與價格的提高，及其所發生加多利潤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化的企業制度之下，這種好現象，充其量，只不過解決了新生產事業的資本問題。就是說，他們可以有資本，提前開辦計劃中所要開辦的生產事業。假使他們一時找不到別的資本，他們並不以盈利為擴充新生產事業的原動力，像在非計劃經濟國家那樣。盈利，只不過是一種附屬產生的價值而已。並且這種利潤的增加，也只不過偶然發生之事，由於計劃當局偶然允許提高價格，這個提高，並沒有規定在計劃之內。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蘇俄的計劃，到現在為止，雖然力求避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是有些政策，仍有不能不受影響之趨勢。可以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政府所頒布，關於推銷農產品的命令，為證。按着這兩次的命令，私有農民，及集體農民的農產品，可以容出相當的數量，按着傳統交易的原則，由他們自己決定價格，出賣。他們可以自由的從消費者方面，得到最好的價格。其所得的利潤，歸由他們自己所有。這種規定，就是表示計劃當局，對於農民表示讓步。但是在這種讓步規定之下，假使一旦通貨膨脹發生了影響，則計劃當局，要想在價格與生產方面，禁止通貨膨脹所要附帶發生的現象，恐怕較從前將更為困難了！因為事實上自從上面那兩個命令頒布之後，蘇俄農

產品的價格，已非計劃當局所能控制的了！計劃當局雖然還是將價格加以規定，但是農民自己既有自由定價之權，則計劃當局絕難希望其所規定的價格，有完全實行之可能。所以就蘇俄農產品而言，現在可以說是完全受市場上情形的支配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新貨幣的流通量，增加了，無疑義的，這些新的購買力，一定要向價格不受政府控制的市場，去發展。結果通貨膨脹可以不受阻力，而能實現其附帶所要產生的現象的區域，也就隨之擴大，而不只限於沒有受社會主義化的企業的範圍了。其蔓延所及，實可達到全國食料生產，與食料分配的領域之內。同時這些私有農民，與集體農民，也就因價格的提高，可以將消費者手中之貨幣，變為他們自己之所有。以上所述，乃是表明在計劃經濟國家裏，通貨膨脹，也可以很容易的，很簡單的，引起農業生產暫時興旺的現象。這種情形，正與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通貨膨脹，可以同時引起工業農業興旺的情形一樣。通貨膨脹政策，在一個貧困的國家裏，其引誘力實在太大。

現在我們將計劃經濟國家，對於通貨膨脹所取的態度，綜說一下。計劃當局時常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如何可以使全國的生產資源，按着計劃的規定，從事生產。其所處的地位，與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的政府，或經營國營事業的政府，所不同的，就是計劃當局所需要的條件比較多，比較複雜，計劃當局，關於資源分配所需要的條件，可以有兩個方法完成。一、將工資的比率及零售的價格，及攤配量的數目，加以規定，使社會上的需要，保持在某種水準之下，不會把全國的資源，與勞工，都完全使用了。其所剩餘的勞工，與資本，就可以用以發展新計劃。這個辦法，就金

融政策的立場而言，就是把市場上的貨價，規定一個水準，這個水準，與工資比較為高些，其結果就可以將從高價中，所得來的利潤，備充新生產事業的資本之用。簡而言之，這種辦法，就是從價格裏邊，向消費者抽了一些稅，計劃當局，算是對全社會實行一種強制的儲蓄，和強制節省的辦法，以期利用這筆儲蓄，以謀新的發展，並以實現新的計劃。這種辦法，恐怕也只能在社會主義化的經濟制度之下，可以實行，因為唯有社會主義化的經濟制度，纔有控制價格，與工資的全權。

但是假使計劃當局，對於資本的分配，不願意採取上列這個辦法，認為這種強制儲蓄的辦法，好像資本主義國家，直接向人民徵稅，以充費用一樣。那麼其另外一個辦法，就是與資本國家一樣，發行新貨幣，不過這時候，假使計劃當局發行新貨幣，其所要發生附帶的結果，也是要與在資本國家裏所發生的一樣，就是提高價格。如若不然，他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人工，與工廠設備等等。這些人工與設備等等，是不好在原計劃中正式要求增加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計劃當局，失了他可以控制整個經濟制度的全權，一方面他盡管籌劃計劃，另一方面在事實上所表現的，只是另外一件事了！這些事實，都不是能在計劃內預先規定的。

計劃經濟，實行通貨膨脹的唯一大危險，恐怕就是在他事後，需要修改計劃的一點上。其實照理講起來，似乎是很沒有理由，計劃經濟，為什麼會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計劃經濟，應當可以有許許多多別的方法，可以採用，何必要用發行紙幣的方法，來欺騙社會，使大家失望。因為紙幣的購買力，終於是慢慢望下減低的。但是這個是不得已的辦法，計劃當局，或是因為計劃的錯誤，或是因為不願意直接向人民開口，怕勞民過甚，而同時他們自己，又

沒有充分的資源，以應他自己的需要，所以爲補救起見，他有不得不走向發行紙幣這條路上去的苦處。可是發行新紙幣的本身，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除非同時還要產生他所要發生的附帶結果，要想法子允許價格提高，限制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而後發行紙幣，纔會發生效力。這個提高，是不在計劃之內的。照這樣子看來，通貨膨脹與修改計劃的最後歸宿，是一樣的。但是通貨膨脹的辦法，要實行稍微圓滑一些是可以採用的。第一，因爲人們要被迫到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將要不顧結果如何，擇其最容易者，以謀出路。第二，因爲假使那個結果，無法避免，那麼價格的提高可以認爲是簿記上的問題，爲貨幣單位價值變更之所需要。這樣子，可以使價格的提高，不顯出完全是計劃的錯誤。不過要想避免這許多困難發生，唯一方法，就是在各方面沒有籌劃週到融合以前，最好不必先行從事擬具計劃。

五 生產過剩問題在蘇俄

假使蘇俄的計劃，並不見得完全是靠非計劃經濟制度下，所實行那一種的通貨膨脹政策，來維持，那麼我們可以不可以說，蘇俄之所以能夠避免生產過剩，是由於別的現象造成，而並不是計劃本身所固有的。關於這一點，我們要特別的顧慮到，目前蘇俄經濟發展，尙在創始之期。目前計劃經濟的任務，甚爲簡單，因爲過去所已經生產的東西無多，此後所要經營是什麼，極易決定。換而言之，物品的供給，還很有限，企業還可以有長時期的盡量發展生產，以供消費者之需要。

這種說法，含有一些真理，而又雜有不正確的觀念。這種不正確的觀念，不免會使人們對於計劃的真相，引起錯誤的看法。其具有真理之點，上面已經提過，就是說，生活程度與經濟發展的程度越低，則其因為計劃當局對於消費的需要，作錯誤的預測，而引起計劃失效的機會越少。在生活程度較高，人民消費種類較多的社會裏，這種因為工人與工廠設備的錯用，預測錯誤的結果，而引起失業的機會，比較在生活程度較低的社會，要多些，要比較難於避免些。所以我們可以說，蘇俄在這一點上，是比較資本主義國家，占了便宜。他可以不必憂慮錯誤的現象發生，而使其經濟制度發生動搖。以蘇俄鐵路及其他交通設備之稀少，鋼鐵廠等等之缺乏，肥皂鉛筆等等供給量之不足，他們正是極需製造這許多東西，以應需要。

但是我們要注意，關於這一點的好處，對於蘇俄，並沒有多大意義，除非我們認為，計劃經濟，在決定生產的時候，是同非計劃經濟國家一樣，還要十分遵守維持成本，與售價平衡的方法。目前非計劃經濟，所以陷於困難，其唯一理由，乃是因為他們所做出來的貨物，沒有人肯出企業者所認為有利的價格，去買他，結果企業者不得不停止生產，截止出貨。但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他們可以避免這種困難。因為他們可以用採用甲貨之利，以津貼乙貨的辦法，使乙貨不斷的折價出售，甲貨不斷的獲得高利。他們可以用武斷法子，去計算成本，即使計劃當局所患的錯誤，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也因為生產預測的錯誤，而不能找着市場，他們大可以不必關閉工廠，除非他自己願意。自然錯誤的本身，自然還不免為一個錯誤。其所不同者，他們不需要以工人失業，工廠歇閉的現象，把他的錯誤，揭露出來。他們可以把貨物的價格，減到成本以下，出售，而消費者還要覺得他的售價太高，這就是他們彌補錯誤

的辦法了！所以我們可以說計劃經濟引起工人失業的機會比較少。因為他的錯誤現象比較少。但是我們同時要存這樣一個觀念，就是說，我們要認定在預測錯誤與失業狀況之中，其因果關係，計劃經濟是與非計劃經濟一樣的。

假使我們超過以上這個限制，認為蘇俄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所以他就可以根本的，避免所有生產過剩的危險，那就不對了！我們時常聽見人們，作這種過分的論調，他們除承認經濟發展較優的國家，陷於生產錯誤的機會，可以比經濟極端發展的國家少之外，還認為在生產不發達，人民嗷嗷待哺的國家，簡直不會引起生產過剩的問題。這種說法，就不免陷於我上面所說的，觀念不正確的危險了！因為我們稍為思慮一下，就知道平常所謂生產過剩的現象，與生產的水準，並沒有多大關係。生產過剩的現象，可以發生於各種不同生活程度的國家裏，從勤儉日本人，到好享受的英國人，以及貴族的美國人，都可以有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是一個生產過多的簡單問題，乃是一個交易停頓的問題。所謂生產過剩，並不是說生產的總量，到了一個限度，消費者的慾望，都已經滿足了；並不需要再增加生產了，在生產過剩的時候，乃是表現平常本來有許多生產者，貿易者，為謀彼此的利益起見，互交換其生產，以通有無，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活動停止了，於是生產品無法推銷，生產計劃歸於停頓。

但是在貨物互交換，互通貿易的問題上，無論其貨物為富人的奢侈品，或是貧人的必需品，其交易的原則是一樣的。不過在奢侈品方面，問題比較複雜一些。但是這個奢侈品的交易，在一個經濟程序，已經超過原始時期的社會，（所謂原始時期，即指每人生產其自身所需要的必需品）總是要發現的。所謂奢侈品與必需品交易原

則是一樣的，可以下例爲證：我們知道，就一個奢侈品論，製造汽車，與賣汽車者，一定要找到那個需要汽車，與有財力購買汽車的人，而後他的汽車，纔有辦法出售。同樣的，一個製造麵包，與賣麵包的人，也是要受同樣原則的支配。在這兩種交易裏邊，其所要避免生產過剩的條件，是一樣的。就是說，一方面要有人需要這些貨品，另一方面還要有人願意出價去買這些貨品。第一個條件，是容易達到的，無論是麵包或是汽車，都是一樣。但是第二個條件，就成問題了，無論其爲麵包，或是汽車，最要緊的，要看消費者的收入的情況如何，無論在非計劃，或有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這第二個條件，都是要看消費者自身，在別種貨品的生產，或是別種勞役上，有沒有貢獻，或者他允許別人有所貢獻，而決定的。就是說，人們要想買汽車，買麵包，他自己必需能讓別人，對於他的工作，或者對於他允許別人有所作，給他一筆收入。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是國營托拉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是僱主，或購買者。在一個窮的社會裏，其出售麵包的困難，正如在一個富的社會裏，出售汽車之困難。在那種情形之下，麵包在窮社會裏之會有生產過剩的情形，亦正如汽車在富社會裏之會有生產過剩的情形。

換而言之，我們要記着一個簡單事實，就是說，無論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是單靠着互相洗濯而生活着，現在的蘇俄，這個洗濯物比喻所包含的，多半都是最簡單的必需品。在一個比較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這個洗濯物含有許多奢侈品。在這兩個社會裏邊，大家都有許多比較沒有滿足的慾望。假使蘇俄願意食料的種類豐富些，那麼資本主義國家那些成千成百比較舒服的人們，他們需要休假時間多些，衣服穿得好些，生活設備比較舒服些。由此看來，生產過剩，既不是因爲人們慾望過分滿足而發生的，所以這種過剩現象，在以下

這兩種社會裏，都可以有產生的可能。一、人們僅能滿足最低限度慾望的社會。二、必需品的種類，與範圍，需要加多的社會。蘇俄要想決定他們人民所需要的是什麼，比較資本社會國家容易些。但是在一個生產不大發達的社會，一旦人民不能買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引起事態的嚴重，那麼這種情形之足以造成生產過剩恐慌，正與在一個企業發達到極高的程度的國家一樣。

假使有人不相信我這種看法，一定認為生產過剩，乃是工業發達的懲罰。那麼就請他研究蘇俄在宣佈新經濟政策的初年，與沒有實行五年計劃以前的經濟歷史。有法布門 (Mejacl Farbman) 的『列寧之後』 (After Lenin) 一書，可以供給參考。在一九二三四年的冬天，蘇俄的貿易停頓了，失業及貨物堆積的現象，隨即發生。堆積的貨品，占全年產量百分之四十，所有資本主義的危機，竟都在一個人民奄奄待斃的國家呈現了。法布門對於當時蘇俄的情勢，作下列的解釋：他說，這種悲慘的現象，乃是表示市場的恐慌，同時市場的恐慌，乃是表示資本主義的危機，這種資本主義的危機，乃是起因於生產過剩，但是在蘇俄，其生產僅達戰前百分之三十，其人民已多年缺乏商品消費，我們不能說他是生產過剩。蘇俄的情勢，從價格降落的現象看來，完全表示是生產過少的現象，而不是生產過剩的現象。但是法布門這種分析，理由並不充分，因為法布門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蘇俄這種因生產過少而非生產過剩所發生的現象，也同樣的可以在一般資本主義危機中發現。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其人民雖然沒有多年缺乏商品消費，但是其需要更多的消費品，去消費，是一樣的。資本主義到最後，也是一樣的要降低價格，使堆積的貨品，可以售於需要尚未滿足的消費者。任何生產過剩的現象，都可以同樣的照法布門解釋方法，認為

生產過少。

六 計劃經濟制度對於矛盾情形之補救方法

上面這個討論，可以使我們進一步，討論以下這個中心問題：就是計劃經濟制度，是否有避免資本主義，那種悲慘而滑稽的矛盾現象，啼笑皆非的崩潰現象的可能。我們是否可以相信，蘇俄的成效，並不是由於一時的政策，與環境所造成的，而承認計劃經濟確是可以使經濟永遠向前發展，不至於像資本主義制度那樣，受浪費悲慘現象的阻撓。

我想計劃經濟，是可以辦得到的。因為計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乎避免這種浪費悲慘的現象發生。假使失業狀況，重現於蘇俄，乃是表示蘇俄並沒有按着這個理想目標，去執行他的計劃。即使失業狀況，果然重現於蘇俄，可是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我們對於貿易衰落的原因，與其補救之方法，到現在為止，還不能尋出相當的辦法，而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他們雖然在原因上，不能完全加以控制，他們至少在事後，有補救的方法。現在讓我們就事實上來研究計劃經濟，在失業人數日益增長，與貨品堆積數日益加多的情況下，要想出何種實際補救的辦法。我想計劃當局一定要一致的降低所有貨品的價格，使購買者能有力量去購買那些堆積貨品（這是蘇俄在計劃開始初期的辦法，如一九二三——四年所實現的情形）。假使有人反對，認為這種辦法，將要使國營企業，歸於破產，因為貨價雖然降落，假使同時工資並沒有變更，那麼他們的收入，一定要減

少了。(自然工人的消費，可以因貨價降低得到好處)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按着貨物堆積所以發生的原因，作下列兩種答覆：第一貨物堆積，或許是因為工人生產力的增長，這就是說，因為生產方法的發達，從前工人在六小時之間，可以做成的工作，現在在一小時就可以做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國營企業機關，自然很可以降低價格，而不至於使營業受損失。假使一百羅布的資本，本來只可以換取一百個單位的生產，現在可以得六百個單位，那麼售價當然可以較以前降低六分之一，而不受什麼影響。同時價格降低了之後，工人可以以原有的工資，多購一些東西，一般人的生活程度，遂為之增高。

第二，貨物堆積，不能出售，或者是因為人口中成人的成分加多，工人市場上，發現新工人，於是新貨品加增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情況適與前者相反，很明顯的，沒有法子，可以達到提高全體人民生活程度的可能。假使在這時候，計劃當局，下令降低價格，那麼同時也就必需減少工資，結果人們的現金收入減少，但是因為物價降低，他們也可以以減少的收入，去享受與從前一樣的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實際情形，並沒有什麼更動，企業家就可以將減少下來所剩的工資，供做增僱工人的工資。假使以上這些辦法，都不採取，那麼還可以用一個更簡單法子，以達到同種的目的，而並不必更動物價與工資，那就是發行新紙幣，付給新增工人的工資，其結果新增的工人，可以用新增的貨幣，去消費，同時這個新貨幣，也就是為這些新工人所增造的貨品，謀銷路。

假使有人以為這個例子，有點太理論，我們可以用實在例子來說明，比方說，蘇俄計劃當局，發現在國內各地，失業工人有趨增之現象，(尤其是莫斯科、列甯格勒、各地) 那麼最主要最急迫的補救方法，就是為這些失業

工人，找些他們所能做的工作。我們知道，在一個社會之內，總有許多工作，是必須要做的。計劃當局，可以擬具一個臨時辦法的計劃，選擇幾件與全社會有裨益適當的工作，讓他們這些工人，去做。他們可以弄一個砍伐西伯利亞森林的計劃，去供做建築農民住宅的木料。假使這些住宅造成之後，其價格是很低，或者可以免費居住，那麼總有人願意住居新房子的。假使他們發現那些失業工人，多半是紡織工人，那麼計劃當局，就可以弄一個增開紡織工廠計劃，增加紡織物的出品。再有，假使失業工人之中，有許多是橡皮業的工人，那麼計劃當局，可以趁機會製造些新橡皮胎子，以替代那些舊的橡皮胎子，或者多替人民預備一些橡皮雪靴子。計劃當局，要去找一些必需的工作，無論在蘇俄，或是在其他國家，都是極容易辦得到的。

假使這些計劃，決定了，第二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執行這些計劃，其所需要的材料，是要向各國營企業機關，或國外購買的；同時還要籌一筆資金，無論採取何種金融政策，去籌集的。其唯一籌款之道，是在要取自社會上那些沒有失業的人的手中。社會上凡有工作的人，或是從事某種企業有盈利的人，都要想法子去維持那些對於農業，尙未有貢獻的失業工人的生活。其方法或是納稅，或是征納保險金，或是從他們工資中，花費一些，去幫助失業工人的親戚，或朋友。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失業工人，當局並不給他們任何工作做，僅是使他們生活程度，降低到於極點；有職業的人，對於這些失業者的負擔，是很低的。但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臨時計劃，已經替這些工人，預備了工作，其所得工資，也可以同別人一樣，那麼有職業的人，對於這些失業工人的負擔，不得不暫時加重。同時計劃當局，更需要他們替這個臨時計劃，擔負購買材料等等的必需費用。所以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吸收失

業工人的結果，固然可以使全社會的人，都可以有工作做，但是全社會的人的生活程度，就爲之減低了。

生活程度減低之後，社會將要發生何種變化，那就要看失業工人，有了工作之後，社會環境，要發生何種變遷。假使國內原料，與食料，非常缺乏，國外貿易情形，並且不利，那麼生活程度的降低，就要永遠延長下去。比方說，爲執行臨時計劃起見，需要從國內距離很遠的地方，輸運煤，木材。或者要在一個很難繁殖棉花與橡皮的區域，去生產棉或橡皮。或者還要將本來供給國內的食料，運到國外，以期將在國外所得的貨幣，以付給自國外輸進的材料。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那些失業工人，現在得到了工作，但是他們仍是要靠社會上其餘那些有職業的人，來維持他們的。於是別人的收入，就不得不爲之減少，而將其餘剩，以供給這些本來失業的工人，並爲他們購買原料，與材料，以供他們生產之用。更明顯一點說，假使這些本來失業的人，可以不必靠着別人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使社會上少發現幾個分利多而生利少的人，那麼這個社會，纔有比從前轉好的希望。

但是這種不好的現象，僅會發現於人口過剩的國家裏，這種所謂人口過剩，是就資本不足維持其既有人民的生活的意思而說。假使科學家的技術，日益發達，可與人口的增加，同肩並進，那麼這種因失業工人恢復工作而引起生活程度降低的現象，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而已。因爲這些失業工人（執行臨時計劃的工人）有了工作之後，他們就可以與社會上其他份子一樣，自己能夠養活自己。爲求解釋明白起見，我們姑且作一個假定，假定這些得了工作的失業工人，另成一個社會，與其他社會上人無關，他們有了工作之後，他們是很可以互相交換，他們自己的生產，不必與其他社會上的人，有何經濟的接觸。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有些人，是做建築房屋的工作，有些

人是做生產食料的工作，有些人是做紡織的工作，那麼他們各各份子，大家會合起來，豈不是可以整個的，自己互相維持；在那時候，社會上其餘有職業的份子，不是可以減輕他們的擔負，不必再供給這些本來失業的工人了嗎！

上面這個假定，並不是完全假想的。我們知道，一個非計劃經濟國家，有時候，在一個小規模範圍之內，就用這個同樣的法子，去應付這個失業問題。比方說；在我們國家（英國）我們就劃出一個區域，為失業工人自己互相從事小規模生產的地方，如同補鞋製造傢具等等小規模生產。但是這些本來失業工人，所製造的貨品，不能在外而市場上出售。因為怕引起工會的注意，認為有礙本來沒有失業人的飯碗。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他們承認失業工人的生產是好，是有用的，但是其消費者，也應當限於這失業者的本身。假使他們將其生產，出售於外面的市場上，那就為社會大家所反對了！但是這種說法，並不是一種合邏輯的推理，因為假使這是合邏輯的推理，那麼我們可以同樣的證明，我們要到失業工人區域裏，去請他們替我們補鞋，這個行為，也是錯的。因為這樣子一來，本來從事補鞋業的利益，不是也因是受了影響嗎？同時假使我們要請一位失業工人，到補鞋鋪子裏，充正式工人，也是不對的，因為這不免增加了補鞋業工人的供給量，與本來從事補鞋業工人的利益，也有妨礙。這種不邏輯的推理，可以下列這一段事實，來證明；我會聽見某君告訴我，失業區域裏的工人，曾經發誓，不將他們製造的東西，向外面出賣，他們所修製的東西，僅為他們家庭自己，及失業工人區中之用。

這種不邏輯的現象，可以上章末後，我們所談到，非計劃經濟存有一種離心力的力量，來解釋他。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遇到失業問題發生時候，他們絕不敢讓政府機關，來干涉，請政府來替他們籌謀計劃，安置失業工人，使

失業工人，從事於生產事業，並將其生產，出售於市場。其原因很簡單的；因為就上面所舉鞋業的例子而言，失業工人所增加的出產量，將要使一般鞋的價格降低，利潤減少，也許還要引起無利可盈虧折的現象。價格的降低，固然可與購鞋的消費者有利，他們就不多買一雙鞋，也可以將其所省的錢，花在別的東西上。但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鞋的價格的降低，對於造鞋者是絲毫沒有利益的。他們的眼光，就是顧到他們自己的營業。在鞋價格降低的時候，某購買者本來要花十先令十一辨士，去買一雙鞋，現在只花七先令十一辨士就可以了！也許他可以將所餘剩的錢，去買襪子。這種以餘剩的錢，去買襪子的事實，對於賣鞋者，絲毫無利，除非他也有資本，投資在製襪子的生意上。

但是在計劃經濟之下，情形就大為兩樣。所有的企業，都是社會化，或是國有。在這個社會化與國營制度之下，計劃當局，可以將甲業之所盈，以補乙業之所虧。計劃經濟社會的經濟活動，有如將上面所說的那個失業工人區的情形，加以放大。在失業工人區裏，問題很簡單的，就是說：某甲為某乙製造鞋子，某乙為某甲製造小孩搖車，他們兩個人，都得以都得到益處，他們做這工作，總比他們兩個人都站在街上，不做工作好。但是計劃經濟社會，與這個失業工人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失業工人區內，小規模的生產，可以直接用以貨易貨的方法，互相交換。在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社會裏，就目前他們所發展的情形而言，他們還是用現金，來做交換的媒介物，但是這一點，並不見得就把他們兩個相同之點，抹殺了。一個計劃當局，有支配控制價格工資的全權，可以增加甲貨的價格，抑低乙貨的價格，使計劃可以繼續進行。不過在這裏邊，有一個條件，要注意的，就是整個企業總產量的價格，絕不能規

定得，比購買那些產量購買者的總收入高，如若不然，就要發生問題。這是數目字上極明顯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所以陷於走不通的狀態，就是因為貨物的規定，與成本的所費，除去極小部分之外，並不是歸同一個機關控制；同時整個企業的整個價格，與總成本，更沒有任何機關，把他通盤核計。結果某企業機關之所以倒閉，不是因為價格定得太低，無法價補成本，就是因為價格定的太高，與消費者的收入，不相稱合，使消費者無力購買。

但是假使一個計劃經濟社會，也陷於同種的困難，那麼只好歸咎於計劃當局自己了！因為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各種貨品的價格，乃是由各個人，獨立作不同的規定。在計劃經濟社會裏，所有的貨價，乃是由計劃當局支配，以期能與他的計劃相稱。在非計劃經濟之下，價格的變動，及人們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這兩種力量，都可以左右全國企業的路向，更可以左右甲企業的倒閉，與乙企業的開辦。在計劃經濟之下，這兩種力量，不過是一種工具而已。計劃當局，可以用這個工具，使各種企業，都按着計劃上所規定的軌道去走。

七 計劃經濟具有避免失業蔓延之可能

上面所說的，並不是說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失業狀態之發生，是不可能的。上面所說的結論，是這樣子的：就是說，管理計劃經濟的當局，他們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要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工作，同時所有生產出來的貨品，都應當很快的售完。我們認為在他們具有這種決心之下，是很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消除失業狀態。我想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計劃經濟的本身，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可以消除某種特殊失業的狀態，像目前資

本主義所發生那樣。（這種特殊延長的失業狀態，雖然其嚴重性在某幾個企業中，特別厲害，但是他是可以使所有企業的失業工人，普遍的增加。這個失業的數目，是超過某種正常的數目字以上。在這種失業的狀況下，同時還發生工廠停閉，貨物堆積無法脫售的現象。）但是我們相信，假使計劃當局要想消除這種失業狀態，一定要在他發現現有的企業，已有容不下現有工人供給量的趨勢的時候，他就訂立補充的計劃，以謀補救。換而言之，假使他們發現某種企業，目下雖有盈利可獲，但是他已有不能再繼續維持他目前的產量的趨勢，那麼政府就要趕緊想法補助，予以津貼，或者趕緊將已有工人的工資減低，或者將某企業所需要的原料的價格減低，或者開辦別的新企業，以代替營業有不良趨勢的舊企業，以為後起的工人，謀新出路。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在人事變遷複雜的社會裏，計劃確定之後，不能一下子毫無困難的，永遠消除失業現象的發生。計劃當局，應當隨時不斷修改計劃，以糾正錯誤，應伸縮計劃範圍，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假使計劃當局靜止着，不動作，他所遇到困難，也要與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政府一樣，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政府，現在還沒法子替那些在私人企業找不到工作的工人，謀得相當位置。

非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兩種制度真正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政府，除籌劃幾件公共事業之外，（這種公共事業的生產，是不參加商業市場的）他們是迫於不得已不得不靜止着，毫無動作。因為假使他們有所動作，將已經停歇的企業，恢復起來，則其結果，就是使現有的企業，也歸於停閉。至於在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化的企業管理之下，新添的計劃，吸收了失業工人，只不過是就原有的企業，加以擴充，並不是新加一個企業，與舊有者，立於敵對的地位，互相競爭。

此外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除非工人有易於移動的可能，就是說，願意操守甲業的工人，可以很容易的把他移動到乙業上去，失業狀態，也是很難免的。換而言之，除非計劃當局，能夠按着計劃本身之需要，自由調動男女工人，去做計劃所要叫他們做的工作不可，要不然，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工人失業，工廠停歇，貨物堆積，種種情形，只不過是現有的計劃，不能適應環境，在外表上的表現。假使計劃當局，要想用修改後的補充計劃，來糾正這些不良現象，那麼計劃當局，對於失業者絕不能存着一片婆心的觀念。假使某甲工人按着原來計劃，他是充做一個礦工，現在計劃修改了，按着新的補充計劃，煤的出產量，要減少，造路與木材的出產量，要增加，那麼我們不能認為，現在去叫某甲工人，去改行去做砍木或修路的工作，是不合理的。總而言之，或者是用經濟的引誘，或者是藉重第二章裏所提到的各種力量，計劃當局，總應當對於工人的分配，握有很有效的控制方法。

不過關於這一點，自然計劃當局，也同別人一樣，要受一種很明顯的限制，他也不能叫人去，他在精神上，或是肉體上，根本不能做的事。一個理想的計劃經濟，所以會發生失業現象，也許多半受這個限制的影響。比方說，計劃當局，無論在原計劃上，或是在預備應付事變的修正計劃上，決定按全國經濟的需要，應將某甲企業的範圍縮減，而擴充某乙企業（比方說，縮減肥皂業，擴張棉紗業。）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許會有一大部分的肥皂工人，根本就不適合於從事棉紗業的工作；或者計劃當局，認為是值不得的，假使這些肥皂工人去從事別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人，都是具有專門技術，除製造肥皂外，他們對於國家的經濟，不能有別的貢獻；無奈在這時候，肥皂產量的

增加，已不值得去花那些必需的成本，去製造了。於是計劃當局，不得已只好禁止肥皂托拉斯，添招新工人，任從事肥皂業的工人失業；等到這些工人老死之後，也許可以使肥皂工人的數目，降低到必需的標準。

計劃當局，在這種處置方法之下，自然他心目中，已經把以下這一個觀念，完全打消了！就是說，計劃經濟，最主要的任務，是要使每個人都得着工作，尤其是處上面所說的那種情形之下，容易把這種觀念打銷。但是我們要知道，假使我們認為，負責計劃的人，除了使每個人都有工作外，還有比他更重要的任務，那麼我們自然不能說計劃經濟，可以自動的，消除失業的狀態了！我想最合理的結論，是這樣子的，計劃經濟，確是具有有一種抵抗失業狀態蔓延滋長的力量，假使負責計劃的機關，具有魄力，具有勇敢，具有決心，去使用這個力量。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說法，並不包含說，一個計劃經濟，假使充分的使用這個力量，就可以達到我們理想中經濟效率的百分之百。一個計劃當局，具有這個決心，固然很可以做到使每個人，都有工作可做。但是理想的經濟效率，乃是要每個人都能有他適當的工作，其工作的結果，是比較去叫他去做別種工作更有用處些。

但是所有以上這本書所說的，乃是表示實際上經濟效率的標準，是一件空中樓閣，不可捉摸的事。關於這一點，非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都是一樣的。比方說，人們都知道叫一些人去掘了坑，而後又把他填滿，這是一件無用而浪費的事。這種工作，並沒有什麼效用。可是假使掘了坑，而不把他填滿，假使一旦森林中發生火燒了，這個坑可以阻撓火燒的蔓延，那麼這件工作，似乎又不見得是十分浪費，而無用的。再有，假使我們在春天，叫一些人去鑿一道溝，使泥濘的河水，可以有出路，那麼這種工作，自然更有用處。可是，假使叫一些人，去為一個製造化妝品的工廠，

整地基，那麼這件工作，是不是有用處呢？關於這一點，就要看人們對於化妝品的看法如何，及化妝品已有的供給量是如何而定。事實上在任何複雜社會裏，我們都很難斷定，我們的工作，是不是屬於掘坑而又把他填上那一類的工作，都是靠別人來生活的，或者我們的工作，真是能夠使我們自食其力。非計劃經濟，有他一套衡量成本與效用的辦法，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用一個工具，去證明我們的工作，還是靠着別人生活，還是能夠自食其力。但是這種工具的用處，是有限制的。我們在第二章，已經預先提到了。所以假使我們對於非計劃經濟，使用這一套工具的價值，抱着堅決懷疑的態度，那是可以原諒的。

此外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假使我們認為各種工作的價值，是沒有法子很準確的去估量，那麼有一個根本事實，我們仍然要承認的。就是凡是費了成本的工作，無論如何，總要讓他多少有點結果。有一點結果，總比毫無結果好。假使我們認為所謂經濟效率，乃是一件工作的結果，必須能與成本相稱，要不然，那件工作，就不應當做，那麼我們同時就應當承認，假使無結果，就不應當有成本。所以比方說，有人認為襪子的生產，現在是值不得對於間接，或直接與襪子有關係的人，付給他們工資，讓他們去再製造了！那麼在這個停止造襪子的決定中，含有一種原理在。就是說，沒有襪子，就沒有工資。其中還含有一種意思，就是說，假使要叫這些造襪子的人，去做別的工作，其所花的成本，或者還可以與其所得的結果，比較這襪子為稱合些。

但是事實上，在一個人民還沒有全部都有工作的社會裏，其實際情形，並不是如此。其實際的問題，不是製造襪子與製造手巾之間的選擇問題，乃是在乎製造襪子與沒工可做之間的問題。失業的工人，無論社會上有沒有

一定的辦法，來救濟他們，他們總不能束手而待斃的。所以我們不能認為，一旦這些失業工人，要解僱了，養活這些工人的成本，就可以消滅了。事實上成本可以減低，是確實的，因為這些工人失業之後，他們的生活程度，總一天一天的比他們有工作的時候降低，但是成本並不能算是完全消滅了！所以我們縱使承認，在一個經濟效率，達到理想的社會裏，沒有一個人的工作，不與其成本可以相稱合。但是我們還不能就下一個結論，認為在經濟效率減低的社會裏，假使某甲的工作，不值得那些成本去維持他的生活，那麼某甲就不應有任何工作。其所以不能有這個結論，乃是因為假使某甲的工作，能夠有一些效用，無論其效用是多麼小，那麼他在成本上，總可以有一些的貢獻。極端主張個人主義經濟制度的人，總不能否認半塊麵包，是比沒有麵包好。我的工作，與我的報酬相稱，固然是達到了百分之百的經濟效率，但是我的工作，只值得我的報酬百分之十，就經濟效率上講，無論如何；也總比一點工作都沒有好。

假使以上這兩個要素，一個是難於決定我們的工作，是否等於掘了坑，又把他填滿了；一個就是聊勝於無的看法，可以用以解釋人類為什麼，有時候會發生不由自主浪費光陰的不幸現象。那麼我們很可以有一個好根據，來證明在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比較之下，避免失業的蔓延，確實是計劃經濟制度的特長之處。就是我們承認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失業工人，有了工作之後，其工作並不見得會與其成本相稱也是可以的。因為計劃當局，就他的能力所及，並不能很準確的認別，什麼工作是值得做，什麼工作是不值得做；因為人們唯一可以自娛自慰之點，就是他應當有些工作做，很少數的人，要問他所做的工作，是否值得做。況且根據我們以上所說的各點看來，這

個問題，是不能有一定的答案的。所以多數人的看法，仍是對的，並且事實上很少數的人，認為其工作不值得做，還不如失業找不到工作的好。所以一個書記，戴着草帽，持着一把傘，每笑到一個製造不相干的藥品的公司裏去，做記帳的工作，他自己在精神上，總覺得比那些在失業介紹所門口，等候工作的人們，愉快些。社會上並沒有人認為這個書記，成一個社會問題。社會上沒有人去問他的工作，是否比那些無職業的人有經濟價值，或是他的工作，是否比掘坑又把牠塞滿，有用處些。

八 儲蓄與投資問題

假使我們認定計劃經濟，頗具有避免失業蔓延的能力，雖然同時並不能達到理想的經濟效率，或者僅能與那個理想相近，那麼我們可以不可以說，計劃經濟制度，還可以避免引起目前資本主義危機的另外一個不良的現象，其重要性，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提過了！更明顯一點說，假使我們承認非計劃經濟的不好，是由於他的貨幣制度之不良，那麼計劃經濟是否可以避免這個毛病。

關於這一點，我恐怕要承認非計劃經濟與計劃經濟，是陷於同樣的困難的。因為目前貨幣制度之所以不對，乃是因為沒有人知道，一個對的貨幣制度是什麼樣子。關於這個問題，並不僅是一個計劃的問題，可以答覆。照實際的經驗而論，我想在這個問題上，蘇俄所得的經驗還很少。蘇俄貨幣與信用政策之屢次變更，顯明都是為應一時的需要，他這種臨時應變的主義，很可以從他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看出來。我們在上而已經提過，蘇俄如何實行

通貨膨脹的辦法，以及如何取消其附帶現象之發生。我想我們可以說，蘇俄除去不能在短時期內，完全廢除貨幣之外，他還沒有籌劃出來一個合理的貨幣政策。

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關於貨幣的發行，與使用問題，計劃經濟所處的地位，是比受價格機構支配的經濟制度，強有力些。這一點，上面已經略為提過。假使我們在上一章，對於目前貨幣制度所下的批評，是有價值的，我想計劃經濟將來一定要想法子，去解決這個問題。假使無論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人們還是離不了要用貨幣，去買東西，那麼欲求市場問題之簡易解決，必需於貨幣的發行量，與貨物的供給量之間，求得一種平穩的關係。在這一點上，計劃經濟很顯明的，有他許多便利的地方。因為計劃當局，對於這兩方面的數量，是否平衡，既可以有法子知道，並可以有權力支配；至於非計劃經濟，他既不能徹底的知道，同時又要受環境的支配。貨幣的發行，應當有法定準備金，固然是為任何國家法律所規定的。同時貨幣政策的決定，在各個國家裏，固然也多半都是由中央銀行，或是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銀行，從中左右着。但是在生產事業，完全受個人對於價格變動自由反應的制度之下，絕不能有一個集中的機關，對於生產，來加以整個的控制。

此外還有人認為非計劃經濟，所以陷於困難之境，乃是因為儲蓄的總數量，不能與投資的數量，相稱合。我們認為其所以發生這種現象，最主要原因，乃是因為投資與儲蓄，乃是受不同的力量的支配。投資乃是完全受希圖得利的力量所支配；儲蓄乃是一個人們習慣的問題。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這個儲蓄的數量，與投資的數量，是由同一個計劃機關來決定，假使這兩個數目，還不能相抵，只好歸咎那個計劃機關，沒有盡他的責任。

但是這種種的錯誤，並不是計算上的忽略，或錯誤的問題，計劃經濟雖然有充分認識，與控制的能力，但是他也時常會有錯誤，至少會向非計劃經濟，趨於崩潰那條錯誤的路向走去。計劃經濟，有時候受某種現象的誘惑，會使投資額超過儲蓄量，或者是款項未有着落之先，就先開始發展新計劃，其結果人們向銀行裏所借的投資款項，並不是別人所儲蓄的款項，其生產出來的東西，並沒有人需要他。這種種現象，都與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現象一樣。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沒有一個人，來負責任，去審察社會上，是否有人願意節省他的消費，儲蓄起來，以供給企業家投資，發展新企業之用。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儲蓄這件事，無論其為公共的，或私有的，除非那個人，是天生好儉，儲蓄習慣，是不容易養成的；同時計劃當局，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去使人民按着他的計劃的需要，去儲蓄。所以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假使計劃當局，遇到沒有把握的時候，或者已經陷於錯誤的時候，為要補救起見，他們就不得不走到通貨膨脹的老辦法途上去。

但是與上面相反的現象，就是投資額小於儲蓄量，在計劃經濟制度裏，是不大會發生的。這個現象，就是目前資本主義衰落的一個嚴重現象。因為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儲蓄是用社會主義化的積貯方法，來辦理的，大半都是在國營企業中，留下一筆整個的儲蓄金，他們並不是將現金發給個人，而後再由個人節省儲蓄。假使遇到這些國營企業機關，用不着這筆儲蓄金，或是負控制價格與生產的計劃當局，也不用他去發展別的計劃的時候，我想國營企業機關的經理，絕不會就把這筆儲蓄，就這樣的一邊不用他了！因為假使計劃當局，果真發現他們的計劃太大，應當截止新投資，就好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發生那種投資停頓的現象，那麼他們一定要同時將原

來的儲蓄計劃縮小，將原來用於新投資，而現在又決定放棄的數目減去。如若不然，我想擔任儲蓄這筆儲金的企業機關，對於改變計劃，及縮小投資的數額，一定要表示反對。因為那個企業機關，自己既是不能用那一筆儲金，同時又不許他讓給別人去替他用，那麼他們爲什麼要那樣盲目的儲蓄呢？

換而言之，把購買力儲蓄起來，既不讓原儲蓄者去使用，又不讓他去投資到別的生產事業上，這種現象，絕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那樣，發生於社會主義化的經濟社會裏。在一個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人們之所以把錢節省下來，去儲蓄，乃是因爲他們認爲，這個錢在以後的需要性，會比目前更大。此外人們之所以把儲蓄的第二個原因，乃是因爲他一時找不到一個可靠，而報酬大的投資方法，所以他就將本來要用以投資的錢，儲蓄起來。可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投資的機會，是完全沒有的。所以關於第二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關於第一個理由，還有存在的可能。因爲我們絕不能把所得的錢，一氣花完了，不爲將來打算，我們總要留些，以備不時之需。但是這一種儲蓄，在儲蓄量中，所佔的比例數，是非常有限的；除非政治狀況極爲不穩，人們恐怕戰爭或革命之光臨，其數量也許可以加多。

除此之外，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非計劃經濟要受許多束縛的阻撓。我想我們現在不必在計劃經濟制度裏，去討論他是否也要受這些阻撓的蹂躪。很明顯的，在計劃經濟之下，工資與利潤，都是由計劃當局，全權規定。這個阻力所發生的作用，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完全與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兩樣。因爲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所有經濟活動，是靠私人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假使一旦工資及價格的規定受了習慣與法律的支配，那就是用一

種外力，來加以控制。這個外力，適與非計劃經濟制度本身的正常動作，背道而馳。可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這些支配工資與價格的力量，就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不過這種說法，並不是表示計劃當局，可以亂用他的力量，可以不顧到整個計劃的各部分，是否能夠互相啣接，在他規定工資的時候，就可以不必按照計劃，使各種工人的分配，得以按着生產計劃的需要，加以分配。這種說法，乃是表示凡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所要發生的那些束縛，以及有關於束縛的各種特殊問題，多半都是屬於國家干涉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是不會發生的。除非這些問題，是構成計劃成功的必需條件的一部分。

九 計劃經濟有避免離心力現象之可能

最後我們要問計劃經濟，能夠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除以上所說者外，是否還能夠避免發生離心力的現象。這個離心力，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認為他是危害價格經濟效率的一個大威脅。關於這一點，我想在最近的將來，無論是在目前蘇俄，所試驗制度之下，或者是其他的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都不能完全消滅。我們知道，目前的蘇俄，在工人分配方面，多少還是要利權價格機構（其所依賴的程度與我們差不多），以期工人的分配，得與計劃相適合。他們還是要以經濟的利益，及社會的利益，去引誘人們。擔任專家，或是教師，這些人所享受的生活，還是比一般工作簡單，負責較輕的平民們，為優良。在這種辦法尚在採用期中，自然這些特殊階級的工人，都希望他們的供給量，在各個國營企業機關的需要量中所佔的成分，能維持愈少愈好。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是要回

到我們上面所提到的舊狀態。就是說，每個人都希望工人的供給量，永遠是很充分，在這工人供給量中，別人的工作，愈多愈好，而自己的工作，則愈少愈好，別人的獲利，是愈少愈好，而自己的獲利，則愈多愈好。假使蘇俄專家們報酬之所以高，乃是因為其供給量的缺乏，那麼專家們為什麼要希望每個人的智識，與技術，都可以與他一樣呢？這一點，是我們絕對不能否認的。

但是蘇俄現在正在制止這種現象之發生，正在想法子，造成一種排斥貪取的輿論，隨時隨地，提倡擁護計劃成功的精神，並以蘇俄四面受敵的刺激，（指世界各國）對於共產黨的敵視，來鼓勵他們的人民。因為這是人類極普通的一個心理，就是說，假使有一個公共的敵人在前，大家莫不表示一致對外的精神。

此外在計劃經濟制度，與在價格經濟制度尚有一個不同之點。就是假使某一個工人團體，要想犧牲整個社會的利益，而謀他們自己部分的利益，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是比較不容易的，就是有機會來引誘他們，也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第一，工人的對方，僱主，實際上是等於一個唯一的獨占專利者，所以在規定工資的時候，工人講價的力量，是非常薄弱。在蘇俄，工價的規定，名義上是由代表工人的工會，與代表該企業的聯合會，或托拉斯，共同商定，在表面上看來，這種辦法，似乎是與價格經濟集體要挾的制度相仿。但是實際上，這種共同商定，在講價的自由上，是受了許多限制。因為每個企業，或是每個商家，都已經受計劃的控制，預先把工資的數目，規定好了。各該企業的托拉斯，都有服從該種規定之義務，絕不許超過其所限制之數目。除非按計劃的另外規定，要想增加這些工人的生產力，那麼工資可以酌量增加，以應這種的需要。此外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也不像在非計劃經濟制度那樣，

可以用自由到別處去工作的方法，來恐嚇僱主，要求增加工資。因為在計劃制度之下，所有的國營企業，無論是屬於那部門，大家除在製造品的質量上，互相比較外，別的都不許互相競爭。

第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計劃當局對於工人的分配，可以用直接命令的方法，加以控制，並不要以本身的待遇多少，來吸引工人，去就某種工作。假便有一些工人，無理由的堅持着高價，我想計劃當局，一定要執行用直接命令的控制權力了！按蘇俄的刑法，反革命行動，這個詞語，爲用甚廣，罷工怠工等等情事，都可以構成犯罪行爲，且有以死刑處分之者。

所以我們承認，無論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只要他還是要利用工資的比率，來支配工人供給量的分配，那麼離心力的力量，是不能完全消滅的。但是在蘇俄目前制度之下，這種力量的引誘力，雖然很大，但是與這離心力相反的力量，也有同樣的大，足以與之相對抗。

此外比較更重要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個人與大家利害衝突的力量，至少可以只限於影響到計劃的執行範圍之內，而不會影響到計劃的編製上去。就蘇俄的工業計劃而言，這種力量，只能影響到工業計劃的執行，而不能影響到計劃的內容。集體與私人農業情形怎樣，自然還不敢斷言。蘇俄工業生產工具，經國有之後，決定經濟政策的人，就是決定要生產什麼，與在什麼地方生產，及用什麼方法生產的人。在他們下決定的時候，大可以不受離心力的限制。這些決定計劃的人，並不一定是熱心社會利益的人們，他們也許懷有私意，希望某一個計劃，能夠在他自己的家鄉，經營起來，或者就他自己所屬的民族的小範圍內，安置工人的位置。但是他

們至少可以避免以下這種毛病，就是在他們製定計劃時候，他們心裏並不懷着，如何能夠以極少的生產，獲取極大的盈利，而使別人的生產多，而獲利少。這種心理，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壞的現象。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編製計劃的人，或是充任經理者，他們的報酬，並不是與他們所能盈利的數目，成正比例，所以利潤的引誘，並不與他們發生什麼重大關係。

我們要知道，這種不受利潤引誘情形，不但是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計劃的人，是這樣，或者全國企業聯合機關的總經理，是這樣，就是許許多多小工廠的經理，也是一樣的。比方說，按計劃內的規定，鋼鐵聯合會的營業量，需要有多少盈利，那麼凡是屬於該聯合會管轄的每個鋼鐵工廠，都要想法子在他營業上，能有利潤。可是這裏所謂利潤，與資本主義所望的盈利，不同。這乃是一種辦法，可以使鋼鐵的出產量，達到計劃當局所規定的限度。所謂限度，乃是指照他自己的估計，他們的出產量，可以與別種工業的計劃，相稱合。至於他們所採用核計盈利的方法，為如何，或者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採取的相同，或者全然相反，並非所計。也許他們所謂的盈利，按照資本主義的計算方法，其營業應歸破產，而按蘇俄的計算方法，則為有利。所以照這樣看來，所謂要達到計劃上所規定的盈利數目，姑無論其特殊含義為何，我們可以斷定的，就是其中絕沒有含有有利可圖的誘惑意義。國營企業的經理，並不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股東，或受股東支配的經理們一樣，他們並不以盈利為決定政策之根據。因為第一，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充任經理的人，為要達到計劃內所規定的營業量起見，雖然可以應用新技術，變更工廠組織，以增加其出產量，以達到其目的。但是除這個辦法之外，他並沒有其他法子，可以增加他的營業利潤。因為規定價格，及工

資比率的權柄，並不在他手裏。所以他並無法向社會或工人榨取利潤了！第二，就是他所處的地位，可以有榨取的可能，他也不樂意那樣做。因為他明知道例外的利潤，就是得到了之後，也不能到他自己的腰包裏去。這種危害計劃成功的行動，蘇俄負責當局，如有觸犯之者，必遭不好之結果。

十 結論——蘇俄經濟制度之展望

蘇俄計劃經濟，以其歷史之短少，有限，尚不能使其人民所享的生活程度，與普通一般人民，在資本主義之下，所享受者相比，不過他已經達到一個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他可以就現有的生產，予以分配，其分配不均之程度，可較在資本主義之下減少。此外他還可以想法子，將從前帝俄時代，皇帝皇子，及富商所享有之皇宮大廈，充公，讓大家共同享受，以補目前私人用品之缺乏。目前蘇俄各種重要經濟計劃，雖然還沒有很明顯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可以達到理想的經濟效率，非計劃經濟所採取用以增進效率的幾種辦法，雖然對於他們不能有何用處，但是他們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尤其他們認為他們並不會有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情事發生。他們在消除失業狀態上的成功上，至少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可以說不是由於實行某種政策（如通貨膨脹等）的臨時成功，或是他們在經濟發展程序上，佔有何種優越地位，（比如他們的經濟發展尚在初期）確是可以代表他們在制度本身上的成功。他們對於各種理想所具的信念，並不是沒有根據。因為我們把計劃經濟的內容，分析一下，就知道假是他們要立志首先把失業狀態消滅，確是他們這種制度能力之所能控制得到的。自然這種說法，並不是說，按他們那

種辦法，就可以達到理想的經濟效率百分之百。最後我們認為，在蘇俄那種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經濟效率，確是可以相當的增加。因為在那種經濟制度之下，局部與全體利害衝突的力量，（這種現象在我們制度之中是滿佈着）確是相當受了限制。在某某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這種力量，雖然沒有完全消滅，可是他們已有相當有效的辦法，可以使這種力量，不至於爲害了！



第五章 將來如何

一 共產黨之社會哲學——唯物辨證法之應用

今日世界的企業，所賴以運行者有兩個不同方式的經濟制度在。這兩個制度的機構，過去的成功，及他們的潛勢力，已爲之檢討如上。現在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制度，將來的發展如何，這兩個制度將來的關係，又如何。要能答覆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把後今億萬生民日常生活的輪廓，相當的形成了！

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絕不能僅就經濟上着眼，可以尋到的。因爲在現階段的世界裏，我們要把眼光放大，要注意到前此世人所沒注意到的問題。就是說，這兩個經濟制度，每個制度，都是與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或是階級結構，有密切的關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體說來，其社會結構，並不是某種明確的意志，所造成的，所以也並不是一種完整一致的理想制度的實現。但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下，工業化有相當進展的國家，社會的結構，大體可以說是一樣的。不過在任何特別狀況之下，這個機構，因受有傳統力量的影響，及民族因素與地理因素的牽制，都有不同的地方。這種社會結構的特殊之點，就是在他把全社會，分爲幾個社會階級。這幾個階級，在平常社交往來的關係中，不能混雜在一塊往來的。有的階級，在社會上所占的位置，比較高，有的比較低。高低的區別，大概都是以

收入的多少來決定。不過在英國，職業階級，與世襲階級，占有相當勢力，所以他倒不是完全是以富人階級，來區分他的社會階級。比如英國有所謂紳士農夫階級，他們的勢力，尚且存在。更有以職業的潔淨，與污濁，來比較職業的優劣，其實也許污濁職業的報酬，還比清潔的多些。還有所謂職業團體，他們在社會上，可以享受較高的經濟特權。還有因世襲的封號，及在法院內充最高法官，可以在社會上占居高地位。但是我們並不需要把我們所最熟悉的英國社會結構，加以分析。總而言之，誰都知道，一個百萬財主，絕不會請他的女當差吃茶點；一個打掃夫的太太，絕不去拜會 Kensington 的房客。這種社會的結構，很少人去分析他，或者更少人體會他，除非是厭惡這種結構的人，纔注意到這個問題。大多數的人，都是對這個問題，默然忍受的。

蘇俄就不然，他們準備對於他們自己的制度（他們所理想的），及我們的制度（他們所厭惡的），加以澈底的分析。他們對於這兩個制度，都是用那個萬能的哲學所謂唯物辯證主義，來觀察，來分析，我們也就是根據這個哲學，纔能見到他們的經濟試驗的真相。

這個哲學，很撮要的歸納起來，可以用以下這幾個命題來說明。宇宙的每一個部分，都是在繼續不斷發展的狀態中，這個發展，都是由於相反力量的內在衝突，而前進的。這個衝突，根據我們想像，是相反的力量，在每個實在形體，或每個概念中，互相關聯，引起了一種內在緊張的狀態。這個緊張狀態，到了最後，產生了一種新的均衡力量，或是一種新的綜合。這個新的均衡力量，又互相關聯，於是再回到從前那種狀態了！這樣循環不已，就是叫作辯證的歷程。這個辯證的歷程，是時時時斷。每一個新的均衡力量的產生，就好像拔河遊戲的鬪力一樣，起先是兩隊人

互相關力，後來忽然有一隊潰敗了。這種歷程，在物質界，在思想界以及在社會組織的界域內，都是一樣的。到了最後，總歸是一個物質的歷程。這個物質歷程，是自己可以存在的，不必依賴上帝的意旨，或人的意旨。他自己本身，也是同樣的要經過辨證的歷程。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不過是按着自覺的需要，而活動。換而言之，認識了事物的真相，而後再着手去做，免得用足望釘子去踢。但是這並不是說，宇宙是一個機械的世界，僅是許多原子的結合體，這個結合體，盲目的受着均衡的力量支配。這個宇宙，乃是在日夜生長，並不是均衡靜止着的，乃是一種有機物，而不是一個機器。

唯物辨證主義，就人類社會的生活，與政治的生活而言，認為人類各種社會組織，乃是人類按着相反力量內在衝突的法則，對於他的經濟環境，去謀適應的結果。生產的歷程變更，環境也隨之變更。最初我們是生存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生產社會裏，次則開始工業化，起先還只是在工人的家庭裏，後來就到了工廠裏。現在我們是由大規模的工業，與蒸汽時代，而進於更大規模的工業，與電汽時代了！每個時代，都把舊有的社會組織，與階級推翻，用以謀適應新的生產方法。比方說，假使資本主義制度，要沒有附帶產生一套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那他絕不能完成他現在所已經完成的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方面是有產階級的少數資本家，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多數平民，無產階級，是要聽命於有產階級的。

上面所說的，那個相反力量內在衝突的法則，他在社會生活中所表現的，就是相反社會階級的鬭爭。這個鬭爭緊張的程度日益加甚，到了最後，就要爆裂了。於是就產生一個新的社會組織，來適應新的經濟背景。所以前此

所有的歷史，就是一本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王公與奴民，業主與藝徒，互相鬭爭。總而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永遠立於相敵對的地位，不斷的明爭暗鬭，每一個鬭爭的結果，不是一個大革命，把整個社會根本改組了，就是兩個鬭爭的階級，同歸於盡。政府壓迫的力量，如軍隊、警察，以及特殊階級的衛隊，只不過是在上階級，對於在下階級，施行壓制的工具而已。根據社會哲學家的理論，國家是公善的保護者，國家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用以調和各種不同的利益，利益的衝突，是近代複雜的社會所免不了的。這種說法，在主張階級鬭爭的人看來，只不過是布爾喬亞的幻想而已。國家絕無保護公善之可能，因為在一個階級成層的社會裏，沒有善是公的。甲階級的善，就是其相反階級的惡。至於我們所衆口交譽的民主政治，馬克斯在許久之前，就看不起了。他認為所謂民主政治，充其量，只不過是使被壓迫階級，隔幾年，可以有一次權利。決定那幾個壓迫階級的代表，可以到巴力門去做代表來壓迫他們罷了。

共產黨人，根據這個哲學，來檢討過去歷史。他們認為目前的世界，是這樣子的，在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裏，他們為適應近代生產技術的需要起見，階級組織，是非常的簡單化了，整個的社會，日浸月邁的分成兩個敵對的堡壘，布爾喬亞與普羅階級；但是布爾喬亞的壽命，是有限的了！因為他已經無能力，再盡他自己的任務。一個階級要想壓迫另一個階級，一定要有幾個有把握的條件，有了條件，至少不至於發生苟延殘喘存在的現象。布爾喬亞，現在是沒有壓迫人的資格了！因為他的能力，不足使他的奴隸，很安分的，生存在奴隸範圍之內；他並不能使他的奴隸，規規矩矩的受他的養活，而不至於由奴隸來養活他。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爆發的時期，已成熟了！

這個爆裂，就是一個新的社會力量產生的先聲。在這時候，布爾喬亞與普羅階級的衝突，一天一天的緊張，國家的權力，需要極大的擴張，統治的階級，一天一天感覺不安，需要更多的軍隊與警察，來維持法律與安寧，需要更多的麪包，來供給人民，希望人民可以安靜，到了相反勢力內在衝突忍不住的時候，國家就要潰敗了，大爆裂隨之發生。

蘇俄已經達到這個潰敗以後的一個階段了！布爾喬亞為革命所推翻，由普羅階級取而代之。但是這個鬭爭，尚未完了！政府還要暫時保留着，擔任其舊職務，來安置這般被壓迫的階級，使各得其所。不過現在政府的力量，是專門向布爾喬亞進攻，這個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他的權威，沒有別人可以沾潤，並且是完全利賴民衆武裝的力量來維持。恩格斯（Engels）說無產階級之需要國家，並不是為求得自由計，乃是為達到消滅其敵人的目的。列寧並加以補充說，我們應當打倒無產階級的敵人，拯救人類於工資奴隸制度之中。他們的抵抗，應以武力解決之。根據他這句話，所謂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是不能達到的。但是這個統治階級，與他的任何前身，都不相同，他乃是代表廣大的民衆而統治的。布爾雪維克黨人認為這統治階級，比起從前的統治階級，可以真正自由，真正平等，真正民主的理想不遠。國家仍然是施行壓迫的工具，但是這是第一次為着多數人的利益，來壓迫少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而壓迫多數人。同時統治階級的組織，大可以簡單化，不必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笨重。因為壓迫布爾喬亞的工作，是人人都願意擔任的，可以不必指定一個大團體，去特別擔負這個責任。榨取別人利益的人，要想壓迫民衆，非有一個複雜的組織不可，但是民衆可以用很簡單的組織，來壓迫榨取別人的人，差不多不需要什麼組織，不需要什麼工具，利用武裝羣衆的簡單組織，就可以了！

在這種社會的與政治的發展下，其經濟組織，可與之相適合者，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列寧在布爾雪維克革命前幾個月，曾發表一本小冊子，其中曾大略的說到這一點。這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特徵，第一，生產工具，不復為私有的財產。第二，收入是根據兩個雙生的原則，以規定的。一，不工作者，不能得食，無選舉權。二，工作數量相同者，報酬相等。真正的共產主義，應當嚴守下列這個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這個原則，現在還沒有達到。

蘇俄以十分信仰的精神，把這種社會政治哲學，在事實上實現出來。他們利用政府，為壓迫的工具，向從前享有優越位置的人，進攻。假使他們保持現存統治階級的權威與特權，其熱烈興奮的程度，沒有超過他們的前人，他們確實比任何人都光明磊落的承認，法律正義，這套東西，乃是為保全社會上統治階級的福利，而不是人們的公共福利。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所謂公共福利這個東西。凡生活方式，不為他們所贊許的，（其他國家的優越階級的份子也包括在內）第一，取消其選舉權。第二，取消他們執有同業工會證的權利，執這個證的人，可有求得可靠工作，與獲得較好報酬的機會。第三，取消其為合作社社員的權利。凡合作社社員，購買食料，及其他必需品，可享受廉價的利益。他們為保全自己的安全，避免被取消權利的階級，恢復其原有勢力起見，設立一個農工稽查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在這個委員會主持之下，全國普通工人，可以到各種大小官吏的辦公室，或是工廠裏，去任意檢察他們的公文，帳簿，並且秘密監視這些官吏的生活，看他們有沒有走入布爾喬亞的傾向。布爾雪維克黨人，並且大膽的表示，他們法庭的判決，並不假冒公平，凡無產階級的人犯罪，應當加以饒恕，凡布爾喬亞的人犯罪，應當加以重罰。布爾雪維克黨人，很坦白的承認，他們整套的行政，是有階級

性的分別。凡有訴訟事件發生，人民應當把他的社會身分 (Social origin) 說明清楚，就好像在別的國家，一定要把年歲、性別、婚姻情形，說明清楚一樣。

但是據他們向我們的暗示，我們知道這種非常的局面，只不過是暫時的。因為他們相信，根據辯證法的歷程，共產主義的第二期，一定要從第一期脫變而來，到共產社會最後完成的時期，所有階級的分別，可以完全消滅了！我們可以在一個無階級社會裏，享受自由的空氣，既無無產階級，也無布爾喬亞，大家都是自由平等的同志。那時候，這一套政府的機器，也不需要了。誠如列寧所說，到了這個時候，政府國家歸於消滅，因為政府並無階級可以壓迫了！固然個人的行動，還需要限制，但是並不需要特設一個工具，一套機器，來限制個人行動。這可以由武裝的民衆本身來辦理，其容易，其簡單，有如一羣明白事理的人，去替兩個打架的人勸架，或阻止一個女人，被人強姦一樣。我們不希望完成一個不算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但是某甲服從某乙，甲團體服從乙團體，並不需要武力，因為人民在那種社會裏，不需武力，不需要壓迫，人們對於遵守生活的基本原則，都過慣了。

到了這個時候，假使有人問，辯證的歷程，與內在相反勢力的衝突，要形成一種什麼樣子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不能有明瞭的答覆的。據希克爾教授 (Prof. Hecker) 的理想，在那時候，內在衝突，還是存在，但是並不是我們現在這樣，階級與階級的衝突，而是在一個無階級社會裏，在實質上，不斷的變更。要不然，共產主義不是要靜了嗎？那不是與唯物辯證法宇宙觀的法則，相違反了嗎？他這個意思，也許就是說，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與其他社會經濟制度一樣，都要隨着生產歷程的變遷，而變遷，以謀適應。比方說，有人認為假使要以電汽的力量，來代

替蒸汽力量，一定可以使小單位的工業，普遍的成立，比較蒸汽時代，建築大規模工廠，為經濟些，那麼小規模企業，將起而代大規模國營企業，那種只能僱用十幾個工人的農村小工廠，又要發現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相反勢力的衝突，將要發生於大規模企業與小規模企業之間，那些大規模企業，就要開始淘汰，而小規模的，就要重新發現。但是這種說法，只不過是我對於內質上不斷變更這句話的意思，加以一種推測而已。但是有一點，可以斷言的，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可以不必再聽見社會上有階級鬭爭情形發生，如同今日的社會一樣。

二 共產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衝突之原因

上面把共產主義的社會哲學，略加說明，因為這一點對於將來蘇俄的經濟制度，與我們的經濟制度，所要發生的關係，很有重大的影響。假使將來這兩個制度的關係，僅是就兩個制度所表現的功績，加以比較，比如僅就衣食住的方法，及人民日常生活而比較，那麼我們可以不必十分加以憂慮，但是事實上共產主義者，把計劃經濟與他們社會政治的理論，結聯起來，合為一談。所以要想將這兩個制度，作一個公平的比較，其機會很小，因為他們的社會政治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輿論所極端表示厭惡反對的。

蘇俄的政治社會理論，所以遭人厭惡，第一因為他們是無神主義。蘇俄的共產理論，是完全唯物論的，神是沒有地位的，凡是人類直接用五官，或間接得別的工具的幫助，聽不見，看不見，摸不着，嘗不着的境界，也都沒有他們的地位。不但如是，蘇俄不但自己不信上帝，他們並且還譏刺那些非共產國家崇拜神的人。在他們學校裏，以宣傳反

對宗教，來代替宗教的課程。就是極小的兒童，也是如此。青年們都自己驕傲，他們是反對神的革命者。這種現象，在虔心宗教，信仰堅固的人，或自己沒有信仰，而承認宗教應當存在，可以使人得到安慰的人看來，都是很引為驚駭的。他們認為他們自己，雖然不真心信仰某個宗教的教旨，不服從某種宗教的道德觀念，但是他們的兒女，應當教給以一個信仰，與道德觀念。咒瀆神聖的話，要從兒童的口裏發出來，是要加倍受罰的。

但是現在蘇俄的共產社會，所以為西方社會所厭惡，其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蘇俄要想整個的推翻我們社會階級組織。蘇俄以為凡有錢、有地位、有勢力的人，都應當槍斃、殺害、下獄、餓死。更已甚的，凡是享受上層中等階級優越生活的人，都應當被人強迫到街上去做掃街工作，一天之內，都應當穿一樣衣服，因為他們就沒有別的衣服，可以穿。人們應當與污穢無智識的無產者，住在一塊。遭受這種惡運的人，不只是少數沒有良心、自私、自利的壞人，而是整個的階級，並不分別個人的好壞，良心好的人，與浪蕩無規的人，都要受同種的待遇。這種辦法，絕不是別的國家所敢想像的。同時西方社會的人，生怕一旦革命成功，那種社會制度，絕不是我們所能忍受的。一個倫敦船塢的工人，或是一個公共汽車買票的人，都可以隨便跑進英倫銀行的密室，檢查他們的帳簿，和開會的紀錄，並且還要當着他們自己那個階級的羣衆面前，批評銀行總裁的政策，和他們個人的行為。

有許多人，簡直寧願出於一戰，而不願意看見這種夢鬼實現。財產、地位、社會的尊崇、生活的享受，在西方人看來，是人生應當冒險去嘗試的。所以他們對於蘇俄的一切，莫不無理由的含着懷恨之心，而造成一種仇視的空氣，凡看見報紙上登載關於蘇俄災荒貧困的消息，莫不暗中為之歡欣。

根據這種態度，去推測，我們不得不相信，將來蘇俄的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是要以武力的衝突來決定的。假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認為蘇俄制度的成功（或是僅僅存在着），是足以危害他們制度的安全，那麼他們一定要用武力來保障。也許資本主義階級，已經預料到，或者已經見到，現在蘇俄所進行的辦法，就足以危害他們的安全。那麼在那種情形之下，資本主義國家，未必不會先發制人，對於可怕的蘇俄，實行所謂爲阻止戰爭而戰爭的戰爭。

在蘇俄方面，他們一百二十分的相信，資本主義國家，向蘇俄進攻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要到蘇俄去參觀，他一定要大爲驚訝，時常聽見人問，倫敦方面，對於戰爭，是怎麼看法。或者有人問，倫敦方面，認為什麼時候，要發生戰爭。蘇俄人民相信，假使戰爭不來自西方，一定要來自東方，因為貪而無厭的日本，眼睛正注視着西伯利亞廣大的土地，與富源。這種戰爭空氣緊張的程度，固然可以隨政局之變幻，隨時而異，但是在蘇俄當局，及代表蘇俄當局發表演論的人的態度中看來，這種空氣，確是占一個很基本很重要的位置。

蘇俄的布爾雪維克黨人，對於所謂和平的理想，並不關心。他們對於以下這兩個和平信念，都置之不理。這個信念，就是說，思想與社會制度兩者，都不能，也不應當用武力來掩護，來宣傳。他們不相信人類是不能夠用武力的威嚇，來強迫人們接收某種思想，或者承認某種社會制度。他們並且不承認，就是能夠，也是不應當的。他們的行動，與他們唯物的哲學，礙難符合。根據他們的行動來看，實在使人疑惑他們的理想，是放在他們手裏所拿的刀鋒上，而不是放在他們自己信仰上。蘇俄代表，在世界軍縮會議席上，發表了不少和平的言論，提議召集國際會議，實行

普通軍縮。我對於這個偉大計劃的好理想，並不願意有何批評。我也不願意說，假使這個提議，事前通過了，恐怕蘇俄本身，並不會領導其他國家，實行軍縮。但是一個計劃，明明知道當牠被提到會議席上，一定要遭拒絕的，而故意提出，那麼這個計劃並沒有何種實際的價值。我們對於提出這個計劃的人的理想，確是表示敬意，但是這個理想，對於現實的世界，是漠不相關的。並且這個理想，也不足以表現，擁護這個計劃的人，在現實的世界，會採取什麼行動。我想大家都承認我的行為是正常的，假使我向大眾宣告說，假使倫敦的人們，都穿一隻鞋，我一定也穿一隻鞋。

在這種情勢之下，蘇俄普通軍縮的提議，既不爲人接收，他們就開始進行下列這個原則。就是所謂假使你希望和平，你就要準備應戰。蘇俄對於他們的公民軍隊，非常自傲。幾個月以前，莫斯科新聞報登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隊洋洋得意，荷槍實彈的武裝青年，標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擁護者。蘇俄共產黨青年團（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團員，完全受軍事的訓練。我有一次親眼看見女團員，與男團員一樣的受訓練。蘇俄社會上各種活動，莫不用戰爭的字眼，來形容，如衝鋒隊（Shock Brigade）農工戰線（Industrial and Agri. Front）等等。凡遇有假期，或革命紀念日，布爾雪維克黨人莫不作大規模陸軍和空軍的示威游行，和表演。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熱心和平的人們，滿腔羨慕蘇俄共產的實驗，正在想法子減少戰爭的恐怖，禁止使用空軍爆炸，與毒氣，可是三個蘇俄的團體，國防協進會（Society to Aid in Defence）空軍化學同志會（Friends of Aviation of Chemistry）空軍聯隊同志會（Friends of Air Fleet）共有五百萬團員，正在宣傳化學與空軍戰爭的常識，及如何使用機關槍與毒毒具的方法，蘇俄忘不了在革命初期，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威嚇，他們不預備再屈服於人。在

這種情勢之下，我絕對相信，蘇俄一定有億萬的青年，正在準備犧牲他們的生命，來保障他們革命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布爾雪維克黨人，還有許多別的問題，亟待解決。目前他們還不能輕於惹起世界大戰。他們的食料，還要靠農民階級，來充實，他們還不敢擔保一旦戰爭來臨，饑荒發生，農民不起而反抗。自從五年前托拉斯基失敗之後，蘇俄當局，對於世界革命的使命，已漸漸的冷淡了！全國現在正造出一種假裝維持世界和平，虛偽的空氣。蘇俄當局最高的願望，是要表現他們的國家，與衆不同。凡是他們的民衆，是快樂的，自由的，富足的。經他們的努力，這個願望，似乎已經在逐漸實現的進程中。但是他們還沒有成功到理想的程度，能使其他的國家，都一齊加入他們這種快樂的境界。他們相信假使他們能夠繼續不斷，對於其他國家維持優越的地位，一定可以達到他們的最後勝利。但是他們同時知道，這個優越地位，是要建築在堅固的經濟，與軍事的基础上，如要不然，他們的理想，經不起一星期的大戰，就要完全化爲灰燼了。

根據上面所述，非計劃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制度的衝突，因為受這種消極力量的牽制，也許可有避免用武力解決的希望。但是假使這個希望，不能實現，假使擁有充實軍備者，或者英雄無用武之地，忍受不住了，好像過去世界大戰那種忍受不住的情形一樣；一旦目前牽制這兩個制度武力衝突的力量，薄弱了，經濟衝突，日益加甚，到了最後，仇恨恐怖的情緒，及擁護宗教的熱誠，打破了人們人道慈悲的觀念，那麼在那個時候，就沒什麼可說的了！不過我們要知道，甲制度殺人的力量，比乙制度爲優越，並不足以表現甲制度的生活工具，比乙制度好。兩個制度武力衝突的結果，只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戰勝者在戰敗者的面前，並沒有什麼可以顯耀的。假使兩個制度真正

要訴之於武力，我們寧願希望我們能在這個戰爭發生以前，脫離這個世界，還比較幸福些。我們更不希望人們留下兒女，叫他們繼承這個悲慘的遺產。

三 資本主義國家採取共產制度之可能性

現在我們再討論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資本主義制度國家，是否能夠因為與蘇俄發生武力衝突的結果，或是由於他們自動整個採取蘇俄共產理論，而有應用他們那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可能性。據我看來，要沒有附帶產生一個大革命，大爆發，大流血，這個可能性，在任何地方，是不會實現的。因為假使擁有資財，與占有社會地位，享有自由的人，為保障他們的特殊利益起見，要對國外敵人的侵犯，用武力去抵抗，那麼他們對於國內沒有享有這種特權的人的侵犯，也是同樣的要表示抵抗。強者是不肯退讓坐位的，坐位是要由他們自己放棄的。富有的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絕不甘心與他們的工人階級，交換他們的地位。我們絕對相信，要想把社會的階級整個的顛倒，或是使他整個的平等，其代價非有一個大革命不可。

但是服膺馬克斯主義者，永不憚煩的說，一個革命，唯其在革命情勢下，纔能發生。要造成這個情勢，我想要具有四種要素，至少其中有三個，是必要的。第一、經濟的困難。第二、是嚴重的刺激。或者至少是政府施行一種暴虐不堪的政策。第三、有嚴密的組織的革命團體。第四、國外的援助。

蘇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成功，在這四個條件中，具有三個。第一、經濟困難到萬分。第二、大戰給予他們重大的

刺激。要達到激成革命的目的，再好莫如長時間不順利戰爭，因為在戰爭的時候，全社會各分子的生活，沒有不受其影響，即平常素不關心國事的人，都要受到痛苦。他們一定要將這個痛苦，歸罪怨於引起戰爭的政府，埋怨政府爲何任戰爭繼續不止，於是所有人民的仇恨，就是不關心政治的人，也都集中在政府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就被煽動了。第三，蘇俄的社會民主黨，自被驅逐以後，花了幾年的功夫，組成一個有嚴密組織的革命團體。蘇俄革命，就是缺少第四個條件。但是在這一點上，蘇俄得了消極的援助，因為當時歐洲各國，忙於交戰，他們都無力幫助沙皇應付國內的革命黨人。並且事實上我們不能否認，蘇俄的革命成功，多少得力於德國給予列寧，及其他革命志士們，回到俄國的便利。德國的意思，是要縱容蘇俄革命的陰謀，以牽制帝俄對德的戰爭。

國外的援助，在革命情勢中，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條件，不會使革命的成功，受多大影響。並且在目前革命的潮流中，要想從資本主義國家，得到多大幫助，是不會有的。這個新革命運動國外援助的來源，是要在蘇俄去尋求的。蘇俄之願於援助別國從事革命，是不容待言的。國外援助，對於一個前途很有希望的革命運動，的最後成功，是有很重大的關係。蘇俄對於一個革命運動，尤其是與他相鄰近的國家的革命運動，莫不願意予以物質援助。革命運動的成功愈近，則其援助愈加增。蘇俄對於虧本的事情，絕不肯花怨冤錢，但是對於將要成功的革命，又作別論。假使德國的共產黨，發現他們將要有成功的希望，我們敢相信蘇俄一定把將要成功，當做簡直已經成功看待。

就造成革命情勢其他要素而論，德國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德國因資本主義的總崩潰，與在大戰時所採取政治經濟政策的影響，所成的經濟困難，比別的國家較爲嚴重。（除奧國外）德國要想靠恢復貿易，來完全解決

這些困難，是不可能的。就是把德國過去貿易的成績，重新實現一次，也是解決不了。德國除經濟困難外，還有嚴重的激刺，和一個嚴密組織的共產黨。這個共產黨，在汎西斯壓迫之下，現在似乎暫時消滅了。

革命的情勢，在德國是無疑義的潛伏存在着。目前因為共產黨的失敗，沒有爆發，但是希特勒雖然能在國內消滅共產黨，而革命的組織，還可以在國外進行的。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革命運動，即其一例。關於革命團體的組織，目前的德國，還有兩個優點：第一，德國人是富有組織能力；第二，他們有蘇俄的經驗，可以參照。他們應當可以避免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派別分歧的影響。布爾雪維克的革命，就是派別分歧的結果，還好以後社會主義者受公敵的壓迫，而團結，派別之分，始為之減少。

目前德國的革命，同時也受汎西斯運動的恐怖局面，暫時制止了。汎西斯黨人，欲向工人階級中，屬於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分子進攻，但是他們這種階級鬥爭，受了種族偏見，及民族自覺觀念的牽制，頗不容易率然引起。德國長久受和約束縛，民族自覺觀念極深，所以結果希特勒政府反而得了共產黨人的擁護。許多革命青年，本來都要站在革命旗幟下，推翻特權階級的，現在都為復興民族的觀念，所感動了！目前他們都將對付國內資本階級的情感，移到對付國外的敵人身上去了！

所以汎西斯運動，在德國雖然是造成革命情勢的一種激刺，但是這種激刺，還沒有演成觸犯衆怒的局面，還不足以引起革命的爆發。目前各階級中還可以尋出億萬的份子，是擁護汎西斯運動的。此外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革命以前的俄國，他們根本沒有中等階級的存在，他們社會的結構，與階級鬥爭是非常簡單，德國的情

形則不同。上等工人階級，與靠小薪水爲生的人，及稍爲富有的商人，與職業團體階級的人，他們結成一個很堅固的反對革命的命集團，希特勒政府，雖然不是代表民衆的政府，但是他所代表的範圍，比較廣闊，不只是統治階級的幾個巨頭而已。

但是以德國政治經濟情況之不穩，事態可以瞬息即變，目前制止共產革命爆發的力量，其基礎也許還不如革命勢力本身的基礎，那樣根深蒂固。假使在近幾年內，德國要發生革命，我認爲有兩件事情，是可以預料得到的。第一，計劃經濟成功的機會，恐怕要超過蘇俄幾年試驗的結果。德國人是天生具有科學精神，與組織能力，他們要實行計劃經濟，是再合宜沒有了！第二，德國的革命，恐怕要如火之燎原，凡今日世界上尙未發現火星的地方，將來恐怕在德國革命後，都要被蔓延及了。

四 汎西斯主義

說到這裏，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汎西斯運動，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是否有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或共產黨計劃制度的可能。我個人認爲是不可能的。汎西斯主義運動，是含有社會性的。汎西斯黨人所主張的社會結構，與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十分顯著的分別。意大利的黑衫黨，與德國的褐衫黨，固可結成兄弟之誼，但是汎西斯運動，仍是一個民族的運動，並不會有國際性的。

若從經濟立場去看，汎西斯運動，只不過是一個反共產主義的運動而已。唯其有發生共產革命危險的地方，

汎西斯運動，纔占有勢力。意大利之所以有汎西斯運動，就是因爲工人階級有實行共產革命的趨勢，德國造成革命情勢的條件越完備，則汎西斯運動在德國越得勢。我相信假使現社會的安全，沒有被威脅，汎西斯運動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汎西斯運動，乃是要保障現存的社會，而並不是要創造一個新社會。至於共產主義，乃是根本要改造現經濟制度，與現社會制度的結構。

我認爲我的看法，是對的，雖然現在意大利有所謂組合國家的 *Cooperative State* 制度，其目的是在實現汎西斯主義的理想經濟與政治制度。在意大利，凡經法律承認的資勞團體，就算屬於整個國家組織中的一部分。每個企業的勞方，與資方的團體，經法律承認後，任何一方，都有保留協訂勞資協約的權利。凡事之涉及任何一方，的經濟與社會的利益，每個團體，都有正式代表發言的權利。根據意大利的選舉法，唯獨這些企業勞資的團體，纔有選舉議院候選人的權利，並不是像別的國家，選舉權屬於各地方的選舉區。並且按法律規定，每個企業的勞方，與資方的團體，可以聯合成爲一個整個的組合，其目的是在謀整個企業的福利。除去這些經國家承認團體之外，別的團體，僅是在名義上可以存在。這些未經承認團體的活動，僅限於社員的教育，及社員的衛生等活動，並不能涉及有關於社會全體的重要經濟事項。

但是我認爲創始這種制度的人的動機，是不難於追究的。尤其我們知道，組合國家制度，乃是發現於共產革命危機減退之後，他的第一個目的，乃是避免革命工人團體的產生。第二，乃是盡力想法子顧到勞資雙方的共同的利益。第三，乃是利用勞資協約的辦法，與工人法庭的組織，來公開解決勞資利益的衝突。

這種辦法，在理論上看來，好像勞資雙方，似乎是立於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並沒有解脫非計劃資本主義經濟的幾個重要的要素。在這個辦法之下，資本家方面，仍歸還是按着他自己所認為最有利可圖的原則，去僱用工人，僱用工人的權柄，還是在他手裏。勞工方面，仍然還是按着可以達到報酬最大的原則，去尋找他的工作。所謂組合的國家，也同別的國家一樣，對於個人的自由行動，可以加以相當的限制，有的時候，也可以控制價格機能的作用，以適應他自己的計劃。並且在莫索利尼政府的權威之下，這種種的干涉，都可以相當的實行，他可以用強制的辦法，下令減低利率，或者禁止某商人售價超過某種最高限度的價格，或者是用領袖批准的辦法，來限制工廠的設立。但是意大利政府，也與德國英國政府一樣，並不能製造一個整個詳盡的計劃，用政府力量，促計劃之完全實現。並且假使政府要想經營一件公用事業，也是同樣的受限制。這個限制，就是公用事業應當列在普通市場企業的範圍之外，否則歸於無用。組合國家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避免工會團體，走向革命的途徑上而已。

五 資本主義復興之可能性

所以從這樣看來，我們不能從汎西斯運動中，另外找出一種的計劃經濟制度來，因為這個運動之所以產生，乃是保障資本主義社會，優先階級的特殊利益，乃是反對所有革命的運動。但是這不是說，資本主義復興的機會，完全沒有了。我已經說過，其機會是比那些社會主義者所想像的為多。可是這個機會，無論如何，是要從研究資本

國家，所以會有今天走不通狀況的原因中求之，而後我在第四章裏所作那麼詳細的分析，纔不算白費力了。

第四章所分析的結果，與現在討論的問題，有關係之點，可以綜說如下：第一，我們要承認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所以演成今日如此之衰落，還沒有尋出一個準確的解釋來。我們對於一種病症，下診斷的時候，既有懷疑之點，自然我們對於病的結果，不能有把握的。第二，我們在這種懷疑的診斷之下，認為資本主義目前所以感到困難，多半因為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生產者的推測，大半是錯誤的，同時每個生產者的活動，又復按着這種錯誤的推測去經營，這個缺點，是非計劃制度本身所生來不可避免的。第三，還有一半原因是由於附帶產生的，並不是非計劃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就是貨幣制度之不良。

非計劃制度本身，既有生來不可避免的缺點，那麼就是因為他是生來固有的，所以其缺點，是根深蒂固，而與制度本身相終始的。我認為目前世界貿易之所以趨於衰落，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不能向前發展，多半是由於這個缺點所造成的。但是過去的貿易衰落，都還沒有使資本主義趨於滅亡。這個病人，隔不多時，就要生病，可是隔不多時，又可以恢復健康。

這個自然並不是說，這次衰落的病象，一定還可以恢復過來。但是這個是表示，這次病症，假使好好的醫治，並不至於使這個體質向好的病人，一病不起。尤其是我們要把過去的情形，回顧一下。我們認為這次資本主義衰落的復甦，乃是在他向前發展的途中，遭遇挫折，而不是在他衰退的途中，遭受挫折。在每一次衰落的間隔期中，產量的水準，都有顯著的加增，人民的生活程度，也有同樣的加高。假使我們不相信戰後的英國，是這樣子的，我們請接

頭看看美國，就可以證明了！資本主義，在美國是最發達的，他們曾經過幾次大衰落，尤其以一九〇七年，及這次從一九二九年以來的大衰落，為最甚。但是把美國經濟歷史，拉長看一看，我們絕對不相信，美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在他們的制度之下，是日趨於低落，事實證明給我們看，他們的制度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因為受了幾個缺點的影响，暫時停滯罷了。

所以我們認為，前此的衰落，是有復興的可能，假使這次也有同樣的完備條件，再行復興，也是可能的。一個人的閱歷，是很短促的，一個人的經驗，是很有限的，年青的社會主義者，很難叫他們相信，否極泰來，是可能的。因為這種事情，在他們生命期中，還沒遇見過。但是過去的事實，確實沒有不是這樣子的。就是在事態嚴重，達於極點的時候，也是有恢復的可能。過去復興的途徑，他們約略有一些認識，其經過情形，大概是這樣的：企業者各自彼此不相關顧，其結果貨物充斥，不能獲得有利的價格，到了最後，貨物雖然可以脫售，不過喪了膽的破產生產者，已經不敢再行生產了！因為市場上供給量，若是少一點，還可以有一些購買者，可以出到企業者所索取的價錢。在這時候，貨幣政策的力量，對於貿易盛衰的影響，甚為重大。因為貿易的衰落，經過一個長時期之後，我們一定可以發現貿易之所以衰落，乃是因為尋不到人去購買。但是有兩件事，可以使購買者增加其購買力，第一、想法子叫購買者花費他們從前沒有花費，所留下的錢。第二、要有較充足的錢，讓購買者去消費。

在這情勢轉移的關頭，貨幣當局，對於第二點，非常注視。他們認為其可能性很大。他們很著意於增加購買者購買力的週轉量。於是他們發明了一個名詞，叫作回漲（Reflation）來實現他們的辦法。其實回漲這個名詞，就

是通貨膨脹的變相。通貨膨脹，是他們本來所認為一種罪惡，他們現在想盡法子，去說明人民是如何的需要較多的貨幣量。假使有人在這時候，認為企業家應當向貨幣當局，實行借貸，他們是最歡迎不過的。在這時候，企業家也漸漸把他們過去推測錯誤的失敗，忘記了，又從新開始他們的新推測，同時現在資本既可以很便宜的借到手，那麼他們認為企業又有利可圖，如果他們的推測，果然有些是對了，那麼過去已經喪膽的人，也就隨之開始活動了！新企業也就恢復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工人的工資，也增加了！工人的購買力，也充足了！企業界就更進一步的興盛起來了！

換而言之，假使有一個很適當的貨幣政策，資本主義制度，是具有渡過暫時難關的可能的。這種暫時難關，乃是企業家各自為政，不相兼顧所產生的結果。由此觀之，目前世界經濟的難關，為什麼不可以同過去的歷史，同樣的渡過呢。

從根本上看來，我認為是可以渡過的。這次的衰落，固然是空前的嚴重，但是其所以如此嚴重，一半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日益提高，日益複雜，於是推測錯誤的機會，亦隨之愈多，其程度亦愈深。還有一半是因為補救的方法，太不得當，所以其衰落程度，愈益加深，其衰落時間，愈益延長。這個不得當的補救方法，固總還不至於使資本主義，趨於滅亡，但是一個病人，要不斷的給他毒藥吃，他的病，是不會轉好的。

假使補救的方法，可以與過去在大戰以前，所用的方法，一樣的靈巧，那麼在一個基本經濟條件完備的國家，恢復繁榮的機會，是很有希望的。所謂基本經濟的條件，是指富有智巧力，及適應環境能力的人民，與富有近代企

業所需要的資源而言。假使我們認為近代經濟組織，所以日趨於精巧，日趨於複雜，乃是因為分工之日趨於專門，那麼我們同時也要認為，我們要想對於近代企業，完全認識，善於駕馭，其所需要的力量，也一定要比從前為多。我已經說過，假使我們能夠籌劃出來一個良好的貨幣制度，目前的困難，可以解決一大半。我覺得要造成良好的制度，並不是人類智力所辦不到的。社會主義者，請不要忘記，資本主義企業的恢復，乃是世界上各種階級，億萬生民所熱望的（除蘇俄外）。這種的恢復，並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並不是人們所認為不需要費力去實現的。假使不能實現，乃是因為謀恢復之道，沒有盡其能事，其原因不是因為人們的智力太差，沒有把整個的問題看得透澈，就是因為人類的心眼太窄，對於補救之道，大家懷着互相推諉之心，而終於無人出頭補救。關於這一點，大家現正集中視線，在觀察美國在今後數年內的發展情形。美國是近代國家中基本經濟條件最具備的一個國家。美國的輿論，是很贊成貨幣擴張政策的。同時美國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人，也比較的少。我不相信以美國人民之奮發有為，得天獨厚，他們不能與過去一樣，達到渡過難關，恢復貿易的境地。

六 資本主義之崩潰與今後之繁榮問題

以上所說的，一方面是關於共產革命的前途，一方面是關於資本主義繁榮之恢復。說了這許多，都是對於每個國家的前途，予以個別討論，好像他們是各不相關的。尤其對於國際間的糾紛，如關稅政策，戰債問題，賠款問題，等等，我都沒有提到，這種種問題，在一般人腦海中，認為是造成目前資本主義社會啼笑皆非的悲劇的主要原因。

我所以沒提到以上這幾個問題，其理由有二：第一，我不相信目前經濟的難關，是像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是以政治上糾紛，爲其主要原因，是要以政治上糾紛，來做替罪之羊。政治上糾紛，是應當歸罪於政客們的。假使我在第三章裏分析的各點，是對的，我認爲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崩潰，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在制度的本身結構上，尋求之。其制度本身不良之點，遠在大戰以前，就發現了！其禍根，遠在我們這一時代的人，還沒有入世之前，就種下了！過去的衰落，與目前的衰落，是有相同之點，這一點，我們不要把他忽視了！許多人因爲厭惡這個時代政策的不良，而往往忽視了這點。

凡認爲目前經濟的難關，其主要原因，是因爲大戰發生，及大戰後戰債與賠款的問題，那麼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這種觀念的不正確。我們知道，目前經濟上各種困難，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的末期纔開始發現。在一九二九年以前的五年中，世界上各國家，如歐洲各主要國家，及美國等等，大部分莫不享受到財富增加的好處，這種情形，較之過去資本主義之成功，實在勝過多多。英國似乎是沒有別逢其盛，大半是因爲英國人民認爲，凡是應當由英國賣給人家的東西，英國人民不應當向別人去買。自從戰後貿易短時期的大繁榮，結束以後，英國的企業，總是在適應人家需要的狀態中，人家的需要，是變換不定的，是沒有法子在前預告的，所以英國的企業，總是在推測錯誤的狀態中。

假使無聊的大戰，及戰後各種金融的糾紛，是造成目前經濟衰落的原因，那麼我們就不相信，爲什麼其惡果成熟得這麼慢，我們尤其不明白，爲什麼以美國所受大戰，及戰後各種經濟問題的影響，比較的少，而其貿易的衰

落，反而特別利害。根據數目字來說，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各國欠美國的債務，到期應當償還的，僅有二一四，八〇七，〇〇〇金元，折合四千四百萬英鎊。在同時間，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美國的進口總值，達八九一·四萬英鎊，出口值，達一，〇五九·六萬英鎊。以上面這幾個數目字看來，並不足以表現當時美國市場，有貨物充斥之虞。同時美國銀行界，也不見得有因債務的收回，而發生現金過剩的現象。事實上各國在戰後流入美國市場的貨物，或現金，以供償付債務的數量，其增加並不見得十分猛烈。假使美國經濟制度，是在良好狀態之下，他很容易把輸進的貨物，消納了，而不至發生消化不良的病象。唯獨德國，可以說其經濟崩潰的原因，是由於償付債務的結果。根據道爾斯計劃，德國每年要付給債權者的數目，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是五千萬英鎊，到一九二九年，是要增加到一萬二千五百萬英鎊的最高額。這個數目字，實在可觀。德國在一九二九年出口總值，是六五九·九百萬英鎊，根據道爾斯計劃，在一九二九年德國的債務，是要占他出口總值五分之一，但是雖然如此，我還不相信在良好的狀態下，德國會沒法子付清他的債務。

這些戰後的金融糾紛，並不是引起目前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其第二個理由，就是這些金融糾紛的危機，乃是在經濟衰落已經發現之後，纔表現出來，而不是表現在他之前。我在第三章裏，已經提到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離心力的力量，是永遠存在着的，是永遠會使私人或某團體的利益，與全社會整個的利益相衝突。我們還要知道，這個離心力的力量，是要影響到國界以外的。比方說，我為保護英國製鞋商的利益起見，我應當以最高的價格，去向英國製鞋商，購買手工最好的鞋；同時全英國的製鞋商，都聯合起來，要我去買價貴的英國鞋，而不要去買價

賤的捷克鞋。這個就是關稅制度，與限制進口制度之所以造成的主要原因。所以假使我們每個人都認為我們的關稅制度，應當用科學方法，加以規定，以資輔助我們工業的發展，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表現全世界各國的關稅制度，莫不是受利害互相衝突這一個要素的支配。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國際間貿易的數量，算是鉅量的增加了！可是同時各國關稅制度之複雜，也隨之加增。在名義上看來，各國關稅制度，都有他們正大光明的理由，以自圓其說。所謂經濟自給，維持工業與農業之平衡發展，補助幼稚工業等等，其實這些關稅制度，在骨子裏，乃是表現那些屠戶，麵包商人，及做燭臺商人等等的成功。他們這些人，時常向他們政府表示，部分的利益，是如何比整個的利益為重要。從經濟的立場看來，這些關稅制度，實在是多餘無謂，假使我們眼光，望深裏看，其多餘無謂之程度，無過於關稅壁壘之足以阻礙國際間貿易的發展。但是關稅制度，與關稅壁壘，是一個永遠存在的事實，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最健全的時候，也還是要存在着。甚至戰後新興的國家，也要極力的表示，他們後起之秀，並不示弱於老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國際聯盟迫於不得已，不得不於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召集一個毫無結果的世界經濟會議，在這個會議裏，所有保護關稅國家的代表，都爭先說了許多自由貿易的空話。

在經濟衰落時期開始之後幾年中，經濟國家主義，可以說是達了瘋狂的時代。在這個時期中，大家都為入超的現象憂愁。英國、德國、美國及其他各國，絕對的認為恢復繁榮的唯一道路，是在大家應當都買自己國家的貨物，不許購買別人所製造的貨物。同時在這時期中，不但關稅增高，像一九三〇年的英國那樣；並且大家還想種種法

子，只許賣出貨物，而不許買進貨物，前此課以高稅的進口貨，現在改爲完全禁止其進口了！政府不但不許外國貨在國內市場存在，以免人民去購買他，並且還禁止銀行使用外國貨幣，以免人民用這個外國貨幣，去付在國外所購買的貨物。如其有一個國家，表示寬宏大量，肯接受別個國家的貨物，那麼他一定要附帶一個條件，就是出賣貨物的國家，一定要向接受貨物的國家，購回一定數量的貨物，以資報答其讓步之大量。比如在最近英國與丹麥所定的貿易協約內，丹麥答應英國在他們所用的煤量中，應當百分之八十，向英國購進，不要再向德國，或荷蘭去訂購。

這種種不良的現象，固然不能算是引起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因爲他是發生在危機既見之後。但是這些現象，是與恢復繁榮，極有妨礙的。非計劃經濟制度，要想恢復繁榮，一定要對離心力的現象，加以制止。我們自己應當先去冒險，去做大家所公認爲好的事情，而後別的人，也就同樣的隨着我們冒險去做。如若不然，我們認爲現在的情勢，已經不對了，糾正的方法，是要把上面的政策，顛倒一下，就是說去鼓勵人工作要少，營利要多，那麼繁榮的恢復，是絕對的無望了！這種私人圖謀個人利益的現象，擴而推及國與國的關係，正是一樣。所以我們認爲資本主義復興的機會，完全要看國際之間，是否肯放棄爲個人謀利益的政策，復興之程度，即恃其放棄的程度以爲衡。我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當作例外看待，假使個個人都以例外自視，那麼這個例外，就變成全體了！不過大家肯不肯放棄爲個人圖謀利益的政策，還要看大家的心理，是否可以恢復到資本主義全盛時代，鼓舞歡欣的心理，那種心理，與資本主義的成功，實有莫大關係。

處目前狀態之下，這種心理，可以說是完全消滅了！大家都認為大家愈工作，大家愈貧窮，這種心理之普遍，實前此所未有。緊縮市場的信念，在政治家，工人心中，與在企業家心中，是具有同樣的堅信。全世界的人莫不大大事鼓吹近代生產能力增長的迅速。有人認為一輛汽車，在一九一三年，要化人工一二六〇小時去製造，到了一九二五年，只要花二二〇小時。美國一個製硬領的工廠，每年就可以供給全美國人三個硬領，大家都認為我們的前途，非歸於崩潰不可。按照過去經驗，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我們盡量使用有效的，與迅速的生產方法，以減低出口的價格，以供給人民的需要，生怕物品的供給，不能與人口的增加率，相適應。這種經驗，我們現在全忘記了！按照從前的說法，每個人自己的生產，就是替別人的生產，製造銷路，物價的降低，乃是為機器生產，謀出路，現在這一類話，也不見有人再提起了！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一世紀以前，生產力無限量的增加，其所造成當時的現象，恐怕也正與今日機器生產，造成今日之現象一樣的糟。所以我們若用比較的眼光去看，銷路市場問題，在我們祖宗時代，所感到的困難，恐怕是與在我們現在的時代一樣的，不容易解決。市場問題，望遠裏看，是要由他自己去解決，並不能永遠都是順利的，乃是要時作時輟，零零碎碎去解決，其中總不免要碰到過剩現象的阻礙。目前的狀況，就是其例。市場問題，所以能由他自己去解決，乃是因為人們總是相信，我們越工作，越可以使大家趨富，這種信念，無論如何，總比所謂愈工作大家愈趨窮的觀念強。所以消費的力量，到了最後，總可以與生產的力量，同肩並進。除非處目前這種意外狀況之下，賣者與買者在價格上，不能相融合，貨物的交易，只好暫時宣告停滯。

所以照這樣看來，假使大家在政策上，在輿論上，仍然為離心力的力量張目，仍然使他繼續的危言非計劃經

濟制度的發展，那麼目前經濟的衰落，要想恢復繁榮，就要無限期的延期了！就是其他情勢轉好，繁榮亦無希望。假是每個國家，仍舊繼續把別的國家的財貨，當着傳染的瘟疫看待，仍用關稅壁壘，及阻止入口的方法，把別的國家的貨物，隔離起來，那麼非計劃經濟制度雖然本來存有復原繁榮的力量，也要被他們搗殘無餘了！就是在基本經濟條件具備的美國，他們雖然最近頗有開始復興的趨向，恐怕也要被這個不良的經濟政策，打銷了！美國現在正在聯合全國僱主，實行一種工少資多的運動，我想這一劑補藥，美國社會，雖然強壯，也許未必能夠容消。

並且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縱使在幾個非計劃經濟國家中，其企業有復興的希望，但是假使經濟科學本身，與經濟科學的藝術，不能有充分的進步，不能把目前經濟制度上幾個缺點，加以糾正，我恐怕他們將來復趨於崩潰的危險，還是避不了的。我在前面已經提過，這種糾正，是必需的，並且是可能的。比方說，富有研究精神，與富有企業經驗的人，很可以把現在的貨幣制度，加以改正。我們要具有歷史的眼光，我們要記得在沒有開始用紙幣以前，我們付一筆款，無論是多或少，我們是要用天秤來衡量的，我們不相信我們現在的貨幣制度，不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改善。後此之人，難道不會在我們已有的智慧之外，再加一些新智慧嗎？但是就目前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目前的智識有限，目前非計劃經濟所演成啼笑皆非的悲劇，是咎有應得的。

七 蘇俄經濟制度前途之推測

世界經濟之前途，除去以上所陳各點外，還有許多別的問題，要注意到的。不過最足以駭人聽聞的問題，就是

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戰爭問題。假使蘇俄的社會革命，與經濟革命，要在別的國家，重演一遍，我想只有那些不顧人類個人幸福的人，所能安然忍受的。他們這些不顧個人幸福的人，具有偉大的抱負，願意忍心隱痛，替那些廣大男女的民衆着想，改造整個的社會，爲那些民衆的生活求解脫。

假使我們不願意這種革命重演，我們是否可以從目前蘇俄的社會經濟制度中，或者其他非共產國家制度中，造成一個極有效率的經濟制度，樹立一個很公允的，合乎人道主義的社會制度？我認爲就蘇俄而言，其前途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假使他們肯決心不放棄目前這個機會，去創造一個公允的社會制度。現在他們正在進行的計劃經濟制度，其潛勢力是很大的。假使他們能運用得法，我認爲是很可以避免非計劃經濟制度所遭遇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難，慘劇。我與認爲假使我們以爲所謂經濟效率，其標準是不可捉摸的，那麼我們要想達到有效率的經濟制度，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想法子避免平常人所認爲不經濟，而沒有效率的現象發生。一個有計劃的經濟制度，對於人類財力，雖然不能擔保其能最經濟的使用，但是比起非計劃經濟制度，至少總可以替人力財力，找到比較相當的用處，可以使那些依賴使用這些人力財力爲生的人，得到相當滿足。

誠欲完全實現蘇俄的經濟制度，自然還要經過許久的時間。蘇俄實行計劃經濟所具的唯一良好條件，就是富源種類多，而豐富。不過蘇俄還缺乏兩個其他很重要的條件，就是具有工業技術的人民，與具有行政管理才幹的人民。就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而論，除一二種工業以外，蘇俄的工業，還是不能與幾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在這幾年中，蘇俄雖然非常的努力，想把他們的電力，從一一·二五萬萬基羅活特小時增加到四二·五萬

萬，但是他還是趕不上德國的六〇·五萬萬基羅活特。我們知道，電力的發展，是蘇俄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計劃，列寧的口號是：『社會主義等於蘇維埃的力量，加上電汽的力量。』誠然蘇俄有他很大的理想，假使他們要造一個汽車工廠，或是一個煉鋼廠，他們總要想造成一個世界最大的工廠。但是這些巨大的工廠，所需要的數目很多，絕不是在一天之內，就可以超越那些工業先進的國家，所已有的大工廠之上。蘇俄的計劃經濟，要想將其偉大性，在事實上表現出來，還需要許多的時間。我認爲就是蘇俄第二次五年計劃宣告成功，他也不能把人民生活程度，提高達到像一九二八年的德國那樣，姑且不必比一九二八年的美國。不過在蘇俄這種國家基礎之上，實行計劃經濟，其所能產生的結果，也只能達到現在這樣。我們絕不能將他們所得的結果，來與這個制度本身的可能性，混爲一談。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對於計劃經濟制度的前途，是可以樂觀的。我們深信就工業而言，蘇俄絕對是要在計劃制度上，求得盡量的發展。就過去幾年的事實來看，我們不敢說蘇俄在農業方面，也能產生出來一個與工商業同樣的制度。不過在工商業方面，私有制度，確是沒有恢復的可能了！就是蘇俄制度爲外力所推翻，恐怕這個恢復，也是不會發現的。以外還可以斷言的，就是假使蘇俄果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程度，享受這個利益的人，一定是大多數的民衆。

說到這裏，我們要問，我們對於蘇俄的社會政治制度，（蘇俄人民認爲這是整個共產制度的主要部分）是否也能有同樣肯定的推測。關於這一點，我覺得有幾個不可確定的條件，我們要顧到的。這個問題，多半要看蘇俄政府當局的動向如何，並且要看他們認爲那一種制度，是合乎他們的理想。蘇俄要想以整個推翻資本主義社會

的社會階級，以保持他們目前的社會，結果是很難辦到的。除非在事實上，有那種需要，或者需要實行一種社會的專制 (Social tyranny)，大家認為應當由多數人來統制少數人，比由少數人統制多數人好。蘇俄現在的社會制度，尤其令人憎惡的，就是一個人往往因為社會身分不同的關係，而要公然受極大的污辱，遇到訴訟情事的發生，這個問題，就發現了。被告者往往因為社會身分的不同，而要被判下獄，或者處以極刑，或者連累到他的兒女，不許他的兒女，有受教育的機會，不管他們的智能是怎樣的。凡知道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破船案件被告如何受原告的虐待，及蘇俄法庭對於被告的社會身分，是要如何詳細的盤問，我們就知道這種推翻社會階級的現象，在蘇俄現在還是完全存在着。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種現象，要永遠的繼續下去。這種現象，並不是計劃經濟制度所必需的條件，這不是革命的遺產而已。假使我們認為，在計劃經濟制度開始的初期，非有這種社會制度，來扶持他，計劃制度不能長大；那麼我們也應當同樣的認為，總有一天，計劃經濟，應當脫離這種制度的襁褓，而自謀生存。所謂剷除資產階級，乃是包括所有商人，工業家，教授，科學家，資產階級各份子而言。布爾雪維克黨人，已深感覺得剷除了這些人，無異於剷除了許多有才幹，有技術的人，這些人在社會上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現在蘇俄當局，為經濟上的需要起見，對於那些有智識，有能力的人，已不得不給予經濟的特殊利益。就是在革命初期，他們也已曾用過從前在帝俄時代充任軍官的人，來指揮革命時候的軍隊。但是他們還是盡量不讓這些資產階級份子，負特別重要的位置，或是享有經濟的優先權利，以期避免他們在社會上占勢力。農工稽查委員會的代表，還是繼續不斷的，到處施行偵

探工作。共產黨的忠實同志，還是隨時在那裏監視帝俄時代的官吏們的行動。凡任命一個重要的職員，還是要注重他在黨務方面的功績。這種種情形，還是表示布爾雪維克黨人，仍然對非共產階級的人們說，你們還應當忍痛受苦。

這種種現象，所以到今日，還是存在，其中有二種原因。第一，蘇俄當局，恐怕不贊成新社會制度的人，實行同盟罷工，但是這種危險，現在雖然不能完全消滅，其可能性是一天比一天的減少，因為在舊日社會占有勢力的人，其數目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減少了！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一種心理狀態，在裏邊作祟。這種心裏狀態，不幸是相關連的。一方面是仇恨與戒懼，另一方面是熱心社會（Social enthusiasm）的心理。蘇俄當局認為農工偵探的存在，對於社會很有益處，可以利用他們去激勵人們擁護計劃的熱心，這一點，恐怕是蘇俄社會最重視的一點。但是我認為農工偵探之需要，還可以用別的方法，來代替，大可以不必把某一個社會階級所有的份子，不顧好壞的，整個消滅了！並且我們還知道，一旦計劃經濟，果然真正表現他的效力，農工偵探就不會覺得需要了！唯其計劃經濟失敗了，而後共產黨纔需要實行消除資產階級，地主等等，以卸脫他們自己失敗的責任。

除以上兩個理由以外，我認為目前的蘇俄社會制度，並不需要這麼嚴厲冷酷，除非他們認為他們非要這樣嚴厲不可。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他們已有放鬆的趨勢，據曼達斯（Manrice Hindus）說，許多帝俄時代的商人，現在已經恢復他們的公民資格了！許多智識份子，也漸漸在社會出頭了！但是蘇俄社會制度，要想不讓人認為他是暴厲的，與不公允的，那麼最要緊之點，就是在他完全取消剝別人民在社會上所隸屬的階級的辦法。政府對於人

民的職業，固然需要一個詳細的調查，但是這種調查，並不需要將這些人的職業，用武斷的方法，來甄別他們所屬的階級。要想把這種社會階級間的隔離除去，一定要將他們加於布爾喬亞的束縛，尤其是加於布爾喬亞的兒女們的束縛，解除去而後可。

八 社會平等問題

假使這件事情，能辦得到，蘇俄的社會結構；或者可以有如下列的發展。各種職業收入之不同，仍然存在，但是收入多的人，一定是負責任較重，專門技能較富的人。經理的薪水，可以比他的屬員多，專家的薪水，可以比他的助理多。那麼決定薪水的標準，就可以與資本主義社會，大致相同，但是職業團體之間，彼此收入不同的程度，就可以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減少了！其理由有兩點，在上面已經提過了。第一，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凡是營業成功，或經營金融事業所得的盈利，不是歸私人所有。所以位置就是很高的人，也不能有獲得很高收入的奢望。第二，教育機會均等，可以減少職業的獨占性。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往往因為某種職業，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於是有的人，就及受那種訓練，而那種職業，就為某種人所獨占了！我固然承認人類辦事的能力，就一般人的標準而論，尚是很低，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真正辦得很好的人，還是很少；但是我相信，社會上可以擔任較難工作，與責任較重的人的數目，一定比較在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制度下為多。頭等的醫生，頭等的工程師，固然很少，但是就普通而論，假使一般男女青年，都給他們受必需的訓練的機會，一定可以造成許多可以擔任普通醫師，和普通工程師的人。現在因為

職業獨占的結果，有許多醫師，工程師的薪水，實在是太高了！

收入的不同，會引起生活方式，及生活趣味的不同，其方式與趣味相同者，就會互相彼此往來。根據這種理論，加以推測，假使我們採用了西方國家規定收入標準的原則，那麼其結果，不是也要產生西方國家那種的社會結構呢？白硬領階級的人，又要看不起沒有帶硬領的人了！文人階級，又要看不起做手工的工頭了！更重要的，就是那些低階級的人，是不是又要仰高階級人的鼻息了！低階級的人，對他們說話的時候，是不是又要特別表示恭敬，在社交的場合裏，又要自動退出，不能同那高階級的人，在一塊兒往來。

照這樣看來，社會階級，頗有重新實現的危險。爲鄭重起見，我們要將收入的差別，與由於收入的差別而發生社會階級的差別，兩者不同的地方，加以詳細說明。收入高的人，必需具有特殊的智識，或者特殊能力，其智識與能力，必需與其收入相稱合，其所成就的事情，與別人所作的，事情，相比較，也必需與其收入相稱。照這樣看來，具有特殊才幹的人，給予高的報酬，在原則上並不是表示收入高的人，可以有自己自命，乃至於爲別人所認爲，他是比人高出一等的權利。至於階級的分別，乃是將人類加以假定的甄別，用以比較估計每個人的價值，是毫無根據與毫無理由的。一個聰明的僮僕，和一個呆子相比，一個身體強壯的人，與一個思想遲鈍的人相比，他們個人的價值，到底有什麼普通的標準，來估計呢？我們終久要承認，人到底是一個人，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是一樣。比方說，在社會上發生緊急事變的時候，或是火災，或是破船，我們絕不顧到階級的觀念，對於遇災的人，加以甄別，而後再去施行營救！

這種才能優越，與階級分歧的不同，往往爲一般人所混淆。一個人因爲他是聰明的工程師，所以他有錢，因爲他有錢，所以他有房子，有洗澡房，每天可以洗澡，每天晚上有好飯吃，他可以隨時出國旅行，隨時買書看，不必向圖書館去借。因爲他生活的優美，洗澡、吃飯、讀書，他可以成爲一個很漂亮的人。許多人往往以爲這種幸福，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由於機會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認爲凡享有這種種幸福的人，應當享受優遇，應當受人尊敬，殊不知這只不過是我們得天獨厚而已。假使我們把這種應當受人優遇的觀念，加在別人身上，無形中就是表示貧窮的人，應當對於富有的人，表示尊敬，以爲這是人類天生的本能。所以一旦收入的差別實現之後，自然而然本來大家因爲生活方式，與趣味的不同，分別形成許多不相同的團體，但是結果會造成不自然的階級分別了！

因爲這種原故，所以有許多人認爲，就是一旦蘇俄放鬆了對於資產階級的壓迫，他還不輕易放棄農工稽查委員會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實行，固然有礙於經濟效率；因爲農工稽查，以普通人民的資格，去干與專門家專門的事業，一百件事之中，有九十九件，是他們所完全不懂的。但是有人認爲這種犧牲經濟效率的代價，是值得的。因爲唯其實行這種辦法，纔可免階級觀念的產生。凡是那些慣於指揮別人的人，或是自己本來擁有資產的人，如擁有農田、礦產、工廠等等，一定要想法子提醒他們，使他們知道，他們並沒有什麼比別人不同的地方。提醒的方法，莫過於實行農工稽查制度。同時實行這種制度，可以使那些做低等工作的人，能有機會，與那些負重大責任，與工作較爲細巧的人，混在一塊，以免間隔。換而言之，這個制度，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使大家知道大家都是同樣的，沒有人能自命比別人爲優越。並且等到無產階級人民教育程度提高之後，這個制度，妨礙經濟效率的程度，一定可以慢

慢減少。普通人民教育程度愈提高，他們愈知道尊重專家們的事業，他們在技術上所作無價值的批評，也就減少了！他們對於人事問題的看法，也就同別人有同樣的眼光了！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心目中所注意的事情，就不是中央銀行的政策如何，集合農場的收穫如何，而是注意到個人的行為問題。這個個人的行為，一方面是指自大虛驕的人的行為，一方面是指那些俯首從命於別的人的行為。這兩種行為，是社會階級觀念所以產生的內在力量！

我心中所理想的社會結構，並不與蘇俄所理想的完全相同，並不是完全無階級平等的。不過與他們的理想頗為接近。在經濟方面，總可以達到蘇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口號。我不否認我這個理想，假使運用不得法，會有重新產生階級區別的危險；但是我以為其發生的可能性，總可以相當的減少。我對於那些熱望完全平等的理想的人，願意貢獻下列意見；我認為像我所主張，有限制的平等，至少有他的正當理由在。我以為凡是反對經濟社會平等的人，其最大理由，是認為人類生來就不平等的，並且永遠不會平等的，但是人在外貌上，或是智力測驗上，其所不同的程度，是有限的。其所不同的程度，絕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當領袖的人，與當小工的人，在收入上相差程度那樣利害。在一羣的成人當中，某甲的高度，或者比某乙高出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某甲的智識測驗份數，或者比某乙高出一倍，但是同是人類，其不同的程度，絕沒有相差一百倍或是一千倍。假使人們收入不同的程度，也與人們外貌不同的程度一樣，那麼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過於懸殊的現象，一定可以消滅了！在那種情形之下，社會上雖然不能顯出一種絕對平等的現象，不過去平等的理想不遠矣。

我以為為維持一個大而複雜的社會的安定穩固起見，像這種有有限制的平等，是一個必需的條件。我雖然

不願意武斷的，或者無理由的，不主張理想的完全平等。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個原則，就是平等不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假使要勉強的維持平等，恐怕是任何人類的社會所辦不到的。我們要注意，假使我們在經濟上，要勉強維持社會的平等，那麼在這不平等的天秤上，勢必至於使弱者、不幸者、無能者、乃至於怠惰者，都占了便宜。弱者與不幸者之占便宜，也許可以原諒，假使無能者與怠惰者，也占了便宜，恐怕文化的進步，是無望了。

九 政治制度問題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蘇俄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現在再討論到蘇俄的政治制度，我們很擔心恩格斯與列寧所主張廢止國家的理想，是否要變成一場好夢而已。我們承認，在非共產主義社會裏，國家的任務，多半只不過是頒佈條例，執行法律，為統制階級謀利益而已。（自然近代國家的立法，並不見得都是如此。比方說，法律規定小學兒童，應當要檢查身體，公共場所的花草，不許亂折，富有危險性的工作，其工作應當有限制，諸如此類，並不見得都是為壓迫貧者之用。）我們也姑且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行為，是富有階級性的。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個理由，認為國家之所以需要，乃是為維持社會的階級而已。凡是無階級的社會，就不需要國家。這種推理，是不合乎邏輯的。列寧已經承認，就是在所有階級，都消除之後，凡反抗者，還是要施以壓迫。但是他認為到了那時候，要實行壓迫，是很容易的，可以由民衆本身自由去解決，其容易有如一羣的文明人，替打架的人勸架，或不讓一個女人，為人強姦一樣。他對於羣衆正義的心理，確是很表示尊重，但是我恐怕這種尊重，不是羣衆所能當得起的。

我們更要注意的，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發達的結果，一定要對於男女人們加添不少社會義務，這些義務，都是個人主義社會所未開過的。現在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有許多國家，產生了許多新的立法，要叫人民遵守。我相信在計劃共產社會成立之後，這個義務，一定還要大大增加。蘇俄的刑法，新發明了許多犯罪行為，如怠工罪，反革命罪等等，這些都是在資本主義法庭，見不到的。這些罪名，恐怕並不見得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時代的臨時辦法，並不見得會在理想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把他取消了！在非計劃經濟制度裏，政府對於人民，並不要求每個人在平常的時候，都要以全力從事國家的生產，這個並不是人民應盡的義務，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不需要到處派偵探，偵查人們有沒有不盡他的義務，而對於不盡這個義務者，加以懲罰。但是共產主義國家，則不然，就是在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的時候，也不興。因為共產主義需要每人各盡所能，所以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要想一個辦法，去偵察人們是否盡了這個義務。同時還要想法子去對付那些不盡這個義務的人。所以照這樣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越消除，真正共產主義越實現，則政府的組織，對於共產主義的國家，是愈需要的。因為在過度時代，人們的收入，是可以不平等的，所以政府還可以利用收入多少的差別，來引誘人們，去加緊工作。假使照蘇俄的理想共產主義的實現，要造成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那麼在那個社會裏，這種引誘的辦法，既不合用，在那時候，共產主義社會，不是更需要一個政府機關，能够發號令，對於不盡義務者，加以處罰嗎？

現在我們要問以武裝民衆，來代替法律明文的规定，這種辦法，在蘇俄已經實行到何種程度，是否已超越蘇俄理想中的程度了！我們不斷的聽見，蘇俄對於行為不好的人，加以種種非正式的侮辱方法。比如將怠惰工人的

姓名，在墨板上公佈出來，同時並將勸勉工人的姓名，用紅筆寫出來，以資比較。凡喜歡喝酒的人，他們就在壁報上用譏諷的文字，嘲笑他們，並且在他家裏門口上，貼漫罵的標語。嫖妓的人，就在報紙上把他的姓名，及照片登載出來。這種方式，很明顯的會引起假公濟私，洩報私仇的流弊。並且假使我們就承認武裝民衆的辦法，是可以維持正義的，但是羣衆們的心理，是顯不到去調查事實的真相。強姦婦女，固然是不應該的，但是一羣衆只顧到達他們的目的，也許要不問皂白，把一個強姦婦女的人，撕成兩半了！這種方法，實在不如用國家的力量，經過合法檢查的手續，來判斷是非爲愈。

十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計劃經濟制度之種種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非共產主義國家看來，比較去推測蘇俄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前途，更爲重要。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非共產主義國家，也要施行計劃經濟，或者向着計劃經濟那條路去走，我們是否可以不必經過革命階段，或者是否可以不必同時產生像蘇俄的社會制度，將來我們是否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兩個制度的中間，創出一條新的制度出來。換而言之，在蘇俄方面，他們漸漸放鬆那種嚴酷的社會組織，形成一種可以比較的與我們相接近的社會組織，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我們用計劃經濟來代替非計劃經濟，但是不用勉強的方法，把社會階級的機構，整個的推翻。考之過去歷史，國家之間，頗不乏甲國採取乙國的經驗，以供自己發展的參考，使後起的國家，可以不必重蹈前人的覆轍。蘇俄以爲他們可以在他們的歷史中，把資本主

義的階段，整個的跳過，一直從工業革命前的農業時代，跳到社會主義的第一期。我不知道我們這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要實行計劃經濟，是否可以跳過計劃經濟的第一期，而一直進入其第二期。

我想這點在事實上，是否可以辦得到，完全要看是否有人肯按照這個目標去做。我覺得我們要想在現存非計劃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樹立一個計劃制度，而同時並不整個的把社會組織推翻，在技術上，沒有何種不能避免的困難；所感困難的，祇是人的阻力。不過假使我們要認清了我們的目標，認為我們應當照着我們的目標去做，那麼就不要因為人的阻力，而灰心。因為人的唯一阻力，就是人的意志。假使我們要想成功一件事業，我們就應當想法子使人相信我們的主張，也許我們在目前所作的主張，在將來也就是別人所要主張的。

誠欲實行計劃經濟，則負責計劃者，非有控制主要生產工具之全權不可，否則有效的計劃，殊屬不可能。所謂控制的力量，不但是於執行某一個的計劃時候，有限制某種生產，與鼓勵某種生產的權利，並且還要在限制與鼓勵之外，有領有生產工具的力量。在這本書裏，我們都是姑且認定，所謂計劃經濟，乃是一種經濟制度，在他這個制度之下，所有的資源，凡是包括在這個計劃以內的，都是直接歸一個中央計劃機關管轄。所以在這種認定之下，假定有了計劃，凡材料工具之分配，與其使用的方法，應如何得與計劃相符合，我們都認為這是計劃當局分內之責任。因為計劃當局，等於人民公僕，為人民籌劃一切。在蘇俄，這種情形，是很充滿的。全國工業資源，皆歸國家公有，充任經理者，對於某種企業營業的結果，並無個人金錢之利益。計劃當局，在製定計劃的時候，胸中很有把握，他們可以很如意的，叫某個銀行，透支多少款子，給某種工業。比方說，某個煙草托拉斯，應當把他的剩餘利潤，津貼給某個

礦公司，並指定某個礦公司，應當用那筆錢，去開探 Don Basin 的新礦。他們並不要顧慮到某個銀行，要認為銀行的資金，是屬於銀行所有的，或者煙草公司的利潤，是屬於煙草公司所有的，而這些所有者有自行支配所有物之權。他們永遠有一些人專門負責按着計劃的需要，去分配資源，使資源之使用，各得其所。

生產資源，應歸國有，為實行計劃經濟的必需條件，關於這一點，將於下一章，更加詳細討論。我們現在所要繼續討論的，就是假使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果然是不可分離的，那麼現在除蘇俄以外，別的国家資本工具，還都是私有，我們要怎樣的使他變為國有呢？

我認為僅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凡應歸國有的資源，其所有權應由沒收法子收歸國有，由全國整個計劃控制之。第二，沒收後，予以償補。這兩種辦法，可以同時並用，但是無論同時並用，或是單獨應用，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別種辦法。

沒收的辦法，足以引起革命，我們已述之詳矣。蘇俄對於這兩種方法的利害，並不加以比較，他們簡直就採取強制執行的辦法，將私有財產領主所有的財產，強制用貨車載走。這種辦法，是蘇俄國家所准許的。我在列賓格勒一個兒童劇院裏，看見在一齣戲的末了，有幾個青年，在戲臺的前面，用貨車拉走一個惡棍。據譯者的解釋，這是革命的老習慣。但是我們要知道，凡是財產被強制沒收的人，他一定要想法子強制收復他的財產。所以沒收的辦法，不但需要革命，並且還需要建樹一個像蘇俄在革命後那種社會政治制度，想法子使那些財產被沒收的人，及他們的兒女，永遠居於被壓迫不能出頭的地位。

所以假使我們要想在我們這種國家，不用革命的方法，不推翻社會階級，來實行計劃經濟，我們還要回到正宗的辦法上去，就是用償補的辦法，對於所有者，不用沒收的方法，而用收買的辦法。換而言之，凡現在擁有企業債券的人，就是將來國有企業的債權者。國家用收買的法子，把所有權收買回去。債權者的利息，無論他們是執有優先債權，或是普通債權，都按着一定的利率來計算。可是這些債權者，對於企業的管理，無權過問，同時各等持券人所得的償報，也不是一律的。凡是在私有企業制度下提取利潤較多的人，其所得的償報，自然比那些利潤有限的人多。所有資本，凡是借給國有企業的，都有一定的利率。以上這種辦法，我們希望規定一定的年限，加以實行。換而言之，就是分期按年付收買之費，以幾年為限。此外為進行便利起見，還需要請各企業舊有的董事和經理，加入將來的國有企業組織中，使他們擔任原有的職務，並有僱員，供他們的調遣。不過個人的利潤，則完全沒有了。即使有之，其數目亦非常有限。這種收買的辦法，可以倫敦旅行社併為國營，供做極好的楷模。

至於這個辦法，是否能夠大規模的實行，那就要看人們對於實行這種辦法的熱心程度如何。這點我已經提過，不知現下這種熱心的程度，是否已經普遍化，或者已有普遍化的趨勢。

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所有權，應當歸移國有，但是多半都反對用收買的辦法，而贊成用革命沒收的方式。據我印象，覺得企業界中人，頗有一些負技術與行政的人，厭惡以贏利為企業的目的，很願意自己能夠處於國家公僕的地位。但是這些人對於社會主義的擁護，還不足以使社會主義的方案實現。因為目前大家都把社會主義與階級的觀念，混為一談，他們對於共產社會主義的階級觀念，都存着厭惡之心。

所以在這個時候，英國工黨放棄狹窄的階級觀念，擴大工人階級的範圍，凡是用手和用心工作的人，統稱之爲工人階級，我想他們一定免不了許多困難。這個問題，永遠要受界限勢力的掣肘。在新肉剛剛發現的時候，舊皮不能完全把他脫去，不過同時新肉與舊皮，又是根本不能兩立的。用社會控制的力量，實行計劃經濟，智識份子與技術專家，莫不共同表示贊成，同時他們這個階級的人，在任何企業裏，都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們要贊成計劃經濟，其實現的可能性，實在很大。但是這些人並非工人階級裏邊產生出來，所以工黨對於這些人，要想同工人階級同樣不分輕重看待，是不可能的。

因爲薪水較優的人，（並非就所有薪水階級的人而言）多半不是與普通工人，屬於同一個社會階級。他們所結合的團體，多半是收入相差不多的人。工黨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發現一個充任工場的經理，一年薪水有一千五百鎊，同一個每星期僅有三鎊收入的技師，可以屬於同一個階級，而不同一個做投資事業，一月有一二千元收入的人屬於同一個階級。因爲經理與技師，都是受別人的僱用，他們隨時覺得有被解僱失業的危險。一個投資者，則不然，假使其投資安穩，則永遠可以有固定收入。不過薪水較優的人，爲避免他們隨時有失業的危險起見，他們有一個保障的辦法，這個辦法是靠工資爲收入的工人所沒有的。就是他們可以同僱主訂立一月、一季、或一年的契約，他們的薪水，並不是以日或以時計算，所以他們的地位，並不像工人那樣，可以隨時因僱主個人的感情衝動而動搖，或爲工頭所開除。除此之外，薪水較高的人，還可以時常注意機會，用聰明投資的方法，來增加他們的收入。所以收入越高的人，則越難分別其爲受僱者，或爲所有者。最後還有最要緊的一點，就是以一個充任經理，去請技

師吃茶點，或是玩哥而夫球，在普通習慣上，是很平常的，並沒有什麼禮節的拘束，但是以一個充任技師者，要想同經理的女兒接吻，那就認為大不敬了。所謂階級懸殊的真相，就是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出來。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子的，假使我們的目的，是要強制的使強者讓位，那麼我們對於階級鬭爭，只有加以赤裸地宣傳。凡是擁護這個鬭爭的人，就不要去同布爾喬亞階級的人，或薪水階級的人，去賣弄風情。假使不是這樣，我們的目的，是要利用社會的力量，來建立一個計劃經濟制度，而不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社會組織的辦法，那麼我們的宣傳功夫，就要轉移方向望着這一方面去進行，至少對於階級鬭爭的動機，要放棄。我們要想達到目的，應當向技術專家，行政專家的園地中，尋找出路，因為要想實行計劃經濟，應當充分的與這些人合作。

此外要想實行社會主義化的計劃，還有一件比較更困難的問題，就是同大企業家，尤其執企業牛耳的巨頭合作。這些企業家，雖然也是屬於大薪水階級的一份子，但是他們這些人，在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地位，當然遠不如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了！他們在資本主義下，既可以當富翁，又可以執企業的牛耳；在大規模國營企業之下，這些人可以有充任大企業公司經理的希望，可以滿足他們掌權的慾望，有施行大規模計劃的可能，但是他們一旦佔居了計劃經濟的重要位置，他們就要永遠放棄從前那種意外收入的機會。這個意外的收入，是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下最能動人的利益。

所以根據這個理由，不主張用革命方式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病象，應當任他繼續延久加重，因為從前那些獨資自營的資本家，一年可有三萬、五萬、十萬的收入，現在所以甘心處於公僕的地位，減少收

入，一年只有一萬，或二萬，乃是因為他們希望從前的黃金時代，可以從新恢復。所以假使目前經濟的衰落，越持久，則其嚴重性越大，則非計劃經濟制度的弱點，越顯著，則這些企業家，越容易使他們對於計劃經濟的好處，加以考慮。也許他們會覺得將來他們在計劃經濟制度上所處的地位，可以不至於如現在這樣的不穩。

私有的資產，移歸國有，除以上用沒收與收買兩種方法辦理外，還可以用別的方法，加以補充。我們要牢記在心，企業的組織，變化迅速，尤以今日較前此為甚。今日所認為重要之企業，非昨日所認為重要者，亦非明日所認為重要者。所以假使我們有遠大的眼光，能看到將來的大企業，一定要歸由國營，那麼我們現在就應當向計劃經濟制度的路上去走。但是所有的新興事業，都要經過一個極端冒險的時期，國家本身，是經不起冒這麼大的險，所以這個方法，只可以分別斟酌採用。此外還有一個限制，就是當一個人從事一種試驗的時候，別人不應當使試驗者知道，這個試驗的結果，不能由他自己享受，而使他灰心。但是雖然有這些限制，假使我們要立志，將現在私人的資財，歸移國有，我們是很有機會事前先樹立一個社會化企業的基礎出來的。總而言之，試驗並不是一個盈利的計劃，所有新興的事業，在企業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多半都是經過研究的。在這個研究之中，四分之三是純粹的研究，僅有三分之一是為求得某種問題的答案而研究。不過這個試驗之所以聞名，並不是為求這個答案而聞名。我們現在已有好例子，可以證明新興的事業，可由政府獨占的辦法，去經營。英國廣播無線電聯合公司之成立，與全國電汽分配之歸由國有，都是國營新企業制度產生的好例子，與從前郵政之歸由國營辦法不同。同時並足以證明這種制度的實現，可以不必引起社會的變動，與經濟的恐慌。

上面說了許多，最後我們仍是要承認，要實現生產工具歸由國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縱使認為其將來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們還是不能逃避這個事實，就是說，一定要有充分的人，願意其成功，而後他纔能成功。

十一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計劃經濟後之社會組織

我們現在姑且假定，我們已經打破了許多難關，達到目的地，我們可以用收買的辦法，成立一個集中的機關，具有支配全國資源的權力，能夠對於全國經濟，作一個通盤的計劃。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在，就是這種計劃經濟的前途，是要形成一個什麼樣子，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要形成什麼一種的社會組織。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那種社會狀況之下，其階級組織，一定要與現有的階級組織，比較相彷彿，而不能傾向於整個無階級的社會組織，或者傾向於蘇俄現在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主義。因為在那種社會狀況之下，收入的不同還是很大，各企業家不是用任何價格可以收買的，其價格一定要與他自己的標準相接近。根據倫敦旅行社的經驗，假使能按市價三分之一收買，其價格似乎還是很高。並且還有一個事實，要注意的，就是用收買的辦法，來轉移所有權，無形中會使閒人階級，至少還能暫時存在，其中還有許多人，是富有的。僅有少數人，因為從僱主或是股東，變成國家公僕，或是變成領受養老金的人，也許要變成無產階級的同志了。

照這樣看來，假使階級與收入的區別，繼續存在，那麼在那種社會之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工具，雖然很辛苦的

得到了，可是要製訂計劃，或執行計劃，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很關重要的問題，在蘇俄看來，他們絕對是作如是觀。因為這個問題，是他們整個哲學中全部問題的一部分，他們認定要實行他們那種經濟制度，社會革命是免不了。計劃經濟不會發生效用，除非第一步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第二步實現一個大家平等無階級的快樂社會。

蘇俄認爲一個計劃，一定要有一個整個一致的目標。假使在一個社會中，少數富有與有閒階級的人，仍然居於億萬無產的人民之上，這個計劃，是不會有整個的目標的。這個計劃，終了是要分裂的。這種的經濟制度，不但需要計劃，並且沒有法子有任何計劃。一個全國的計劃，一定要顧到全國的利益，在無產階級革命未實現以前，無所謂全國的利益，只有一個階級的利益。

這種說法，固然不能認爲只是主張革命者的無聊幻想而已。但是我認爲這種說法，並不能包括一切，多少總含有一些成見在內。這個成見，就是認爲自己的主張，總是的唯一的主張。就英國這種國家而論，這種說法，未免大把握級界限分得太清楚了！像英國這種國家，社會上最高的階級，與最低的階級，僅有一種分不清的界限，一個階級與別的階級，總是相連啣接着的。所以所有階級，都是互相浸透，而不是截然分開。革命前的蘇俄，並無中等階級的存在，所以其階級之鬭爭，是很明顯的，是很劇烈的。馬克斯預料西方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的前途，認爲是要漸漸形成兩個大壁壘的對立，無產階級與布爾喬亞，這個預言，在事實上是無根據的。

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分析，社會組織，與個人思想的變更，是隨着生產技術的變更而走的。但是生產技術，要如何之變更，恐怕並非馬克斯所能預料得到的。同時生產技術越變更，則中等階級，與職業階級，在社會上的重要性，

恐怕越增加。這兩個階級的人，在馬克斯的理論中，並沒有他們的位置，因為他們並不屬於馬克斯所預料的那兩個階級中。比方說，就英國這種國家而論，計劃當局所要感着的困難，並不是爲誰計劃的問題，還是爲少數企業界巨頭計劃呢，還是爲大多數民衆計劃呢，假使不用革命的方法，去解決階級內的糾紛，恐怕這許多不同的利益，不能容納在一個經濟計劃之內。計劃當局所感着的困難，是如何使全社會中各種衝突的利益，能很嚴密的互相交錯的存在着。因爲這許多衝突的利益，在整個社會裏，他們的力量，是均衡的，都是可以發生效用的。

也許有人認爲社會階級組織的複雜，能督促計劃當局，爲全國而計劃。從某種眼光去看，這種說法，是對的。因爲在這種社會裏，計劃的路線，可以加多，選擇的範圍，可以較廣，絕不像蘇俄範圍那樣狹窄，只有擁護無產階級，打倒布爾喬亞的原則，可以遵守。像英國這種國家，一定要同時兼顧到各方面人們的利益，無論技師和醫生的利益，畫師和鐵路工人的利益，企業界巨子和醫院看護的利益，都要顧到。蘇俄一定要把西方的社會，劃分爲兩個明顯的階級，並且認爲只不過這兩個階級，他們這種看法，實在是忽視了另一個很重要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現狀的力量。一個不用革命方式所造成的計劃機關，在他開始計劃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前非計劃經濟時代，所遺留的許多基礎上做，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從頭做起。計劃者應當就現實的社會，去探討計劃的方法。其第一個計劃，應當按着現在社會的結構，及現社會的需要，而編製。他們應當將現有啤酒，牙籤，球拍，汽車等等的產量，作一個詳細調查，並且要詳知這些貨品是如何分配到各階級的人們中去。第一個計劃最重要之點，是要製成一個很詳細的計劃，使各種貨物的供給量，都能與從前在個人企業，受價格機能支配時代一樣。一個從平和空氣中產生出來的

計劃機關，要想安穩生存，其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要走的太快，離開現狀太遠了。

但是費了許多力量，把企業社會化了，而其結果，僅是由一個統一意志的機關，來代替從前那些各自為政的機關，除此以外，一切都與從前一樣，那麼這個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計劃當局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要去完成現有經濟制度，所不能完成的工作，而後所費的力量，纔算值得。換而言之，這個計劃，不但能充分利用現在已經被利用的富源，與勞工，並且還要把現在浪費了的資源，利用起來。不過要想增加這一筆新富源的用處，計劃當局也不得不首先注意到現狀的力量。就是說，計劃當局，應當在生產原來的基礎上，順着原來的路線，作進一步的增加。同時凡參加執行這個計劃的人，也應當用與現在同樣的辦法，來報酬他們。有經驗，有專門技術，與負有較重責任的人，應當給與他們較高的薪水。在編製生產計劃的時候，應當想法子注意到現有財富分配的情形，應當製造相當數量的奢侈品，以供應那些高薪水人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計劃經濟的任務，並不僅僅去決定某種生產的數量，應當有多少，以供應英倫三島人民的需要，而是要決定某種貨品，應當比現在的數量，增加百分之幾，或是減少百分之幾。計劃當局要達到這個任務，事實上已經夠繁重了。但是其困難程度，較之毫無社會的根據，要從新編製計劃，從頭執行計劃，已經容易多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推翻現有的社會，使人們重新從頭創立一個新制度。

所以一個用和平方法，組成的計劃機關，應當首先注意就既有的現狀，加以更改。他需要與全體人民，與所有階級合作，而後纔能造成一個經濟制度，可以使所有人民的衣食住，都比在現制度之下好些。全國的人民，應當拋棄私人的利益，與階級利益的衝突，應當團結起來，共同經營與大家共有利益的事業。這種與大家共有利益的事

業，雖不能使大家得到同樣的利益，但是總比專替幾個人謀利益好，因為凡與幾個人有利益的事業，一定為其他別的幾個人所不利的。

更明確一點說，假使目前所有失業的工人，都可以與現在有工作的工人，一樣得到工作，並有同樣工資，我們絕不能否認，這是全國的利益。同樣的，假使現在工商階級人們的收入，其所增加的數目，正可以與他們在營業衰落時候，與營業繁盛時候相比所受的損失相抵，那麼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也是全國的利益。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許有人以為如果富人收入的確減少，並確能將減下來的用一種方法分給社會中窮苦的階級，則社會的公道雖云可以因此維持得較好一些，然得利益的卻只是工人，這並不是全國的利益，而仍是部分的利益。

假使一個計劃，誠能如以上所說的，為全國人民謀利益，那麼我想一定可以使全國人民，集中心力，擁護這個計劃，促其成功。不過這個試驗，除在戰爭時候，大家會表現集中力量，一致對外的精神外，在平常時候，還沒有嘗試過。在蘇俄，他們確已用集萬億人的心力，一致的精神，去執行他們的計劃，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

十二 改進社會組織之和平辦法

此外也許還有人反對，認為假使計劃當局，所能做的事，只不過是維持現社會的現狀，那麼我們還情願有一個革命，要不然，就不必多此一舉。我對於提這種反對論調的人，願意作以下的提醒：大家要知道，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話，只不過說到計劃當局，首先所要注意的事，只不過是他的初步任務而已，充其量，也不過是開始頭兩步

的任務而已。其任務，並不是僅止於是。我們知道，在蘇俄，無論是在社會方面，經濟方面，假使我們隨時加以注意，可以發現他們時時刻刻，在變遷着，並且變遷的很快。我們這種以和平方法，所組成的計劃機關，維持現狀，是我們向前開步走的起點，而不是到了我們的終點。

我們理想中所能推測得到的變遷，同時這個變遷，並可以用輿論的力量造成的，有下列幾點：第一，收入差別的程度，可以減少。縱使我們仍然利用經濟動機，以左右勞工的分配，這點也可以辦的到的。在開始的時候，計劃當局仍然要維持企業沒有社會主義化時代的辦法，對於少數聰明與幸運的人，維持他們舊有意外的收入。不過等到社會上發生了一種要求平等的空氣，那麼這種意外收入的機會，與辦法，必定可以因這個要求平等的力量的加增，而漸漸減退，乃至於停止。在那個時候，無論富者與貧者，都要接收平等的原則。還有我們在上面已經提過，收入差別的程度，最顯著的時候，是專門技術因受機會的限制，與受固有能力的限制，而無法獲得的時候。假使一旦教育的機會均等，教育特權的限制，廢除了，那麼在那時候，可以擔任較高位置的勞工供給量，一定可以增加，同時位置較高的人的收入，與普通工人的收入的差別程度，一定也可以減少了！並且在我們這種國家裏，社會階級之區分，是由於收入之不同，假使收入不同的程度減少了，那麼社會階級之區分，也自然而然的減少了。

第二，在這個新社會裏，有開階級的人，不一定永遠存在。所謂有開階級的人，乃是那些靠生產的結果生活，他自己對於生產，並無貢獻的人。（許多社會主義者，所以反對以收買方法，實行社會主義，就是在怕產生有開階級分子。）我在上面已經提過，國家收買私人的企業，其付款方法，應當是規定一定的年限，在這年限內，分期按年付

清，而不應許其永遠保持他的資產，也不可許其在多少時間之後，贖回他的資產。或謂這種辦法，與用永遠責任（Perpetual obligation）的辦法相比，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如果我們決定，按市價收買，我們所欲社會化的產業。因為據反對按年付清的辦法的人說，假使我們規定在某年限內，每年付款五十鎊，其資本價值常年永遠可以得到二十鎊，或三十鎊的年利無差別。假使有一個人，收到政府給他按年付清收買金，他一定不滿足，其結果他也不過把分期得款的權利，買給別人，以換取按年永遠可以得較少利潤的權利。照這樣子看來，我們要想在一定時間內廢除資產階級，恐怕是辦不到的。

但是這種反對的論調，只能在收買或出賣私人資產的市場，繼續存在的時候成立。比方說，我從國家方面得了一筆按年分期付款的收買金，可是我自己是願意保持能夠永遠得到較少年利的辦法，在這時候，假使債券市場上，有許多擔保品出賣，我當然可以把這個分期付款收到收買金的權利出賣。所謂市場上的擔保品，多半是政府所發的債券，或是由地方政府所發的債券，或是企業公司的債券。但是假使一旦政府為實行他的政策起見，停止發行債券了，僅僅限於實行分期付款付清一個辦法，同時各種私人企業都歸國有了，也都不發債券了！那麼在那時候，擔保品的來源，就要宣告斷絕，繼續投資唯一的機會，只有靠私人的借貸，或靠國外的投資。關於這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沒法子實現，因為在一個多半企業都是國有的社會裏，私人企業能夠存在者，僅是極少數而已，所以私人借貸的機會，尤其是長期的借款，也一定是很困難的。在那時候，沒有人願意以私人資格，和別人訂立長期借款的契約，除非他能有用於生產事業的機會。私人生產機會，既是斷絕，國內長期債券的市場，自然也隨之消滅。

蘇俄就是其例。現在蘇俄除國家債券外，別的債券都不能存在。所以在這時候，凡得到按年付清的收買金的人，在這個新社會裏邊，只有向國外投資一條路可走。同時他們也只有承認按年付清的辦法，還可以使他們得到一筆可靠的資金，要不然，他們從前的債券，將要成爲廢紙了。

假使政府不一定要整整齊齊的完全完成他的理想，也許可以把國外投資這條路開放。但是假使政府不願意開放，他也並沒有一定要開放，根據過去幾年經驗，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國家要想完全禁止人民向國外投資，也是辦得到的。不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變動，受價格變動的影響很厲害。計劃機關既不受資本市場的左右，假使他要進一步把國外投資完全禁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雖然承認不能把所有的資產階級完全消滅，但是我們可以不用革命的方式，而能使資產階級人們經濟活動的範圍，日趨窄小。企業既歸國營，經理的收入，是以薪水爲標準，那麼資產階級之無力參加計劃，已無待言。假使這些國營企業機關，也同蘇俄一樣，將他們自己的利潤，用社會主義資本集疊方法，貯着起來，充作發展新企業的新資本，那麼這些資產階級的人簡直無法利用新儲蓄的資本，去做什麼活動了！到了最後，他們終歸於完全停止他們的活動。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似乎可以使用徵稅的力量，來改變社會經濟的組織。徵稅的數目，只要不把人們的收入，減少到最低限度之下，使他們還可以維持生活，去從事計劃內所規定要做的事，則徵稅可以沒有經濟的限制，對於擁有某種收入的人，予以增加。換而言之，凡擁有不勞而獲的收入，是可以無限制的予以徵稅。不過此外還有

一個限制，就是社會的限制。所謂社會的限制，就是說，要看社會上的人，對於那一種稅收的標準，認為是否適當，是否公允，最要緊的，要看他們所希望是什麼一種標準。我覺得在經濟立場上看來，假使一個人對於企業，既無直接的貢獻，又沒有將資本儲蓄起來，以供發展新企業之用，那麼他並沒有理由可以有他的收入。假使要想繼續享受他的收入，一定要有兩個條件：第一，要看他不勞而獲的收入，是否能為社會的正義所允許；第二，要看他的收入，是否能夠擔保不會較過去的數目，日益趨於減少。

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我認為對於不勞而獲的收入，分別課以各種不同的重稅，是合理的。就是稅率增高到可以完全消除這種不勞而獲的收入的目的，也是可以的。不過要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上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輿論，認為凡人都應當自食其力。

根據經驗，這種輿論，是可以利用正當宣傳的方法，造成之。一個人對於社會所應盡的義務，在社會的眼光看來，並沒有一個既成永遠不變的標準，就是一個社會階級，對於社會應盡的義務，也不是永遠不變的。考之近數十年來的社會歷史，即可證明其為然。尤以徵稅一端而論，其變遷特別顯著。三十年前，絕對想不到今日的所得稅，會增加到現在這樣高。凡有五〇，〇〇〇英鎊的收入，每英鎊就要納十一先令四個半辨士的直接稅。其所以變更這麼快，固然是由於大戰的結果，但是大戰已經過去十五年，現在我們對於目前這種所得稅制度，已經認為是正常的事情了，並不以為奇怪。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過去這一個世紀中，社會上人對於階級的觀念，無形中有一個大變遷。這種變遷，很有

引起變更我們的社會組織的可能，我們很可以從許多暗示中，看出我們自己很不以我們的社會階級的區分爲然。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平常人們談話口吻中，無形表現出來。比方說，我們現在在大衆之前說話，就不能用下等階級這種字眼！有禮貌的說法，應當用一些形容的字眼，把階級的內容，表現出來。比如工人階級，或工資階級，貧民階級等等字眼。這種字眼，完全同下等不同，因爲他是用以表現各階級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含有輕視的意思。至於下等或上等，似乎含有表現個人身價，或社會價值的意思，在現在社會上一般人看來，認爲這種字眼，含有一種勢利的表示，應當把他廢除。但是中等階級的字眼，現在仍然可以應用。一個人可以在大衆之前，或在文字上，表示他是中等階級的一份子，但是假使有一個世家或富人的子弟，公然自稱他是屬於上等階級，那是不爲社會所允許的。他只能以稱爲上層中等階級，而不可以自命爲上等階級。所以從這種情形看來，無形中表示在目前我們社會中，中等階級的地位，是佔居最高的。

這些都是很微小的地方，不過這個確實從根本上表現人們的觀念變更了。同時也就是因爲這種變更，是真的變更，所以我們並不是沒有理由，主張在開始計劃經濟的時候，凡目前領有資產的人，應當按他的原價，予以收買。收買之後，假使有人仍靠他的資產金過活，那就應當課以極高的所得稅。因爲沒收的辦法，是直接的辦法，是暴動的辦法，是不顧大家的好惡，與社會的希望與標準的。至於徵稅的辦法，是要與社會的標準相適合，或者稍微比社會的標準高出一些。一種稅收，任憑付稅的人，如何反對，但是總是基於大家的心願，至少對於富人與有勢力的人，的徵稅，是這樣的。（按照我們的辦法這些有錢階級的人損失最大）因爲就貧者而言，雖然在他們被人壓

迫的時候，他們所要付的稅，連得他們下意識的心願都沒有。可是至於富者與有勢力者，他們只要求減輕他們的稅率，因為他們覺得政府所征的稅，差不多與沒收他們的財產相等了。

所以直接的沒收，與征稅的方法不同的地方，乃在沒收之不顧社會上已有的標準。但是我們要注意，沒有一種標準，是永遠不變的，就是有契約為根據的標準，也是要受實行那個標準的社會環境所限制。一個契約，不合社會的標準，不為社會認為公平的，也終歸要變通履行。這個並不足以危害契約的效力，乃足以保障契約的效力，因為他足以避免使不合時宜契約，完全被人毀約了。關於這一點，征稅的效用，非常的大。因為征稅的特別效能，就是在他能夠完全變更契約的原意，而不至於毀約。他可以將每星期按收入規定為十鎊的契約，減為五鎊，而無損於契約。假使契約並不含有經濟的重要性，那麼征稅的力量，僅是受社會正義的變動的制限而已。

所以從這樣子看起來，在我們這種國家裏，在開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時候，也許免不了要附帶產生一種不十分理想的社會制度，但是這種現象，到了相當時候，是可以望好裏改善的。在這裏，我們又可以有蘇俄的經驗，供作參考。蘇俄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整個把社會一般的標準推翻了！但是不經過一番大革命，我們絕不能希望像他們那樣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內，把搾取這個字取消了，或把不勞而獲靠別人吃飯的人消除了。所以照這樣看來，其所需要的時間既是這麼多，我們希望假使社會主義者能夠運用得法，那麼這不勞而獲對社會毫無貢獻的資產階級，也許可以在我們兒女生命期中，發現他們自己懷疑，他們是否應該存在，至少會自己覺得很慚愧的存在着。

所以假使蘇俄要肯在他試驗社會主義的中途，與我們合作，我想在西方國家，社會階級不是絕對嚴格分割的情況下，很可以用和平漸進的辦法，達到經濟的目的。即不如是，假使蘇俄果然能够及早成功他們的制度，馬上增長他們人民的生活程度，與我們人民的生活程度一樣，乃至於還要好，或者他們能把革命與內爭的念頭，完全消除了，減少他們目前社會政治制度殘忍的程度，大家在承認人類生來就不平等的原則下，望着消除階級的目標走去。我想以上各點，蘇俄假使能辦得到，則世界上趨向於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國家，一定較現在增加多多。我在上面已經提過按蘇俄現在所走的路向看來，這種理想，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唯一的條件，就是要維持和平，使第二批的世界革命不要及期駕臨。

十三 改造社會不可以革命為手段之三理由

用和平的方法，來實行計劃經濟，用漸進的方法，來改進社會組織，不但他本身有許多好處，或者他的成功機會還比較多；並且這種辦法，可以說是代替革命方式，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唯一辦法。

許多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的方式，與沒收的方法，非常信仰，就是在英國實行布爾喬亞民主政治與布爾喬亞自由的先進國家裏，也有許多有心的人，與智識份子，對於共產革命的可能性，頗加注意的。因為革命具有一種迅速性，熱烈性，容易挑動人的情感，他還附帶產生一種英雄主義的行為，這種行為，在一個安靜的社會是不容易有他用武之地的，凡是對於環境不滿意的人，很可以用毅然決然的革命精神，來滿足他們的慾望。

但是革命並不是兒戲，我認爲有三個理由，至少在現代的英國，不應當走向革命的路上。

我的第一個理由，或者是沒有普遍的真實性 (General validity)，是從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推演出來，並不能根據理性的基礎，來澈底說明。這個理由，可以說是我個人反對用武力的偏見，我尤其反對對於個人，不顧人家私人的利益，而施用武力。革命需要羣衆的暴動，使甲羣衆去反對乙羣衆，私人之間的對抗，是不允許，也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凡是主張採取革命暴動的人們，也就是主張經濟宿命論 (economic determinism) 的人。他們相信人類歷史的演進，是隨經濟變遷而走的，社會形態的變遷，無論是和平的，或是流血的，並不表現出人類是一步一步的向着某種理想生活去演進，乃是表現繼續不斷的去適應某種新的生活方式，以求生存。因爲無論任何一種宿命主義，他們（指各種宿命主義）的相關之點，是個人不負責任 (individual irresponsibility)。所以一個人既是逃脫了他的責任，認爲他自己只不過是這個殘酷宇宙中的一個工具，那麼他當然很容易因爲某人社會身分，與我不同，而加以壓迫或屠殺。

我所以反對用革命方式，以造成新社會制度，除含有道德觀念外，尚可用理性來解釋。理性的解釋，有一種心理的經驗，做他的基礎，我以爲根據過去革命的經驗看來，我們很可以承認在革命發動的時候，必有一種革命的情感，隨之發生。這個情感的力量，是比引起革命幾個直接的原因的力量，維持更長久。好戰的人們，在戰爭過後，無不感覺若有所失。所以在現代的蘇俄小說戲劇中，時常提到蘇俄內爭的故事，小說中的人物，與戲劇中的角色，對於白俄，莫不希望立即予以完全消滅。同樣的，歐洲有一部分人民，雖然飽經前次大戰悲慘的教訓，但是自從和約

簽定以後，他們的心理狀態，就沒有安寧過，雖然他們外表好像是願意生存於一個安靜的社會中。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或是一個階級，要是自流血中得到政權，雖然他能够造成一個以正義公平為基礎的社會，但是無論如何，是要遇到許多意外的困難的。血的腥味，是永遠存在着的。這個腥味，一經嘗試了之後，就不容易消失。軍隊們已經飽受獅子咆哮的訓練，就不容易叫他們學唱鳥聲，也不容易叫他們變成馴馬。

我反對在現時代的英國，使用革命方法的第二個理由，是完全屬於策略的，可以同樣的適用於德意法美各國。這個理由，甚為簡單。就是說，用革命方法失敗的機會太大。蘇俄革命的對象，乃是已經頹仆的社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一次革命時候，帝俄政府，已經是完全没有力量了。全國陷於戰敗國的狀態，經濟破產，達於極點，全國的軍民，都有餓饑之虞。帝俄政府，既沒有各部部长，又沒有受過文官訓練的官吏，到了那時候，在沙皇統治之下，連統兵的將帥，都靠不住了。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指揮疲於奔命的軍隊。在那種情勢之下，帝俄政府，可以說是從內部崩潰起來，而不是從外面被革命勢力打倒。基倫司基（Kerensky）政府繼續執政，在開始的時候，他就表現出要失敗的預兆。這個徵兆，就是他還要繼續已經失敗的戰爭，在那時候，凡是戰爭的需用品，完全都沒有了，疲於奔命的軍隊，已經都不願意作戰了，所以無怪乎六個月之後，在列寧沒喊出和平、土地、麵包的口號之前，Tericho的城牆，就崩潰了。哥薩克兵，受政府的命令，在聖彼得堡城上，阻止革命軍前進，他們雖然奉命出發，但是他們很安靜的，讓羣衆從他們的馬腹下爬過去。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蘇俄簡直無所謂中等階級。他們所有的，僅是腐敗無能的官僚。這些官僚，在新社

會裏，毫無存在的價值。所以很可以與貴族同樣的把他打倒。他們的存在，並不足為革命勢力的阻礙，他們的滅亡，也不足為將來新社會的損失。

但是在英國，其情形適與之相反。英國的政府，在人民眼中看來，雖然僅是一個團結的中心，或是精神上的偶像。但是政府內部的組織，和內部行政的系統，是有效率的，是很有權威的。假使到了一個相當時期，政府的一切事務，大可以由文官制度下的官吏，全權辦理，不用那些政治領袖協助；那麼政治領袖的任務，只不過是充任部長，與簽付文官們所呈給他們的命令而已。這些文官官吏，絕不能與那產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相容。若以我們現在社會實際的情勢來分析，我們社會的階級，無論如何，絕不能使這些文官官吏隸屬於無產階級。並且再進一步說，任憑現在政府的工作，偶有不當之處，但是文官制度還不失為一個有效的制度，其效能與其齊整，是繼續增長的。所以假使一旦革命發生，在實行暴動，與實行沒收的中途，遇着極大反抗的力量，這個力量，不但僅是代表政府幾個關員而已，乃是代表這個政府整個的組織。這個組織的勢力，比政府本身的力量還大得多。這些行政官吏，認清了他們的任務，知道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他們絕不能隨隨便便，把他們的工作，交給殘暴凶莽的無產階級去處置。無產階級的生活，的言語，的服裝，恐怕都不是這一般有智識的官吏們所習見的。

這個中等階級的人數，是很多的。凡職業團體，與技術專家，皆屬之。就他們所具的性情，與他們在社會上所占地位而言，根本反對暴動與沒收。我們要想建立一個完滿適合我們需要的經濟制度，這個中等階級，是占很重要的位置。一旦革命暴發，這些中等階級醫生、工程師、化學師、電汽師、新聞記者、護士、推銷員、教員、及經營各種製造業

與入口生意的商人，大部分都要被唾棄；但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要保持一個經濟制度的完整，是唯這些階級人們是賴。所以在革命之後，既是需要建設，而建設工作，又唯這些中等階級的人是賴，那麼這些人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人了！

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革命的失敗，與用和平方法勸導的失敗，是完全兩樣的。革命的失敗，除人民所受的痛苦，與無結果的暴動，杜塞了自己將來發展的途徑不計外，他還把敵人的眼睜張開了，他把所有合理與不合理的恐怖，引起了，他把反動的勢力，與敵人報復的壓迫引動了。革命一旦爆發，本來在原則上對於計劃經濟表示贊成的人，現在因為看見了革命的恐怖，引起了他們對於新制度的發生膽怯，反而對於舊制度，表示擁護。那時候，他們不但擁護舊有的局面，並且發生一種反動的力量。這種反動的力量，在平常時候，他們並不能受納，現在乃是被恐怖之心引起。根據理想家的理論，認為使用武力，固然是對付與我們道德、政治、宗教觀念不同的敵人，最後有效力的方法。但是我恐怕這種理論，是經不起用事實來證驗的。比方說，我們不能不承認蘇俄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反動勢力，把蘇俄的革命成功，延緩了幾年。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假使英國政府不把印度的革命首領下獄，印度的自治，可以早一些成功。

用和平方法勸導的失敗，是兩樣的，至少不會把將來發展的途徑堵塞了。並且和平的勸導的失敗，是要達到成功的正當途徑。根據經驗，我們向上帝頻頻求福，是無用的。但是對於人則不然。凡是一個政客，要想達到候補人的資格，永遠要在一個選舉區內，用苦功夫。不管他是一個什麼怪物，或者他在開始的時候，是如何沒有希望，但是

到了最後，他總會成功的。根據這個經驗，我們很可以以此例彼，廣為引伸。

舉例為證，英國社會上任何制度的成功，都是經過多少年不斷的宣傳累積而成的。一個社會制度成功的歷程，是這樣子的：第一，新思想的傳播，第二，引起大家的驚訝，第三，引起大家的同情，第四，形成一個法律，或是一個制度。英國強迫教育制度，失業保險制度，老者與寡婦的恤金制度，都是這樣造成成功的。我們希望我們的成功將來可以日漸擴大。

現在說到我所反對在英國這種國家，使用革命方式的第三個理由。我認為中等階級人們之所以要求經濟制度，須有穩固性，繼續性，並不是沒有他們的理由。他們並不是專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着想。法律、契約、習慣，乃是非計劃經濟制度所賴以運行的骨架。革命一經發生，這些骨架，都要被推翻了。這些骨架被推翻了之後，經濟活動之無法進行，有如總罷工之足以危害經濟活動一樣。在那時候，牛乳沒有人送了，火車不能走了，麵包沒有人製了，屠夫不屠宰牛肉了，貨物要停止捨卸了。假使革命的時間，不是很長久，我們尚可以生存。我在這裏，所謂長久，並不能以月計，只能以日計，如若不然，時間經久了，那時候社會上能在革命中過生活的人，一定很少。並且假使反抗革命勢力，非常之大。則革命之成功，非經與反抗勢力一戰不可。這一戰，並不是轉眼間就可以解決的。蘇俄之所以能經得起他那個大革命（其犧牲已經不少了）乃是因為蘇俄人民，在革命內爭的幾年中，他們自己能夠維持自己。這就是說，他們的養料，是出在他們的本土，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耕種，他們自己，可以養活自己。假使這個是蘇俄人民所以能夠經得起革命的原因，試問以我們英國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人口這樣稠密，一切食料，都要仰

給於外人，我們試想想看，我們能够在革命的生活中生存嗎？

所以無論如何，在我看來，革命的代價與犧牲，實在太大。但是也許我的意見，不能得大家的同情，革命的思想，現在雖然很薄弱，只有少數人在那裏主張，但是也許在不久之內，會受人的歡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願意向大家提醒的，就是凡是同情於實行社會經濟革命，以消除社會階級，造成計劃經濟制度的人，他們所負的責任，是很重要的。假使他們之所以反對革命，乃是基於反對用武力，那麼他們就應當想法避免戰爭。在那種情形之下，凡是富者，應當使他的財產，爲人充公，絲毫不加抵抗。凡是貧者，就應當不要伸手去染指別人的財產。但是假使他們反對用武力，僅是反對在某種情勢之下用武力，而不是從根本策略上反對用武力，那麼他們簡直就是贊成革命的。因爲一旦革命爆發，我們就沒有方法去決定他在什麼時候，應當開始爆發。

所好現在革命尙未爆發，大局尙未決定，我以上所作的忠告，勸大家心平氣和，尙用不着在這裏加以辨證。縱然今日的世界，已經充滿了破壞的情緒，不過人們的理智與含忍的精神，尙未完全消失。我在這裏，也用不着來辨證爲什麼沒有提到我所理想的烏托邦，爲什麼僅指出幾種較好的可能性。（自然這幾個可能性，沒有一個是完完全全圓滿的。）因爲假使我提出我的烏托邦，一定會一方面而忽略了人類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一方面忽略了人類現象的實在情形。按着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與社會中實在的現象來看，這個不圓滿的人間，是不會產生一個圓滿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出來的。但是在這不能達到十分圓滿的結果之中，我們大可以有選擇路向的機會。在這選擇機會之中，人類前途，是幸福，或是悲哀，就靠我們來決定。也許我們的路線，已經向着悲哀的路上去走，也未可知。

在這個悲哀的前途中，也許很少的人，能够生存，人類的幸福，也許根本全會消滅了，也未可知。但是這個悲哀的前途，是可以避免的，我們的路線，是可以用我們的意志，而更改的。我們不能根據我們的前途，不是烏托邦，而認為我們不完滿的前途，不會因人類的努力，產生一個比從前較好的現象出來。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假使我們認為我們所走的路向，是對的，那麼我們應當自己慶賀自己，因為我們還有機會，可以補救我們過去的過失。



第六章 計劃經濟成功之條件

一 實行計劃經濟所需之智識與使用此智識之能力

現在將以上所說的歸納起來，得幾個結論。說明欲求計劃經濟之成功，要有幾個必需的條件。

第一最明顯的，欲求計劃經濟之成功，首先必須具有實行計劃經濟的智識，與使用這些智識的能力。我們需要詳細知道目下生產和貿易規模的大小，社會上各種階級所得分配的情形，各種企業組織及其使用技術的情況，人口的地區分佈與年齡分配的情形。這幾個問題，不過舉其大而較明顯者。此外實行計劃經濟，還需要一個具有極高度執行能力，與統治的機關。我們就是在一個很小很單純的社會裏，實行計劃經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凡愚笨，不謹慎，思想不正確的人民，或其腦子裏充滿着許多空幻的概念，與不消化的理論，絕無實行計劃經濟的能力。

不過關於討論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問題，我們要附帶多說幾句話，就是：上面所舉這些條件，乃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一個計劃，絕無百分之百的成功，就是以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也不能獲得百分之百的滿意。蘇俄人民，雖然有時候充分的表現他們實行計劃經濟的智識與能力，是非常的低，但是他們的計劃，已有相當的

成功。根據這點，我們至少可以承認：如果有別的國家，願意試行計劃經濟，其前途一定會比蘇俄比較光明。但是我們請求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牢記在心，實行計劃經濟的任務，是非常的繁雜，其需要專門的能力與技術，是普遍的。無論是在不重要的技術方面，或在不重要的行政方面，其所需要專門能力與學問，是與操縱計劃經濟命運的幾個最高主持人，所需要的是一樣的。列寧不憚煩的告訴他的黨徒，要在實際上從事企業組織的研究，要從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裏，去研究管理工商業的方法。我希望無論那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應當把列寧的話牢記在心。因為現在我們在沒有實行計劃經濟制度之前，還可以有許多機會，預先把計劃的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先行學好。

或者我們覺得懷疑，這些機會，是否已經完全被人利用完了，或者人們對於利用這個機會的必要，是否還沒有完全認識。現在不知有幾千幾百的社會主義者，願意研究關於經濟上各種問題。他們犧牲時間，犧牲精神，到夜校裏去參加各種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會。但是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很懷疑這種智識上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否足以抵償大家所費的時間與精力。我覺得他們太浪費精力在兩個相反，毫無用處的問題上！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重複不斷，作一般的概論，訴說資本主義的罪狀，贊揚社會主義者的功績。這些概論，就是有事實做根據，也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他們所得到的結論，並沒有把握住經濟推理的程序（process of economic reasoning）。尤其是我們這般講授經濟學的先生們，請坦白反心自問，那些聽我們講授經濟學的學生們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夠完全了解那些最粗淺的經濟常識，我恐怕其數目一定是很少。原因就是：有一般人（先生同學生裏邊都有）認

爲，甲種經濟制度所產生的結果，既是受了人們很嚴重的批評，那麼，代替甲種制度而產生的乙種制度，一定是靠得住的了！我們可以不必去考慮這個制度，各種經濟決定所依據的原則，是如何，或者根據這個原則在實際上所要發生的困難，是什麼；其結果，我們只有得一個無聊的概論，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將我們所需要的東西，給我們，我們不必發愁生產過剩，因爲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爲使用而生產，而不是爲贏利而生產。我們並沒看見他們在估計人們的需要上用功夫，也不看見他們研究市場應如何的管理，纔能避免生產過剩的危險，這幾個問題，正是一個建設的社會主義者應當集中注意力注意的。所以我以爲我們需要把經濟的基本智識，徹底弄好，就好像一個木匠，能有把握使用他的鉋子一樣。

第二個問題，是與上面一個問題相反，就是社會主義者，浪費功夫，去做許多細末的批評。在企業上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貢獻許多寶貴的實例，這些實例是從事純粹學術研究的人所經驗不到的。他們可以證驗從事純粹學術研究的理論，是否完全，是否準確。但是這些實例，是白費的，除非第一要適用，第二僅能承認其爲一個舉例，而不是一個真理。但是關於這點，目前有一個很大的阻礙力，就是現在凡在企業上曾有實際經驗的人，很難使他們避免與目下的現狀，發生衝突，很難使他們個人的經驗，與整個的企業，發生關係。比方說：他們過着減低工資的困難，他們並不曉得減低工資的目的，是在減少不興旺企業的工人供給量，所以他們就不去根據他們自己企業的經驗，去提出有益的建議，去想出另一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以期達到同種的目的，或是對於別人所提出的方法，加以善意的批評。工資階級的人，自然看不出：如果現制度之下，有減低工資這個問題，那麼，一切的經濟制度

之下也是有這個問題的。或者他們時常挑出某一個例子，比如說，某個企業機關，已經是國營了，但是該企業機關所要改善待遇的要求，並沒有達到目的，就以此證明國營機關，並不見得比資本主義的國家好。他們並沒有從內容與功績上來把這個要求改善的例子，加以研究，他們也並沒有研究國營機關，在反對那種要求時候所處的環境是如何。

這些心理狀態，自然並不是生活舒適與生活有保障的人，所能判斷其是非的。因為這種心理狀態，是在勞苦與氣憤不公平的情況下，自然發生的現象。但是我們需要大家協力同心，想法避免這種足以阻礙建立建設的經濟思想的阻礙力。我們應當很準確的想一想：一個經濟制度的任務是什麼。要達到他的任務，要從事何種經濟決定。在非計劃制度之下，這些決定，用什麼工具來進行。這些工具之所以失敗，是在什麼地方。要實行計劃經濟，應當根據的事實是什麼。要達到某種經濟決定，應當要側重那種事實。要使某種經濟決定生效，要應用何種工具。此外我們還需要知道，要使用什麼方法去計劃，去執行計劃，而後這計劃纔可以在各種不同的企業中，都能適用。

假使在每一個企業中，都有幾個中心人物，在那裏考慮以下這幾件事，那麼社會主義運動，一定獲益不淺。第一，將計劃與非計劃經濟中，所共有的幾個經濟原理，加以詳細分析。第二，將自己企業的組織，及其所要發生問題，加以認識。如成本問題，資本問題，銷路問題，工人工資問題，工人僱用問題，技術上行政上各種問題皆是。第三，考慮用何種方法，可以將各企業將來的活動，予以通盤計劃。如關於生產的數量，工人的供給量，及資本的需要量等皆是。並且還要考慮怎樣使這個計劃，能與全國的經濟計劃相適合。這種種問題，經研究之後，其所得的經驗，都是實

行計劃經濟制度中無限寶貴的資料。這個資料，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去尋求。

二 中央計劃機關

欲計劃經濟之成功，其第二條件，也是非常簡單，就是要組織一個機關，同時能具有起草計劃，與監督執行計劃的權力，這個機關，一定要像蘇俄的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那樣，其本身握有控制全國的權力，同時並能得各地方計劃機關，與各單位工廠的擁護。

關於這個機關的組織，及其權限，我們目前不能加以詳細確定，不過有幾點可以注意的。就是這種計劃委員會，必須具有半永久的性質，委員的任期，要有相當的年限。頂好採取輪流退休的辦法，以維持其永久性。委員的任命，在英國，應當由議會擇其具有聲望，與經濟上經驗的人，予以委任。自然此外要留幾個額子，以備重要的經濟團體，如工會之類，加入充任委員。

根據以上這種組織，我們就可以不必顧慮這種機關的設置，要破壞政治上的自由，或是要以獨裁來代替民主，像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計劃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決定何種工廠，應當要建築，何種企業，應當要停歇，某種企業的工資，是多少，某件貨物的價格，是若干。這類問題，在現在制度之下是由三種勢力圈來解決的。第一種勢力圈，是成千成百不相關聯獨立意志的活動，這個就是代表私人之間所訂立的合同契約。如 *Saffordshire* 煤公司董事，決定把沒有利潤可盈的營業取消，並解僱其工人，即為其例。第二種勢力圈是代表由於雙方心願訂立的

契約，凡是第一種勢力圈所能享受的自由，都相當受了它的限制。比如我應當付多少工資，給我的工人，我對於某種貨物，應當定價若干，這些自由，都被工會的協定，或是同業的規約所限制了。最後一個勢力圈子，就是政府命令、法規、權力所達之處。這些法規，或為議會議案，或為議會授權給政府中的某機關，所頒佈的命令。比如政府頒佈一條法律，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或者組織一個委員會，管理牛乳的市場等是。

根據以上所述，凡第一第二兩個勢力圈所做的事，皆與政府的制度問題無關。僅有最普通的幾點，要注意的。就是一個非計劃經濟，欲求其進行順利，必須得幾條最基本的法律原則來維持他，如契約的效力，及自由結社的權利等。凡屬於第一第二兩個勢力圈之經濟活動，無論政府為民主，為獨裁或帝制，或共和，都是一樣的不受影響。所以我們提議把屬於第一第二勢力圈內的經濟活動，決定歸由一個中央計劃機關管轄，並不含有破壞或阻撓政治自由的意思，因為那些決定，並不是屬於任何政府權限範圍之內的事。非計劃經濟制度經濟上的決定，大部分都是個人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按着他個人的利益，對於那環境的現狀，發生反應的結果。這些決定，同時就有另一批人，作同樣的反應，把他執行了。比如說在 *Southwark* 地方，有一批人決定設立一個工廠，製造救火機器，因為他們相信這個營業，是與他們有利的。同時又有另一批人，願意去執行他們的計劃，決定到那個工廠裏去做工作，因為他們認為那裏的工資，可以較別的地方為多。計劃委員會成立之後，自然把第一批設立工廠的人的自由限制了，但是並不見得把他們的政治權利限制了，或者把他們從前已有的民主權利限制了。因為他們的權力，根本就沒有含有政治的背景，至多不過設立一個國立強制的機關，來代替舊的企業領袖而已。假使中央計劃委員

會，在執行計劃的時候，還是多半依據各個人獨立經濟決定的總和去進行，其情況一如在非計劃制度之下一樣，則上面所提到那個第二批人的決定，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受計劃的影響。比方說，有一個計劃，需要一千個工人，來參加某種工作，但是某甲某乙，是否應當參加在內，仍是由某甲某乙自己去決定。

計劃委員會之成立，唯有對於第三個勢力圈中，有侵犯現行政治制度機能之處。這個侵犯，可以略加申說。因為有許多人認為，民選的國會，其力量不足以應付近代經濟上所發生一切技術問題。國會的工作，成績最壞者，無過於關於經濟方面的工作，並且其違背民主政治理論的地方，也無過於此。這種情形，並不是怪。因為以擔任競選的議員，要他們去考慮經濟計劃上所需要的各種細末的技術問題，實在很難辦到。開員及國會議員之無力處理細微技術問題，已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了！凡是政治改革家，都已注意到這個問題。

今後最完滿的辦法，就是大家從此認定，所有關於經濟上的事情，是專家們的事，應當移歸專家辦理。經濟上的事情，要想詳細根據民主原則來治理，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東西，否則只是一個假想的形式而已。過去就沒有人能夠很有有效的實行過，今後也不見得有人能夠想出任何好辦法，去實現他。無論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所有經濟決定，無論大小，大半都是由其自身去決定，或是委託幾個企業巨頭去決定。這種情形，恐怕我們應當承認其為不可避免的。我們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既已耗盡我們的精神，則對於此種情形我們亦不必覺其可惜。目前我們最要小心的，就是我們要十分注意去尋出幾個好的巨頭來，並且我們應當就他們權限所能及到的事情，指示給他們。

我認爲目前關於起草計劃及監督執行計劃的任務，應當歸由一個永久委員會辦理。這種辦法，並不是說人民對於這個委員會的計劃，將來所要成功的結果，不能由他們的代表，去發表他們的意見。蘇俄的制度稍加修改，使他能與民主政治組織相適合，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蘇俄的計劃委員會（ Gosplan ）是一個起草計劃，和監督執行計劃的機關。蘇俄的共產黨，可以示以幾條應遵守的原則。比如共產黨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提出應當增加輕工業的設備，與減少依賴國外的供給，就是一個例子。在一個仍舊享受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裏，國會的任務就是在向計劃委員會提出原則；其與經濟方面不關十分重要的計劃，國會也可以提醒他們注意。比如計劃當局要毀棄某一個天然景物，或古蹟，國會可以警告他們。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議會而已。議員並不是從會計師或調查婦死亡的專家，乃是人類共同利益的保護者。他們乃是代表人民，來督促人民所要進行的事。

上面所說的，乃是表明在一個民主國家裏，要起草一個計劃，執行一個計劃，要經過以下各階段。第一，國會應負指導之責，比方國會可以說，我們應當把英國工業，集中在某一個地方，或者說，英國人民各種職業的種類分配，應當有更大差別，或者說，美國的婦女，應當給予較多職業的機會，或者說，收入均等的運動，應當早日促其成功。第二，計劃委員會應當按照現狀，起草計劃，並要依着議會所指示的幾個基本原則，去進行。此外計劃委員會應當根據各地方單位的小計劃，起草計劃，在全國計劃委員會沒有作最後決定之前，應當將計劃草案，送給各地方單位，請求批評改正。及計劃委員會將計劃草案完成之後，應當送交國會，讓他們有討論的機會。國會如有不滿意地方，可以提出意見。比如國會對於增加婦女職業機會的問題，可以表示不能在某幾個地方實行，如同在礦區地方，男

工是絕對需要的。在這時候，不但國會方面可以提出各種批評，還有其他機關如工會團體，及其他代表某種特殊利益的機關，都可以貢獻意見。

計劃委員會可以將大家提出的批評，意見，建議，加以核閱，有的採納，有的拒絕，其不採納者，可發表其所以遵守原計劃的理由。計劃當局，可以有最後決定的權利，就是說，我認爲這個辦法，是絕對的需要。不然，計劃當局的地位，很容易讓許多不是專家人們的意見，所動搖了。他們也許要不問實際的情形如何，硬要把許多沒有技術根據的意見，加入計劃之內。

關於國會與計劃委員會應當怎樣詳細合作，非另寫一本書詳述不可。上面簡略所述的幾點，並不能包括這整個問題的一切。我的意思，僅是要表示經濟計劃是一件事，政治組織又是一件事。實行計劃經濟，並不見得要根本改造其政治組織，充其量不過把目前國會所要擔負的一部分工作，移歸計劃委員會擔負而已。但是國會在政治上所具的機能，及他所負保護政治自由的責任，並不見得因計劃經濟的實行，而失卻了。

並且實行社會主義化的計劃經濟，也並不需要變更國會的組織，及選舉方法。蘇俄的憲法，在原則上根本與我們不同。但是我們絕不能亂說蘇俄的憲法，比西方民主政治的憲法爲優越，或者說，凡願實行計劃經濟，必需要有蘇俄那種特殊的政治組織。我們知道，蘇俄政治組織，與我們不同的地方，有兩大特點。第一，他是從下而上，用間接選舉方法組織成的。第二，他是根據企業團體，來分配票權，而不是根據地方區域，來分配票權。根據間接選舉的方法，議會議員，握有較大權柄者，是從比較重要的議員中，選出來的。惟獨最小的地方單位組織，如村及工廠蘇維

埃等，由人民直接選舉。這種辦法，對於人民沒有受過自治，或地方民主訓練的國家，很有益處。可以使選民從參加一村的事情，開始受訓練，但是其權限，絕不能超過一村以外。這種制度的民主精神，比起國會議員，直接由人民選舉的制度，自然差些。國會議員，應與選舉區選舉人，有密切關係，像英國這樣，乃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根據蘇俄的憲法，就是在文字上，也看不出有這種關係。

許多人對於蘇俄政治組織的第二個特點，頗為注意。就是他的政治組織，是以企業為基礎。近十五年以來，企業代表制度的呼聲極高，凡是在地方選舉區域制度下，享受不到民主政治自由的人們，對於企業代表制度的好處，尤為歡迎。在意大利組合國家制度之下，選舉區的單位，是工人和僱主所組織的團體，而不是各地方的選舉區。但是我願意提醒大家，我們對於企業代表制度的選舉方法，不必去多費心思，企業代表制度，並不見得比以地方為單位的選舉制度，為民主，也不見得對計劃經濟，有何特別適宜之處。在企業代表制度之下，一個選舉區內所包括選民，是同一工廠的工人，在地方單位選舉制度之下，其所包含的選民，是屬於同一區域的人民。這兩個選舉區的選民，唯有對於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纔會發生不相同的反應。在企業代表制度之下，選民所關心的是關於工廠的計劃，希望某種計劃，可以增加他們的工資，或是促進工廠的發展。在地方單位選舉制度之下，其選民所關心的，是同一區域內的人民福利問題。人生於世，工作的時間，比休息的時間較多，所以在企業代表制度之下，其選民對於部分的利益，一定在比地方單位選舉制度之下，關顧得週到。這兩種制度之區別，恐怕只止於是而已。至於關於政治上一般的問題，如言論自由、教育問題、衛生問題、租稅問題、等等（地方租稅及某種與工人有關

的工業稅除外）並不見得企業代表制度選民會比地方單位所投的票比較正確，或者替他們的代表，爭得較多位置。企業代表制度，維持部分利益的優點，正是以企業代表為民主政治基礎的弱點。因為一個國會內所含的分子，每個人都是代表他自己那個選區內的部分利益，這種利益，一定與別的團體的利益衝突，那麼這個國會，無異於狗打架的國會。結果離中心的瓦解現象，一定很明顯的暴露出來。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離中心的力量，是社會的大仇敵，韋布夫婦（Webbs）在多年以前，就反對以職業代表或企業代表，來組成議會，其主張到今日還是對的，並不見因蘇俄實行企業代表制度，而失其效力。

蘇俄的政治組織，乃是要成立一個蘇維埃的社會制度，而不是要實現民主政治，或是造成一個政治組織，以便實行計劃經濟制度。蘇俄所以認為應當以工廠為單位選舉區，乃是因為他們相信，除工人以外，別人無選舉之權，他們的主張，完全與我們不同。企業選舉制度，顯具有兩種特殊作用：一、可以使不是工人的人，無法選舉。二、可以把工人階級的優越，和工人所享受的特權，很明顯的表現出來。凡是願意抄襲蘇俄制度的人，其用心恐怕亦即在此。如若不然，以一個民主國家，要想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大無效法蘇俄之必要。

三 生產工具應歸計劃機關所有

假使如上所說，實行全國計劃，無需乎變更政治組織，那麼企業組織，是否亦無變更必要。我們在上面已說過，要實行計劃經濟，非生產工具，直接歸計劃當局管理不可。同時我們並已花了許多功夫，說到這個困難的條件，這

的確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能用某種方法使我們相信，這個條件並不是絕對必需的條件，那麼，計劃經濟的問題便容易解決得多。復次，如果我們不必事先對人們說明生產工具社會化的必要便可以進行計劃經濟的工作，那麼，我們的問題便更容易解決了。

最近塞爾特（Sir Arthur Galter）極力主張實行計劃經濟制度，並不一定先要實行生產工具社會主義化。他認為我們可以留心現在已經有許多企業團體，或是用推翻舊有的組織，或是正在樹立新組織，都向着計劃經濟的路上去演進了。如商會的組織，工會的組織，僱主的組織等皆是。他認為這些組織，具有兩種性質。一半是自衛的，一半是職業的。關於自衛的，就是說他的機能是在保護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免受與他們直接反對的利益打擊，或是與他們相競爭的利益的打擊。關於職業的，其任務是在求得企業效率的標準，與企業行為的標準，激發內部自勉的精神。這兩種性質，作用範圍之大小，因各種組織之不同而異。但是一般的說來，自衛的性質，是很重要的。據塞爾特看來，這兩種性質中，應集中精力去促進屬於職業方面的機能，使這個機能，成為創製計劃與執行計劃的工具。他說大規模的企業組合，可以將各單位分子，組織起來，成爲一個大組織，使這大組織，在某種企業的範圍內，負指導政策的責任。這種辦法，並不是每種企業，都要這樣辦，我的希望，是想把這個辦法，介紹到混亂的非計劃制度裏，以改革其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至於發生許多無謂的浪費，或紊亂狀況。

這種說法，自然是太樂觀，因為照現在的趨勢看來，自衛的機能，在各種經濟組織中，是很占勢力的。這種勢力，並不只是偶然的現象，乃是離中心傾向惡勢力的表現，即是部分利益，與整個利益不可避免的衝突。我們知道，一

個部分的利益，無論他是一個商店，一個企業公會，或是一個工會的利益，絕不能與全社會的利益相調和。根據亞當斯密斯的理論，似乎他在勸導我們個人，去從事各個人的利益，以求得大家共同的利益。但是他這種主張，要同爭求部分利益的吸引力比較起來，未免太脆弱了。在所有經濟決定裏，任何團體，無論大小，都要發生反社會利益的力量，這乃是因為每個人都是按着自己的利益，對於他的環境發生反應。這種力量，太大了，所以其結果自然會使自衛的機能，在各種部分的經濟組織中，占了勢力。職業機能，在這些組織中，能够占勢力的，祇是很少數的例外而已。這種例外，並不見得能够風行，為大家所效法，而加以擴展。

我所擔憂的，假使一個總計劃，是各部分團體，按着他們自己的利益，所造成的，其結果這個總計劃，充其量，不過代表各種相衝突的利益協調而已，每個團體，都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放在頭裏，大眾的利益，放在其次。我認為在生產工具，與生產本身仍為私人財產的期中，人們還是為着謀金錢的利益，使用這些生產工具，出售這些生產，那麼大部分的經濟決定，還是要依賴每個商店，每個企業，個別的按着他們自己最大的利益，去經營。換句話說，任何一個總計劃的內容，還只不過是背離中心力量的產物而已。生產鋼鐵者，為他自己的鋼鐵打算，生產啤酒者，為他自己的啤酒打算。其結果，這個社會，是大家互相計算的社會，而不是通盤計算的社會。

這個就是表示一個計劃機關，假使不能直接指揮其生產工具，與其所產的出品，其結果他只能有一個消極的計劃而已。我並不認為這種計劃沒有價值，現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採用這種辦法者，已經日益加多，並且他們相當的把億萬人，不相關連的，與無組織的經濟活動，集中了一些。但是這種辦法，有他的危險性，與他的限制性在。

在這種辦法下所決定的計劃，只能代表呼籲最厲害，爭執最力，與本來已經獲到利益的團體，（尤其是那具有專門技能與操作過度的工人們的團體）變成一個專以發表個人意見為能事的機關。充其量，這種計劃，也不過是消極的，也許可以避免非計劃制度太顯露其醜態，但是他並不能達到以有計劃來代替非計劃的目的。他可以吧牛乳、肉等的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規定起來；劃定某區為住宅，某區為工廠；但是他不能使從前就生過一根草的地方，生長兩根出來，乃至於也不能在某工業生產區內，建築一個工廠。他也可以禁止一個地主，把他的地出租，叫他挪作市場之用，但是那塊地，終歸是那個地主所有的，他總沒有權柄，去侵犯他的財產權，去對他下命令，叫他留作市場之用，或者把那個地方，應當要買多少鴨子，多少牲畜的數目，確定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他要叫地主捐出相當的地畝，為市場之用，那麼他就要替地主造成許多有利的條件，引誘地主，到那個路上去。但是至於售賣東西的詳細辦法，仍是要承着地主的意志，去規定。尤其要想法子滿足他自己的利益，而不能為社會大家的利益着想。假使這種現象，在每個生產部門中，都實現了，其結果這種背離中心的力量，一定仍然把一個整個的計劃的內容，打得粉碎。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把蘇俄在工業上，與在農業上所得不相同的經驗，來作參考。蘇俄在工業上所感覺的主要困難，一方面就是他們要想從僅裝一斤酒的酒壺中，取出比一斤多的酒，可是在他們這種過度樂觀的信念下，一方面是工人能力不夠，技術不精；一方面是工廠設備不完全，材料供給量不夠，交通工具的不方便。不過雖然情形如此，他們在工業上不見得因為這個原故，就把不完全的設備，整個毀棄了，或者不願意按照計劃的規定，去

使用固有的設備，或者把他們出產量限制了。但是農業方面，則不然，屠殺牲畜的情事，屢屢發見，農人們簡直拒絕耕種的數量，超過他們自己的需要。因此農業計劃，大受打擊，這種農業與工業不同的現象，並不能完全以農民有特殊心理來解釋。現在工廠裏的工人，從前也就是農民。工業與農業最重要不同之點，就是在乎在農業方面，雞和雞蛋，牛和牛肉，土地和五穀，是屬於直接出售這些東西人們的財產，就是集合農物，也是一樣。這些人在某種條件之下，自然可以互相合作，但是這些出品出售後所得的價格，是這些人們的部分利益，這一點在計劃之內，應當替他們注意到。

四 計劃經濟與價格機構

其次，我們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第一點，一個成功的計劃經濟，其依賴價格機構的成分，或不依賴價格機構的成分，是到何種程度？第二點，計劃當局需用貨幣，和價格的範圍，有多麼廣？假使他仍然需用貨幣與價格，其用意還是僅僅爲求表現方法方便，還是仍像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那樣，把他當作左右經濟政策的權威者？這些問題，在我看來，似乎應當加以詳細研究。現在一般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已經開始在注意這些問題。我想在幾年之後，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大家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目前我只能暫作下列幾個臨時的解釋。

第一，我們應當認定一個計劃機關，不可以整個的，並自動的，爲價格制度所左右。我們不可以僅僅將貨物出售於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上，按照出售後得利之多少，與盈虧，以決定生產量之應當擴張，或應當緊縮。假使一個

計劃機關，不能達到其自身有規定價格的機能，並且不能在規定之後，予以準確的遵守，那麼這個機關，就不能叫做計劃機關。假使設立一個機關，在他未設立之前，有許多工作，還能比他做得更好，那麼設立這個機關實是很無聊。假使經濟決定可以由價格機能來決定，那麼所有經濟決定，還是聽他由那許多各自為政的機關，和一種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力量，去決定，又何必我們費盡人力，把他詳細籌劃，反而得着許多不滿的結果呢？

但是在這本書裏，我們已經多處說明，這個價格制度，不能供做這個用處。假使我們把他當做理論分析的工具有，他似乎可以使我們很準確的去解釋經濟效率的意義，並且還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各種經濟問題得到一個清楚的觀念。因此之故，經濟學者莫不把價格制度當作一種可供玩弄的東西。凡是人們歧視價格機能，具有普遍價值者，經濟學者莫不表示憤怒。他們的結論，不是以為計劃經濟不是一個好制度，因為也不能聽價格機能的左右，就是反過來說，惟其是計劃經濟制度，價格機能纔能充分的發生效力。但是關於討論這個問題，事實與理論之間，實在有一個大鴻溝在。在事實上看來，價格機能是正在與那個沒有法子可以解決的問題，奮鬥之中，他要想法子去衡量，並且去比較那個不能衡量的東西，所謂用別一個人的快感，衡量一個人的工作。但是這是與習慣風俗相違背的，並且是一種錯誤的衡量方法。我們絕不相信，我們可以在一個人們的經濟決定，受對價格機能反應支配的社會裏，能達到最高經濟效率的目的。

同時我們若是認為在一個社會主義化的計劃制度之下，可以造成適合的條件，使價格經濟的功用，可以很準確的運用，可以使生產的成本，與慾望的滿足，可以獲得真正平衡，這種說法，也不免有說不通的地方。誠然，計劃

制度，也許可以糾正一些目下價格制度的缺點。比如解除目前分配不均的毛病，或者還可以確立一個假定（恐怕只能是假定而已），就是說，我為某種工作，願意出一個半先令去僱人工作，同時也可以有人願意為這個半先令去做那件工作，這件工作的成功，乃是為你我雙方相互的利益所在。但是我們要小心，假使計劃經濟，在這一方面既可以改進價格制度的可靠性，那麼他在另一方面，恐怕正要發生相反的結果。假使我在第二章裏所主張是對的，那麼在儲蓄與投資，都是由集體辦法來實行的狀況下，我們很難為所有生產的成本，尋求一個客觀衡量的標準，並且也絕對不能有一個極端可靠的指數，可以指示給計劃機關，說到了某種程度，出產量的增加，是不急迫需要的，使那個出品的成本，有所依憑。所以，計劃機關方面，一定要具有一種能夠武斷決定的機能，他可以斷定煤應當出多少萬噸，白薯應當出多少噸，他所以作這個決定，並不是因為這些數目，乃是達到某種數字的限度，多出一噸，就會發生錯誤，乃是因為在計劃當局方面看來，這種數量，是一個適當的限量。其所以決定這個數目，其武斷的程度，與他將來也許還要改為別的數目，是一樣的。換句話說，計劃當局，應當準備去解釋他所以定這個計劃的一般原則，可以用籠統的說法，去聲明他的理由。比方說，他可以說生產白薯，是有益衛生的，是可以使人民富足的，可以使人聰明，在他們考慮之下，某某地方人民的職業問題，是可以多出產白薯解決的。但是他們不可以存有捨卸責任的心，（指作一種決定的責任）指出白薯成本與售價的數目字，鄭重的認為根據這個數目字看來，他們的決定是對的。

在另一方面看來，計劃經濟除非在計算的方法上，相當的利用現金價格，他是很難進行他的工作。蘇俄廢除

現金會計制度所得的教訓，現在還是有價值的，可以做我們前車之鑒。所以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價格制度的第一個作用，就是用以表示計劃的內容，並且還可以用以核計計劃的實現。換句話說，一個計劃，應當提議其中含有多少某種貨物，應當出產多少數量，成本要多少，售價要多少，假使決定這些數量，與計算成本與售價的方法，是需要加以武斷決定，那麼計劃經濟一定要用現金的數目，去說明他所要計劃是什麼。不過我們要注意，這種計算的方法，一經應用之後，那麼無論任何計劃，一定要從頭至尾，遵守這種計算的方法。這種計算方法，並且還可以幫助計劃當局，去表現他們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什麼，如其沒有完成，還可以發現在什麼地方，沒有完成，其沒有完成的數量，有多少。比如說，在計算成本的時候，我們決定其中要包含有百分之四的利息，這個自然是一種很武斷的決定，我們並沒有法去決定，按照計劃，這個百分之四的利息，是否足以抵償我們資本設備所應付的利息，還是要比百分之四多，或者還是要比百分之四少。但是一旦這個數目字，及與他有關係的數目字，決定了之後，那麼凡是只能得到百分之二的利息的企業，可以證明他不能與我們原計劃所要實現的目標相符。並且我們可以根據這個現金計算的方法，推測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所得的結果與原計劃相差的程度，是百分之五十。所以我們在這種地方，就可以想起我們在前而曾經提過，價格制度的好處。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他當為記載數量結果的工具。因為我們無論執行任何經濟計劃，都免不了有錯誤，要有準繩來衡量這個錯誤的限度，當然是必需的。

並且在某種有限範圍之內，價格變動的情形，在計劃經濟制度，會同非計劃制度之下，相像的。所謂有限範圍，其中有一個是關於各種職業工人的分配問題。關於這一點，價格制度的用處，要看我們利賴他的程度有多麼

利害而決定。此外還有一個範圍，就是關於貨物供給量的分配問題，這些供給量，是指已經生產出來的供給量，要如何分配於使用這個貨物的消費者而言。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是談生產的最後一個階段的問題，就是說，一塊麵包，經過了許多生產階段，一直從耕田的人起，到最後達到賣麵包吃的人手裏止。在這最後階段裏，我們所要決定的問題，是如何規定價格，而後纔能使已經生產的貨物，能得到他們的市場。在貨物或者人工還具有有限性的狀況下，我們對於這個最後階級，僅有兩種法子來解決。一個就是採用一定的數量攤配的方法，如蘇俄攤配食料那樣。另一個就是標明貨物的價格，讓購買者花錢購買之。

第二個辦法，勝過第一個辦法的地方，是在乎第二個辦法，可以將消費品的樣子，顏色，質量，排在消費者面前，讓他有選擇的機會。至於攤配的辦法，那我們就要把每個人的消費，都加以固定。假使我們所定的標準，降到最低限度之下，或者在一個社會裏，大多數的人民，都有獨立的主張，不願意受這種攤配的限制，這個辦法，就沒法子進行了。比方說，有些人願意多花錢旅行，而不願意謀家庭的舒服，而同時有些人願意一年到晚都在家裏，把家庭佈置得很好，這種個人的所好，是沒有什麼害處的，並且爲求生活有變化起見，他們應當有這種各有所好的習慣。

其實在計劃經濟制度下，計劃當局，既有全權決定生產的方向，那麼用價格來支配分配，比較用攤配來支配，其區別是這樣子的。在攤配制度之下，消費者是受人強迫，去使用人家給他使用的東西。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選擇力，完全失落了。但是在價格制度之下，其選擇的機會，是受事實的限制，第一，凡市面上沒有的東西，人們就沒有法子能買得到。第二，計劃當局盡力想法知道全社會的消費者，確實把市面已有的東西買完了，他爲達到這個

目的起見，可以從中想法子引誘消費者，多多購買他所以已經決定要實行大規模生產的東西，其最主要的引誘法子，就是把這些東西的價格，定得很公道。假使他充分的應用這個政策，根據非計劃經濟的試驗，他是可以成功的。因為貨品價格，定得非常低，自然會有人去購買那些東西。但是這個政策，只不過是一個引誘的政策而已，並不是一種強迫的辦法，並沒有人是被人強迫一定要去購買某種東西。假使價格制度，要能這樣子運用起來，在一方面，計劃當局仍然可以細心從長籌劃社會上所需要的生產數量是多少，其趨向是什麼，同時在另一方面，每個人還可以就他自己所好，與他能力之所及，在這個價格範圍之內，有他自己的自由。

蘇俄目前所採取混合攤配制度，售貨取現金，授予特權又不用現金，同時價格的規定，又按着購買者的收入，而有區別，實在是很笨拙的辦法，還不如專門應用價格機能，來支配分配的方法為愈。蘇俄攤配制度，可批評的地方，除以上所述之點，此外我們還時常聽見在蘇俄工資少的工人，可以比有多量收入的人的生活狀況好些。因為工資少的人，可以享受種種特權，如同可以在工廠商店，買價格便宜的麵包，房子可以按着租戶的收入，而有差別，同一房子，收入少者，租錢少，收入大者，租錢多。這種辦法，一方面是用一種特殊的辦法，來支配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是連帶的影響到貨物與人工的分配。同一貨物，因各人收入之不同，而定出各種不同的價格，結果只是使分配增加了許多麻煩。其實假使我們認定某甲應當比某乙占便宜，那麼要達到這個目的，最簡便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多給某甲以現金，使甲乙二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去購買市場上的貨物。可是蘇俄所用的特殊辦法，似乎有他的用意。他們認為不直接用現金去表示特殊的享受，可以不至於引動人們貪慾的本能的。此說雖云簡單，然若

謂有特別購買的權利較有同樣金錢的收入爲好，未免太過質樸。

五 計劃經濟制度與經濟動機

我們在開頭研究蘇俄計劃經濟的時候，就得認定假使沒有人能够執行計劃，那麼製訂計劃，是無用的。換言之，一個建設的計劃，需要有相當的人和事，能受他的控制。比方說，按照計劃，這裏應當採煤，那裏應當設電力廠，這個鋪子應當賣綢帶，那個應當賣報紙。可是同時這個計劃，還需要能够調動相當的礦工，相當的電匠，相當印報紙，做綢帶的人，去執行那些計劃。所以我們進一步要問的問題，就是要在什麼一種適合的條件之下，我們纔可以把這些應辦的事辦成，而後纔能使紙上的計劃，變成實在的事實。

爲答覆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這樣子的。我認爲應當利用引起經濟動機的老辦法，爲執行計劃的主要工具。（自然其應用的程度，要受相當的限制。此點將於下論之。）使一個計劃，在民主社會裏，能够在地點與職業上，獲適當工作的分配。換言之，關於工人分配問題，我們在工人市場裏，要維持價格機能作用的情形，應當與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利用價格機能支配工人分配的情形一樣。計劃當局，要執行一個計劃，固然最方便最直接的方法，是他能有自由調遣人的全權。換言之，控制人的力量，如控制東西的力量一樣。但是這種辦法，有一點樹立奴隸制度的意味，不但限制人的自由，並不是政治上所走得通的，更不是一種理想的辦法。所以引起經濟動機的辦法，並不是用強迫的辦法（除在某種少數特殊情形之外），乃是用另外一種辦法，來引誘人，去做計劃內所要做的事。

近來主張引用經濟動機，來啓發經濟活動者，頗不乏人。但是最近頗不爲社會主義者所贊同。第一，他們認爲我們所以孜孜工作，有別的原因在，並不是專受物質收獲的驅使。第二，這些別的原因內，有道德的含義在，並不是專爲求金錢而工作。第三，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這種道德含義的發展可能性，比在一個大家孜孜求利，以金錢爲一切活動的動機的社會裏，比較大。他們尤其認爲我們之所以工作，乃是習慣使然，或者就是就因爲我們寧願做一點事，而不願不做事。有許多人簡直認爲做事是服務社會的義務。在某種情勢之下，我們好像是受某種義務心的刺激，而發生反應。這個刺激，就是我們認爲這整個社會，是由每個人的一小部分的工作，聚集而成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誠欲利用上面這個動機的潛勢力，以爲執行一個大規模全國的計劃的工具，那麼我們一定要很詳密的考慮，這個計劃的本身，與執行這個計劃的人們，需要發生一種什麼關係。我們尤其要記得，任何嚴密的計劃，都是要準備發生變化的。縱使他在開始時候是從現狀做起，但是他的任務，總是要在現狀上謀改進的。就是在目前試驗計劃制度的國家，他也是已經正在繼續不斷發生變化的狀態中。技術上的變化，換新了生產的方法，發現了新的技術與新的工具；人口生死上的變化，改換了人口的成分；（人口的成分，分爲兒童，成人，老者）購買者好惡標準的變化，需要製造前此所未有的新奇商品。根據這種種情形說來，凡是一個計劃，不能隨時適應這種種變化，就不是一個好計劃。任何好計劃，其最後成功，莫不與原計劃兩樣的。除非計劃的期限短，要不然，在他執行的中途，莫不需要修改，以求適應新環境，俾計劃可以繼續不斷進行。但是一個計劃經濟制度社會，不可以太過於注重這種種伸說性，與適應性。因爲在一個計劃沒有進行之前，人們總是比較容易按着舊計劃去進行，計劃當

局，很容易有保守舊政策的成見。所以最重要，就是隨時要想法子，克服這個成見，並且執行新計劃的工具，尤其要富於反應性與伸縮性。

根據以上這個考慮，我們發現以工作的習慣，與人們好工作的心裏，來代替非計劃經濟社會裏所利用的經濟動機，其可能性實在是有限制的。但是限制的重要性，時常為人忽視，尤其是那一般社會主義者，因為恨惡社會的不平等，所以非常不贊成以經濟動機為工具。比如蕭伯納就認為他所以敢大膽主張普遍實行報酬均等的辦法，乃是因為報酬均等的辦法，就是在資本主義裏，也已經有實現的了。比如相同地位的法官，議會的議員，軍隊的兵士，他們的報酬，都是相等的。但是蕭伯納的錯誤，就是在這一點，因為他認為在一個階級裏，報酬既是可以相等，那麼將來報酬均等的辦法，很可以加以推廣，使所有階級的報酬，皆為相等。一個郵員的報酬，不但與別的郵員相等，並且還可以與兵士議員別的階級分子相等。但是他沒想到一個當法官所得的報酬，與別法官固然相等，但是人們並不是認為當法官是事業的終點，假使沒有經濟的動機在內。階級的廢除，固然可以把現在已有的各種報酬不相等的現象減少，雖然經濟的動機，還可以引誘人辭退這個工作而做別個工作。但是報酬均等，要完全普遍實行，或者我們把經濟動機也都消滅了，那時候，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出來支配各種工人的分配，要不然，假使我們遇到多需要幾個郵員，少要幾個法官的問題發生，我們又要怎麼解決呢？

習慣當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習慣可以使製造輪子的輪匠，繼續製造輪子，一個醫生，繼續施醫，一個女招待，繼續招待，一個教授，繼續授課，或者還可以進一步使輪匠的兒子學製輪子，醫生兒子學醫藥，女招待的女兒做招

待，但是習慣的力量，沒法子多產生幾個醫生，少產幾個輪匠，多有幾個女招待，少有幾個教師。在事變的時候，習慣是維持一個經濟制度繼續存在的極寶貴的助力，就是在平常時候，其力量也很大，因為發生變化，總是一種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定例的狀態。人們從前願意墨守舊規，而不願意發生變化，但是習慣之外，須加上一種別的力量，而後他纔能適合新環境。這種新環境，在一個非計劃的社會裏，是各種不相關聯的力量，偶然湊合而成的。在一個計劃的社會裏，乃是經過明白規定，而換新的。除以上所說外，我們在尋求所以能够按着計劃當局所決定的計劃，去從事工作，還有一個動機，可以代替為個人謀利益的動機，就是所謂社會服務的精神。男女人們所有的工作，都可歸納於這種精神的表現，可以說是對這個精神發生反應。這個特例，我願意用一個字形容他，就是向上的精神。向上的精神，可以引導人去努力這個，去做那個。如愛國，對一團體負責，盡忠等精神，都是向上的表現。

關於向上精神的價值，心理學家自然還有許多可說的。不過關於這個動機，根據我們研究的經驗，我們應當原諒一般人對於以這個動機為原動力的經濟制度，表示懷疑。因為我覺得我們對於人類的一般性情，要不顧到他們平凡的見解，我們在啓發社會服務的動機的時候，一定會隨帶着發現兩種不如人意的現象。

第一，前面已經說過，就是我們要以全付精神，盡力於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團體，一定會聯帶的對於其他一件事，或者其他一個團體，發生憎惡的心理。我們認為利用喚醒人民國家的意識，是可以為成一件以全國為對象的偉大事業的工具，一旦國家從事戰爭時候，與蘇俄五年計劃的經驗是為其例。但是在第一例子裏，盡忠的心理，與憎惡心理，是如雙生子似的，離不開的。比方說，在戰爭時候，我們不為敵國服務，就是表示為自己的國家服務，為自

己國家服務，是盡忠於自己國家，不為敵國服務，是憎惡別國。

第二，太注意社會服務的精神，會產生一種不能忍受與虛偽的精神，相混雜着的現象。這個現象，不是好的現象。至少在蘇俄，是這樣的。在蘇俄，一方面是盡忠於共產黨的精神，一方面是犧牲自己的精神。這兩種，都是很單調的，都是出於情感的作用。其結果會使人們造成向單方面發展的特殊人格。我對於他們這種精神，並不表示懷疑，我也並不認在一般不能離羣獨立的男女們的心中，確是有一種社會服務的潛勢力存着。凡是在學校、在機關、在工廠、在家庭、各種團體裏有過一些團體生活經驗的人，不能不覺得人們確是具有這種精神，並且其發展的程度，因人而異。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的，這種對社會負責的精神，我們充其量，只能承認有這麼一種精神存在着，假使要把他明明白白的，當為喚醒人們從事某種工作的一種工具，那麼他的價值，就要漸漸減退了。在一個沒有從頭到底，完全瓦解的社會裏，每一個普通的人，我們都可以信賴他可以規規矩矩的，從事他的工作，都可以相信他具有不願意，卸責於人的精神，並且還可以想到他不至於太犧牲自己，或者對於自己表示自負。以上這幾種精神，可以在平常日常生活看出來的。我們只要知道，他走進別人屋子以前，願意把鞋刷乾淨；離開一個屋子時候，願意把電燈滅了；在醫院的窗口，可以禁止他自己吹喇叭；就可以證明他有這種精神。但是我們要想叫一個人，放棄甲種工作，去做乙種工作，或是為大家的好處，去接收較少的報酬，並延長他的工作的時間，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因為第一、人們並不自己覺得為社會大家的利益起見，他應當改變他的工作，好像他覺得他的喇叭要擾亂病人，他的襪鞋要為主婦所不喜歡那樣。所以照這樣看來，假使要叫他對於一個經濟計劃，去盡他應盡的社會義務，一定

要用許多話來指示他。換而言之，要使他十分明瞭，他自己所做的事，及他所以要做這件事的動機，那麼其結果，就是使他變成一個自負的人。

第二、一個計劃，有的時候，需要個人在行為上，大加變更，其變更的範圍，要超過目前非共產主義國家所認為社會服務精神的標準。一個人要把他的國家觀念，提高到最高點，而後纔能盡他的責任，我覺得這種提高的現象，是做不到的。並且是有危險性的。因為這種現象，只能在一個大家永遠都是在自覺自矜，與大家互相贊揚的社會裏，維持得住，並且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定要時常抑壓個人的所好，與個人的方便。我很懷疑這種壓迫人格的現象，在心理上是否一個大損失。

由此看來，所謂社會服務的精神，其正常作用，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就團結社會的作用來說，這種精神的價值，是無限的。並且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裏，文化漸漸提高，大家對於社會服務的精神，一定會自然而日益擴張。我在前章已經說過，這種社會服務精神，在過去已經成就不少事業，其將來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是這種精神的造成，是漸進的，不是可以明明白白可以指示出來的。如其我們如果要想保存他的價值，不使其附帶產生別的不好的現象，一定要讓他自己慢慢發展，強迫是不成的，是要失敗的。實行經濟計劃，想到賴人們對於社會服務的精神的反應，而進行其計劃，那麼非用強迫的辦法，是不會生效的。

如上所述，我們一個人的行動，欲求其動機，是起於為人的，乃至於為全社會的，是有他的限制的。這種說法，好像是很驚人的。但是我認為根據經驗的教訓，去推測，這個限制，是確實有的。要超過這個限制，其危險的程度，並不

滅陷於利己主義的害處。因為我們不能永遠生存在超然向上的社會裏，除非我們能够真正犧牲一切，對於我們自己，或者對於別人，永遠不斷的克己。這正是基督教和布爾雪維克的理想，所不能做到的地方。

在一個社會裏，與上面這種超然向上的精神相違反的，就是由於為個人謀發展的動機。這種動機，在一個社會裏出現着，好像是一種平常的現象，好像反而使社會感覺一種自然空氣。所以就是在蘇俄，現在他們也已經放鬆他們理想，讓這些謀個人發展的動機，有發洩的餘地。莫斯科新聞報，是一個用外國文字發表的報紙，其目的是在使別國來參觀蘇俄的人，對於蘇俄表示同情。所以他們極力把他們在制度上，可以走得通的事實，發表出來。有一天我在報紙發現 N. Shatokhina 女士大張言說，她在集體農場努力工作的結果，得了許多錢，可以供她自己買鞋、大衣、襯衫之用。她顯然是要表示她和其他自謀生活的女子，現在是可以相當富有了。同時還有一位 Ivan Buzak，也是同一個集體農場的一份子，他說，他起初有一個時期懷疑，假使他加入集體農場，他是否可以真正得到他加入農場時，他們答應給他的錢、菜蔬等等，他事前先把他可以得到的數量計算好，其結果發現他所得的，只有比他所預料的多。所以他和他的妻子，就決定去買靴子、大衣、背心、襯衫等，並且還買了許多豬、羊、雞子。

照 N. Shatokhina 與 Ivan Buzak 所說的話，及他們兩個人所代表那些加入農場的人的志願看來，我們是可以承認圖謀他們自身和他們家庭的較大幸福，是計劃當局所以能够吸引社會一般人，去按着他們計劃去工作的主要動機。總而言之，利用經濟動機，是一個最聰明最合理的政策，去表現人類能够充分善於利用天所賦給人類許多寶貴的東西。天把智慧放在人們腦子裏，天把力量放在我們筋骨裏。這個政策，照我看來，他本身是

很合乎中庸之道的。其所以遭人反對的地方，乃是因為有時候甲如有所得，則乙即有所失。實在講起來，這個政策，實在是計劃當局應當用他為執行計劃的準繩。計劃之效率如何，就看他能達到這個政策所要達到的目的的程度如何而定。所以照這樣看來，人們在他和個人生活中，應當承認努力與代價，仍是有相當的關係存在着。

反對依賴經濟動機的唯一理由，就是說，這個動機，會引起每個獨立團體，各自為政背離中心的現象發生。我們一旦決定了某種工作的報酬，要比別的工作高些，以期吸引更多些工人，去從事那樣工作，那麼連帶的就會引起那個報酬高的工人，去維持他們那種工作的希罕性，而提高他們報酬的水準。我在上面已經把這一點提過了，其中有兩點，讀者可以注意的。第一、在執行計劃的時候，我們不願這個趨勢的發生，任其自然的去影響計劃的執行，與我們有意讓他來影響這個計劃中，所含的幾種重要的經濟活動，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第二、在一個生產工具都歸固有的社會裏，所有工人，都是在一個總機關指導之下活動，其對付這種危險趨勢的力量，比在沒有一個整個計劃的社會裏強些。在那種社會裏，工人的問題，都是由各種工會，各自以自己利益為前提來決定的。

不過這種各自為政離中心力的現象，我們又不必太為之擔憂。我現在可以把它一個依賴經濟動機，來執行計劃的計劃經濟制度，可以用什麼工作，來抵抗這個離中心現象的發生，簡單說一說。第一、這個經濟制度，對於某種職業團體，或是某個人在某種工作上的既有的利益，要下一種狠心。我們不能承認某個團體，享有較高的生活程度，就可以永遠繼續享受他那種優先的利益。穩當安全，固然是任何經濟制度的要素，一個國營的企業，固然可以同工人訂立一個相當時期的契約，但是不能讓甲契約的內容，有損害乙契約的地方。我們應當把履行契約的責

任，永遠放在那些求得較高報酬的人的身上。報酬的規定，總是趨向於報酬平等的原則。我們對於具有特殊技巧，負有特殊責任的人，固然可以給他特殊的報酬，因為根據經驗，這是需要的。但是一旦發現了某種工作，不必他，別人也可以做，那麼我們就不能繼續的給他特殊報酬了。

爲實行這個政策起見，計劃當局應當採取有效的辦法，阻止那些特殊職業的工人團體，使用獨占的力量，拒絕具有同等資格的人加入他們的領域。在決定工資比率的時候，代表國營企業機關的經理，與代表工人的工會談判的情勢，應當要同在目前制度之下，資勞兩方，都有互相交涉力量的情形一樣。但是在一個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工會方面，應當放棄部分的利益。（所謂部分利益，我心目中所指的，就是那些用法子拒絕別人加入限制別的工會，或職業團體。）在計劃經濟社會裏，所有職業團體，企業機關，應當開放門戶，任人加入。如其在資格上，要加以限制，這個限制，應當由中央計劃機關決定，不能由代表醫生，代表礦工的部分團體，去個別決定。

再次，我們在上邊已經提過，計劃當局絕不能讓任何人表示，他有永遠操守某種職業的特權。聰明的計劃當局，應當知道無論何人，他所能做得好的事，其數目是有限的。大體說起來，凡工作爲我們所熟悉，所願意做的，我們就可以比別人不熟悉，不願意做的人，做得好。假使叫一個極專門的人才，去做隨便任何人都能做的事，那就是浪費，但是我們可不要太拘泥於這種簡單的原則。有時候，也許需要變通辦理。比方說，我擔任教授經濟學，有十年功夫，假使根據計劃的需要，那個大學，應當停辦，我應當被停職了，可是同時我在任何別的地方，都尋不到教授經濟學的適當機會，那麼我一定要準備去接收我所能做的別的工作，要不然，我就要挨餓。比如到一個飯館裏去洗碗，

去做廚子，或者去做記帳員，我不能閒着做社會寄生蟲，一直要等到我能再尋到從前教書的機會為止。但是假使計劃當局能給我任何事情，是我能力所能做的，那麼我當然可以要求計劃當局維持生活。但是一個計劃機關，要想很有效率的支配所有工人的分配，並且要求其能隨時適應計劃的變更，與推展，那他一定要承認這個原則，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總要絕對否認任何人，在任何職業中，有一種既得的利益。

假使注意到這一點，那麼部分利益，各自為政的趨勢，可以不至於成為計劃經濟的一個嚴重的威嚇。此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辦得到的，就是可以相當的利用直接強迫的辦法，去控制經濟動機的使用。所謂強迫，從積極方面說，就是強迫命令某一個人，去做某一件事，用法律的力量，去執行這個命令。關於這種強迫方法，我們認為僅能在奴隸社會裏使用。據我們觀察，蘇俄似乎還沒有完全廢除使用這種強迫方法。我認為這個辦法，不能在民主社會裏實行。比方說，以軍隊來擔任工業的工作，絕對不是一種辦法，除非在特殊情形，或嚴重的狀態下，也許可以適用。同時精神的壓迫，也是不成的。比方說，強迫在鄉村裏工作的人，到城市的工廠裏去工作，或者強迫私人，放棄私人財產，去加入集體農場，其可反對的程度，也不減於直接命令式的強迫。但是以上所反對的兩點，並不同樣的適用於使用消極的強迫方法。就是說，在一個計劃經濟社會裏，我們規定經濟動機只能在某種範圍內，可以自由發生效用。我尤其認為假使某種職業，在某個計劃之下，其工人尋到工作的機會，有減少的趨勢，那麼計劃當局，應當有權力募集那種職業的工人。我們不讓一個人得到做木匠的機會，與去命令一個人一定要去做擦玻璃的工作，是兩件不同的事。停止召集的辦法，就木匠而言，其對於木匠的益處，大過我們明知知道充任木匠的機會，一定會減少。

而一定要把那個木匠的名字，放在木匠的單子上。這種消極的限止辦法，在非計劃經濟社會裏，已曾經有發現過類似的情形。根據一九二六年礦業法案，工人部長，可有權力規定招募礦工的辦法，就是在招募礦工的時候，其應募的優先權，要讓給已經做過礦工的人。這個辦法，雖沒有實際的執行，但是工人部長與礦業廠主，曾經有過正式的約定，就是說，廠主們已經根據這個原則，立定一個計劃，限制新工人加入礦業。我想計劃機關，可以更多的使用這種權力，隨時命令國營企業機關，在某種職業裏，禁止接受新募的工人，或者他們還可以用更澈底的辦法，去限制工人進一步的跑去擔任專門的工作。這個辦法，就是停止招收受專門技術訓練的學生。

關於這點，我還想出另一種消極強迫的方法，就是由法律規定，凡是工人對於他們的工作，在忠實與效率上，都應當達到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若達不到，就要受法律的懲罰。但是我對於這個辦法，目前還有些懷疑，因為其發生流弊的可能性很大，同時我們也很難確定工人的工作，要如何的不好，纔能說他是犯了法律。蘇俄對於意工的犯罪，雖有詳細的規定，但是還免不了這個困難。不過他們現在所感的困難，也許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大注意到這種辦法，會發生不公平，與使人受冤屈的流弊，一方面因為他們還沒法子立出適合的條例，去解釋這個犯罪的行為。但是我認為目前我們雖不能確定在一個計劃經濟社會裏，應當把勞工玩忽義務的罪狀，規定在刑法內，但是這個問題，實在值得當律師的人們，去注意的。因為這是一件極尋常的事，為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就是說，凡怠惰偷閒不做工，或是用種種法子，去破壞生產能力的人，在原則上，是與竊盜行為竊取別人在法律上已得的財產，是一樣的。假使法律能在這兩種行為上，承認其有相類似之點，那麼研究法律的人，在這方面，就應當有所改善。

而後使計劃當局，在執行計劃上，可以增加他的力量，可以提高他的效率。

為避免誤會起見，我們要注意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用消極強迫方法，來限制計劃當局，用命令式的強迫方法，來支配工人的分配，並不包含有干涉計劃當局，有支配工人，去做某種工作的權。我已經說過，在一個計劃經濟社會裏，任何人在一定範圍內，都可以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其所以決定的方法，多半是由他自己比較各種職業的報酬，與前途，就他自己所認為最優良者，而決定之。並不受別人命令的支配。可是一旦他已經開始去做某種工作之後，他就應當在這近代生產組織複雜的環境下，按情形所能允許，去從事某種生產。換句話說，他應當聽從負企業行政責任的經理，或是工頭的指揮，去從事工作。讀者於此或者要注意到，在這本書裏，並沒有提到在一計劃經濟社會裏，企業內部的管理方法，應為如何。關於這一點，其理由甚為簡單，因為關於企業的管理問題，並不因一個企業，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經營，或是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經營，而受到重大的影響，蘇俄在他實驗計劃經濟的初期，就有見及此，所以他們在廢除用工人委員會來管理工廠的制度之後，就採取由經理全權管理的辦法。每個經理，都有權力，下命令，大家對他都要服從。經理自己，就對管轄那個工廠的托拉斯，或是其他上級管轄機關負責。任何企業，要求其在行政上不混亂，一定要有一個最後的負責人，能夠有作最後決定的權力，並且他的最後決定，還要能得附屬機關的擁護。從一部的主任起，到工頭止，在工作效率上，都應當對這作最後決定的人負責。這種情形，不論一個企業的經理，是受計劃機關的指揮，或是受董事會的付託，或是由他自己經營一切，都應當一律是這樣的。一個經理，享受這種全權，並不妨礙他可以在整個企業政策上，相當顧到這個政策對於他所監督下的

工人將要發生何種影響，而由他爲那些工人，貢獻他自己建設的意見。每個企業，爲要保障工人的特殊利益起見，是很需要設立一個工人代議機關。這個機關，設立之後，職工生活上的安全，與便利，都可以澈底討論到，並引起管理當局的注意。並且從這個代議機關裏，可以把工人的特殊經驗，貢獻出來，以謀全企業的利益。但是這種機關，僅能具有顧問性質，並且多半僅能討論關於某種計劃，對於工人的某種利益，有何衝突的問題。這個機關不能有討論與決定政策之權。產量貨物的售價，及工人的工資等等，皆不在其權限之內。這部分有關於政策的事情，經理也都不能參加決定，因爲這些事情，是關係全社會的福利，並不是僅僅關係某種特殊方面的工作，應當由一個留心這種廣大利益的機關，去決定。這個機關，是直接歸中央計劃機關的管轄。經理的任務，只是負責把這個機關，所決定的政策，加以實行。這個工人代議機關，也不能涉及人員的升降問題，乃至於在工作時間，工人是否可以吃煙的問題。某種工作，要用何種機器，也都不是他們所能涉及的。這些問題，要讓負責的經理，去考慮，去解決，經理將各方有關係人，及專家的意見，收集起來，而後他在其中，就與上級計劃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相符合的地方，加以決定，加以解決。經理是要對上級機關負責的。近代企業，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社會，或是非計劃經濟社會，都不能用召集大會的辦法，來執行事務。

六 實行計劃經濟國家之自給問題

最後我們要提到一點，以證實我在這本書背後，所假定的一個臆說。這就是說，一個國家，可否以一國爲單位，

從非計劃經濟制度，改變到計劃經濟制度，並且能仍舊繼續與世界其他各國，發生貿易關係。換句話說，以國家為單位的計劃，可否不以依賴國際之間有一個國際的計劃經濟。

很明顯的，假使一個國家，他的經濟，一大部分是靠國際貿易來維持，那麼他要想製成一個全國的經濟計劃，比起一個能够自給的國家，是要困難些。雖然在原則上，計劃的方法，是一樣的。比方說，無論計劃當局，是應用國內所產的麥，而計劃製造一百萬塊的麵包，或者是用加拿大所產的麥，或是蘇俄所產的麥，而在英國製造麵包，都是一樣的。在前一個例子裏，計劃當局要為農夫決定播種，和收割的辦法，要為麵包商決定磨粉的辦法。這些辦法，都要詳細包含在計劃之內。在後一個例子裏，計劃當局要對於從國外購買麥的供給量，規定一個辦法，同時還要規定英國應當出口多少機器腳踏車，多少玩具，多少煤，而後纔能將其國外所得的收入，付給購買麥的錢。自然這些機器腳踏車，玩具，煤的產量，也應當詳細規定在計劃之內。但是製訂後一個計劃比製訂前一個計劃困難一些。因為一個計劃機關對於國內的經濟活動可以運用價格機能，在許多購買者競爭之下，來支配貨物的數量。並且還可以用價格機能，支配各種工人的分配，其控制市場的力量，可以用操縱價格，與生產的辦法，來達到目的。比方說，他可以用在甲貨物上所得的利潤，去津貼製造乙貨物的成本，這樣子一來，一個計劃機關大可以指揮價格機能，而弄出一個正確的國內計劃出來。

但是國外市場的變動，不是計劃本身所能左右的，其情勢就大為兩樣。關於這一點，國家計劃當局負責人所處的地位，很像一個商人，在非計劃經濟制度之下，所處的地位。他們一定要把市場的變動，姑作一個假定，而對於

這個假定，謀適應的辦法。至於具有獨占性質的貨物，即爲例外。不過一個計劃，要顧到國際貿易的變動，其錯誤的可能性，較之一個計劃，對於國內市場，具有控制的權力，一定是大些。關於這點，自從一九二九年，各種需要食料品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開始極度的降低以來，蘇俄已經感着困難。蘇俄本來希望在出口方面，運出麥、牛油，以抵償他們在入口方面，所付的價格。因爲食料品價格的降低，結果使蘇俄所希望的，完全推翻，他們所運出的貨物，所得的，不足以付他們從國外購進貨物的價格。結果他們所要運出口的數量，超過他們本來所預料的數目，同時自然連帶的影響到國內市場，因爲國內消費者，本來所應得的數量，現在也要望國外市場輸運了。

像英國這種國家，絕無利用自己出產，謀自給的能力，其須要中途接着國外市場的變化，（不是計劃能力所及的）而修改其計劃的時候，一定很多。但是這一點，並不是表明計劃與自給，一定要有一種必要的關係。所謂貿易，無論是國內貿易，或是國際貿易，乃是表現兩個生產者，互相交換他們的生產品，兩方面都承認貿易的結果，是與兩方面都有利益的。所以貿易之是否能成功，全看這兩方面是否都承認在某種條件之下，這個貿易，是與他們兩方面都有利的。同時還要看兩方面是否願意出錢，去買別人的貨物，而各人自己所要求的價格，都不是太高。但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計劃當局對於這兩方面，可以達到同意的條件，並沒有法子，可以加以更改。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經營國際貿易者，不能違反計劃內之規定，自由與人實行貿易。至於在非計劃制度之下，國際間之貿易，就完全按着價格機能之運用，就其最有益於我者反應之。

實行計劃經濟，必需謀一國之自給，以期不必仰給於他國，這種主張，無疑義的，是以蘇俄方面表現出來，尤其

是在他們開始計劃的初期，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有一點，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就是蘇俄之所以持這種態度，其動機與計劃本身，並沒有關係，並且其動機，也不是完全經濟的。蘇俄之所以要使入口降到最低限度，僅限於用以建造國內實業的資本貨品，希望能用這些資本貨品，去製造從前要從國外輸入的貨物，其動機大部分是起於軍事的。

我們知道，蘇俄當局所時刻提心吊膽的，是怕國外的人，要向蘇俄進攻，這纔是蘇俄所以要求自給，不必仰給外國貨品，與所以要把七年八年的工作，縮短為五年，而至於四年的真正原動力所在。此外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蘇俄為誇耀他們社會主義化的經濟制度起見，他們不願意去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因為那些國家的經濟活動，都是受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所支配。自然凡是一種貿易，或是某種入口貨，真正與蘇俄計劃的成功，有切身的關係，他們在表面上，是樂於接受的，但是很明顯的，這個並不是出於心願的。自然就他們的立約看來，這是很正當的，很對的。其所以對，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要實行計劃經濟，乃是因為他們自己是馬克斯社會主義的信徒，是唯物史觀的信徒，而與他們發生國外貿易關係的人，是具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人們。

根據蘇俄與非共產主義國家通商的經驗看來，我們很明顯的認識，計劃經濟雖然與自給，不必並肩而行，但是計劃經濟，要想與其他國家，有成功貿易的關係，一定要遵守幾個條件，這些條件，或是社會的，或政治的，或為經濟的。所謂社會的與政治的條件，上面已經提過，就是經濟制度的好壞，不專就經濟上的成就如何，加以判斷，是要在經濟範圍之外，就其所附帶發生的社會狀況，來判斷其好壞。目前我們要想對於計劃經濟制度的好壞，下一個科學的判斷，我們不免受非共產主義國家，對於蘇俄所持的各種意見的影響。他們對於蘇俄的宗教觀念，對於蘇

俄的婚姻制度，對於蘇俄的階級成見，與排斥異色等問題，都有所批評。他們所批評的意見，同時也就影響到蘇俄與這幾個國家的貿易關係，並且連帶的影響到蘇俄與這幾個國家的政府關係。結果蘇俄與世界上各國的貿易關係，永遠不能穩固，時常被與貿易本身無關係的事件，所阻撓。比如這次蘇俄捕了幾個英國人，經審判之後，認為按着蘇俄法律，其中有幾個人是有罪，而結果英國與俄國的貿易，就此斷絕。但是假使德國政府，同樣的逮捕一個英國人，把他下獄，英國或許要提出抗議，但是英德的貿易關係，還可以維持無恙。我們固然可以說其原因是因為德國比俄與英的關係重要，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其原因乃是因為德國不是共產黨的國家，至少德國在目前還沒有根據某一種信仰，或是某一種哲學，來樹立一個社會的制度，政治的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公認的原則，相對立。所以歸結以上所說的各點看來，其主要之點，就是一個國家，要想以計劃經濟，來代替非計劃經濟，同時還要非同計劃經濟國家，實行貿易，頂好請他注意到那些非計劃國家所公認的原則。換句話說，兩個國家，無論發生何種關係，欲求其關係之成立，必須在兩方面都覺得無所損於任何方面的空氣下，纔能成功。

同樣的，在經濟方面，一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國家，假使要想同一個經濟制度受價格機能支配的國家通商，那麼他也受不是由他自己所定的原則的限制。我們知道，計劃經濟是很有操縱某種貨品價格的力量，這個力量，可以應用到銷售於國外的貨物上，同時也可以應用到凡是計劃勢力所能達到的生產事業，與消費的範圍內。比方說，蘇俄的牛油，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地位，假使他要抵償這部分的損失，他可以在別的出口貨物的盈利上，拿出一點錢，來補助牛油的出口。這種辦法，在普通狀況之下，自然是不值得的，因為我們要認為傾銷是完全與傾

銷者有利，受其害者，唯有被傾銷者，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不過假使蘇俄要想在國際市場上，占相當的位置，或者他特別需要將某種貨物，運輸出口，那麼上面這個辦法，也許有時是值得使用的。但是他要想無限制的對於別的國家使用這個辦法，是不可能的。因為非共產主義國家，與資本家的集團，他們有時候也想法子用補助的方法，來鼓動某種貨物的出口。那麼在這兩造相競爭的當兒，非計劃國家，可以連合起來，對於計劃國家，實行杯葛，凡是不必仰賴計劃國家貨品的國家，恐怕都要參加這個杯葛的。

所以在非計劃的國際環境裏，要實行一個全國的計劃經濟，而其國家又不能任經濟上自給，那麼有一個條件，一定要遵守的，就是他應當在某種限制範圍之內，使用這個補助某種貨品出口的權力。這一個限度要怎樣的確定，自然是容易的。其困難程度，就好像在一個非計劃經濟國家，一個商人他只能實行傾銷到某種限度，纔不至於引起別人的抗議，同時還不至於引起別人，對他施行報復。所以我們在這裏所能提醒計劃國家的，就是他們傾銷的限度，在數量方面，在範圍方面，都不可以甚過一個商人在非計劃經濟國家裏，實行傾銷的程度。假使計劃國家，是聰明的，他們應當知道，因為他們在傾銷方面，占有超越的權力，所以他們在每一種行動上，都會引起人們的懷疑；所以他們應當自己知道檢點，不應當過於太侵犯人家了！

這一本書，現在已經把實行全國計劃經濟的幾個最低的條件說得很多了！在這一本書裏，我很明顯的指出，要實行計劃經濟，其所遇到的阻力，與其感受困難，多一半是在人類的意志方面，少一半是在技術的困難，與自然的阻礙；其前途之為樂觀悲觀，請讀者自斷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30523)

經濟計劃經濟與非計劃經濟一冊

Plan or No Plan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arbara Wootton

譯述者 王世憲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陳忠杰)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25028



4

16